

書評與書序(上)

著者●殷海光

殷海光全集

殷海光全集

090.9(套)
122-0(第十六册)
15

書評與書序(上)

殷海光全集

書評與書序(上)

殷海光全集 拾 陸

著 者 ●殷海光

發行人 / 賴阿勝

出 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 址 / 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 / 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 / 886-2-3969194

郵撥帳號 / 0104579-2

印 刷 / 東良印刷廠

初版一刷 / 1990年4月(印數1~2000本)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 價 / 200元

ISBN 957-551-090-9(套)

ISBN 957-551-122-0(第十六冊)

《殷海光全集》序

我是一九四五年美國原子彈投在日本後與我的丈夫第一次見面。他剛從印度退役回國，來重慶找工作，暫住在我娘家。那時我十七歲讀高一，看到他就迷上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具有學問、最了不起的人，一心要跟他一輩子，即使做他的佣人也心甘情願。雖然偷看到他寫給我哥哥的信，說他要獨身一輩子，但是不知爲什麼信心那麼強，堅信我一定會得到他。我的父親雖然欣賞海光的才學，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但非常反對我與他相好，想盡方法阻止。加上正逢國共兩黨打仗，兵荒馬亂，整個中國一片混亂，海光與我一直分離兩地，所幸通信從未間斷。一九四八年底我們逃到湘潭時，海光突然寄來一本很厚的哲學書（海光的來信父親多半過目，而且還問我

爲什麼我們每到一處他的信就來了)。我父親對這本書覺得很怪，每天躺在床上讀一陣，每次讀讀便睡著了。有天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一邊大叫，原來他發現有兩條拉成長形的金戒指藏在書的訂線邊內，這是海光寄給我去臺灣的旅費，他在信上不敢提，我也不知道，居然被我細心的父親發現了，他感動的對我說：「海光不完全是個書呆子嘛！我的小女孩，共產黨馬上要來了，我做爸爸的再也不能保護你，只好讓你去臺灣與海光相聚。」說完我們父女相抱痛哭。

與海光結婚後，他的生命絕大部份花在讀書、教學及寫作。他的著作及言論提醒人們對民主自由的覺醒及追求，但帶給他自身及他的家庭災難與逼害，也帶給他的朋友及學生們災難及逼害。有一次他對我說：「我也不是那麼笨，要吹牛拍馬、說歌功頌德的話，混到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誰不會？只是我的良知和個性使我做不出來。」

一九八九年是殷海光逝世廿周年，不知爲什麼今年特別不平凡，首先是中國，接著是波蘭、東德、捷克等共產國家風起雲湧的向獨裁集團、恐怖統治者挑戰，千千萬萬人要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假如殷海光今天活著，他一定會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飯。多麼令人震撼及興奮的事實發生，而且發生得這麼轟轟烈烈！

廿年前殷海光被國民黨圍剿逼害，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接著海光罹患胃癌，甚至主治及手術醫生說他只能活六個月，國民黨仍不讓他去哈佛大學做研究員。

他在臺灣大學任教職的學生們莫名其妙的被解聘，朋友及學生們被捏造罪名坐牢受苦刑。我一人剛到美國時做過傭人，做過大廚，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四小時，凌晨三時才能回家睡覺。我們的不及犧牲值得嗎？看到今年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使我覺得殷海光所說所寫的是對的，我們大家受苦犧牲在極權國家是必經的過程，是值得的。

《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我必需感謝夏道平先生，以及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王曉波、胡基峻。沒有他們的奔走與協助，全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尤其是陳宏正，近十年來，由於他的策劃與努力，使得殷海光的著作與精神，重新獲得大家的認識與肯定。臺大哲學系林正弘負責全集編務，賴阿勝先生不怕困難，擔負起全集出版的責任，我都必需深深的予以感謝！

殷夏君璐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於美國

《殷海光全集》 編者的話

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二十年來，港臺之間先後出版過多種專集，選錄他的論著、書信，或他的門生故舊懷念和評論他的文字，但迄今未有重印他全部著作的計畫。桂冠圖書公司爲了紀念這位勇敢的書生，決定把他一生所寫過的全部文字，以及他的親人、朋友和學生所寫的懷念和評論文字，重新整理編排，分冊印行。

本套書取名爲《殷海光全集》，並不意涵已收入殷先生的全部文字，而只是表示編輯的理想目標而已。我們依據已經出版的各種選集，參考某些選集中所收錄的殷先生著作目錄表，並多方訪求殷先生的親友和門生，儘可能蒐集完備，分類編排。但遺漏缺失，勢所難免。在此，我們一方

面要向以前編過殷先生選集和著作目錄表的各位先進，以及提供資料和消息的各位朋友，表達我們的敬佩和感謝之意；另一方面要懇求大家繼續指教，使本全集再版時能更爲完備。

本全集除了「專書」之外，將殷先生的單篇文字分成《政治與社會》、《學術與思想》、《書評與書序》、《雜憶與隨筆》及《書信集》五部分。別人所寫的懷念及評論文字則另成一單元。各部分文字大都按發表或寫作的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專書」包括殷先生就特定專題所撰寫的單行本、教科書，以及成冊的翻譯作品。他所寫的邏輯教科書《邏輯新引》，幾乎每一講都利用邏輯題材，借題發揮。他的譯述英文書籍，也常在譯文中附加許多「譯者的話」，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都有助於瞭解殷先生的思想。唯獨他少年時代所譯《邏輯基本》一書，內容過於陳舊，且未在譯文中附加譯者的意見，我們仔細考慮之後，決定不收入全集之內，而只把他所寫的譯者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此外，殷先生在世時所出版的單行本，有些是由已發表過的單篇文章集結而成的。《思想與方法》一書即是如此。對這種單行本，我們決定把其中所收錄的文章，按其性質及其發表之時間，分別編入單篇文字的五部分之內，並將其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而不再以專書形式印行，以免重複。

在單篇文字方面，《書信集》部分最不易收錄齊全，其次是《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勤於寫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的，但收信人未必有保留書信的習慣，且散居海內外各地，訪求不

易。有些書信只記月日，未標明年代，從書信內容無法斷定其何年所寫，收信人也無明確的記憶。這一小部分書信，自然無法按寫作的時間先後，正確編排。在《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所寫的社論，因未署名，不易認定。我們暫且只收錄能夠確認的文字。我們盼望讀者，尤其是殷先生當年在〈中央日報〉的同事，能夠提供資訊。

懷念和評論殷先生的文字，除了收集他的親友和學生所寫的文字之外，還選錄了一些從未和他見過面的年輕學者所寫的論文。此外，我們也把已經出版的各種殷先生選集的編者序言收錄在這部分的文字之內。這些序言，一方面表達了編者對殷先生的懷念與評價，另一方面讓我們明瞭殷先生的著作在其去世後重印發行的概況。

我們以謹慎的態度和惶恐的心情來編這套全集。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責任。

林正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目 錄

《殷海光全集》序	殷夏君璐	一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林正弘	五
羅素論權威與個體		一
第二十一世紀		三三
蘇維亞怎樣管制思想		五一
民主政治		六一
二十世紀哲學		七一

追求與幻滅·····	八一
美國八位偉人·····	九七
怎樣擊敗俄國·····	一〇五
一九八四年·····	一一三
極權對於民主自由的威脅·····	一二三
文明是怎樣創造的？·····	一三三
科學與社會·····	一四七
自由人·····	一六三
第三次世界大戰寫真·····	一七九
雅舍小品·····	一九五
羅素論權力·····	二〇九
世界之新希望·····	二二五
經濟政策與經濟學理·····	二四一
羅斯福夫人回憶錄·····	二五七
莫斯科的寒夜·····	二六九

美國去來	二八三
羅素畫傳	二九七
新蘇維埃帝國	三二三

羅素論權威與個體

引說

權威與個體之間的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這個根本問題潛在於(Underlying)組織與自由，統制與放任，群性與個性之間。並且，由之而衍出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底各種差異。因為這些東西有各種差異，於是而各別地或合同地予人類生活以各種不同的影響。

不幸得很，無論在概念上或本質上，權威與個體二者是不相容的或至少是不易調和的。因為二者是不相容的或至少是不易調和的，於是，主要地受二者之一影響甚至於決定而衍產出來的政

治制度，社會結構，或生活方式，與主要地受二者之另一影響甚至於決定而衍產出來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或生活方式不相容或至少不易調和。既然如此，於是它們難免發生摩擦，時起衝突，甚至演成鬥爭，人類許多不幸由此形成。自古代希臘以迄現代極權與民主之對演，從一方面觀察，正是權威與個體底衝突之具體表現。人類一直自陷於因二者之未能調和所衍成的災難之中而無以自拔。但是，這一目的易於言說而不易於實現。

人類如欲免除因權威與個體之不相容或至少不調和所衍成的種種災害，而過幸福與進步的生活，那麼，必須設法使二者相容或至少互相調和。

權威之所以得以長期支配人類底大部分，因為它並非全無必要。著重權威，思想容易趨於齊一；個體力量易於凝聚；社會比較少有混亂而易趨穩定。這些因子或其總合，在相當範圍內是有利於共同禦患求存的。可是，權威的好處裡也正潛藏著它的害處。思想齊一一旦趨於凝固，個體的思想便不得自由，智慧發展為之阻障。如果思想齊一而與權力政治掣合，那麼思想齊一就變成統制工具或愚蒙萬眾的魔障。復次，政教禮俗長期「定於一尊」，囿於定型，則民族創造精神能力日趨萎縮以至於死滅。權威凝固到這一程度，可能使整個民族外而不能禦侮，內而不能應變，必至難以適存。大陸性的民族常易陷入這種危險之中。

個體底獨立與創進精神之抒發為一切富於精神生活者所嚮往之最低限度的必須條件。自由主

義者追求此種條件尤為熱烈。個人底獨立創進精神能力得以充分抒發，人類文化易於進步。文藝復興和近代科學底重大進步就是個體底獨立創進精神能力底表現。可是，個體發展並非全然無害。歐洲十九世紀放任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弊端是一顯著實例。假如一個社會完全包含各自獨立的個體，那麼各個個體的力量游離而不易凝聚。假若各個個體底力量游離而不易凝聚，那麼也就不易團結求存。個體生活的內容豐富而凝聚力薄弱的高度文明社會，不易抵禦文化雖然較低但團結緊湊的獷野民族之蹂躪。

由此可見權威與個體二者各有短長，二者非予適當安排不可。但是，不幸二者在性質上互相妨害。鞏固權威，勢必妨礙個體發展。放任個體發展，結果必至推翻權威。我們要予二者以適當安排是非常困難的。不獨如此，世界近百年來的發展，尤其是近數十年來的發展，益愈顯得這個問題一天比一天緊急，也益愈增加這一問題解決底困難。近數十年來世界政治、經濟，與軍事底激劇變化，產生了幾種型式底極權統制。這幾種型式底極權統制構成對於個體自由獨立之史無前例的嚴重威脅。復次，一個現代化國家，即使沒有實行極權統制而是實行民主政治，可是，現代科學技術之應用於政治管理，尤其是大規模工業化之應用於經濟發展，也不易避免地構成使個體底自由獨立日漸消失的趨勢。因此，權威與個體之間的衝突問題到了現代更見嚴重。怎樣將權威與個體作一適當安排的問題，到了現代不獨沒有和緩，反而隨著科學技術與工業進步而愈形迫切。

這個問題關係著人類前途的禍福苦樂。許多有識之士苦思焦慮以探求這個問題底解決。老哲學家羅素便是其中之一。他爲了這個問題，曾作了一序列有系統的講演。題目叫做「權威與個體」(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在這一序列有系統的講演裡，羅素首先從心理方面討論社會行爲與反社會行爲底泉源；政府管制底廣度與深度；考察歷史上，藝術、科學，與道德方面個體所盡的任務；然後，他探求足以決定政府底職能和個體底職能的諸般政治原則。他認爲只要無礙於秩序與安全，統制愈少愈妙。他看出將權力集中到中央的權威以控制龐大的機構，並且將行政權委諸遠在中央的官吏，是很危險的事。他相信縱然某種程度的中央管制是必須的，但是，我們依然可能保持個體底創進精神；同時，這也是很重要的事。他並爲此提出許多原則和方法。

社會凝聚與人性

在一開始，羅素討論人性中的許多衝動，這許多衝動使得人類可能有社會性的合作。他說，在一切社會動物中，包括人在內，合作和團結，有其本能的基礎。蟻與蜂就是好例。不過，蟻與蜂的社會生活是機械的，刻板的，和固定的。牠們未能產生偉大的藝術作品，或發現何種科學規律，或創立什麼宗教以教化蟻衆。人類顯然高出一籌。他們有這些創建。人類社會群體生活之最

強固的和出自本能的單位是家庭。從家庭又過渡到部落。從家庭過渡到部落之原因，可想像地，也許是由於集合起來打獵比較收效些。在極早的時代，部落之所以團聚，是由於各個部落發生衝突所致。在人類的行為變得優美而複雜以前，群性使得他們一小群一小群地聚在一起。這時，對內極其友愛，而對外則極端敵視。在這個時候，個體對於群體之效忠，因效忠於一個領袖而增強。在一個較大的部落裡，即使各個個體彼此陌生，但首領則為每人所知。

從早先的時代直到現代，戰爭是擴張社團的主要動力。有戰爭就有恐怖，恐怖易於使人感到需要一個首領和需要集團。於是，「恐怖心理」代替「部落結合」，而成爲社會凝聚底泉源。這種趨勢與日俱增。史達林輩深知此理，所以長年製造「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恐怖，藉以部勒人民。在文明發展底較後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結合力量。這種新的結合力量就是「信仰」。信仰相同者常常結合在一起。這一因素，發展到現代，成爲社會凝集的有力因素。近幾十年來，許多非民主性質的政黨通過政府機構將「主義」從個人散漫自由信仰的狀況組織而成人民大眾一律接受的齊一狀況。這樣一來，信條之一致，愈益成爲社會凝聚的有力因素。這一因素，又作用爲藉統制思想而壓迫個體自由的工具。在蘇俄，信條底統一與國家底統一聯繫起來的；並且，超出國界以外而發生一種吸引力。

除了戰爭以外，現代文明日日趨向於設法增加人類底安全。但是，並非消除了一切危險就可

使人幸福。許多中國人以爲「平安就是福」。美國北部印第安人寧願在危險生活中覓取光榮。一個平靜的生活簡直是一種乏味的生活。許多充滿精力的年輕人，常常願意放棄安定的生活，而冒著危險尋求刺激，一個良好的社會應予這些人底精力以發洩的機會。否則，無形埋沒了人類許多有價值的成就。

社會凝聚與政府

社會單位底擴大主要地乃戰爭之結果。社會單位如果變得太大，以致各個分子彼此不易認識，那麼便需要某種機構來集體地決定事務。這樣的機構，漸漸發展下去，經過許多階段，就成爲現代所謂的政府。既有了政府，於是便有些人比其餘的人更有權力，愛好權力(Love of Power)的動念使得統治者企圖征服別人。當著被征服者沒有被殺掉而是淪爲奴隸時，征服的企圖更形熾盛。於是，因政府有權懲罰不服之徒，社會凝聚大爲增強。在這樣的社會裡，只有少數人在社會上層。這些人，例如像國王，貴族，和僧侶，只有他們才需要一種心理的機械律來促進社會凝聚。其餘的人衆只服從就行了。無疑，在這樣的統治之下，廣大人衆是不愉快的。有許多帝國之形成，是靠著一個偉大征服者的威望。當著這個征服者亡故，則帝國歸於冰消瓦解。因爲，這些帝國之統

一完全靠兵力，而沒有心理的統一。羅馬帝國稍勝一籌。因為希臘羅馬文明，為受教育者所珍愛，而且這一文明與防線以外的部落的野蠻主義適成尖銳對照。

羅素此言，真足發人深省。在任何場合中，要人效死奮鬥，必須讓大家真正感覺有值得犧牲生命來保衛的東西——珍貴理想或歷史文化。而且領導之者，必須在學問人品方面足以服衆。

政府常干涉個體生活。埃及，巴比倫，諸帝國的上層社會分子保有大量個人創進精神的自由，但是由對外征服而獲得的大量奴隸人衆則沒有這種自由。僧侶階層從多方面干涉人民日常的生活。羅馬帝國嘗想把文明世界統一起來。這一企圖之所以結果不幸，主要地是由於它沒有給予人民以本能上的快樂。在羅馬帝國末年，國內普遍發生悲觀情緒，人民無精打采。大家覺得活在世界上沒有什麼意思。這種情形有助於基督教以來世永生的福音來團結人民底思想。從十五世紀到現在，政府干涉個人的權力日有增加。在起初，主要地是由於火藥發明。政府底權力增加，個人自由日漸失去。所以，崇拜自由趨勢也隨之增長。所謂「全體戰爭」出現，幾乎置社會每一分子於高度緊密的控制之下。因而，大家更感覺到自由之可貴。

政府，從古至今，有二種功能。一種是消極的，另一種是積極的。政府底消極功能是制止侵犯他人，保障個人底生命財產。政府底積極功能是滿足大衆底需求。時至今日，政府底積極功能大為增加。因而，中央化之趨勢也與日俱增。照情形看起來，這種趨勢很不易抗拒，除非它引起

災害而為大眾制止。而且，在人類制止因此而產生的災害以獲得個體自由之前，這整個的統制體系崩潰。這整個的統制體系一經崩潰，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無政府狀況和貧困。

在一方面，從鬆懈的和原始的組織型式演進到比較有秩序的政府，是經過週期性的發展程序的。在這一發展程序底某一點，財富和安全大為增加，而野蠻時代底活力依然保存起來並且企圖心依然熾盛時，易於在促進文明上獲致重大的成就。但是，當著這一新文明定型之後，政府有時間鞏固其權力，且風俗，傳統，和法律都形成足以窒塞企圖心的規律時，那麼社會就趨於僵固。到這個階段，人們就開始追憶過去的光榮，懷念祖宗創業的艱難。但是，卻沒有誰能趕得上這些祖先。這時，藝術變為一種成規的東西，科學的進步則被讚揚權威所阻礙。中國和印度就是如此。社會凝固到這種地步，結果難免遭受外力侵略。當著這樣的國家遭受外力侵略時，常用老的原則來抵制老的敵人；但是，當著新型敵人興起時，它就不能適應新形勢以採用新的原則來單獨制敵而獲得安全。漸漸地，在一種新的但卻又多少是無政府的狀況之下，活力開始恢復，新的勢力抬頭。

除了這種週期性的發展以外，還有另一形式。在每一循環底頂點，一個國家所管轄的領土比前此任何時期為大。國家權威對於個人的統治程度較前此任何時期猛厲。羅馬帝國比巴倫帝國和埃及帝國為大。現時的帝國比羅馬帝國又大些。在人類過去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大國像蘇俄這

樣全面管制其人民的。既然地球底大小有限。這種帝國擴張的趨勢如果不加限制，結果只有產生一個世界國家。

現代技術使政府統制得以更加緊湊。這種可能性已被極權國家充分利用。也許，在戰爭壓力之下，或在戰爭恐懼之下，或因極權勢力之征服，世界保有某種程度的個人自由的地域愈來愈小；而且即使在這些地域，個人自由也愈來愈受限制。這樣一來，古代的罪惡就復發；大部分人類受到奴辱，偏狹的迫害，不寬容的威脅，和卑劣的看待。這是人類底不幸，反抗這些不幸，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因著這種理由，時至今日，注重個體底價值，比任何前此時期更較必要。

個性的作用

在討論了社會凝合與政府管制以後，羅素討論個體底衝動和欲望之重要。

在未經長期嚴格統制的社會裡，總有某些人，他們不完全合乎一般人底型式。在實際上，一切藝術，道德，和知識的進步，都有賴於這類比較特別的人。這些人是從野蠻過渡到文明的決定因子。如果一個社會要有進步，那麼需要這些例外的個體。這些個體底努力，雖然是有用的，可是並不須同乎尋常。然而，在一個具有高度組織的社會裡，往往有一種趨勢，這種趨勢就是給予

這類特殊分子底行動以不適當的妨害。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個社會一點管制也沒有，那麼能產生有價值的改進事業的個體創造能力，同樣可以產生惡行。所以，問題在如何維持社會管制與個人創造之平衡。自由太少使得社會僵固；自由太多會引起混亂。

藝術家是富於創造精神能力的。藝術家在古代很受人尊重。直到現今，我們還是尊重藝術家。可是，我們把藝術家隔離起來，我們以為藝術是與世隔離的東西，而不是社會生活之不可少的部分。

社會上一致認為偉大人物的人物，常為宗教與道德的革進者。縱然，這些人物在死後被人尊從，可是，大多數在生時多少與其社會捍格不入。今日，一切道德上的成就，常為古代蠻性底重現所摧抑。但是，我們不相信，這些道德家們所表徵的道德進步到頭來終會消失於人間。

雖然，軼發道德進步的先知和聖人們，大部分在生時不為人所尊敬，但在從前並沒有人有計畫地阻止他們傳道。可是，在現代極權國家裡，情形比蘇格拉底時代惡劣得多。在一個極權國家一個改進者底觀念如果不為政府所喜，那麼不僅他本人被處死而已，因為在一個勇敢的改進者看來，死根本是無所謂的事，而是完全禁止他傳佈其主張。在這樣的社會裡，改進之事，只能由上而下地由政府發動。不過，現在的政府，正像在過去一樣，不願意發動與其自身利益直接衝突的任何改革。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之中，一切毛病都成不治之死症。這是人類歷史中的一種新事實。這

一新事實之所以形成，是由於政府堪能利用現代技術大為增加對於個人的控制。這是一個極其可悲的事實。這個事實表明，在一個極權統治之下，每種道德進步是如何定命地不可能；而只有眼睜睜地見其由日漸墮落腐潰而趨於滅亡。不幸的是人民。

興念及此，憂時憂世的老思想家羅素，也不禁概乎言之。

科學，經過長期與神祕奮鬥，已經從神祕之中解放出來了。當著科學是知識底系統時，我必須把它看作是有價值的東西。可是，當著科學是技術時，那麼它究竟值得我們讚揚或譴責，這要看我們怎樣運用技術而定。就科學本身說來，它是中性的，根本無所謂好與壞。我們對於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如何作價值判斷，不能靠科學作最後決定，而須從科學以外的其他方面去找來源。

羅素對於科學的這種看法，是公平而正確的。這種看法矯正了科學萬能觀，同時也矯正了科學萬惡觀。

科學家們，縱然給予現代人類底生活以深遠的影響，但常不及政客有權。在現代世界，如果一個個體不能夠掌握大的組織，那麼他幾乎不可能獲致重大的成就。我們猜想在不久的未來的世界也是如此。現今，一個人如果在工作時沒有一個組織來幫助他，像一個希伯來先知，或者像斯賓諾薩(Spinoza)這樣孤獨的哲學家，那麼他不能得到在過去的日子相同的人所能得到的同樣重要的影響或成就。過去的科學家多單獨從事研究，但是現在的科學家需要許許多多設備和助手。

凡此等等，要靠政府幫助。在美國，要靠富人資助。因此，時至今日，科學家不復是一個獨立的研究者，而根本是某一巨大組織底一部分。這一變化是很不幸的。一個人，除非是一暴君或獨裁者，他將很難發展抱負，以期有所影響於大眾。一個政客，可以想出辦法來做一國底首領。一個科學家可向政府出售他底努力。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便不是爲自己底目的而工作，而是爲別人底目的而工作了。

這種情形，不獨對於極少數例外的偉大天才爲然，對於許許多多有才力能幹的人亦然。時代的這一悲劇，乃社會的一切被集中和組織到一種高度，使個體底創造能力大受限制所形成。組織既然這樣謹嚴，個體底創造能力既然大受限制，你如求發展，必須向組織低頭，尤其須向控制組織者低頭。如此，假若你要從事某行業務，你必須逢迎巴結在這行業佔勢力的人，從而你方有希望承受他底權力。

作者可依同理推論，在世界某些以專制意識爲體而以半現代技術爲用的組織中，文人寫文章必須逢迎這一組織中權力者底意旨。其他人底行動依此類推。否則，你至少需要具有忍受窮困和準備接受迫害的勇氣。

現代人底生活與古代人真是太不相同了。他們被集中化的程序所拘束。集中化底結果是使人一個大的集體中遭遇太多的競技者，而且又要服從一種不適當的判斷品鑑標準。今日，我們對

於產生美好生活的那些創造情緒感覺得太少。關於重要的事物，我們是被動的；我們所能主動去做的事，常又卑瑣不足道。如果我們是從煩惱的人生中自拔出來，便必須恢復個體底創進精神能力。我們不僅要本此精神能力去做瑣細的事，而是要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我們說這話，並不是鼓動人去破壞大多數人賴之以生存的那些現代組織之必要部分。我們底思想是說，那些組織應須具有彈性，比較能讓地方自行管理，儘量避免因其龐大無情所引起的對於人類精神生活的壓迫。

現代技術與人性底衝突

人類與動物不同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他們常做自己所不高興的事體。因為，這些事體往往是達到目標的手段。爲了要達到所欲的目標，人類常常訓練自己自制，審慎，或以意志力克服衝動。但是，這也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超過人性所能忍受的限度以外來克制自我，那麼便會受到心理的懲罰。在文明的生活之中，一部分的心理懲罰是無可避免的。但是，照我們看來，大部分的心理懲罰是不必要的，而是可藉不同的社會組織來避免的。

奴隸制度底發生，使工作底目的和工作者底目的開始分歧。埃及底金字塔是爲光耀諸法老王而建立的。但建立金字塔的奴隸並不能分享其光榮。他們之所以工作，至多是爲了活命，或者避

免監工底咎撻而已。在工業革進以前，消除奴隸制度，手工業興起，這使得自己作自己底主人翁的工作者之數目增加。這時，他們可以誇耀自己手工的製成品。可是，工業革進以後，大規模機器生產發展起來，情形就一天一天地變得不同。汽車製造就是一例。公司組織底目的是製造車輛，工人只不過為賺取工資而已。從主觀方面著想，工作場合中並沒有共同的目標。這種毛病之所以發生，主要地是由於機械化與組織之大規模擴張二者不可分離。由於機械化，沒有誰能做汽車底大部分，而只做汽車底一小部分。許多工作需要小技巧，而且做來重複又重複，所以工作顯得十分單調無味。由於組織之大規模擴張，在管理與僱工雙方並無統一的實感。有二種事物使工作者可以自尊自傲的感覺減少：第一是成品可以買賣；第二是大量生產。一個東西可以買賣，就不是無價之寶。展覽會裡標價的字畫之心理價值遠不若深藏高堂的手跡。美國機製的大量香水遠不若戰前巴黎工藝香水之可貴。

現代工業組織產生二種結果：第一是生產者對於製成品底興趣大減。因為，那些盡是標準化的一式一樣的商品，而不復是含有個人創作成分和性靈特徵的藝術品。第二是工作與報酬底距離往往很遙遠。一個叫化子紮幾隻紙人紙馬在街頭叫賣，馬上可以得到現錢。可是，福特汽車銷售海外，往往需要很久並且經過許多程序才能拿回售款。這樣，一切機械化了，創造意味的親切感幾乎全然消失。

這類底情形，在政治上亦復類似。有些人以為政府是民主的，它就會努力為人民謀取公共福利。這種看法似乎過分樂觀。因為，無論政府民主到什麼地步，在現代組織中的民主政府，無可避免地受到現代組織底支配，於是現代組織底先天缺點也就成為它底缺點。官僚主義興隆的地方不必去提，即使沒有受到官僚主義毒害的政府，也不易克服官吏與公衆之間因距離和分工而發生的困難。在一個高度組織的國家，從部長到低級職員，都有他們自身的利益；而這些利益不見得與公衆利益完全符合。其中最顯著的，是權力愛好，和不喜工作。當著你向一個人民公僕有所要求時，他搖搖頭，鼻裡哼一聲「不行」，便立刻滿足了他的權威和尊嚴感。這樣一來，在某種程度之內，他就似乎變成了他所要服務的人之敵了。他們不認識人衆，因而與人衆沒有親切感。當著政府與人民距離很遠，而公共行政又中央化下並且政權底權威從中遣派到四周時，公民在政府權力之前顯得尷尬的情形，是難以避免的。如索民主是確實在所感受之中，而不是僅僅在政府機構底形式中，那麼這類毛病是應須設法免除的下當然，獨裁政府毛病，千百倍於此，那是不必提的了。

戰爭，是調和個體與社會之最明顯的工具。在一個艱苦的戰爭裡，當國家獨立遭受威脅時，容易將各個個體團結起來，而在一個共同的意志之下活動。如果政府是勝任的，那麼人民樂於接受它底命令。這種情形與船觸礁時類似。但是，並沒有人贊成藉觸礁而訓練海軍；也沒有人因戰

爭可促成舉國一致而贊成戰爭。同樣，恐懼戰爭也促成舉國一致。但是，當恐懼戰爭之情促成舉國一致之時，人民會變得倦怠，同時易患歇里斯底亞症。依常理而論，將我們日常痛苦歸咎於一個敵人，並且引起大家仇恨，往往招致墮落。製造敵愾情緒固然可以激起原始本能的能力，但是結果常造成巨大災害。最妥善的辦法，是消除大家痛苦之源，或使大家瞭解痛苦與不幸由之而產生的原因。但是，如果強有力的勢力在政治上一天存在，而且迫使報紙鼓勵歇里斯底亞症的事實一天存在，這一理智的方法便一天難以實行。

英國近年來常呼籲義務感。適值危險之時，無可否認地，義務是必須的，但是訴諸義務感並非永久的解決辦法。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義務感會一天一天淡薄下去而失掉效用。因為，在義務感中，包含緊張感覺，並且要長期抵抗自然的衝動。如果我們長期抵抗自然的衝動，會弄得衰竭，並且減少自然的力量。

大多數人贊慕民主的平等，但是，卻少有人注意，許多事物和品質有為民主的平等而犧牲的危險。究其實際，這些事物或品質無需乎為民主的平等而犧牲。在這類事物或品質之中，最重要的也許是自尊。我們所謂的自尊，是高傲之良好的一半，即是所謂「合適的驕傲」。驕傲之壞的一半，是優越感。如果一個人具有自尊感，那麼一旦他處於敵人權勢威脅之下，可以不致卑情沮喪；並且助使他感覺到，即使全世界是反對他的，他所持的理由，依然正確。

筆者以為這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至大至剛的精神。可惜現在中國底知識分子具有這種精神的人為數太少了。他們不是依附這個權威，便是依附那個權威。自尊感已經不是他們底精神財產。

假若一個沒有自尊的品質，他將會認為大多數人底意見，或是政府底意見，是沒有錯誤的。這種感覺，如果普遍存在的話，那麼便不能使道德和知識有何進步。

照筆者看來，這樣的知識分子，充斥斯土。這才是中國今後真正的危機。作者以為，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是藉少數人底權威來打殺大多數個體底自尊感，而是給予大多數個體以充分的機會來保持這種自尊感。保持各個個體之自尊感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貧困，虐待，與痛苦，應該不復存在於現今文明之世。這些不幸的因素可藉科學和現代技術而刈除。在我們具有惻隱之心並且瞭解生命與快樂之源時，是可以把科學和技術這樣運用的。假若沒有這樣的瞭解，那麼我們就是於無意之間建立一個新牢獄。人類藉科學與技術建立的新牢獄，是無人可以逃跑出來的。於是，被自己建立的新牢獄所監禁的人類，長年悶惱，無趣，並且精神趨於死滅。

管制與創進

一個健全和進步的社會既需要管制又需要個體的和群體的創進；如果沒有管制，那麼便成無政府狀態；如果沒有創進，那麼就僵化。在一個社會中，我們所發現的性質，有些在根本上是靜態的，有些在本質上是動態的。大致來說，靜態的性質適於政府管制；而動態的性質應為個體或群體的創進精神能力所振奮。但是，如果創進精神能力不是趨於破壞的而是趨於建設的，那麼政府就應保障這樣的創進精神。依據前述的理由，在現今的複雜世界裡，如果沒有政府之助，那麼個人即使富有創進精神能力，也難以有何成就。但是，不幸得很，世上儘有無創進精神能力的政府。

我們以為政府底原本目的有三，即是：安全，公正，和保存。

安全底意思是保障生命與財產。可是，有些國家，在禁止人民侵害別人時，並不以為人民為了自身生命底與財產底安全而可以反抗政府。無論一個國家是怎樣強盛，如果政府不依適當法律程序來懲處人民，那麼人民就無安全可言。即使政府謹守法律程序，還是不足以保障個體的安全，除非司法獨立，不受行政干涉。只有在自由的國家才能做到這個地步。

不過，安全的生活不必然就是快樂的人生。悶惱和單調一樣使人感覺不快。這一點我們已經提到。安全是因希望免於恐怖而引起的要求。這種目的是消極的。一個適當的人生必須具有為希望所鼓舞的積極的目標。這並不是說，恐懼之情一無用處。適當的恐懼，可使人因求免於恐懼外界而激發力量而努力奮進。中國所謂「無敵國外患，國恆亡」，這話裡就包含恐懼之需要。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之所以淪亡，就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於德國太無所恐懼了。

公正，尤其是經濟的公正，在最近若干年來，成為政府所要達到的目標。在經濟的場合中，公正被解釋成平等。政治上的公正，就是民主。民主是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目標。而經濟的公正是一個較新的目標，並且比較需要政府管制，社會主義者主張，凡具關鍵性的工業和巨大的對外貿易，都由政府管理。照我們看來，這是正確的。

不過，照筆者看來，即使這些東西由政府管理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有一個絕對必須的前題，即是，從事管制的政府必須是真實實由人民選舉而構成人民可控制的政府，而不是在「革命」或任何藉口之下憑武力征伐而造成的政府。憑武力征伐而造成的政府，無論具何形式，它的本質終歸是軍事獨裁性質的。如果這樣的政府實行所謂「社會主義」，藉盡情控制重要工業以及銀行而扼制著國民經濟命脈，那麼它就如虎添翼，多一種最厲害的統制武器。在這樣的統治之下，善良人民永世不能翻身，只有一概走向奴隸之路以求苟延殘喘。蘇俄政權不過是許許多多這類政權中

之一典型的範例而已。

即使西方熱烈擁護社會主義的人，都不能不承認，經濟的公正是有限度的。復次，正同所有的人如果都富足時是公正的一樣，如果所有的人都貧窮也是公正的。假若我們不設法使貧者變富，而卻使富者變窮，這樣的公正不見得有何價值。

保存，像安全和公正一樣，需要政府來籌畫。我們所謂的保存，不僅是保存古跡，公路，橋樑，公用事業等等。我們認為主要保存的工作，是保存世界的自然資源。這件事體非常重要，可是很少人予以注意。過去一百五十年來人類發展工業而開發資源所浪費的自然資源，為數極大，而且這種浪費趨勢與日俱增。最顯著的例子是汽油。地球蘊藏的資源之數量有一定限度。這樣消耗下去，終有窮盡之日。農業方面的情形正復類似。英國的種植方法甚易耗盡地力。這類底惡劣趨勢必須設法防止，以保持自然的資源。這類事務私人不克勝任，必賴政府負擔。

齊一性，是政府管制之自然結果。有些事需要齊一性；有些事不需齊一性。並非所有的事都需要齊一性。比方說，在討論問題時，如果各派抒發不同的意見，這是很好的事。在心靈世界，諸子百家，異說爭鳴，最有力的學說最後站得住。藝術家和著作家應須保持差異。不過，著作家底創造精神能力雖然保持至今，可是在許多方面已經受到威脅。如果版權操諸政府之手，政府就得以決定那一種書可以出版，那一種書不可以出版。除非圖書出版權委諸全無黨派偏見者之手，

否則，除了合乎主要政客底胃口者外，將沒有書籍可以出版。報紙雜誌，情形正復相同。在這種範圍以內，整齊劃一，簡直是一種災害。但是在一個國家以內毫無限制地實行社會主義便極易發生這類底結果。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現在的科學家不復容易藉個人單獨研究而得到什麼成就，而必須藉國家底設備或資助來研究。這樣一來，決定誰應得到這些便利的條件，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只有被視作正統派的人才能得到這些便利，那麼科學的研究一定爲之窒息。如果中央機構爲了統制某項事物，在訂定方案時好像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其實是一無所知，那麼實行起來，所結果實就是阻礙個體底創造精神能力。

在一個獨裁的國家，政治的權威統制著一切公共機構，一個具有特殊創造力的人底命運是很悲慘的。無論他是否觸犯法律，也不能將他底觀念發展出來，讓大家知曉，更無法讓大家受到他底觀念底影響，抱有政治方面的雄心者底命運常更悲慘。

誠然，活比死好，但我們不能僅止滿足於不死而已。我們要快樂地，生氣蓬勃地，富有創造力地活著。爲此，國家應能給予一部分必須的條件。政府不可阻塞個體底創造衝動。因爲，創造衝動使得人活著人味。個體應有其適當的位置，而不應完全從屬龐大組織底統制。在現代技術所創造的世界裡，防止這種危險是特別必要的。

防止這種危險的辦法是讓個體的創進精神能力得以在一個團體中儘可能地發揮。如果要辦到這一點，必須這個團體很小。如果我們各是一個小團體的一分子，那麼我們便有合理的希望來影響這個團體底行動。在一個小的團體中，個體既不被掩沒，個體底才智和企圖心便容易舒展。反之，在像國家這樣的龐大團體中，我們總容易感覺到我們是被治者。某種程度的中央管制如果不可避免，但爲了個體創進能力不被抑壓而得以順利舒展，應須逐漸減削國家底權力！將中央權力依地理的，工業的，和功能的差異而分化爲較小的單位。在這些較小的單位中。個體既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可使精力充沛和雄心熾盛的人感到興趣和滿足。這是止息一國內部的禍亂於未然的根本辦法之一。

除此之外，我們必須建立一世界政府。世界政府底職能是阻止戰爭。因而，世界政府必須單獨保有軍隊，有權訂定並修正條約，有權仲裁國際糾紛。但是，世界政府不應干涉各國底內部事務。

羅素這一提示，似乎含蘊著「大同世界」的理想。雖然，這一理想距離實現之日尚遠，確爲止息世界禍亂的一方案。

社會倫理與個體

我們現在來討論個人的倫理

沒有人是完全自由的，也沒有人全然是奴隸。在人有自由的時候，他需要個人道德來指導他底行爲。如果一個人嚴肅地要求有良好的人生，那麼他必須對於一般風俗習慣持批評的態度。

從歷史記載看來，倫理信仰有二個不同的根源。第一是政治的；第二是關於個人宗教和道德信條的。如果沒有公共道德，社會要歸於毀滅。如果沒有個人道德，人類底生存就無價值。所以公共道德和個人道德同爲一個好的世界之所必須。

無論我們怎樣正確地去盡我們底道德義務，倫理不止關繫乎我們底近鄰而已。因爲，履行公共義務並非良好生活之全部；我們還得追尋個人最優美的性行。因爲，雖然人類一方面是社會動物，可是究非完全是社會動物。如果我們讓政治和社會義務的觀念過分成爲宰制個人優美性行的觀念，這是一件危險的事。一切宗教領袖，以及一切藝術家和知識底創發者，都表現了道德義務感，以滿足他們底創造衝動。假若我們有很深的良心信條，要我們做一件事，可是這樣做是必遭政府權威譴責的。我們就應該照自己底良心行事。

我們不要以為個人範圍以內的行為在倫理價值上比社會義務底倫理價值低。有些最好的行為，至少在情緒上，與其說是社會性的，不如說是個人性的。例如，科學的發現常常出自孤獨的個人。當著這類底發現者之主要的創造衝動強烈時，如果權威與其深信為真的東西相左，他們便覺得他們不能服從權威。在道德的事件上亦然。正是這樣的人才將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帶到世界上來。他們不僅在宗教上，在科學上有所貢獻而已，並且在增進社會義務感上，也是一樣大有貢獻。這樣的人常是孤獨的。他們底思想和情緒不為群眾所支配。

假若我們不願人生變得索然無味，那麼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許多事物雖有價值，但卻不必有實際用途。常常某一事物之所以有實際用途，乃由於它是另一事物底工具或手段。而這另一事物，如果不再是其他事物底工具或手段，那麼，必須是因其本身之存在而有價值，或者說，這一東西底價值就在它本身。如果沒有這一最後的本身具有價值，那麼所謂用處也者，不過一幻覺而已。

我們要分辨什麼是目的，什麼是手段，而且予二者以適當的均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過這件事做來十分不易。最顯然易見的實例，在現代政治的許多運動中，當運動發軔之初，領導者標尚一個理想目的，並可藉以激誘大眾，同時，為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不採取許多手段。但是，行之既久，只看見手段，而原來的理想目的，卻成為渺小不可見之物。

遠見，乃人類心靈發展之一重要階段。但遠見不易養成，並且需要控制衝動。因此，道德家

強調其重要，而且特別勸人「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希望大家爲了行當爲之義而犧牲眼前的滿足。但是，如果我們注重目的而不注重過程，那麼，我們也可提出相反的主張。假若沒有未來的遠景作爲目的，那麼我們一定感到前途茫茫，黯然神傷了。

現今許多人動輒侈言「現實」。所謂現實，究其實際，多係注重手段。其實，這種人只有一半聰明；其餘的一半就是目的。當著我們注意目的時，整個人生會得到一完全的新意義。

但是，一個社會不是，或者至少不應是，爲實現一個外鑠的目標而存在，而是應予構成社會的各個人以美滿的生活。一個良好的社會，是爲實現構成這一社會的各個個體底美滿生活之一手段。社會不能離開構成它的各個個體而具有其本身單獨的目的，或何種抽離的優美之處。

討論到這裡，筆者聯想到，幾乎所有的極權國家都標尚所謂「理想的社會」，而且嚴格地要求社會上的每一個體犧牲他們個別底觀念，幸福，和行動，以從屬於這樣的一個社會。這是一件很可注意和值得研究的事體。當然，筆者並不是說，任何社會不能有或不應有由共同的文化基型或生活條件所自然衍生出來的共同信仰。

有人常說，國家是一整個的有機體。如果這種說法漫無限制，恐怕引起種種錯誤的結論。人和高等動物是屬乎嚴格意義的有機體。對於一個人好與壞的東西，乃是對於他整個的人好或壞；並非只對於他的這一部分好或壞，或那一部分好或壞。如果我牙痛，那麼是我這一單個的人痛，

並非別人痛。照我們看來，相信在一群體之間有好或壞，而且這好或壞超乎每一不同個體之好或壞，這種想法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想法簡直可以導向極權主義。所以這樣的想法是很危險的。

有些哲學家和政治家以為，國家有其優越的目的；並非僅僅是為公民謀取幸福的一手段。我們想不出任何理由來同意這種看法。所謂「國家」是一抽象的東西。它感覺不到苦與樂。它沒有希望，也沒有恐懼。某些人認為是國家底目標的東西，實際只是指導國家底各個體行為之目的。當著我們正確地想，而不是抽象地想時，我們便會發現，所謂「國家」，在實際上不過是某些人比最大多數人具有更大的權力而已。依此，究其實際，所謂歸榮耀於國家，不過是歸榮耀於少數統治者而已。沒有一個民主主義者可以容忍這樣一種根本不公正的學說。

羅素此言，對於強調以國家目的來消革個人目的之主張，是一付中和劑。雖然，他不無稍嫌言之過火之處。

當前的世界，成為獨斷的政治信條之犧牲品。在獨斷的政治信條之中，最有力量的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我們不相信二者照其原來的這種樣子可以救治人類的災害。資本主義只給少數人以創進的機會。共產主義者宣言為全人類底安全而努力，實際並未如此。但是，如果人類能夠不受那些簡單的不易說通的政治理論底影響，並且不從事於這樣的理論所引起的鬥爭，那麼人類可能籍著聰明地應用科學技術，來給予大多數人努力的機會，並且替大家謀得安全。可是，不幸得

很，我們底政治理論還沒有科學那樣高明。

的確，依筆者觀察，至少從一方面而論，中國近幾十年來，老百姓就是被不通的政治學說或簡單的「主義」害死了！欲救中國，還是「少談主義」為妙！

總括起來，我們已經辨析了社會活動底二種主要目的：在一方面，是安全和公正。這多少需要健全的中央政府來辦理。如果我們能夠創立世界政府，那麼便可能更為有效。在另一方面，是進步；進步需要最大限度的個人創造精神能力。

達到這二個目標的方法是漸進(Devolution)。世界政府，除了阻止戰爭這一項以外，必須在每一方面予國家政府以自由。同樣，國家政府必須盡可能地予地方政府以自治權。在工業方面，我們不要以為工業國家化，一切問題便可解決。大規模的工業，例如鐵路，必須具有大量的自治權。在一個工業國家化的場合，僱工與政府底關係，不應僅是從前資本家與勞工底關係之重演。凡屬有關思想言論的東西，例如新聞紙，書籍，刊物，政治宣傳，必須有真正的競爭。政府不應橫加干涉；也不可用任何其他方式來壟斷。但是，這類底競爭必須有益於文化，和啓迪智慧。在文化的事體上，差異性是進步底條件。某些獨立的機構，如大學和研究團體，在這方面大有價值。在蘇俄，政客們能藉政治和經濟權力來推銷他們荒謬可笑的見解。蘇俄底科學家，在這些無科學知識的政客底訓令之下，被逼著為其胡說亂道作註釋。這是多麼可憐的事。

照筆者看來，這類可憐的事，世上正多著哩！在武力與金錢作爲基本決定因素的地方，知識的尊嚴幾乎是絲毫沒有的。

羅素所講演的內容雖以「權威與個體」爲題，我們依據上述的內容可以抽繹出幾個重要的層面(Phases)。

至少在這一序列底講演之中，羅素沒有用過類似「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這樣的名詞。的確「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這類底名詞是不妥當的，如果在用法上「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所代表的內容是彼此絕不相容的或是如水之與油一般可以「調和」的，那麼更是不妥之尤。不過，除了這類不妥的用法以外，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這二個名詞所表徵出來的許多論爭之中，含蘊著一些可爭的真實因素。這些真實因素，與人生具有密切關聯，因而有待妥善安排。

顯然，至少就中國而論，主張發展「物質文明」的人，在事實上就是著重西方工業文明，注意物理科學；並由之而衍產出類似「全盤西化」的主張。恰恰相反，主張發展「精神文明」的人，厭棄西方工業文明，輕視物理科學。在這一類人之中，有的轉而注重民族的精神文化。其中，有的再往前追進一步，就發生思古之幽情。

這一種思想是各趨一端而難以調和的。在羅素於此所討論的內容裡，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

至少提出一方面底啓示。他所謂的「權威」，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就是所謂「物質文明」底骨幹。所謂的「精神文明」，主要地導源於個體底創造精神能力。從羅素底分析看來，所謂「物質文明」誠然是人類文明進步之必至結果，但也並非若干中國人所想像的那樣毫無毛病的文明。而個體底創造精神能力則是值得也必須從一部分由現代科學技術所形成的管制威脅之下力予保衛的。因此，「權威」與「個體」之調整，也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調整。羅素在這一大大問題底解決上之啓示，值得世界人士注意，尤其值得為創建新中國而在暗中摸索的中國人士注意。

與這一問題相連的，是對於科學與倫理之估價。許多以為「科學萬能」的人，認為科學是最後的知識，它可以代替一切：在今日科學權威之前，道德倫理應須退避三舍。在對於科學底性質理解最深的思想家羅素看來，科學並非一切。科學底本身是中性的。關於價值判斷，必須乞助於科學以外的東西。除了科學以外，倫理為合理人生之必不可少的教訓。這種健康的看法，對於以科學為萬能的偏枯看法，無異是當頭一棒。

羅素對於調整權威與個體的關係之提示為促成世界政府與實現單位自治，而把國家這一中間物萎縮到可能小的限度，萎縮國家底主張，可想像地，以為國家單位乃不可移易的歷史文化單位的黑格爾信徒所深惡痛絕，同樣，亦必為權力政治者之所怫然不悅。世界政府底建立是一美麗而必須的理想。打垮蘇俄以後，權力日漸強大的聯合國可能成為一國際政府。國際政府如可成立，

或漸趨成立，各單位自治又實現，個體創進精神能力便有充分抒發的機會。在這種發展之下，中間物的國家不易甚至於不復作為權力政治之殘民以逞或侵略征伐的厲階。這樣一來，極大的世界政府與極小的單位自治綜合運用，「大同」的理想就為之實現了。

綜合起來看，羅素所表現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趨於極端的中和 (Moderation) 精神。這種中和精神，至少自洛克以來，幾乎成為英民族底精神特色。這種精神特色，表現到政治上，就成為民主政治。

沒有中和精神的政治必非真正的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必然是中和精神的政治。中和精神的民主政治與專制獨裁精神上加布爾希維克精神的假民主政治，其間之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如果中國民族底文化精神遺產還沒有被共黨及其同質者流破壞殆盡，而且中國民族文化精神中果真有近乎中和的精神成素，那麼，我們應發揚這種精神成素。中國目前的暴亂固然需藉武力解決。但是，一切具有遠見的人都能明瞭，最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絕不是武力或馬基維里主義，而是貨真價實的政治民主。惟有實現貨真價實的政治民主，使引起暴亂的任何花樣的權力政治永不再見於中國大陸，讓各種新生進步的力量，得以抬頭並協和共進，中國底前途才有希望。

這是我們藉讀《羅素論「權威與個體」》之所言而得到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最大啓示。

——原載於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二十日，十月五日

《民主評論》二卷五、六、七期

第二十一世紀

一八四八年是現代歐洲史裡的焦點，也是十九世紀底真正開始。在此以前，歐洲底社會型模與十九世紀無殊。在此以後，歐洲進入一個工業與技術化新時代。政治情勢也發生激劇的變革。這一變革，一直延展於廿世紀。

一八四八年以後，歐洲被二種新的起於群眾的力量所控制：一種是社會主義；另一種是國家主義。這二者之混和則產生了許多形變。二者於十八世紀時產生於西歐人道主義的個人主義及批評的理性主義的氣氛之中。但是，二者將十九世紀自由的人道主義變換為侵略的排斥主義，將著重個體尊嚴的態度轉換而為著重集體的權力。二者合共起來，給予西歐近代文明以重大的創傷，

而且使二十世紀的紛擾益形激化(Intensifying)。鐵幕政治及其模倣的組體，是排斥主義之當前的現實例證。

以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為基型，普魯士主義、斯拉夫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橫行於二十世紀。這些主義的推動的勢力和行動是破壞性的勢力和行動。這種破壞性的勢力和行動，主要地以民主、自由與和平為對象。本書作者漢斯康(Hans Kohn)以為欲致世界於和平、自由與幸福，必須鞏固民主力量並實現民主聯盟。

二十世紀初葉，似乎出現了具有共同文化型模的統一的人性；可是，人類底分裂確也為前所未有。人與人之間衝突在擴大地區進行著，並且掀起很深的激情。文化的接觸助長國與國之間衝突。西方人將西歐文化帶向各處。但是，為文化所培育出來的許多人民則起來反對西方。例如，英國人將英國底觀念帶到印度。印度人民用英國底觀念喚醒了他們自己。他們要求建立國家，激起運動以反對英國繼續統治，以至於實現今日獨立。甘地可算這一運動之中的代表人物。西歐國家主義底性質與別處有所不同。在英國與法國，國家之成長，主要是由於內含的力量，乃土生土長的社會與政治力作用之結果。而在中歐和東歐以及亞洲，國家主義之發展，乃由於外界底影響。因而，前者底政治形式發展為西方的國家主義，為英國式的巴理門機構，為法國中產階層的共和國。這類型模是可以普遍採用的。而後者則注重各自底歷史文化，而不注重各國之共同的發展；

只注重集體的力量，而不注重個體權利。因而，這一型式底國家主義者注重軍國民教育。發展所及，不免窮兵黷武。斯拉夫派則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他們誇張俄羅斯底任務是解救人類，尤其是解救衰弱的西方。麥尼開(Magnicky)認為鞭韉統制也許是俄國歷史上的大幸事。因為，這一統制，使俄國與歐洲隔絕起來，因而保存了俄國底純潔。照作者看來，這種念頭，也許就是今日蘇俄鐵幕政治之精神的起源。大清帝國一與此種西方文化接觸便持深閉固拒的態度。此一帝國之所行幾為一極權的孤立主義(Totalitarian Isolationism)。但是，這一態度和辦法，招致一連串底慘痛失敗。但是，吾人未知此種餘毒已否滌除盡淨。土耳其則順應文化潮流，成為一民主國家。雖然，土國曾經過凱末爾過渡的獨裁專政，可是，以國家為重而不以黨派與權力為重的凱末爾在他執政的期間並沒有倚權藉勢迫害合法的反對黨派底合法活動。結果，土國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道路，真正復興起來，渡過幾次難關，而成為一個有秩序的民主國家。

「唯力是視」乃獨裁在極權統制底一大特徵。一切獨裁極權統制者，在力量足夠時，便實行對外擴張，因而造成世界戰爭；在不是以對外擴張時，便「視民如寇仇」，以人民為行使暴力底對象，猜防抑壓之唯恐不及，因而造成恐怖統制。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崇拜暴力並以迷信代替理性，二者成為許多非民主國家風尚。西方底態度是尊從個體自由和理性，有秩序的程序和公平競爭。而這種良好的傳統至此則被歌頌暴力與迷

信所掩蔽。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戰爭似乎使武力合法。許多人把人不是看成朋友就是看作敵人；而此外沒有其他的人。依照極權政治的原則，這種非友即敵的主張，是必須承認而且接受的。同時，國家及其永無失誤的領袖才能決定誰是敵人。而且這些敵人及其幫兇必須以無情的方法予以消滅。

在「唯力是視」的主義之下，當然崇拜強有力的人，崇拜永無失誤的領袖。在二十世紀，新拿破崙輩出。這些新拿破崙們，具有無可計量的感興，似乎具有無可抗拒的善的力量，具有價值極高的英雄成功的續業。他們走進實際政治場合裡。在他們底領導之下，教育變成戰鬥訓練，並且是爲了接受戰鬥所含蘊的危險而施行。

在這種「唯力是視」的世界裡，世界成了強者底天下。強者不需要良心。他們所要的是成功。唯力是視的時候，當然就不講理性。

法國哲學家笛卡兒是近代理性主義底奠基者。他所引用的基本方法是合理的懷疑。他懷疑任何事物，一直到我之存在爲止。依據這種懷疑精神和態度，人底權利是謹嚴地分析每種教條和意見，一直到最後的自明理爲止。不過，這種態度，祇有政治高度成熟的社會才可能。在其他社會裡，只重迷信，只重意志。所謂意志，是一種黑暗而盲目的驅策。叔本華(Schopenhauer)將這種意志定義爲生存意志。這種生存意志沒有任何確定的目的。尼采(Nietzsche)將叔本華之生存意志

底主張形變而為權力意志底主張。這種權力意志乃生命之唯一的意義。這種人要拗執地活下去，永遠地活下去，為其權力而生存。這種權力意志，實乃權力政治之基本的動力。

歌頌生命和鄙棄理性會引起對於世界之一新的迷惘，即是，再把首領抬出，整天呼口號，政治的巫醫再度勝利。凡此等等，在這一新時代，都藉最新的技術和群眾催眠術來實行。世界底事物一天繁複一天，往往弄得群眾困惑不耐煩去瞭解，並且不信任理性、協調和緩慢的進步。於是，許許多多人易接受簡單的口號，並易受自命不凡的人物之影響，甚至於領導；沒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尤其如此。

時至今日，在許多地方，文明底基礎，個體尊嚴和一切民族與階層都是平等的信仰，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在這類底打擊成功的地方，生活是極度繁逼的。權威者只相信「技術」，只注重「訓練」，只注重於將群眾塑造得一式一律。於是，隱藏在群眾中，個體才比較安全，所謂普遍的真理及其探討，全為辯證的實用主義(Dialectic Pragmatism)所拋棄。要求理性的和諧之希望，愈來愈渺茫。歷史則被看作爭鬥過程；而且面對此情境的人只好承認，只好接受，似乎無可奈何。

個體的理性既被攔置一旁，群眾口號思想統制既然從新迷惑這個世界，於是西方文明底發展為一種新的集體神話所威脅。集體神話之所以能夠把握多數人，是因它底內容把握著群眾底欲望。例如，共產黨人說「提高生活水準」。這一符咒在他們未現出原身以前當能迷惑大眾。其他類似其

黨者底辦法類此。在這個神話時代，個人底沉思自由討論不復重要，而是代以無可批評的熱情和有訓練的動作。

既然唯力是視又廢棄理性，而且群眾神話和有訓練的動作主宰一切政治場合，於是個體自然陷入危厄之中。

藉群眾運動而產生的專制與靠世襲得來的專制二者之來路固然不同，而其為專制則一。而就現代的實例看來，起於群眾運動的專制，對於個體之迫害，十倍嚴酷於起於世襲的專制。起於群眾運動的專制者較起於世襲的專制君主更知個體尊嚴與自由對於專制之不利。至少，從心理方面解析，各個個體有了尊嚴，專制者的尊嚴便為之減色。「每種專制主義對於保持人底尊嚴和獨立的任何事物，都具有特別尖銳和厭惡的本能。」這可以說明為什麼專制主義者絕不與人平等討論問題，而且除非你願接受其當面侮辱才能為其所用。在暴政之下，任何人都失去人底尊嚴。

唯物論是每種暴政底輔助理論，不管這暴政是一人暴政還是群眾暴政。在十八世紀，個體可以對抗一人暴政；在二十世紀，個體要對抗產生於群眾的暴政，其事更難。共黨不是動輒談反對者是「違反人民」嗎？這樣暴政，他們叫做「民主專政」；而這樣的「專政」，據說又是從「革命」而來。所以，在他們底「邏輯」之下，「民主」與「革命」可以聯在一起，其實，在辯證法的實用主義之下只要是需要幾乎任何二個冰灰不相容的名詞都可以聯在一起。這是二十世紀非民主世界

裡的語言運用之一大特色。原來在權勢高壓之下，既無自由討論，錯與對、真與假都無分別。

現代，一種新的軍事精神漸漸將對於個體的著重移到對於組織的著重。國家主義環繞軍營。社會主義環繞工廠。每一種都是集體民動和訓練底符號。在蘇俄，則將這二者混合起來，因而產生了一新型底極權統制。在這一統制之下，兵士即是工人，工人即是兵士。這與十九世紀底情形是完全相反的。在這種統制之下，個體底獨立只爲一人享有。

這種新型底極權獨裁制常經過「民主」步驟。這是二十世紀政治上的一種特殊現象。其實這種「民主」步驟並非真正民主，而是在某些外形上與民主相似的群眾運動。這種群眾運動，一定歸結於暴政。希特勒底興起就是如此。它是普魯士主義乃對軍事訓練和嚴密組織的一種強烈的崇拜。德意志認爲它不獨在政治上，而且是在文化與道德方面，與「羅馬」及「西方」敵對。希特勒主義乃德國對於西方觀念底挑戰之最後答覆和面向西方力量之抗鬥。這正與史達林主義之在蘇俄底情形相同。這些主義削弱了西方社會底道德信仰和社會凝結，並且到處引起猜忌和恐懼。希特勒主義者將一切困厄敗壞歸咎於世界底陰謀，而從來不歸咎於自己底錯誤。史達林也是如此。一切與之同型的人物與組體也是如此。希特勒以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被外面的敵人擊敗，而是由於內部底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綏靖主義、一切西方思想、基督教、或布爾喬亞的人道主義所擊敗。因此，爲了免於再度失敗，他們認爲必須排斥這些東西，將德國封閉起來，在精

神上，完全自給自足。反對自由主義和西方思想，原來是一切閉關的軍事獨裁主義者共同的心理傾向！

蘊涵在希特勒主義裡有二種重要的因素。第一種是種族主義；第二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說是前述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底混合；而為普魯士主義進一步的發展。

由於膚色不同和種族差異所引起的種種政治和社會問題，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其實，一切文明都由有色人種創造。中國黃河流域底黃種人，印度、美索布達米亞 (Mesopotamia)，和埃及底棕色人，以及地中海盆地底黑色人，都是文明創造者。在這些人種之中，有的創立了偉大的宗教。他們之深邃的宗教情感和玄學的思想從未為洛底人 (Nordic) 所超過。然而，西方近代的興起，情況便不同。在法律之下的個體自由精神使西方人得以在經濟上獲致財富，並且在知識上有所發現。西歐底社會因此而有自由研究的科學方法和有責任的政府。既然如此，於是歐洲底社會，特別是北大西洋和北海邊沿的社會，與別地方底人民比較起來，顯得特別優越。自十九世紀以來，全球便為西方人所控制，白人優越論遂興。遠在國社黨人得勢以前，德國人多信這種論調，德國國社黨人則將這種論調提高至於極峯。原來，瓦革納 (Richard Wagner) 在先認為人種有層次高下之不同，而德國人代表最高一層次和最富於創造力的一種。人種底能力基於「血統之純淨」。所以，雜婚有害於文明。這種論調，到一九三三年，成為德國科學

和國家底官方正式的基本理論，亦若「無產階級爲一切之本」之爲蘇俄科學和國家底官方正式的基本理論。在德國影響之下，種族神話遂成法西斯運動之不可少的部分。日本帝國主義與德國相似，是建立於種族論之上的。日本神道教就認爲日本大和民族乃優於一切民族的民族。基於這一心理，他們便曾在發動的侵略戰爭中，任意殘害別的民族。

其實，種族之見係一種謬見。即使是口頭堅持種族優越論者也並不能牢守種族界線。德國人固嘗強調一種族戰爭以征服全球，但是，彼等畢竟與種族相近的英法作戰，而聯絡與其種族大爲不同的馬雅人(Maya)和日本人。時至今日，人類底衝突不依膚色種族而劃分，而依政治觀念及利害來劃分。所謂種族類型，有時不過用來作政治與經濟關係之藉口而已。德日以強調種族之不同爲宣傳底中心。蘇俄共產主義者則以強調階級衝突爲宣傳底中心。二者對於人類都是有害的；而且都使理性趨於混亂。

法西斯主義與國社主義同爲歐洲政治上的二朵奇花。法西斯主義是現代巨大群眾運動之一，也是反理性主義之一。法西斯運動具有兇猛的國家主義的原素，並且愛好暴力和冒險。除此以外，法西斯主義者似乎並無確定的貢獻。莫索里尼說：「我們底主張很簡單：我們就是要統治意大利。」這種表白近乎老實，並不像許多人那樣習於文過飾非。基於這種要求，莫索里尼建立了一個極權秩序。他將國家與法西斯黨等而爲一；又將這個黨與他自己等而爲一。雖然，他宣稱以反布爾希

維克爲職志，可是，他卻採用了共黨方法。結果，在號稱反共的意大利，其政治空氣與在蘇俄共黨統治之下的幾無以異。在這種統治之下，每一件事取決於首領。首領底決定不能再討論，只有盲目服從，而且立刻執行。法西斯主義自認爲完全而且毫無妥協地反對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從最初的開始，法西斯主義即是民主與人權底死敵。他們認爲社會必須嚴格建立於一個層次之上：首領並非由選舉而出，他也不對人民負責，而人民則需對首領負責。法西斯黨名言之一爲：「*Mus solini ha Sempre ragione*」(莫索里尼總是對的)。此語殊堪玩味。在莫氏統制之下，軍事訓練與盲目服從瀰漫於公民日常生活之間。

幾乎與法西斯主義同時開放的一朵花生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之花似乎開的更燦爛，影響也更大；可是，它凋謝以後，更顯得寂寞。像法西斯主義一樣，國家社會主義將國家主義與群眾革命聯繫起來。但是，除了多少學習法西斯主義以外，它更有其特別的德意志根源。

國家社會主義者兇猛地反理性主義，他們相信有權超越一切普遍律則。例外的事物，成爲他們底律則。依此推衍下去，他們相信投機。他們又迷戀過去。希特勒將強烈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與軍事的和神祕的國家主義聯繫起來。在許多技術上，他也是列寧底徒弟。而在許多地方他卻已超過了他底老師。當著共黨將一切罪惡歸咎於「資本主義」之時，他將一切罪惡歸咎於猶太人和猶太主義。興登堡死後，希特勒攫取政權，他立刻強迫文武百官對他個人效忠。魏瑪憲法死

亡。全國成爲一個極權國家。國家等於國社黨。國社黨又等於希特勒。希特勒底意志決定一切。這種「新秩序」並不限於德國。國社主義底動力推其感染於別的地區。

政治是消除戰爭的藝術。戰爭應被視爲一種變態。政治家底努力是在竭力保持正常生活。因而，戰爭之爆發，明智之士往往認爲乃政治之失敗。但是，希特勒之流所持的極權哲學則將一切歷史看作殘酷的戰爭。現在，政治成爲戰爭底準備。蘇俄共黨將這種哲學更發揮到極致。時至今日，戰爭不復是有何限制的東西。戰爭與和平底分界愈來愈流動不定，模糊不清。每件事物都成爲戰爭底一部分。所以，現在的世界都陷入戰爭的恐怖之中。這便是極權哲學所衍生出來的影響。極權哲學相信，生命底物資與歷史是鬥爭與衝突。黑格爾辯證法與達爾文進化論底應用於社會科學，使戰爭顯得是自然界裡的正常現象。在這自然界裡，人類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在殘酷的鬥爭裡，人類底物質設施不獨遭受破壞，而且交通情意的橋樑也爲之中斷。共黨就不承認世界其他部分底是非善惡之標準。

現代工業底成就，及其著重機械化，標準化，和有訓練的團體動作，不僅完全爲極權統制所接受，並且形成一個軍事的超工業的組織。在這一組織之下，工人完全變成一個機械化的和軍事化的工人，變成了一個現代的機器人。這樣的人是在祇有一種思想主義流行並且被這一種思想緊密網綁起來的社會中之一分子。這種網綁，是爲了高度的效率和外在的行動而設施。因而，現代

的極權統制，較之古代的極權統制，其惡益彰，其控制效能益高，以致幾於毫無逃避的空隙。

顯然，在這樣的統制之下，國家不復是真正的國家。它不過是一個獨斷獨行的黨派之工具而已。這樣的黨派認為自己就代表了甚至於就是國家和社會，它代替了國家和社會底一切功能。無疑，希特勒之遠近的信徒，無論在事實上能否做到這步田地，在腦海中卻嚮往這樣的天堂之實現。因為，一旦這樣，他們便無人掣肘，可暢所欲為，而決不會遇到災害了。

但是，奇怪得很，暢所欲為的法西斯和納粹，在國內並無強有力量的自由民主分子「掣肘」，為什麼一一由瘋狂而帶著整個國家自殺，以至於完全幻滅？

和自由民主為死敵的，除了法西斯和納粹以外，還有更兇猛、殘暴、計劃周密，和富於煽動力的共產主義，談到共產主義，我們不可不瞭解壯大了共產主義的最大現實背景。這個背景就是蘇俄。

早在一八四五年科門雅科夫(Khom'yakov)就說過：「俄羅斯底問題，在一切方面，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真正的世界問題。」

這話不幸而言中了！在我們這個時代，除了作為世界共產問題之核心的蘇俄問題以外，世界現在還有那一個問題比這個問題更為重大？

自俄國底東正教會脫離君士坦丁堡而獨立以來，俄國即以負有世界使命自居。她說要救世界，

尤其是要救墮落的西方。這種觀念，成爲史達林征服世界之內在而深沉的觀念動力。其規模之宏大，滲透之深入，遠勝於希特勒底種族優越論。拿破崙之崩潰，給予俄國此後的伸張以無窮的便利。一八一五年以前俄國即曾入侵西方。自一七一一年至一九一八年俄國軍隊曾佔領羅馬尼亞十次；並曾牧馬萊因河畔；大掠柏林。一八一五以後，俄羅斯帝國領土包含維斯土拉(Vistula)到阿拉斯加。大多數俄國人以爲：「我們瞭望這世界無與比倫的偉大帝國，我們就覺得自己渺小。羅馬也沒有她這樣偉大。」

中國自清末有洋務派與國粹派之爭。俄國自十七世紀與西方文明接觸以後也有洋務派與國粹派之爭。國粹派反對彼得大帝底改革，並且希望回復到莫斯科底舊秩序。洋務派則贊成與西方接觸，並且痛心於俄國底落後。有人以爲俄國可以超過歐洲底革命的社會主義。有人則以爲俄國單獨可以保存真正的基督教。

在大體上，國粹派戰勝。因國粹派具有土生土長的思想根源。洋務派即使不受排斥，俄國之向西方學習的，也不過當作工具，免被西方淹沒而已。國粹派強調俄國精神優於西方。自十八世紀以來，俄國底思想家反覆伸述俄國對於人類的使命。這種思想深植於正教之中。馬克斯主義之輸入，遂使「俄國使命」穿上現代時裝，一變而爲所謂「世界革命」。從「俄國革命」變成的「世界革命」，一入史達林之手，與權力政治結合，便成爲征服世界的工具。

因爲俄國底歷史順著這條線索發展下去，所以她與民主底距離日益遙遠。俄國人民底臉面毫無表情，這反映著他們內心底空虛。公民權利和義務，個體尊嚴與自由，這些深爲西歐人民所呼吸的觀念，對於俄國人民全是陌生的。共黨之無孔不入的極權統制，使俄國人民一天一天地墮入非人的深淵。現今世界上，恐怕沒有那一種思想能夠如此強勁地與民主主義對抗。列寧將共產主義從馬克斯主義之知識的階段實現化地塑造而成一個實際有力的政治工具。許多社會主義者相信以進化的和民主的方法來實現經濟公正和社會平等。而列寧則從一開始便將使用暴力和陰謀的行動神聖化，並且認爲必須藉精選的少數人來領導群衆。這樣一來，就使其後由一黨專政而行一人專政者振振有詞，獲得「理論的根據」。他們認爲，這樣的獨裁是過渡性的，所以並不妨事。因爲，獨裁結果，資產階級消滅。作爲統制工具的國家隨之萎謝，一個自由人結合而成的無階級的社會便會出現。可是，俄國底實情如何呢？俄國處於共黨獨裁之下三十餘年於茲，國家不獨沒有萎謝，而且成爲真正極權統制底第一個典型例樣。在這個國家裡沒有個體生活可以脫離那無所不包的掌握以外。

因爲出現了法西斯、納粹，尤其是以蘇俄共黨爲中心的共黨，所以對內形成極權統制，對外則形成新型的帝國主義。英國式的帝國主義固然可惡，然而，它底經濟背景是海外拓殖；它底文化背景是西歐文明。在這樣的背景裡產生的帝國主義，多少還含有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

法治主義的成分。所以，這一型式底帝國主義者固然從事經濟剝削，但是還知道「將羊子養肥了再剪羊毛」。因而，隨著這一型式底帝國主義者而來的，是教育的啓發，衛生的改進，民主自由思想的灌輸，法治的確立。無論如何，這一型式底帝國主義者不會將幾十萬的人口消滅或強迫遷徙。甘地並非死於英國之手，這種帝國主義之自然的發展結果，是各殖民地之獨立。例如印度、菲律賓等便是。新型的帝國主義則不然，它恢復古代統一帝國的思想。由於沒有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文化背景，新型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較之十九世紀英國型底帝國主義者酷烈十倍百倍。蘇俄是這種新型帝國主義底典型。它之奴役殖民地，實屬史無前例。它有屠殺幾十萬人或將幾十萬人強迫遷徙的偉大氣魄。假若甘地這樣的人在蘇俄治下，已不知犧牲多少個了！

依漢斯康看來，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都是損害個體尊嚴，輕視理性，剝奪自由，危害人類和平，阻礙進步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不可取的。可取的唯有民主。然而，僅僅有國內的民主還不夠，還必須組織民主聯盟。民主國家盟結起來，才能制止侵略的野心，而消弭世界禍亂於無形。這未始是必不可期的事。至少民主國家必須朝此方向努力。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方式就是，在法律底承認與保護之下，一切個人都平等地享有行動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尋求幸福之自由。民主生活，預先假定了寬容和容忍的態度，

以及協和的意願。這樣的態度和意願，是以尊重他人底自由和信仰爲基礎的。各個人、團體和階層之各種不同的態度、利益和意見，都可藉自由討論底方式來求得一致同意之共同基礎。民主底目的是在承認每一個體爲其自己底目的，而不是任何他人底工具。當然，這是一種最精緻的政治組織形式；因而也就最難達到。所以，只有少數國家才有貨真價實的民主。在禍亂如麻的時代，或帝王思想瀰漫的地方，民主只是人民渴望的福音而已。當然，在蘇俄，政府甚至於有計劃地將人民底這種希望連根消滅！

測驗真民主與假民主之簡便而明顯的尺度，是看是否允許不以陰謀暴力而以合法方式活動的反對黨派存在。如果允許，那麼便是真民主。如否，而一味藉權勢以迫害之，便是假民主。在甕中捉鱉，當然比出海捕鯨容易；但真正能幹的漁人必不感覺興趣。民主固常藉選舉表現，但選舉表現卻不一定是民主的。蘇俄底選舉形式做得較一式一律，熱鬧好看。所謂民主，必須預先承認反對者乃民主程序之一合法的伴侶。民主承認價值觀念和政治組織之多元性。民主主義者反對將國家當做極權或獨裁的黨；也不贊成藉政治權勢迫令手無寸鐵的人民信奉一種教條主義。（毛澤東強迫中國人民一體學習「新民主主義」。所以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都必反對他。）

二十世紀底極權政府認爲民主是爲保護某些階層底利益之一虛偽的幌子。這話用到極權統治者底自身恰好合式。他們常自稱爲「最新的民主」，極權統治者又認爲民主不能適應現代繁複的集

體生活。他們以爲民主政治衰落了，民主方式不適用了，信仰民主者少了。民主主義者不像極權主義者那樣具有狂妄氣質和撒謊的習慣。一口咬定自己底制度或辦法之完整無缺，某某主義的理想之「偉大崇高」，或首領之永遠無有失誤。照民主主義者看來，民主並不完整。因爲，人是有錯誤的。要實行民主，必須有健全的公民，人民受過高等教育，而且不受情緒的激動或習慣惰性之拘束。但是，民主縱然有這些缺點，民主在一切政治制度之中還是最合乎人情的制度，這種制度可以增進人底尊嚴和每一個體底創造能力。它相信大家底智慧超過一個統治者或首領底智慧。這樣，民主制度的本身就是一個富有生機與進步的體制。這樣的體制本身就可以逐漸而堅定不息地改正它自己，以趨於完備。由此所發生的力量，比極權統制之下所發生的力量，實不可同日而語。

可是，繼法西斯與納粹之後，目前民主受到重大的威脅。這一威脅無疑爲共產主義的極權帝國主義的威脅。爲了應付這一威脅以確保人類的自由、和平、安全與幸福，民主國家必須聯繫起來。具有這種見地的人並非沒有。早在一九一八年，安基勒(Norman Angell)即著書立說，指出民主國家之聯結，是維繫和平與保持自由之一必要的條件。他提出民主的國際主義(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的思想。而在民主國際主義的聯盟之中，美國擔任一個主要的角色。

依此，綏靖主義是不可採取的。綏靖主義使人對於當前情況麻木，鬆懈必要的準備，和癱瘓

及時的抵抗。凡此等等皆屬有助於敵人底侵略計劃。綏靖主義者在客觀上幫助了地球上最反綏靖主義的力量。

對於罪惡不加抵抗，就是墮落到承認罪惡的存在，就是呼籲大家接受罪行，並寬宥不義之事。所以，綏靖主義，不是爲真是真非挺身而鬥的，而是叫人陷入普遍的危機之中。侵略者正好利用這種弱點來糟蹋真理，顛倒是非，以遂其慾。這種覆轍，豈可再蹈？

所以，綏靖主義必須放棄。大西洋公約是維繫世界秩序之最有希望的步驟並不回復到主權觀念和分裂觀念。民主國家底人民不再在盲目中行動。他們知道隱伏的危機，並且預爲之備。在當前的危疑震撼以外，西歐與北美緊密聯繫起來，爲未來奠定良好底基礎。這種基礎就是西方文明之一新階段底基礎。西方文明底這一新階段要棄絕狹隘的絕對國家主義，並且恢復西方人對於自由的信心，以及對於和平的保衛之力量；並且進而將這種意念及其影響擴及全世界。

——原載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三卷九期

附記·評 *The Twentieth*, 1949, By Hans Kohn.

蘇維亞怎樣管制思想

近來有一可喜的現象，就是可能產生反共抗俄效用的出版物日有增加。在這類底出版物中，就品質而論，似乎以華國出版社本身出版的——非代印的——之成色比例較高。《蘇維亞怎樣管制思想》這本小冊便是其中之一。

談反共抗俄，要有真正的把握，絕非在有限的空間以強力Macht造成主觀順意的局面，而是要能在強力所及的範圍以外真正產生政治影響或攝引力，亦若孫逸仙先生當年在廣州彈丸之地之能使全國感應之所為。要能達到這一地步，必須樹立一個超乎現實、人事、利害、成見、權力、種種因素而確乎令人值得嚮往的理想；或者，實實在在在值得令人用生命去保衛的東西。就自由

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酷愛思想自由。而蘇俄則嚴格統制思想。亦步亦趨「向蘇聯學習」的中國共產黨徒，於利用國際的以及國內的種種弱點騙取大陸以後，正著著進行照著蘇俄底範型來統制思想。《蘇維亞怎樣管制思想》這本書最顯活而扼要地報導出蘇俄管制思想的實況。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測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著手管制思想。酷愛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深惡痛絕以任何藉口、任何方式、以及任何教條來統制思想。這本書，雖係一小冊，但確能增加我們對於這一方面的體會，並在我們認識思想自由之可貴這一點上不無助益。

在蘇俄，一切新聞底來源及其發佈無不為政府或政府黨獨占；政府或政府黨「對於凡能模造及支配人類心思的一切機構具有完全控制之權。：舉凡人類所知之每一部門文化，祇是支持共黨政策之一種利器。」中國共黨正是如此。在共黨統制區域，即使有少數私人創辦報紙或刊物，其內容必須與共黨教條根本相同；這就淪為共黨之輔助出版物。否則，立予查封，或抓拿編輯及寫作者：根本不能立足存在。吾人可依此標準來測量任何空間是否真正民主自由。

「蘇維亞當局模造與支配思想的工作開始於學校中。共黨要求把黨的『正確』主張在一切的學習範圍內加以解說。每一個學生，不問他的興趣如何，都要研讀馬克斯列寧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正是如此。他們藉其政治權力，通令各學校讀「新民主主義」。在事實上，凡有共黨型的思想的人，只要是他們底力量辦得到的地方，他們都要藉其力量強制人民讀其「主義」的。誰敢不「接

受」？

那裡的知識分子呢？說來真是可憐：「知識分子能夠按照政府期望而有貢獻者，自然是得勢。但那些不能從共黨的目標找出靈感者，就是不能頌揚新政權而使工人皆能瞭解者，不是被處死，就得亡命於國外。」在極權統制之下，知識分子底命運確實可悲若此。君不見！在毛澤東底武斷與暴力籠罩之下，凡潔身自好之士，有是非，有正義感，有氣節的知識分子，一概難以自存；而不惜奴顏婢膝，向權勢低頭幫閑，說黑的是白的，說不好的是好，爲那個啥子「新民主」的「主義」作註釋之知識分子，則高車駟馬，富貴榮華。在一切從屬於政治之下，知識底尊嚴，至此真是掃地以盡！

既然一切從屬於政治，文學與藝術當也被用來頌揚共黨的成就。因而，他們要「打倒無黨的作家，打倒超人的作家。文學的目標必須成爲一般無產階級目標之一部分。……音樂亦然：「音樂既然屬於藝術的一般規律，當然也屬於馬克斯列寧的美術原則，而應受黨的管理。」這種統制，真可謂徹底之至，無論是文學也好，藝術也好，音樂也好，都「必須成爲一般無產階級目標之一部分」，都「屬於馬克斯列寧的美術原則」，都「應受黨的管理」。這樣的統制，可謂「無微不至」。在這種原則之下，「無黨的作家」，當然要被「打倒」。君不見！他們躲在圍牆以內信侮謾罵非黨派的作家何等起勁！

文學，藝術，與音樂必須「受黨的管理」以「符合於」馬克斯的教條，科學怎可被置諸例外？「科學，正如蘇聯其他事物一般，必需符合馬克斯列寧理想所能容許的科學理論」。「科學理論」而必須有待於「符合馬克斯列寧」的「理想」，誠不知這個樣子的「科學理論」是何種「科學理論」！

爲了使科學「符合馬克斯列寧」底「理想」，蘇俄共黨從科學底許多部門著手，而最遭殃的要算生物學。後得性(Acquired Character)之不能遺傳，已成生物學界底公認定論。但是，蘇俄共黨「中央當局」則認爲此說有礙於無產階級之「進化」，並無形取消十月革命之改造人類環境之影響作用。於是，「蘇俄則堅認由於環境關係，可能恆久改進遺傳的性質，因此便可強令生物按照所期望的任何方向而變易。」共黨的教條是：「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恩惠，我們必須向自然爭取之。」實在，蘇俄與共黨之所謂「真理」只是「政治的需要」而已。政治上有怎樣的需要，他們便隨時製造怎樣的「真理」。蘇俄共黨抱持「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恩惠，我們必須向自然爭取之。」這種「人定勝天」和「征服自然」的雄心，的確其志可嘉。不過，我看俄國天氣苦寒，冷得有點弗好受，史達林何不命令上帝把太陽向北照一點呢？

因爲共黨需要合乎其政治目標的遺傳學，於是謹守正統遺傳學的科學家，「祇因他們的科學觀點與共黨中央委員會所容許者相反，以致或遭斥責，或被清算。」在排除了這些純正科學家以後，蘇俄共黨就捧出像賴申柯(T. Lysenko)這一流的人物來講遺傳學。其實，這種黑良心的無賴之

徒，那裡是在講遺傳學呢？他不過以類似遺傳學的名詞來宣傳黨八股罷了！「賴申柯與皮里桑，實際上也不像其在公衆出現的姿態成爲科學的領袖，祇是最高政權的工具而已。」一九四九年美國生物學研究所管理委員會的紀錄中有如下的準確判斷：「賴申柯與其附和者之反對遺傳變異學（？）不能視爲科學思想兩個反對派系之爭，實際上這祇是政治與科學的衝突。」一個在討論科學；另一個在藉科學詞彙來宣傳八股教條，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勝利永遠在宣傳黨八股的那一邊。因爲，在這種場合之下，決定是非曲直之唯一的條件，並非客觀真理，而是槍刺。蘇俄共黨對於科學尙且如此玩弄，對於其他的學術部門更可想而知。其實，所有一黨專政的極權空間對於科學和知識分子的辦法都是朝著這條路走的。中國共黨及其同型的組體當然無以例外。這真是科學與知識分子底摧殘浩劫！

在「黨權高於一切」的蘇俄共黨統制之下，既然科學都可以隨著政治需要而捏造，對於歷史當然不會放鬆。「在那裡，過去的事實，正如現在進行的事實與未來的趨勢，一切都使有利於黨的目標。」「過去被磨滅了。磨滅的痕迹也忘記了；謊言遂成爲事實。」「爲著有利於黨的政策，一件反對共產主義的史實不應提供於公衆之前。」在事實上，一切極權型式底政治組織底態度和想法與作法都是如此。納粹和法西斯之流也曾如此，不過還沒有做到這樣徹底而已。

在這樣的統制形態之下，當然絕對不容許批評政權。批評政權便是叛國。叛國便罪在不赦。

因爲，他們認爲黨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國家。所以，批評政府便是叛國。這是一切形式底極權統制底基本哲學。

「蘇維亞當局藉嚴格的檢查制度，以防止其人民爲非共黨的觀念所沾染。」因此，外方的出版物，如對其政權有較認真的批評的，簡直不爲蘇俄人民所看到。因而，「簡直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獲得兩種的意見。蘇維亞的人民祇准聽一方面的話——就是共產黨的話。」這是共黨一黨極權專政統制之下的寫照。類此的一切極權統制者都想努力做到這一點，以便「統一思想」；否則，難免「思想混亂」。

好一幅布爾希維克的極權思想統制圖象！

照作者鄙見看來，共黨諸類還欠高明。世界太大，科學太發達，要想建立思想圍牆比建立經濟圍牆更難。俗語說：「真金不怕火」。如果真有真理，何必怕外界的觀念之「沾染」？大家公開討論好了，真理終必獲勝的。英美人民從來不怕外界觀念之沾染。然而，英美共黨勢力並不比許多地方猖獗。

共黨是一群魔鬼。魔鬼愛的是與自己相同的黑暗保護色。在黑暗裡捉鬼很難捉到。我們要在自由的太陽底下捉鬼。

「在目前，蘇維亞政權把龐大的民衆恐嚇到不得不齊聲讚揚史達林與共黨的生活方式。人民

之加讚揚，無非認爲這是獲得安全的惟一方法。：但如他們懷疑有些事物不盡如報紙編撰者與演講者所述，祇好把這懷疑的意見藏在自己的腦裡。」這幾句話，可謂發人隱微，可謂道出在極權統治之下的人民心靈深處的悲哀，尤其是有理性者之悲哀。在這種統治之下，黨即是國，國即是黨。二而一，一而二，混淆不分。政權高於一切。因而，人身底安危毫無保障，個體沒有尊嚴，理性被剝奪，自由成爲口頭的宣傳或遠在天邊的幻夢。在這種空間，獨斷和威勢充塞，恐怖成爲氣流，而是非不能明，曲直不能分，善惡不能辨，智慧更無以激發，情感亦爲之麻木。於是，「在俄國全境內最豐富的知識潛能都聽任其枯萎了」。這是爲鞏固極權統治而必至的結果。沒有極權統治不戕害良心與智慧的。良心死滅，智慧枯萎，所剩下的當然就是無用的糟粕了！這種結果，是極權統治本身孕育出來的結果。這一結果就成爲它自身底「否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斯因即得斯果。且等歷史家們來記述二十世紀東方與西方這一筆爛帳吧！

在敘述了蘇俄如何統制思想以後，本書末尾說：「在一個社會中，人們自由發表其信仰而不能免於被攪離其家庭之恐懼者，這斷斷不能算是民主。又守法的公民，時有被剝奪工作權利或生命自由與快樂之恐懼者，這也斷斷不是民主。」這一個結尾，應該是一切愛好自由的知識分子所愛好的結論。這個理想如果有從口頭宣傳而變成事實之一日，便是中國共黨崩潰之一日。我們多向民主自由的理想趨進一里路，便愈增加一分嚮往，愈使大家體驗到真有值得用生命去保衛的珍

貴的東西，因而反共抗俄底力量多加強一分。

民主自由是到反共抗俄勝利的唯一大道。

通觀全書之編制與取材，頗為精審扼要。敘述也平易可讀，引人入勝。譯者之選擇此書，自係具有相當鑑賞能力。

關於譯文，因無原書對照，不易判斷。不過，一氣念完，除覺三幾處似有問題以外，尚清順可口。就中有一科學名詞，恰巧附有原文，筆者認為大有商量之餘地。Genetics，譯者處處譯為「遺傳變異學」。這個學名底本來意義是研究相關有機體之遺傳，相似點和相異點之學。這裡所說的相關有機體之遺傳的相似點和相異點乃從其基因(Genes)與環境之交互作用所生。凡屬命名，必須與被名的內容等其外範(Coextensive)，換句話說，一名與一實底大小範圍必須恰好相當。如果失之太寬，那麼該名含有該實所無之外範並失去其應含之內涵，因而該名歸於無用。可是，如果失之太狹，那麼該名未包括該實所有之外範並增多其內涵，因而該名因只能指謂該實底一部分而歸於不適用。在Genetics一名中不獨包含有「變異」(Mutation)，而且包含有「相似點」。今譯者譯為「遺傳變異學」，未能包含二者，失之太狹。筆者擬試譯為「衍發學」，或「遺傳衍發學」。當然，這種譯法是否適當，還待請教此類專家。譯者以為何如？

筆者以為當前關於反共抗俄的出版物在數量上已經不少，但在質量上可以雅俗共賞的實在不

多。與其瞎寫濫抄，胡扯胡湊，或板起面孔宣傳教條主義，何若選點好的外國作品，謹慎鄭重地翻譯翻譯？

——原載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

附記：本書為庚寅編譯社編譯，華國出版社印行。

民主政治

這是一小冊文摘。雖然它不過一小冊，可是其中所選的文章卻相當精粹：計有張士龍底〈民主國家的基本精神〉；羅素底〈權力的馴服〉；胡適底〈民主與極權的衝突〉；以及戴杜衡底〈民主世界的迷惘〉四篇；此外，還附錄有〈什麼是基本人權〉。

現在，談「民主」總算已經不是「罪」了。這是重大犧牲換得的些微代價。我們希望再不必支付可能的代價而「行」民主。不過，「行」民主，必須瞭解民主底真諦。張士龍這篇文章在這一點上真是給未曾接觸過民主底理論與實際的中國人民以不少的幫助。

在一開頭的時候，張士龍就說：「『民主』二字有它的意義與精神，是不容曲解的。」他將民

主義與精神分列在下述的一些題目裡：

第一、個人與國家。他說：「一個民主國家是自由的個人組成的，而絕非一個概括一切的國」。在這樣的國家裡，人民都是「目的」，沒有人祇是「工具」。個人是最後的實存要素。「旁人能說服他，影響他，然而永不能代替他——不能替他用思想，不能替他作決定……人全會犯過錯。『人君無過失』，『教皇不會錯』的古訓，在現代看是不可相信的。一個人或團體可以在某種情勢下某一時期內，『領導』其他的人，但不能在任何情形下永遠『導演』其他的人。一個人尤不能代替或概括衆多人。這樣便要抹殺他所代替的人的意志，僵化他們的理智。沒有人是『超人』或『聖人』可『以萬民爲芻狗』。……」說到此處，作者更深入一層說：「這是一個很平易的道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庸俗的道理。但是任何與此相反的說法，就要從『整體』(Totality)的觀念出發。從『整體』(無論是階級還是國家)觀念出發，就要把個人的重心放到個人以外，而以整體爲實在，以個人爲虛無，以整體爲目的，以個人爲工具。但這個整體，事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其結果終必致以少數人，甚至一個人(巧妙地透過一個嚴密的組織)完全概括了其他的人。其危險還能比此再大嗎？」這話真是千真萬確。法西斯，納粹都強調「全體主義」，再將這全體主義化了的組織，納入國家至上的範疇之內。現代共產制度是這一套玩意之發展底最高峯。許多人則望此而欣然色喜，銳意模倣，亦若惟恐不及。在這樣的統制之下，人民中之分子，如不屬於統制圈內，便等於

「芻狗」。芻狗那有人底尊嚴？他們底存亡禍福完全操諸人手。

在這樣的全體主義的統制之下，個體根本消亡，亦若泡沫之消逝於海洋。而站在人民之上的人呢？我借用基督教的話來說，就是「一切榮耀歸於主」。有了政權，即是有了一切。古往今來，那有這等極權專政？這是我們反共的基本理由之一。這同一理由也可引用來反對一切形式之極權主義的理論及其實際。

第二、社會與國家。作者認為個人底生活是多方面的，「沒有一個組織能完全吸收了他，概括了他。……國家固然是在衆社團中最龐大最有力，並是帶有強制性的(Coercive)，但它一樣是由個人組織起來的，是人們為改善他們底生活，或表現他們的個性而組織起來的。……國家的功用就在保障、支持、促成、修正、補充、節制、調整、協和，這衆多個人與社團的活動。越出這消極的範圍，國家即應無能為力。如必欲對個人橫加干擾，便難免鹵莽滅裂的結果。」這種看法，調和折衷而且充滿了人情味(Human)；但與一切極權主義的國家論恰好相反。

第三、國家的主權。作者說：「主權的觀念對於民主國家仍是必要的。但是法理方面的主權萬能，至高無上，絕對無限的論證，竟被若干國家應用到經濟範圍上去。個人的自主的生路全被斷絕，因而造成千古未有的專制局面。」這種千古未有的專制局面，是在「實行社會主義」的美名之下行之的。政黨或權力組織藉強力將社會一切生產機構據為己有，將國家一切資源嚴密掌握。

個人自主謀生之路斬絕了，然後只有聽憑他們餵填鴨式的「配給」一點，叫你還覺得是莫大的「恩惠」。大家底胃囊給少數人控制了，你們底命運那得不聽人擺佈？

「民主國家的主權觀念是功能的。要主權爲的是避免內部的無政府狀態，爲的是維持一個法律程序。法律的制定、執行、解釋，全要經過某些固定的機構與正當的程序。唯有這樣纔能避免暴民及恐怖政治。」又說「所以在民主國家內，沒有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是主權者，而其餘所有的國民都服從他的命令（即法令）。這祇有專制時代方是如此。……制法是人民爲自己制，爲自己守。沒有人得以主體者的身份，專門計劃並規定旁人的生活，而自己，却超出其外，不受其影響。」

第四、民主國家無國教。「民主國家另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國民不專信奉什麼主義，不專信奉某個人的主義。民主國家對某某主義更沒有一個官方的解釋。一個民主國家可以有它的民族哲學，但沒有它的國教。」這一層對於民主國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政治組織藉其政治力量而強迫全體人民一律信奉它底「主義」，或藉教育方式強注於在學青年，而且批評了就是有罪，那麼這個國家便沒有思想自由。沒有思想自由的民主，豈非假民主？毛澤東在其槍桿射程所及的範圍以內強迫人民學習那個啥子「新民主主義」。這是愛好民主自由者所難堪的暴行。同時，吾人正好拿是否藉政治力量強迫人民接受教條主義，來作測量是否真正民主的尺度。

第五、國家與革命。關於這一點，作者有很健全的見解，他說：「任何國的國民都有革命的

權利。然而革命卻非一社會的健全現象。唯有落後的國家，才不斷有革命發生。」這是很正確的看法。可惜的很，近幾十年來許多職業革命家們將革命神聖化(Sanctified)而成爲「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底理由，是不知民主方式比「革命」流血更佳。「民主國家經常以和平民主方式轉換政權。改革如有憲法途徑可尋，流血革命根本就不應該的。」將「民主」與「革命」連在一起的人，未知是否瞭解此義。

第六、民主國家的政治。「民主國家的政治是以人權，民主，分治(Decentralization)爲基礎的。」實行民主政治，必須：「a. 兩個以上的政黨在嚴防舞弊中作自由的競選……；b. 全國人民得無限制地，公開地，討論政治問題。無論任何人均有權利對任何公衆問題，政策，候選人與政黨，發表意見；c. 絕對祕密投票。」

以上六點，是民主底基本意義與精神。近年來討論民主的文字多矣！然而，有的不是歪曲，便是斷章取義。能夠對於民主底真諦作一正確而全般介紹的，這一篇似乎是有數的文章之一。

第二篇是羅素底〈權力的馴服〉。羅素底作品對於許多人已不生疏了。這篇文章與前篇頗有互相發明之妙處，它摘自羅素所著《權力》一書。讀者最好取全書細心一讀：當可發人深省；並知權力的馴服對目前的世變具有何種良好的影響。羅素說馴服權力有四個條件。第一、我們不能信任少數人照料多數人的利益；第二、使專權減少到最低限度所必需的經濟條件；第三、不平的伸

訴必須使之有公開的可能；政治活動如不作破壞法律的煽惑，必須予以自由；第四、免除或不製造群眾狂熱。「自由的教育的任務就是：使兒童認識統治權以外的事物的價值，並幫助創造自由社會的智慧的公民。」這是多麼公正的理想。在這公正的理想面前，那藉「訓練」來把人民造成一黨一派底工具的勾當現得多麼偏私！

胡適底〈民主與極權的衝突〉一文，除引述依斯托曼對於極權主義的批評以外，基本觀念在第一篇中都可找到。我們無需在此贅述。

戴杜衡底〈民主世界的迷惘〉一文，曾為若干人誤解，或為一部分人所利用作攻擊民主的藉口。其實，他底立意是爲了預防民主正體之崩潰。這種立意顯然是站在最民主的那一邊的。他說的很明白：「我以爲民主政治是在退轉之中，即是說，已漸漸走上了與它原來理念相反的，或至少是不十分符合的道路。極權國家的情形不用說。我是說即在一般公認的民主世界，也有某種事態的端倪，令人懷抱隱憂。及早指出這危機，也許是避免危機之最佳的方法。」

他分別指出民主政治之瀕臨危險邊沿的重要情形：

一般民主主義者同意政府底活動應僅限於絕對必要的事件上。但此「必要」是一變量(Variable)·而不是「常量(Constant)」。既然如此，「必要」可伸可縮，可多可少，可暫可久，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假若有危險或緊急的事態存在，那麼「必要」的範圍可以擴張及於政治、

經濟、教育、文化全部，軍事更不必說。「必要」底這樣擴張，在事實上與極權統治同其外範(Extensive)。這樣一來，它可以逐漸摧毀民主素質。英國工黨之所為就有這種來勢(Tendency)。而民主剛在萌芽的地方，更經不起這樣幾個「必要」一轉，不知不覺倒退回絕對專制之路，只剩下若干「導演」之下的選舉形式，作為點綴點綴而已。如就蘇俄而論，則「選舉」最順利辦理的地方，正是最極權的地方。

戴氏說：「對眼前這問題，我們似乎還應該從另一方面來考察。民主政治在原則上既並不否定政府的權力，不過是提防著權力的濫用而已，則政府權力提高，如果人民提防權力濫用的技術也同樣提高，政府多管一些事也是無礙的。現在要來看提防技術究竟提高了沒有，究竟提高了多少。」這是一個很關緊要的提示。因為，照現代若干地方的趨勢，一旦少數人掌握政柄以後，你不獨要把「擁護之權」移交出來，而且又要把飯碗交出。他們底政治勢力深入你底腸胃。這時，如果他們胡作亂為，又如果你無力反對，那麼只有白白在肚皮裡悶氣，或者慢性自殺而亡。無可奈何。

作者接著說：「我們首先應承認在選舉權方面，確是有了不少的進步。不論階級性別，不以財產為基礎的普選制度，已漸次在大多數國家實現。選舉方式，在有些國家，也有了若干更符合民主原則的改良。甚至在本質上非民主的國家，也莫不維持著一種的普選形式。似乎現在的統治

者，都是在徵得人民同意之後纔行使統治的。可是我們要瞭解，選舉權這一項人民所掌握的唯一權力，事實上卻正是一項最爲微弱的權力。……人民只有在投票的一剎那是自由的（極權國家甚至連此一自由都非真實），此外時間他仍然爲無條件的被支配者。而且，在投票時作最佳的選擇，已由種種事實證明爲不可靠的幻想；人民，不論他的知識程度如何，對被選舉人未來的行爲思想，不可能有先見之明。在第二共和時期的法國，推翻民主政治的路易拿破崙是人民以絕對多數票選舉出來的；在歐戰後的德國，希特勒的黨也是經合法投票而執政的。人民因投票而喪失了自由的事例，不勝枚舉。」選舉之不足以限制政府之濫用權力，已經說的很透闢了。

許多人學了一點英國工黨的皮毛，就無條件地讚揚「社會安全」。殊不知「它在治者制裁被治者的惡這一方面是前進了，在被治者制裁治者的惡這一方面不特沒有前進，卻只有後退」。如果「社會安全」與「緊急狀態」合在一起而永久化，則這種惡恐怕只有增加。徒以這類辦法與「一把抓主義」及支配欲強者之脾胃相投，所以一拍即合。一知半解的「專家」眞害死人。戴氏認爲抑制經濟之不平不必藉「行政」程序，而可藉「司法」程序。這眞是一大創見。因爲這樣，可以免於造成政府壟斷操縱之浩劫。在第五節裡，戴氏貢獻了此類極其精審的見解。

這篇作品一方面揭露民主世界內含的隱憂；另一方面反映出極權統制之危厄。可謂一舉兩得之作。

這册文摘所選擇的文章在思想上是一貫的，而且都是道道地地的民主思想。愛好民主的人，如能細心一讀，必可增加對於民主的認識。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四卷一期

附記：本書爲民主中國出版社印行。

二十世紀哲學

許久以來，在報章雜誌上，常常有關於「哲學」的文字出現。這些文字之中的許多文字之出現，很容易令人發生一個印象，就是：「談的人不懂；懂的人不談」。如何得了！

此時此地很少人動輒談數學或物理學，而較多的人常常開口閉口「哲學」「哲學」的。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底理由固然是因為某一種哲學與人生切近；另一部分底理由是因為數學或物理學，非常之「過硬」，不能隨便七扯八拉，牽強附會。在中國這個處所底目前，許多人一談起「哲學」，就以爲是一大堆可以這樣說也可以那樣說的意見。既然如此，你可以那樣說，我就可以那樣說；這派如此主張，那派便可如彼主張。既然如此，好像就不能有客觀的是非真妄可言。於是，如果

你底意見或說素與我底意見或說素不同，便說「我們底哲學立場不同」。在這種似乎沒有客觀是非真妄的情形之下，言辯底空隙就多起來，於是乎「哲學」又益愈增多。

沒有問題，與數學或物理學相比起來，哲學是較富於派別性的(Sectarian)。可是，是否有派別性是一件事，是否有客觀是非真妄又是一回事。我們不能由哲學之富於派別性，而推論到無客觀是非真妄之可言，更不可因此而七扯八拉，牽強附會。恰恰相反，正因哲學富於派別性，我們更應藉之作理性思辨的努力，以求在派別分歧之中去發現客觀的是非真妄。

要能做到這一步，先決條件是接受哲學的遺產。所謂接受哲學的遺產，就是潛心究習各家底哲學思想。實在說來，哲學上的「新」問題並不多，現代底哲學問題大多可從哲學史中探溯出其根源或基因。維也納學派或科學經驗論者所增進的只是技術方面，而非哲學之原本觀念(Original Ideas)。我們從各家哲學思想中，可以探索哲學思想發展之來龍去脈，可以知道古往今來各哲學思想家對於某些哲學問題之提出，以及他們如何解答。要能辦到這一層，就有賴乎哲學方面底Scholarship。談到哲學方面底Scholarship，那也就是很「過硬」的，是有一定的，有典籍擺在那裡為根據，再加上謹嚴推理方式作為運思工具，而不是可以高視濶步，或信口吹空氣的了。

現在，歐美國家好的哲學著作真是不少。有志者可以去專心研究。至於在目前的中國流行的號稱哲學著作，堪作補助讀物的都難得找。

胡冬野譯的羅素著《二十世紀哲學》又是華國出版社編印的這類精彩小冊。這個小冊原係羅素所寫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 這本書中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中扼述「求真與致用」，「傳統的德國觀念論」，「詹姆士與實用主義」。「柏格森之哲學」，「新實在論」，及「相對論與新哲學」諸論題。當然，在這樣一篇短短的論文裡，羅素不能將這些大題目作詳盡的列論。不過，以年近八十的羅素在哲學方面的火候之老，以及親身作為現代哲學巨流之一的新實在論底創導者之一，來扼述這些問題，當然把握著緊要的關節，和這幾派底徵性，以及相互關聯。復次，羅素為文，在第一流哲學家，中能深入而淺出著稱。所以，本書所論雖係現代哲學上幾大派系，但並不太艱深。無甚哲學根基的人，只要肯多思索，也可以看得懂。從此，他們對於現代哲學可獲得一個輪廓，或正確的知識。

許多人，特別是有政治興趣而又要使其政治活動顯得「有個道理」的人，往往愛將哲學與政治拉在一起。這種趨向對於知識本身而言是一種危害，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可能是禍亂之一源。無論哲學思想會在政治上發生何種效應，我們在研究哲學時不應與政治活動聯繫起來，尤其不應受政治目的所左右。「馬列哲學」，如果算是一種「哲學」（筆者以為不是），是哲學受政治動機支配之一典型實例。它代替了宗教迷信而掀起禍亂。羅素在一開始便說：「自從中世紀結束以來，哲學之社會的和政治的重要性，即已逐漸衰落了。……只有在俄國，因其在革命以前一直保持中世

紀的狀態，還繼續保持著哲學與政治之明白關聯。」布爾塞維克是唯物論者，而白黨則是唯心論者。在西藏，這關聯甚至更為密切。班禪喇嘛，即政府之第二個最高官吏，稱「玄學宗師」。這可以說明，為什麼許多人一談「政治」，就要談「哲學」，就要滿口「宇宙」，「人生」等等空大名詞。好像非此不足以顯其神聖，非此不足以過癮。像那個啥子艾思奇，就是拿啥子《大眾哲學》來裝潢共黨底「革命理論」。可是，許多反對者看見這個樣子的「大法師」卻心竊慕焉，無意之間跟著他後面「學習」哩！在近代民主國家，政治與哲學簡直找不出什麼直接關聯。「休謨(Hume)在政治上是一保皇黨，而在哲學上則是一極端急進派。」極權國家或準極權國家底統制是全體主義的統制。全體主義的統制是從精神到物質無所不包的統制。既然如此，於是在經濟方面假社會主義之名實行一把抓的統制或計劃經濟，在思想方面則以國教代替一切學說。但是，「宗教」已不見容於現代，科學又難於隱藏獨斷，於是乎取「哲學」而代行宗教之職。所以，在這樣的空間，搞政治的人，或希望影響政治的人，常好談「哲學」。於是乎「大法師」輩出，現身說法矣！

這是禍亂之一源。大法師輩其明白乎？

羅素說「壞的哲學有實際結果，而好的則沒有」。世人每易以為真理對於人類之影響勢力遠大於虛妄。因而引伸出真理終必克服虛妄之樂觀信念。這種想法是建立於另一假設之上，即以爲真理必爲人所信仰，而且人所信仰者必爲真理。這一假設是經不起考驗的。毫無問題，人類大都要

求服膺真理，亦若人類之愛好美與善。然而，主觀地希冀服膺真理是一件事，是否具有辨別是非真偽的能力又為另一件事，辨別是非真偽的能力，多靠後天習得與訓練。關於這一點，在現代技術發達之世為尤然。主觀喜好真理為一不變的常量。而辨別真偽的能力則為一變量。辨別真偽的能力每隨才智與訓練之不同而不同。既然如此，政治野心家可利用群眾心理的弱點或藉周密的宣傳方式製造「真理」以愚大眾。在這種情形之下，大眾所認為的「真理」實一虛妄。虛妄常戴上真理的帽子出現於大庭廣眾之間。在這種情形之下，群眾常為之瘋狂，而為此「真理」效死犧牲，在所不辭。

近代的幾個大的群眾叛亂(Mass Revolt)(借用J. O. Y. Gasset底名詞)提供最顯著的說明。大凡一時煊赫轟烈的人物及其所領導的運動，當時固煊赫轟烈，事後無不覺其幼稚可笑。其狂態與小兒施放鞭炮引為笑樂不相上下。莫索里尼底法西斯運動是一例，希特勒及其領導的納粹運動又是一例。在這些運動之中的千萬群眾無不以為其首領所標尚之言行皆為「真理」，並為之冒險犯難，流血犧牲。其殉道精神，不下於宗教戰爭。然而，在今日看來，果為「真理」乎？

馬克斯底經濟決定論是以「真理」面貌出現的虛妄之近代最大的例證。馬克斯之於經濟現象之研究，固然用力彌勤，而且獲得部分的確實性。然而，無論如何，他以及他底從徒所作的推論，在邏輯上全屬謬誤：彼等將必須條件當作必須而充足的條件，將蓋然(Probability)當作必然

(Necessity)。馬克斯主義之掀起群衆騷亂的地方，不必在其確實部分，正在其謬誤部分。所謂以經濟爲必須而充足的條件，就是說：「沒有經濟則人不能活命，有了經濟則有了一切。」這顯然是一假命辭。以「蓋然」爲「必然」底例子，比如說「資本主義必然崩潰」。這也是一假命辭。這一命辭之爲假，正與「死後必然升天」一樣。但是，馬克斯主義之所以能掀起騷亂，正是這些虛妄的部分。假若有人以學者底口氣說：「經濟條件如不滿足人固然不能活命，但如只滿足了經濟條件而其他條件不滿足時人還是不能活命。」這顯然是個真命辭。但是，如果一個職業煽動家果然說出這樣的真話，有誰肯犧牲生命來從事「階級鬥爭」呢？又假若有人以邏輯家底口氣說：「資本主義的社會如不自行修正，大概可能趨於解體，但並非必然」。這也是一真命辭。但是，職業政客果真說出這種老實話，有誰再信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呢？既然不信資本主義「必然」崩潰，有誰肯送死去「打資本主義」呢？而許多人卻說經濟決定一切，並說了一大堆「必然」，居然贏得許多人相信。由此可見虛妄比真理更支配人。正猶之乎玩魔術較之演數學更令人發生興趣。現代宣傳技術之發展，使得虛妄(Falschhood)底控制力量更加擴大。某種哲學，不幸成一魔術。羅素說得一針見血：「因爲許多哲學家都是喬裝的實際人物。他們作此推論，認爲哲學不必尋求真理，而只須爲有用的錯誤造出動聽的理由就行了。許多現代哲學，都是受這一重大思想之鼓勵而提出的。」羅素自己則認爲：「也許，真理之追求，如藝術一樣，是應該本身即可認爲正當，不計效

用的。」然而，「沒有一個著名的人物，願意贊成這種學說的」。

在述說了「傳統的德國觀念論」以後，接著他敘述「詹姆士與實用主義」。在這一節裡，他徵引詹姆士批評德國觀念論的一段話：「那種『完完整整』的宇宙，以及永不謬誤，絕無缺點，貫徹一切的性質，似乎使我窒息。他只有必然而無可能，只有關係而無主觀，使我感覺，好像和人簽訂合同而無保留的權利，或者，更像住到一個海邊大廈中，而沒有一間私人臥室使我得以暫時避開當地的社會。」黑格爾底哲學，是近代極權主義底理論基礎：在俄國正與在德國無殊。黑格爾跑到東方來，想和孔仲尼開合股公司。他們想拉康德作介紹人哩！

羅素認為「雖然實用主義不會包含究竟的哲學真理，他自有一定的重大功績。第一，他指出『我們』所能達到的真理，只是人類的真理，如其他人類事物一樣，是可以錯誤，可以變遷的。……以虔敬之心談『真理』的人，最好談『事實』，而且應該瞭解他們表示敬意的崇高性質，是在人類信仰中找不出來的。這在實際上和理論上都有長處，因為人類常因他們相信知道『真理』而互相迫害。由精神分析學說來，可以說凡人類以敬畏之心提出的『偉大理想』，實在是加於他們的敵人以痛苦的一種藉口。好酒不用招牌，而好的道德不用使人屏息。」這真是至理名言。過去的宗教迫害，目前的共黨之禍，一部分是由「以敬畏之心提出的『偉大理想』」產生出來的。我並非說不要理想，而是說狂執(Fanatic)是非常危險的。

羅素甚不喜柏格森哲學。在這篇文章裡亦如在他處一樣，對於柏格森哲學持排斥的態度，雖然他底已故老師懷德海(Whitehead)頗受柏格森底思想之影響。羅素與劍橋底穆爾(G. E. Moore)共同創導新實在論。新實在論「在方法是分析，在形而之學上是多元論。」「這種新哲學之第一特徵，是它不承認有一種特別的哲學方法，或以這種方法能得到某種特殊種類的知識。他認為哲學在根本上與科學是一個東西。其與特殊諸科學不同者，只在其問題之一般性，在其有關事實之形成假說者，還缺乏經驗的證據而已。……它並不如以前哲學所常做的一樣，以敘述整個宇宙為目標。它根據其邏輯的基礎，相信我們沒有理由否認這世界看來零零碎碎雜亂無章的性質。它不認為這世界是「『有機的』(Organic)——有機的」云者，其意若曰，由完全已知的部分，即可推知其全體，如一絕跡巨獸之骨骼，可由一根骨頭推知者然。特別說來，它和德國觀念論不同，絕不想由知識之性質，演繹整個世界的性質。」這種哲學，無論是否「不夠」，至少可用來醫治東方人思想含糊不清或大而無當之病。

全文底翻譯似尚忠實而認真。不過，第四一頁「荒謬」一名，看上下文似係paradox之譯(筆者手頭無原書)。因Paradox正是邏輯所要對付或避免的結果。如果是Paradox，譯作「荒謬」，甚不妥當——因失之寬泛；筆者以為最好譯作「詭論」。詭論乃因Type混亂而由正得負或由負得正所形成的。至於A. Meinong底Ueber Annahmen被譯作「假說之上」真是妙不可言。Meinong

選著有 Ueber Moeglichkeit Und Wahrscheinlichkeit，是否應譯作「可能性與蓋然性之上」呢？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四卷三期

附記：本書為胡冬野譯，華國出版社編印。

追求與幻滅

他們所追求的是什麼呢？

人間的社會主義的天國。

他們所得到的是什麼呢？

在社會主義美名掩飾之下的工奴和農奴國。在這個國度裡，一個元首，一個政黨，一個特務組織，緊密地控制著全國人民底一舉一動，一呼一吸，甚至一意一念。

這正是人間天國底反面——人間的活地獄。

追求的理想原來如此。理想幻滅了，於是，弱者失望，涕泣，徬徨；強者則起而反對。

六位與共黨有關的作家自述而成的這本小書，是由追求到幻滅之真切的寫照。從這本書裡，我們可以知道，這些狂熱者如何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以及如何誤認蘇俄是這一理想底實現地方，和共黨真是爲這一理想之實現而努力而犧牲而鬪爭。從這本書裡，我們可以認清，蘇俄與共黨之極權的本質與欺騙的作風。從這本書裡，我們可以體察，他們怎樣由識破西洋鏡而動搖而失望，或者進而毅然反對。他們底情感是狂熱的。他們底經過大多是辛酸的。因而他們底體驗是深刻的。他們大都跳出了精神的陷阱，而另外去尋覓新的天地。

就他們六個人而言，誠然是值得慶幸的。然而，陷入與他們同樣的陷阱而不克自拔的人此刻何止千萬！特別是，在古老，貧苦，混亂，落後，而極待拯救的東方，像這六個人的青年，真是不可數計。他們天真而熱誠地，在絕望之中，以諦聽福音的心情來傾聽共黨底宣傳；並且，以歡迎救世主的心情來歡迎共黨蒞臨。這股願力真是沛然莫之能禦；任何人爲的力量都不能阻止。然而，他們誰會相信，他們諦聽的盡是編纂嚴密的欺人謊言；他們所歡迎到的是更大的惡魔。如今，這惡魔既已騙入，就像吳三桂將滿人請進關一樣，再也請他不走了。如今，這更大的惡魔，跨在萬人頭上，日吮人血日吸民膏以爲生。真是千古未有的劫數！

我相信，事至如此；大多數青年已經由追求而幻滅了。整個的東方，由追求而幻滅了！但是，有幾人能脫離地獄？不能脫離地獄，只有設法推翻惡魔底統制。這本書，由給予大家以更深刻的

認識而堅定大家推翻惡魔統治之信念。

柯斯特勒自承「一種信仰不是靠理性獲得的，而是自然長成的」。這是經驗之談。信仰之所以盲目與危險常生於此。「我生身於中產階級的家庭。中產階級的沒落，燃燒我改造社會的熱望。二十年代之中歐，為通貨膨脹所毀滅，形成歐洲沒落之開始。中產者解體，社會兩極化。有的加入納粹，有的加入共黨。我讀『共產黨宣言』。每一頁有適獲我心之快，感到一種精神的新生。」許多人加入共黨，或受共黨影響，原因正與此類似。既然他信仰了共產主義，「信仰是奇怪之物，他真能移山填海，指鹿為馬的。」「於是，一切謊言，威脅，清算，犧牲這一代以為下一代，都成為必要之事了。」後來，他對於共黨的信仰大為動搖。不過，他尚不能完全擺脫。第一，因反對納粹，使他與共黨度「第二蜜月」。「我在巴黎過半飢餓生活，創辦報紙，反對納粹。我陶醉於工作。史達林政權之卑劣都放在腦後。：而我並不知道，我是在與影子作戰。」第二，因為「大家認為共產運動誠然不滿人意，但你只能由內面改革他，不能由外面改革他。」但是，「西班牙事變的經驗，使我發生這種感想：『人是現實，人類是抽象。人不能看作政治數學中的單位。目的可以不問手段，只在極有限的意義下才是說得通的。道德不是一種功用。同情不是小資產階級感情，而是使人類文化在其軌道中運行的萬有引力。』這是庸言庸理，但這都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一九三八年他在巴黎公開宣布：「沒有任何運動，任何黨和個人，能有這種特權，說他永不謬誤。」

這是人底尊嚴和理性的自覺。這種自覺在本質上與共黨不相容。有了這種新覺悟的柯斯特勒，終於脫離共黨了。

西洛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說家和意國共黨底發起人。他在十七歲時便參加社會主義運動。他當義國共黨代表，到莫斯科參加國際大會，親見列寧及托洛斯基這樣的人物，在討論問題時對於不同的意見竟不能表現公正。於是，他覺悟到自由之重要：「自由即懷疑之可能性，犯錯之可能性，探討與實驗之可能性，對任何權威說『不』之可能性。」這可說是「自由」之最好的注腳。

在創造新世界初期，俄國青年的熱忱，是令人欽佩的。我們大家希望，新世界比舊的更人道一些。誰知過了幾年，新政權鞏固了，經濟制度成形了，外來進攻也停止了，而我們所看到的，過去所開的民主化之支票並不兌現，反之，卻是獨裁制度日益加強之壓迫性。這是如何痛苦的失望。這一段話，是由追求到幻滅之最好的寫照；同時也是由「革命」而走上「獨裁」之最好的寫照。

所謂「革命」，「暴亂」，和「極權」簡直是三個不可分的名詞。「革命」如未成功，則常為「暴亂」。「革命」既已成功，便實行「極權」。此理不獨蘇俄為然；在其他許多地區，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常常如此。可不懼哉！

社會進化可使一般人民獲得實質的福利；而「革命」之果實常為少數人享受。且「革命」使

道德無止境墮落，而與馬基維尼主義結不解之緣。「有一次，當第三國際討論英共領導的少數派應否服從英國職工會的決議時，俄共代表皮特尼斯基說：『英共應宣佈服從，而實際上應該相反。』英共代表說：『這就是說謊了。』於時哄堂大笑。這句話，在俄國人看來，簡直是笑話。革命還怕說謊？……多利奧剛由中國回去。他對人承認國際的錯誤。可是開會之時，卻又說得不同。陶格里蒂曾說這是二重人格與道德墮落。可是，最後陶格里蒂也只得屈服和投降，不說真話了。」蘇俄與共黨所示範的，是在以「革命」為名而實行的「獨裁」統制之下，年復一年地培養這種「人材」。當著人們發現說假話可因得歡心而得好處時，或只有如此可生存時，自然相率訓練說假話。上以此教下；師以此教弟；父以此教子，於是乎，整個社會養成以說假話代替說真話的良好習慣。

紀德是一個大文豪。大文豪常富於情感並多幻想。「社會主義的天國」之憧憬於是乘隙而入。當初，紀德對於蘇俄極其景仰而熱望。他懷抱著一腔景仰與熱忱而遊俄以追求其理想。可是，等到他親身到蘇俄去視察，馬上看出狐狸精底原形。終於，他失望了。

由追求而幻滅的紀德，對於蘇俄與共黨的批評是很深刻的；處處表現出他敏銳的透視力。

「蘇俄對於我，曾經代表夢想和希望，現實之天堂。我尤其讚美他們對於教育文化的關心。所可惜者，這教育只是教他們讚美現狀，『蘇聯超乎一切』。而所謂『自我批評』，只是討論是否合乎黨的路線。」的確，蘇俄共黨及其模倣者之從事教育，目的之一，是要被教者「讚美現狀」。不

獨教育必須讚美現狀，新聞紙尤須如此。所以，如果有人看見佈滿歌功頌德之詞的新聞紙，必係蘇俄共黨及其模倣者之出品無疑。民主國家絕無資格產生這樣的偉大作品。

他又說：「我參觀過模範住宅之許多屋子。一切全無個性，幾件同樣家具。一張史達林相片，並無其他。千篇一律，能算進步麼？」我可以依此意替紀德向前引伸一下；蘇俄與共黨更將個人的頭腦弄得千篇一律，人人是官方頒制的馬列教條之信徒，人人底精神食糧都由官方配給這才是「進步」。所以，「在蘇聯，每一問題只能有一個意見，這便是〈真理報〉教給他的意見。：俄國人訓練得和一個人談話等於和全俄人談話一樣。」這種「統制思想」之空前的成功，使許多人欣羨不置。這種成功，對於統制者的確方便，可是「人」卻不見了，有的都是機械。這還能說是人間世麼？

我不說「資本制度」沒有毛病。美人臉上還有一顆痣。人間世的事物那會沒有毛病呢？只有獨裁或極權的組體才宣傳「我底一切都好」。我是說，「資本制度」多被用成一個倫理名詞——共黨底宣傳使人認為它是萬惡之源，而很少人客觀地認識它是經濟制度之一而已。共黨將社會主義宣傳成衆善之母。即使就共黨筆尖上描寫的看來，我已經覺得不美。因為，縱然在那樣的社會裡沒有餓肚皮的事，但大家「都住在海邊公寓裡，沒有一間私人臥室。」（詹姆斯語）這樣的「福分」，我可享受不起。何況，在現實裡，更滿不是那回事呢？紀德說：「資本主義雖然沒有了，蘇聯工

人並無自由。這是外國無產階級必須認識的。誠然，他們已不受股票持有者的資本家剝削，但是依然被剝削得如此迂迴微妙而乾淨，以致不知道何人應受責備。大多數生活在貧窮線下。他們飢餓的工錢，使少數特權工人——唯諾之徒肥了。：雖然無產階級獨裁並未實現，可是有一種獨裁——蘇維埃官僚獨裁。工人無權選舉代表。自由投票是嘲弄和假戲。選舉權只是選舉指定候選人之權。」不獨如此，而且，「如果不是黨員，不會升職；而無諂佞服從之資質，也不能做黨員。做了黨員如想退出，將失去一切權利。」原來「諂佞服從之資質」，是一切極權空間之如此高貴而且如此有用的「資質」！

面對蘇俄與共黨藉「革命」口號而製造的這種現狀以致理想幻滅了的紀德，終於又回復到長期薰陶他的西歐文化的懷抱裡。他說：「人性是一複雜體，不是一件一件的。任何人將人性簡化劃一的企圖，都是有害而危險的。對於藝術家如此，更為可惡。我在俄國遇到一個畫家。他說精美和獨創不是重要的。藝術必需服從黨的路線，否則便是「形式主義」。我說藝術不能如此對獨裁折腰。這樣道一風同尊奉國教主義，是藝術之衰瀆。他說這是資產階級的想法，不是馬克斯觀點。他的聲音很高，好像在演說。我聽不入耳，不理他便走開了。可是不久以後，他到我的房中，說他內心與我同意，可是剛才旁邊有人，他是故意讓人聽到的。他正要展覽，必須有官方贊許云。」由此可見，在極權空間，人民沒有表露真實之自由。真話不能說出；說出的不是真話。舌頭已不

屬於自己底了。

「專制主義的特徵，是只能容許奴性，不容許獨立性。史達林只許稱頌。他的相片到處看見，名字在每一個人嘴上，每一演說中是必須歌頌到的。」現代極權空間，無不如此，非獨蘇俄爲然。例如，其中之一的戰前德國就是來這麼一套。可見「天下老鴉一般黑」也！

費雪在德蘇協定以前對於蘇俄也是很嚮往的。可是，德蘇協定驚破了他底夢幻。從此，他便反對蘇俄。他之反對蘇俄，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他底論據不是馬克斯主義的或共黨型式的論據。如果以馬克斯主義的或共黨型式的論據來反對蘇俄與共黨，那麼不過是甲共產黨反對乙共產黨而已。如果甲乙同爲共黨型式的思想甚至於作風，而互相反對，究竟是爲了理想呢？還是爲了權力與利益？費雪反對蘇俄與共黨的論據是自由主義的論據。在這一點上，他較其餘的人更爲顯明。

他說：「我自己的態度開始使我困惑。莫非我在崇拜鋼鐵啓羅瓦特，而忘記人類？鞋子、學校、電燈、曳引機、地下車是否就是我所理想的世界，如果產生這些東西的制度，是不道德和無人道的。」

「在我的印象中，開始出現黑點。一九二八年一月，托洛斯基被捕，放逐中亞。他的罪名是與史達林政見不同。列寧時代，這種不同是用投票解決的。現在格別烏的手槍變爲最高判決。」

「我不贊成他們兩人的任何一派。但不拘托斯二人功績和地位如何，以祕密警察終止辯論成爲共黨之滑鐵盧了。於是，有力者便認爲有理，於是犬儒主義勝過誠實。」

「我注意這現象，然尙未瞭解這是墮落之開端。這墮落產生今日大的撒謊，大的沉默，於是產生大的領袖。」

「一切使我對史達林發生反感。官方宣傳將他描寫爲蘇俄一切最好事物之永不錯誤的，仁愛而萬能的作者。他給人民以深仁厚澤。而一切錯誤失敗，都是『托派』『人民公敵』所造成的。」

他底所追求的理想開始幻滅了。

「許多人明知蘇俄惡劣而不願毅然脫離者，實由於資本主義之罪惡，乃容忍共產黨之恐怖。我自己的處方是：二重的拒絕。許多人總想拒絕蘇俄之後，能得到一個更好的歸宿。然有許多人，是由制約反射而形成的權威崇拜者。他們雖對史達林失望，但要求安全和另一教條，另一個足以供其恣肆的軍營，於是變成法西斯。他們實在是反共的共黨。例如法國之多利奧。」

「克隆斯達式起義，只有拒絕獨裁方法，歸依民主，才是創造的，有價值的。一切獨裁都不會民主的，也絕無自由之種子。在我親蘇時期，沒有懂得這一點。我以爲蘇俄暫時限制自由，可以造成經濟的進步，而以後再恢復自由。這是不會有的。」

「我的親蘇主義使我發生這種錯誤思想，以爲建立於『欲達目的不擇手段』原則上的制度，

可以造成一個更好的世界。其實不道德的手段，造成不道德的目的，不道德的人。不論在布爾塞維克主義之下，資本主義之下，都是如此。獨裁是休息於血海，淚洋，全世界苦難之上的——這是殘忍手段之必然結果。

「凡愛人類與和平者，斷不能贊成獨裁。一個社會宣稱自由而又限制之，這固然不好，但不足成爲主張完全毀滅自由的社會之理由。在民主國中，取消對人身的，政治的，經濟的無數限制，而以甘地的道德——其中最重要者，是對於方法，人與真理之尊重，來充實民主政治之內容，才是我們的道路。」

「我之嚮往蘇俄者，我猜想是一種對於財富集中後對人類濫用權力之抗議之副產物。少年時代我讀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我充滿老羅斯福時代之心心相印的坦白精神，以及自由主義和民衆主義。此皆每一貧困美國人之遺產。於是，蘇聯出現了，說要取消一切地主資本家之權力。我反對過度權力之態度至今未變。但深信共產主義不是出路。因其本身就是世界最龐大的一個權力之集中。克里姆林宮不僅以警察特務控制人民，且以國家經濟事業之獨占控制人民。資本家之托拉斯加特爾，較之蘇俄之國有，真是小巫之見大巫了。」

「世界所需要者，是一種政治，經濟權力之平衡，使任何政黨，階級和政府，任何私人團體，都不能夠主宰一切而不受挑戰。我們應該拋棄一切偏見，二重的拒絕獨裁的罪惡，與民主中之缺

點。

「一切目的，民族獨立也好，國際主義也好，科學進步也好，國家安全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好，都不是抽象的。要看對於活的男人、女人、小孩的利益如何，才有意義。必須經過男人女人小孩這手段，一切目的才能實現。熱心於目的，很容易忘記他們，或者以爲他們可以等待，他們並不計較。蘇俄說爲下一代犧牲這一代。但犧牲是可以成爲一種習慣，勢將代代犧牲下去。我服務於人類，但至今我才明白人類之真義。人類是目的也是手段。」

這一番出自切身經驗和明切理解之談，實在深獲我心。東方的不幸，至少已經使人犧牲幾十年了。

六篇報導之後，附有羅素寫的書後。羅素三十年來一向是開朗而自由的反共人物。從這篇書後，我們可以知道共產主義之思想的錯誤。

許許多多的人，甚至於若干反共的人，對於馬克斯主義這一路的說素認爲是了不起，或者還多少殘存一點崇敬之感。自然囉！一種說素被神聖化而成爲一種人世宗教且掀起近代這樣廣泛的群眾運動，那得不使人發生崇敬之感。迅雷急風可使土人下跪哩！不過，聰明的讀者，我要向大家指破：真理固然可以感動人；但感動人的不必是真理。恐怕，在最多的時候，虛妄的言詞遠較真實的言詞更能支配人心。黑夜講鬼故事不比白晝講相對論更能動人麼？幾個小孩爲了做算術而

生肺病的？但是卻有人看了連環圖畫而上峨眉山。說起來現在是二十世紀中的原子能時代，但許多人卻在那裡寫鬼故事，編連環圖畫。與政治實際有關的魔術師，尤好如此。共產黨就專會這一套。許多人則步其後塵唯恐弗及。其實，撇開政治力量不談，單從學理著想，馬克斯那一路的貨色，也不過是許許多多學派之一而已。——雖然它是最適於被利用作煽動工具的。世上沒有一種學說能夠單獨帶來人間天堂。如果別的學派並不一定能帶來人間天堂，何以馬克斯派獨能？所以，並不是馬克斯對，而是這六位先生錯了。羅素說：「其實這幾位的希望，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因為無論馬克斯或列寧，都沒有什麼福音，對於拯救人類事業的前途可給予多大的光明。你不能從荆棘中去找葡萄。在馬克斯和列寧的著作中，荆棘實比葡萄為多。」許許多多歡迎共黨的人，就是想在荆棘中去找葡萄。結果，葡萄沒有一顆，手倒扎得鮮血淋漓！

羅素看出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對於反對者的仇恨，遠重於其原來之人道主義的動機。他說：「馬克斯就是這樣一個人，贊成這思想，承認仇恨與鬭爭是對的。因此，無論在感情上或理智上，他都認為傷害資本家，比之使勞工獲得利益更為重要。」

羅素之所言，是從心理解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入手的，可謂洞察底裡。

他認為這六個人反共的理由很有道理：不過還有病疾底基本原因：「病的基本原因，一是教條主義，一是根本缺乏仁愛的情感。這兩個大缺陷，一為知識的，一為道德的。二者合併起來，

就是獨裁制度及以殘酷手段使其成功之行為的根據了。假定有了這兩種缺陷——其實列寧的思想是兩種具備的——其共產主義的一切罪過，除非有外力阻止，在適當時期內均必自然隨之而俱來。共產主義的各種錯誤，都是理論上發展之必然的結果。對於任何具有歷史知識，瞭解真正人性，或知道教條主義在哲學上的不正確性的人，這些錯誤都原是一種意中事。但不幸的現象，卻是當人類對於惑疑不能再行忍耐的時候，及社會現有罪惡高度發展，人類在感情衝動之下，要求迅速解決的心理到了不可抑止的時候，許多人，就不願意再聽謹慎的理由；對於任何無稽之談的福音，只要有一點救世的希望，便不管他是否有根據，都願意立即接受採納。……羅素此言，真是道出共黨妖言爲何足以惑衆之竅要。白蓮教，上帝會，……皆係如此。天氣太早燥了，難怪人看見一片薄雲便以爲會下雨。而望天「求雨」之事也就不能全然視作迷信。

在禍亂相尋的東方，理想中的「革命」似乎成爲許多人底興奮劑。其實鴉片是不可吞食的，吞食了必死。近代許多「革命」實例明示吾人，緊隨實際的「革命」而至的，絕不是理想之實現，而是人民痛苦之深刻化和普遍化，以及少數野心分子之乘機趁勢攫取權力。人一有了權力，必設法保持。於是，攫取權力與保持權力，成爲非民主地區之政治上最核心的實質問題。羅素說：「權力是一種甜蜜的東西，是一種麻醉劑，越吃越想吃。已經取得勝利的人，縱令最初原有很高尚的動機，但不久他們就會勸告自己，他們有許多理由，使他們不能放棄他們的權力。」這真是一針

見血之言，古往今來，爲權力而鬪爭，使衆民受禍幾何？時至今日，由於經濟權力之集中，以及科學技術之高度發達，權力鬪爭於是更形激化(intensifying)。

譯本前面有胡秋原底序文。序文中說：「羅氏有很濃厚的悲觀氣質。」這句話未知何所根據，不知又從那兒聽來的。不必到別處找，本書第四七至四八頁羅素書後中還有「現在蘇聯的制度，就是馬克斯這種悲觀論的表面化和形式化。」羅素在現代學術上之所以重要，並非因寫了幾篇政論，而是因在數理邏輯上將科學方法引用於哲學解析上有特殊重大的貢獻。這些東西與「人文」根本毫不相干(irrelevant)——雖然可以扯得出某種關係(relation)。數學邏輯裡，我們既找不出悲觀成分，也找不出樂觀成分。這正猶之乎我們不能說「河流有道德或無道德」一樣：河流是根本說不上有道德與否的。羅素固然不像Carnap Ayer這等人之強烈排斥形上學，但他卻也沒有強烈的Metaphysical Disposition。他不大談「本質」(Substance)這些東西，而好談「事業」(event)。也許，有些人因此instinctively覺得如此一來，此身無挂搭處，此宇宙便是懸空，於是乎說羅素輩有「愴涼之感」。大概，這是旁人對他之感吧！羅素一生剛而且健地爲學術努力，爲自由奮鬥，隨處演說爲文，以致於坐牢。這樣的人，是不會著涼的哩！

胡氏又說：「愈是有思想力的人，他相信與不相信一種學說，不單是一理論問題，而且也有整個感情意志乃至下意識的某物在。」這真是妙論！「學說」(theorie)並非「宗教」，不靠證驗或

推理，而要靠「信仰」嗎？「思想」與「信仰」有何必然關聯？「有思想力」的人，在「信仰」一種學說時居然還受「感情」與「下意識」之干擾，這還能算是有思想力嗎？「信仰」可以基於「思維」也可以不基於「思維」。這要以實際的 cases 而定。既然如此，二者無必然聯繫。那麼，何以「愈是有思想力的人」在他相信與不相信一種學說時「也有整個感情意志乃至下意識的某物在」？胡氏既說「思想」，又接著說它與「信仰」「感情」有什麼關聯，可見他所說的思想並非必然「包含信仰或感情的思想」。既然如此，思想，與信仰或感情，是二而不是一，思維訓練之可貴，就在造成一種習慣：在思考問題時，儘可能地不受感情底干擾，或受意志底支配，尤其要儘量將 unconscious 的東西揭露明白。依此，愈是思維訓練有素的人，愈是可能思考力強。愈是可能思考力強的人，愈可能運其純思而減少感情底干擾或意志底支配，∴。思考之可貴，就在可能離絕感情與意志等之干擾以趨近客觀。至於這客觀的結論，能否滿足思想者底信仰，情感，或意志，那就是另一回事，不可混爲一談。反之，愈是思維缺乏訓練的人，愈是思考力弱。愈是思考力弱的人，便愈是在思考進行時「有整個感情意志乃至下意識界的某物在。」所以，胡氏剛好說反了。

作序本非不好的事。但是，如果因爲走筆太快而未能多多給人以正確的知識，那麼便是很可惜的。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四卷五期

美國八位偉人

一個富於活力的民族或國家，其精神力常是充沛的，意識常是活潑的，知識常是不斷進步的。美國新聞處所散發的書刊，內容多清新可喜，或者言之有物。這本小冊子便是其中之一。這本小冊子雖係一本畫刊，可是，它所表現的意義實在不小。我們如要瞭解一個國家，必須從根本處瞭解其立國底根本精神。這本畫刊，如果我們善於體會，將助使我們瞭解美國立國精神之所在。

這本畫刊所陳示的是被認為「偉人」的八個人物。這八個人物，各別地代表著八種不同的典型。

第一位是美國開國人物華盛頓。他藉著自己底謀略，勇敢，和堅定，領導美國人爭取了勝利，

獲得了自由。十七八九年他當選做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總統就職的時候，場面簡樸到近乎寒酸。華盛頓作了八年總統以後，他不再競選，自行退休「立下大公無私爲國爲民的好榜樣」。美國獨立以後，如果他不自願當時的情勢，他是可以乘機攫取大權的。袁世凱之流常常如此，他沒有這樣做。因而奠定了美國民主政治基礎，他是美國求自由的象徵人物。

美國有名的「獨立宣言」底主要起草者是哲斐遜(T. Jefferson)。這個宣言裡說：「我們認爲這些真理是很明顯的，所有的人，生下來都是平等；上帝賦予他們以幾種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尋求幸福。爲保障這些權利起見，人民設立了政府。而政府底公正權力，乃是被統治者所同意授與的。」哲斐遜是美國民主思想底奠基者。他相信個人權利之存在先於政府。他認爲自由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唯一要素。他底自由主義，是以他對於道德觀念的信仰作基礎的。基於這種理由，政府權力須加限制。後來傑克遜(Jackson)之流說「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一八〇〇年哲斐遜當選美國第三位總統。就職的那天，他步行穿過華盛頓市街，來到禮場。他沒有排場，沒有鋪張，更沒有擺總統架子。哲斐遜晚年致力於教育事業，創辦維基尼亞大學。他相信如果人民有教育，世界上就沒有暴政和壓迫。

一八〇九年哲斐遜退任。退任的時候，他說：「人類自由的遺體之唯一的保存者——我們對

自己，對子孫，乃至對人類的責任，要求我們當此世界其他各部陷入紛亂狀態之際，用每一種高貴神聖的動機，維護我們這可愛國家的安寧。」哲斐遜在一百四十二年前說的話，於舉世遭受極權統制威脅的當前，正像今天說的一樣，而且美國正照著這遺言前進。

惠特曼(Walt Whitman)是美國底「大眾詩人」。他從小生在紐約海邊一座田莊裡，欣賞自然的美麗。他在一家報館當編輯時，所作的文章，常論到美國有廣大的土地，等候著別地方的移民前來開墾。他說「偉大的城市，是有最偉大的居民。縱然只有幾間破房子，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只要人民至上，總統，州長，市長都是公僕，就是偉大的城市。」在這詩人筆底，沒有「歌頌」任何一個「太陽」。他所歌頌的是平民。他以為唯一的政府，是尊重個人的政府。他的詩歌質樸，氣象雄渾，描寫當時美國西部拓荒的精神。這正是美國開創時代元氣淋漓，克服自然，充滿理想的精神之表徵。

美國第十六位總統林肯是衆所周知的人物。但我們更應知道他底人格。美國黑奴問題一直是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哲斐遜曾擬廢除黑奴而未果。林肯在世的時候，南部幾州主張延長黑奴制度，並且擴展到新的地區。北部則反對。林肯在國會裡辯論，竭力主張廢奴。他說：「美國政府不能長此半奴隸而半自由。大家應該有一種信念，就是有了正義才有威力，應該本著良知良能，盡了自己的責任。」林肯當選總統以後，南部十一州脫離合衆國，內戰爆發。林肯頒

發告示，解放南部黑奴。可是，必須打了勝仗，這這道命令才行得通。林肯見兩軍血戰，心裡難過。北軍在葛的斯堡大獲勝利，林肯下令將戰場作紀念兩方陣亡將士的墓地，並且發表演說：「我們現在立下決心，不叫這些死了的白白地捐了性命。要這個國家，在上帝庇佑底下，重新產生自由。要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不至於淪滅。」一八六五年林肯開始做第二任總統時，勝利已經在望。他呼籲和平，不要報仇。他說：「對任何人都不要存有惡意，對所有的人都要表示仁恕，堅決地守著上帝所啓示的正義，究竟工作，醫治創痕，竭力實現永久和平。」南軍投降之後，林肯下令對待南軍的條件務必寬大。

林肯之當選總統，是北部共和黨人支持的，而且政府軍勝利在握。照某些人底心理習慣，他應該偏袒北部共和黨和政府軍的。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對南北雙方一視同仁，他對雙方底死傷者同樣看待。這使人知道，他之所以動干戈，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是爲了自由和正義；而不是爲了個人底權力和一方面底利益。這是何等恢宏的襟度！這是何等大公無私的精神！靠了這種襟度和精神，才沒有促致一個混亂的國家陷入滅亡，而是將一個瀕於分裂的國家重新掣合起來，並且走上富強康樂之路。

惟獨具有這種心胸的人才適合作一國底公僕。

卡瓦爾(G. W. Carver)是一位出身貧苦的農業科學家。他二十六歲的時候進一間大學，一面

替別的學生洗衣服，維持生活。一八九一年卡瓦爾進農科大學，研究植物病態，後來大家公認他是很重要的土壤科學家。可是，他不僅是實驗室中的科學家，他還將他底學問教給莊稼人，使他們增加生產。他幫助了農民增加了財富，並發明了幾百種用花生製造的東西，可是他自己並未變成富翁。

卡瓦爾一生的奮鬥過程所表徵的是，在美國這個社會裡，無論你底地位多麼低微，無論你多麼貧苦，只要你肯真正的努力，你自然會獲得可能的成就。你是靠你自己底努力和天才「援引」了你，「提拔」了你；而不是靠任何人，任何黨派來「援引」了你，「提拔」了你。這樣的社會，是有生機而且健全合理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個人一點一滴的聰明才力都可能用於增加社會福利上。除了你自甘墮落以外，沒有任何人的制度會妨害你底正常發展。

在衰老了而無生機的社會裡則不然。這樣的社會是複雜、恐懼、猜忌、疑慮等衰老心理匯聚之所。因而妨害大家正常之障礙重重。在這樣的社會裡，「人事」為最高亦即最後的決定因素。上至權力者，下至卑小公職人員，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和時間都用之於對付「人事」上。如果「人事」沒有「搞好」，您縱有通天才智，亦歸無用。這樣的社會，那會有正常的進步？

卡內基(A. Carnegie)是美國底工業鼻祖。十六歲的時候，卡內基充鐵路局的電報員。因他才幹，慢慢發達起來。有一次，他在圖書館看見一塊牌上寫的字：「不能明理，是為愚人；不願

明理，是頑夫；不敢明理，是爲奴才。」他大受感動，隨後就進夜校，閱讀各種書籍。

卡內基底中心興趣是發展工業。美國南北戰爭時，他爲政府將鐵路組織起來。卡內基心目中的美國，是陸地上鋪滿了鋼軌；江河上架滿了鋼橋的地方。他開辦了好些航線和鐵路；並將礦業富源加以實用，使美國強盛。他自己也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可是，卡內基卻沒有作守財奴。他常常想法子將自己底錢財用在人類福利上。在美國和別的國家，卡內基建立了三千多間免費圖書館；興辦了許多教授科學的學校；設立基金以供訓練良好的師資；在華盛頓蓋了汎美禮堂；又捐錢作海牙和平宮底基金以促進和平及國際合作。

卡內基雖係一工業家，他所象徵的卻是一個新興國家之開創的精神。他成就了許許多多事業並且賺了許許多多金錢，可是他並不想佔有，而是把它分散用於爲人類謀福利的事情上。這正合乎中國古人所謂「爲而不有，功成而不居」的精神。可惜，中國古人底子孫們早已將這種美德忘記乾淨。這些人靠強力組成團體，朋分現成的利益，壟斷國家底資源，佔有主要的生產機構，控制全體人民底經濟命脈。這些行徑之心理的動因，完全出於「佔有衝動」。

創造衝動發達，其國必興。佔有衝動發達，其國必亂。

阿丹茲 (Jane Addams) 是一位女社會工作家。她小的時候被她有錢的父親送進女子大學念書。她在學校的時候就確信婦女能夠幫助改善世界。有一天晚上，她在倫敦貧民窟看見窮人搶著

買腐爛的食物，從此以後她立志幫助窮人。她回到美國以後，住在芝加哥最貧窮而且又髒又擠的地區，和當地的居民打成一片。她又覺得良好的生活，不是一紙法令就能得到，而是應該由各個社會自己培養出來。她幾次到別國，與歐亞三洲底婦女討論社會問題。威爾遜總統也常向她請教。一九二七年各界歡宴她。席間懷特稱頌她對人類的貢獻。她於一九三五年逝世。

愛迪生是衆所周知的美國發明家。他自小的時候就喜歡研究發明。他常常白天晚上不停的試驗，連吃東西也忘記了，疲勞時就在榻上軀一會兒。他對於電力的研究特感興趣。由於他在電力應用上的不斷發明，美國電力事業特別發達。因之，提高了美國底生活水準，使人有較多的機會享受閑暇的光陰。

由這本畫刊，我們可以知道以下幾點：

這本畫刊是美國國務院國際新聞局印發的。雖然這是官方的宣傳品，可是其中沒有將杜魯門和艾其森這一流底「要人」捧上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種宣傳品不是印給杜魯門之流看的，而是給大家看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只有在民主政府之下，辦事的人才可以用不到取悅於權勢層，而真正放手做點人做的事，真正爲一理想目標而做事。即使是宣傳也是如此。

我們應注意的是：從這本畫刊裡我們很難看出美國所謂的「偉人」是怎樣的人。美國所謂的偉人，不是那些好作威福的「元首」，不是愛發號施令的角色，也不是擁有多少武力的雄才，更不

必是大官大吏。這樣的一些人在美國人看來，也許正是偉人底反面。這本書刊所舉的八個偉人，其中有詩人，有民主政治思想家，有爲解放黑奴而奮鬥者，有農業科學家，有工業鼻祖，有爲社會工作的老太婆，有發明家。固然，在這八個人之中有三個是當過總統的。可是，這三個人之被列爲偉人，並非因爲當過總統，而是因爲他們底行誼偉大，華盛頓爲美國之獨立而奮鬥。哲斐遜是美國民主理想奠基者。林肯則藉解放黑奴而表現了博愛與平等的精神。這些人所努力的方面固然各不相同，可是，他們所貢獻的同是創造，而不是佔有。他們所趨向的目標只有一個：造福大家。具備這些條件的人，無論是否作過總統，都是偉人。所以，科學家、詩人、女子和做過總統的人一樣，被列入偉人之林。

從美國人心目中所謂偉人之基本條件，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立國之根本精神。從一個國家將那一種人看作偉人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底興衰及其前途。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四卷十期

怎樣擊敗俄國

這本精彩的小書《怎樣擊敗俄國》(How To Defeat Russia)是出自福勒少將(Major-General J. F. C. Fuller)底手筆。這本書雖然分量極少，可是相當地表現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學問和識見，所以值得一提。

在一開始的時候，福勒自問自答地說：「俄國是不可擊敗的嗎？非也！俄國能被擊敗嗎？能的！」他措詞直截了當，不失軍人本色。他說：「俄國既可在道德的戰場上被擊敗，又可在物質的戰場上被擊敗。如果俄國在道德的戰場上被擊敗，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並非不可避免。即使戰事爆發了，戰爭的時間可以大為縮短。」這種看法的確高人一籌。許多只知反共而忘記提高自身

於聯軍之內，才具有充分的作戰能力；第四，一切重要的防禦問題都成爲國家集團底問題。

俄國底目標是什麼呢？在三十年前，俄國底目標即爲列寧所訂定，如果不瞭解俄國底目標是什麼，那麼也就不能瞭解西歐底防禦問題。列寧說俄國底目標是「獲得世界革命底勝利，創造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爲達到這一目標，俄國要從海參威(Vladivostok)到萊茵河，從芬蘭灣到藍色的多瑙河，組成一個強大的工業與農業集團。而在戰略上，中歐則爲列寧這一雄圖底引力中心點。因爲，一旦中歐在俄國掌握之中，征服世界的門戶便爲之洞開。

俄國需要多少時間來實現這一雄圖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福勒底意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說：「至於問俄國拿多久的時間來完成這個雄偉的計畫，這簡直是題外之談。因爲俄國人是東方人。東方人想問題是不拿時間來計算的。他們只拿永恆來計算。在他們看來，一個計畫就是命運之決定。他們是可以永久從事的。」在西歐人看來，俄國人自然是東方人，這種看法可謂深入底裡。由於東正教會所培養的宗教情緒已滲入馬列教條之中，俄國共產黨人覺得征服世界是他們神聖的使命。神聖的使命之完成，當然不以年月計算。這種看法與羅素底看法不謀而合。羅素認爲俄國對美國的鬭爭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鬭爭。無論究竟是否如此，這場戰爭不必是許多想趁混水摸魚的急色兒所幻想的那樣立即正式露面，更不必是許多西歐型的戰爭設計者所計算的戰爭在何年何月開始。俄國人底戰爭技術大部是向西方學習的，在武器方面尤然，可是在戰爭

底基本觀念上則幽微詭異。因此，急色兒固然由於利慾薰心而不能體察戰機，機械的計算頭腦也不易瞭解戰爭之時間的因素。福勒之言，可謂對於這個問題露出一點微光。俄國在何時動手呢？列寧說過：「戰爭中之最佳的戰略是遲延下去，直至敵方精神解體。這時予敵人致命的猛擊才易湊效。」北極熊是非常沉著的。牠正在等著這最後的一擊。

福勒認為俄國不希望直接單獨純以武力征服世界。俄國之所以如此，照福勒看來，並非因為俄國怕原子彈。俄國幅員遼濶，她不是原子彈用武之地；而是因為單純使用武力不合其革命策略。她底革命策略是藉心理的心菌戰爭以改變人心。可是，如果征服西歐，這種策略就要失敗。為什麼呢？因為這樣一來，俄國士兵就進入一個「有毒的」地域，於是有被西歐文化所沾染的危險。在這一情形之下，俄國士兵們就會恍然大悟，昔日共產黨人的宣傳是假的：俄國並非世界最進步的國家，而是最落後的國家。他們是一瞞天大謊之下的犧牲品。

這種說法有根據嗎？有的。俄國底權力階層最怕兆民為西方文化所沾染。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俄國部隊佔領巴黎。在這些俄國部隊之中，有年輕的貴族和軍官。這些人深為所見所聞所影響。結果，形成一八二五年之十二月派之叛變。這是十九世紀俄國革命之始。照福勒看來，俄國之所以拿「冷戰」代替軍事征服，就是避免拆穿鐵幕而重蹈過去歷史的覆轍。這也是頗有見地的看法。極權的少數者在優越的外力或外來文化之前都是內心恐懼之至的。在無可奈何時他們不能

不接受外援。可是，這時內心卻又深恐人民沾染外面的進步觀念和作風而傾向那一面。雪人見了太陽是一定會消融的。因而，他們必須設法隔絕並排拒人民與外來的進步力量之接觸。這時，光明正大的「民族主義」便作了隔絕與排拒的符咒。採取這種手法的，並陷入這種「矛盾」痛苦的，不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接受美援的蘇俄一國底極權者而已。

既然俄國不願單純使用武力，那麼她對於各敵對國家怎樣辦呢？她使用分割政策。她施展這一政策，第一，將敵人底戰鬥力量分割開來；第二，將衛星國環繞自己。這樣一來，她可以最經濟的力量，或最少的犧牲，換取最大的代價。俄國近來一再發動的所謂「和平運動」，無疑是這一政策在這一階段之又一運用。

前題——世界底情勢——既然如此，那麼問題怎樣解決呢？

心理問題之解決，福勒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之心理的方面，我們必須將心理完全改變過來。第一，我們必須認識所謂『冷戰』是實際的戰爭，不僅是癩疥之疾而已。這就是第三次世界戰爭。而且這個戰爭不僅是存在並且是在進行之中。這個戰爭是非常積極的，因而也需以同等積極的行動才能獲勝。依此，馬歇爾計畫，雖有價值，但因為消極的，所以不夠；大西洋公約，比外交上的馬奇諾防線好不了多少。」

福勒提出警告說，西方國家至今還未認識：第一，西方之經濟的和政治的重建，在蘇俄策動

共產運動之下，是不可能實現的；第二，農業的東歐一天與工業的西歐分離，無論注入西歐好多金錢，歐洲底經濟不會復興；第三，東歐一天不與西歐重行聯合起來，世界不能得到和平的保障。而要消除這些苦難，必須有一建立於心理攻勢之上的積極政策。這一政策要求：第一，阻遏蘇俄在西方國家底一切活動；第二，西方國家必須有一大憲章來對抗共產黨宣言，這一憲章表明西方人底信仰和他們作戰之目的；第三，一旦這個憲章公布了，西方人便要熱心支持它；第四，組織中央情報機構，和宣傳機構，來根絕蘇俄底宣傳說教，並且激揚西方精神；第五，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掀動蘇俄及其佔領國家以內的反抗運動；第六，除此運動以外，組織秘密游擊隊，以便在戰事中破壞俄國底交通與後方。

軍事解決之方法 直到現在為止，民主國家對付俄國的基本策略之骨幹似乎還未出乎喬琦·坎南底圍堵政策之範疇。照福勒看來，爲了對抗俄國底分離策略，西方國家首先必須放棄圍堵政策。因爲，如果圍堵政策長期繼續下去只有分散力量，耗損資源。西方國家應該改弦易轍。西方國家底新政策應該針對俄國底政策，即是：確保中歐底安全以維護這一世界引力之重心。

基於這一著眼點，福勒特別重視德國問題。他說：「如果西德是值得保有的，那麼西德人民底友好態度便值得去爭取。可是，要爭取西德人民底友好態度，必須寬大爲懷，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心理狀態，而且讓西德建立成一個主權國。」又說：「如果將西德歡迎到西歐集團

裡來，而且贏得她底友善態度，那麼我們便可確保這一世界引力重心之安全。這樣，便可癱瘓俄國底附庸，並擊破俄國底全部分離政策。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可將軍隊他調，而無虞歐洲重心受到攻擊。」

戰術問題 假定德國問題之困難解決了，而且西班牙加入西方聯盟，西方便可增加一百個師。在這一百個師之中，有四十個師在西德，並保有三十師戰略預備軍。這樣，是否足以阻遏一百五十師俄國及其附庸軍隊向西橫決呢？這是一個戰術問題。俄國底優勢在數量而不在機動力。大量群眾向西湧入，需要給養，西方國家能否斷絕其給養之供應？俄國底攻勢像洪水一樣，一定是在廣泛的戰線上展開，向西方底弱點滲入。西方國家怎樣對付這一股洪流？這都是西方國家在戰術上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照福勒看來，俄國底軍隊，像過去的東方軍隊一樣，是由兩種成分組合起來的：一種是精兵；另一種是武裝的群眾。前者是精練的戰爭工具；武裝群眾則是它底補助工具。如果敵人底抵抗微不足道，武裝群眾可擔任佔領工作。但是，兩種部隊都需要供應。結果，武裝群眾愈多，則供應精選部隊底問題愈複雜。如果沒有供應，俄國底精選部隊便歸無用。所以，西方底戰術不是怎樣以優越的兵力來擊敗俄國底精選部隊，而是以有彈性的抵抗來遲滯俄國精選部隊之衝進，以及怎樣在自己選擇之點來擊破俄國戰線並癱瘓其後方。歷史一再告訴吾人，抵抗與機動力之聯合運用，

即盾與劍之聯合使用，是對於暴亂群衆之有力的答覆。

結論今日歐洲底問題不是「歐洲能否存在」的問題，而是「歐洲人是否有存在意志」的問題。如果歐洲人有存在意志，那麼他們應著眼於攻擊才行。

福勒所表現的這許多見地確乎可取，他這種積極的主動的態度尤其可取。不過，他在以上的立論之基本出發點還是「歐洲第一」。在亞洲的人則以爲就反共的總形勢看，亞洲比歐洲重要。從知識論的眼光看來，二者似乎都是「自我中心論斷」(ego centricpredicament)。

究竟那一種論斷是真實的呢？這個問題，恐怕只有留待後世歷史家去評判。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四卷十二期

一九八四年

直到目前為止，就我之所知而論，非以理論形式表現出而係以小說形式表現出的反極權統制的書籍，沒有那一本比英國小說家奧維爾(G. Orwell)所寫的《一九八四年》更能動人，更趣味橫生，和更刻畫入微。羅素說：「《一九八四年》一書，以很大的威力，描寫一個確立的極權政治所加於人類的恐怖。西方世界對此危險應深自警惕。」照我看來，對此危險應深自警惕的，豈只西方世界而已哉？

這本書從描寫一個人底現實生活而襯映出極權統制底本質與形態。當然，現在世界各地大小極權國家雖只以或多或少程度實行極權統制，而沒有到達奧維爾所描畫的那種程度，但是，無

疑，一切大小極權統制專家無不以他所描畫的境界爲目標而向之邁進的。現在，在向這一目標而邁進的途中，爲一切大小極權統制專家所留下的問題有而且只有二個：第一，外界的或國際的情勢是否允許他們放手這樣的「幹」下去；第二，技術能力是否辦得到或是否能從心所欲。如此而已。

奧維爾說：「自二十世紀的第三季發生大革命後，俄國吞併了整個歐洲，美國吞併了英帝國，世界由此分爲三大超級國家，即：歐洲國，東亞國，和大洋國。」本書主角溫士敦則是大洋國政府的一個職員。大洋國底政府分四個部門：第一，真理部；第二，和平部；第三，博愛部；第四，財務部。真理部所司的，是操縱新聞，娛樂，教育和美術。溫士敦先生所服務的，正是在這樣的真理之部。

我覺得在一切大小極權統制地區，將操縱新聞、娛樂、教育和美術的機構叫做真理部，真是再恰當也沒有了。在真正的民主國家，真理普遍被保留於民間，亦若財富之被保留於民間。在極權地區，「真理」則被集中於政府及其黨底手裡，亦若財富之被集中於政府倉庫然。既然如此，於是人民不能表示反對的言論以與政府爭真理。果真如此，就是相當於盜劫政府倉庫財富。盜劫政府倉庫財富者殺無赦。同時，製造真理底專利權也操諸政府及其黨手中。自政府及其黨手中奪取真理之專製權，而私造真理，正如私造煙酒一樣，必遭大殃。食物皆由政府配給。你如需要「真

理」，請求政府及其黨計口配售可也。

可憐的溫士敦先生，站在真理部金字塔形的大厦上，瞧見白牆上漆著黨中的三句標語，字跡寫得很挺秀。這三句標語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

頭兩句標語且不去管它，第三句標語殊堪玩味。照我看來，「愚昧即力量」之說，真可算驚天動地的偉大發現，直可與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和弗洛依德之發現心理解析相比。遠在二千餘年前，中國古代有一位「英明」蓋世的帝王秦始皇，焚書坑儒，大行愚民之術。然而，他只有這種行動，尚未發展成爲這種「意識」。沒有這種意識，他就不會有意地將愚民之術系統化，計畫化，並且理論化。所以，他之所作所爲，只能算是一種自然產物的雄才大略之流露，而非精神創造（借用黑格爾語）。

人類底一部科學史，至少從一方面看來，就是人類自己克服自身愚昧的奮鬥史。西方人民爲了追求真知真識，與宗教作過漫長而艱苦的抗爭。這一追求與奮鬥的過程，形成西歐的自由文明。這一自由文明，要求每一個人，擺脫宗教尤其是迷信所加於人類認知作用的妨害，而能獨立自主地下斷判，瞭解自然，瞭解社會，瞭解人生。所以，在十七世紀時，培根(F. Bacon)說：「知識即力量」。

然而，這一藉知識而獲得力量的解放，對於極權統制是大爲不利的。如果財富分別保存於民

間而不能集中，則極權統制專家無由藉控制每一個人底腸胃而控制每一個人底一呼一吸。如是，極權統制也無由建立。同樣，如果每一個人皆有知識或聰明睿智而有獨立自主的力量，則極權統制無由建立。環觀世界，凡極權統制之建立，無不在文化落後或文化衰頹破敗之地區。而且極權統制之程度與民智之程度成反比：民智愈低，極權統制之程度愈高。民智最高的地區，極權統制即無由建立起來。從此可見知識對於極權統制之根本抵抗作用。

企圖建立極權統制的專家深明此理。爲了對抗「知識即力量」，彼等實行「愚昧即力量」。一切大小極權統制者無不厭惡真正有思想有頭腦的人。如果你底知識太豐富，思想太靈活，見解太高超，他便有嫌你「頭腦複雜」。古往今來，多少聰明才智之士，就因「頭腦複雜」而被「反淘汰」者，不知凡幾！極權統制專家，也未嘗不用「人才」。但是，這種所謂人才也者，絕對不是原則性的，而必須是技術性的。這也就是說，在他們所既定的原則或目標之下，來物色技術人才，依據其既定原則或目標，作技術性的設計，以求實現此原則或目標。除此以外的人才，一概都是敵人。在極權統制之下，絕對不能有根本原則性或根本目標之改變。如其有之，不是發生改變，便是「革命」，如果政變或革命發生，一定隨之而有「清黨」、「整肅」，等等事件發生。這些事件發生之日，即是成千成萬生命被犧牲之時！

極權統制之下，人底尊嚴，人格底獨立，個人底自由，都是消滅之對象。在極權統制底設計

專家眼底下，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一個獨立的人，而只看見一大堆一大堆的「民衆」或Mass。民衆或Mass，是有待他們塑造的一大塊一大塊的「材料」(Stuff)。阿里山上的千年古木，生長雲表，挺秀不凡，遊客爲之讚賞不置。中國古代文學中吟咏松柏的作品不知凡幾。然而，這些不凡之木，一入鋸木廠，在工程師眼底，不過一堆一堆木料。他們高興將它們鋸成怎樣的形狀就鋸成怎樣的形狀，高興拿來製什麼東西就製什麼東西。同樣的，「民衆」做成的材料，極權統制專家高興作何用途就作何用途。

然而，人究竟與木料不同。可恨得很，也可惱得很，人有思想。上天生人，狀貌沒有二個完全相同。思想亦復如此。思想這樣大不一致，那裡要得？那麼，怎麼辦呢？焚書坑儒那一套既然不好實行，於是要想一個新愚民術。這種新愚民術，就是使得大家只有一個信仰，而且只依據一個前題並且循著一種方式來想。於是乎，唯物史觀來了，唯物辯證法來了。馬列主義來了，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來了。人，當著被催眠了的時候，他底一舉一動是受催眠者擺佈的。人，當著醉酒之時，往往亂說話亂打人。總而言之，在類此的情況之中，理性是失去作用了。所謂這個史觀，那個主義也者，不過高等催眠劑而已，不過高等烈酒而已。當著一大群人被催眠，被灌醉了以致不可理喻之時，便失去自主能力，而一任催眠家擺佈。依據這個觀點，所以共黨最嫌惡歲數較大的高等知識分子，而喜歡利用農民，工人，著意培養「紅色小鬼」。這群人如瘋如醉，狂

馳疾走，亂衝亂殺，儼如火牛出陣，如猛獸出柙，如洪水潰堤，那股橫決的盲目力，誰擋得了？誰說：「愚昧」不是「力量」？一切極權統治者無不刻意製造並運用愚昧的力量。列寧，托洛斯基，希特勒，莫索里尼，及其模倣者，都是製造並運用這種力量的好手。這種人物一天能夠騙人，驅人於死以滿足其權力欲，民主便一天不能實現，世界便一天不得和平安寧。

「溫士敦轉過身來，面上裝著非常快樂的表情。對著電視幕，非裝著這種假面貌不可。」可是，「電視幕的力量尚不能控制寢室，因此他故意把書架放在這裡。溫士敦慎重地以背面向著電視幕坐下，以躲避它的窺探。雖然他的聲音仍免不了被電視幕收聽，但至少所坐的位子可以隱蔽。」區區數行，已道出在極權統制之下的「幹部」甚至人民之精神之痛苦。奧維爾所謂的「電視幕」是一象徵的說法。它可能就是極權統制者底面目或其密探。這就是說，凡具有足以偵察幹部或人民是否「忠誠」的作用之工具，都是屬於電視幕之類的東西。依此，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極權國家可以裝設電視幕以偵察幹部或人民底一舉一動；而在科學技術尚未高度發達的極權國家則使用暗探來偵察。在這種恐怖氣氛的壓力之下，加之因實行所謂「社會主義」而把自己底腸胃為人所控制。於是稍有頭腦的人，為求生存，在極權統制者面前，自不能不裝得很忠誠可靠別無二心的樣子。可是，這種行徑，究非有良心有血性的人之所樂為。所以，他們回到家裡，對自己底太太、親戚所談的一套，與在大庭廣眾之間或公開發表的文字裡所表示的一套，簡直兩樣。這是人

格底分裂。凡在極權統制之下的人民都有享受這種痛苦的福分。

分裂人格底結果，一定是作偽流行，人格掃地，精神頹喪，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正義不張，是非不明，青年不懷抱理想，中年失去進取心，老年苟延殘喘，全體社會生機死滅，以至同歸於盡而後已。

「在街上，風把扯破的一角肖像吹得亂抖，『Ing Soc』一字也隨風招展，時隱時現。啊！Ing Soc的神聖主義！他感覺自己彷彿徘徊於海底的森林中，彷彿迷陷在一個奇異的世界中。他感覺孤寂。過去的一切不會再來，未來卻渺茫不可知。爲什麼他要生存在這世界上？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現在黨的統治絕對不能持久。」這一段話，道盡了在一黨極權統制之下一個清醒靈魂底無限傷痛。可憐的溫士敦，他底處境，他底心情，如陷入昏天黑地之中，如在茫茫大霧裡面，如在盛夏暴雨前悶熱天氣中的窒息，如困在怪石嶙峋荒山亂徑上孤獨的旅行人。他看不出他自己和苦亂的人民，何日能走完這段困人的旅程，何日擺脫因極權者爲滿足其權力欲而加諸萬眾肩頭上的枷鎖。

「黨曾經信誓旦旦，要解救普羅階級，要使他們擺脫昔日資本主義的束縛。電視幕日夕在人們耳邊絮聒不休地列舉統計表，證明人民今日的糧食衣著均較前增加，居住環境與娛樂亦已改善——比五十年前，人民的工作時間較短，健康情形增進，生活與教育亦遠勝於前。沒有人能證實

或反證這類統計。但同時，爲了遵守兩重思想的原則，黨的教訓是：普羅是天生的賤民，須視之如牲畜，使他們馴服。「極權統制底情形正是如此。極權統制的黨，如共黨或其同路人，在未攬得政權之先，或在攬得政權之初，一定大肆宣傳，作許許多多美麗的諾言。既攬得政權之後，如果他們偶爾做了一點好事，便要自我宣傳十次百次。這種宣傳所予人的印象，好像做點有益的事是例外的事。宣傳底方式，照例是一大串統計圖表數字。但是，即使這一大串圖表數字底本身是不錯的，誰又能明瞭其製出之真實的過程呢？官方儘管絮聒報告，老百姓聽了至多也不過秋風過耳。對於既不能證實而又不允許否認的功績報告，一般民衆是從不關心的。人民所關心的，是壓力來時如何順應，苛煩來時如何小心對付，以挨過風暴中的風暴而已。

這種結果是「事有必至」的。因爲「黨的教訓」，既然視「普羅爲天生的賤民，須視之如牲畜，使他們馴服」乃極權統制底第一要義，餵飽肚子也可使人馴服的。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之精義。美國豬底「居住環境」以及營養好，而且可能逐年改善。是否美國豬底生活值得誇耀？值得羨慕？意義何在？價值又何在？

社會主義的哲學就是餵豬的哲學。

聰明的讀者！這本書底含意太豐富了，我簡直評介不完。你們怕極權統治麼？你們愛自由麼？你們希望有美麗的將來麼？如果是的，那麼你們不妨將買幾包花生米的錢買這一本小書。在這盛

夏的傍晚，花一個多鐘頭，靜靜地品味這本好作品。然後，抽一支煙，悠悠地沈思一會兒。這個世界太忙亂了，太浮薄了！善良的知識分子，一年到頭忙於填滿腸胃的工作都忙不完。大家正好趁這時光，喝一杯這最廉價的冰淇淋，吸收一點精神的清新劑，來增加一點活力，增加一點渺遠的希冀吧！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五卷二期

附記：本書為王鶴儀譯，華國出版社編印。

極權對於民主自由的威脅

這本小冊是柏勒斯(Barnes)教授所著《二十世紀的文化落後及制度危機》一書中一章之選譯。這一章除緒言以外，共有九個小節。

在緒論底開頭，柏勒斯說：「十九世紀政治發展的特徵，是民主的滋長和自由的擴展。至二十世紀，特別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的演變，傾向於相反的方面，步入極權主義的途徑，侵犯民主原則，廢棄遵從多數的規律，剝奪許多種自由權，實行獨裁政制。」

二十世紀以來，危害民主的，有二大巨浪。一個巨浪是法西斯與納粹運動，第二個巨浪是共產主義運動。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這三者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本是鼎足而

立的三大勢力。這三大勢力之發展，支配著人類底命運。由於這三者之不相容，它們不免在發展過程中由相激相盪而演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主勢力竟幫助共產勢力而夾擊法西斯勢力。這簡直是滔天大錯。這一滔天大錯，演成今日全球規模的大赤禍。

當魔王希特勒攻打另一魔王史達林時，民主國家應該利用兩毒相攻的千載一時之機，整軍經武，積極準備。史達林手下的那些軍隊，大都是半原始性的野蠻部隊。這些落後部隊，一碰著希特勒底高度機械化部隊，像豆腐遇著鋼刀，無不完帳的。俄軍大部瓦解，比雪古夫被攻下，史達林只有帶著手下殘敗的「忠實同志」，遠逃西伯利亞，在葉尼塞河荒原上乘涼風去也。希特勒呢？希特勒殺人雖是殺飽了，可是，力量也消耗完了，疲憊不堪了。這時，民主國家養精蓄銳，引滿待發，以新銳之衆而與疲憊之師相周旋。強弱之勢，勝負之數，不卜可知。

然而，民主國家不此之圖。當著希特勒打蛇還沒有打死的時候，民主國家底領袖遑急得很，唯恐希特勒把蛇打死了，趕快拔刀救蛇。尤其是羅斯福那一個老天真，生怕史達林垮臺，急急忙忙，從各方面來援助這個大獨裁者。這一幫忙倒不要緊，希特勒固然被打敗了，卻把一條毒蛇救活了。果然，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史達林坐收漁人之利，更進而向全球擴張其共產帝國。現在，他要同民主國家算總帳。目前，民主國家真是處於空前未有的危厄關頭。如果史達林老魔王再度勝算，毫無疑問，民主自由一詞，將從字典中抹去，人類至少要做千年工奴農奴！

這些極權勢力由何而生？柏勒斯說：「極權主義確是現在的洪流。由於吾人在這機器時代，未能充分解決種種社會問題，積恨積怨，無從發洩，結果蔚成洪水，氾濫無涯。」這話是千真萬確的。凡共產黨猖獗的地方，一定是貧困，混亂，落後，並遭受內外雙重壓力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如果又政治黑暗，人活不了命，自然易被野心分子招誘，相率造反。

有些人以為從左邊來的才是極權統治，從右邊來的則不是。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極權主義和經濟理論無關。過激份子或反動勢力，都可以採取極權主義的方法和型態。蘇俄就是左傾的極權主義的重大例證；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便是右傾的極權主義。不能和極權主義相調和，也不能見容於極權主義的祇有一種主張，那便是民主自由主義。兩者互相衝突，互相排擠。假若人類世界採取極權主義解決複雜的現代問題，那就等於自由歸於消滅。」

這一段話之所論，確係真知灼見。一個政權是否為極權主義的，完全以它所採取的方法或制度是否為極權主義的為斷，而與它底基礎毫不相干。同是極權統制，可以建立於工業國家，也可以建立於農業國家。當然，我們可以說，建立於這兩種基礎之上的極權統制在效率上不同：建立於工業之上的極權統制之效率高過建立於農業之上的極權統制之效率。復次，前者易趨「反動」；後者易趨腐潰。可是，無論其效率或高或低，無論其為易趨「反動」或者易趨腐潰，其為極權統制則一，其為對人民之壓制則一，其為仇視民主則一。

共產極權之外衣，口號，以及發生之基礎，與以封建，血緣，民族，及黨羽為基礎之極權統治似不相同；但若二者採取同一統治技術，或者沾染同型的思想，或者互相觀摩對方底「優點」則久而久之，二者必化合為一。

地球本是圓的。如果一個人向極左走，一個人向極右走，不要好久，一定會碰頭，握手言歡的。

何以致此呢？因為各種極權統治底形態即或有所不同，而其政治理念在根本上相同，在統治技術上尤易因相互感染而趨於根本相同。

既然極權統治之政治理念與統治技術根本相同，於是極權統治與極權統治乃同質體。極權統治與民主政治之政治理念與對待人民的態度根本不同，於是極權統治與民主政治乃異質體。所以，極權統治與極權統治之間的差異，遠不若極權統治與民主政治間之差異。極權統治與極權統治之間的鬭爭，乃權力與權力之間的鬭爭，或因權力與權力之轉移而引起之鬭爭。極權統治與民主政治之間的衝突，乃政治理念之間的衝突，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甚至於是人生哲學與文化之間的衝突。所以，極權統治與極權統治之間的鬭爭，是皮相的，不是根本的；是一時衝動的，不是永久可能的；是外在的，不是內在的；是機械力的，不是生理力的；是情緒的，不是理性的。假定上帝擁有一切權能，對於極權統治的那些角色之權力問題能予以適當的安

排，我相信那些脚色一定會相安無事，人類一定可以免除許多言之不能成理的慘苦鬭爭。如果上帝有權能，把史達林和希特勒底土地和人民來個「平分秋色」，將希特勒調到俄國去做元首，將史達林調到德國去做元首，而且他們底作風還是那個老作風，那麼二國人民如不樂於接受，則同等地不樂於接受；如樂於接受，則同等地樂於接受。因希史二個大老板，調調兒是一個樣子的也！

可是，如果上帝把史達林和杜魯門對調，結果必定大不同。史達林如果「蒞臨」美國，擺出那一副了不起的神氣，包他挨摑，挨噓。杜魯門如果到俄國上任，說，我只幹四年，四年以後諸君如不選我，我便退讓賢路。俄國人聽了，一定不信，一定以為杜魯門在「打官腔」，在撒謊，在騙人，在以退為進。在想戀棧一輩子，以至於萬世一系。俄國人又看見他遇事好與人商討的習慣，不是受寵若驚，便會在背後罵這個元首無能。

良以極權統制與民主政治之間的衝突，根本不是權力與權力之間的衝突。尤其是在民主國家內部，根本就沒有像極權國家內部那種權力鬭爭的問題。在極權國家內部，有而且只有兩種情形：鎮壓與反叛。民主政治與極權統制之間的衝突，是自由與奴役的衝突，是人格平等與人格污辱的衝突，是個人發展與個人壓制的衝突，是理性與反理性的衝突，是人生觀念與夫文化類型之間的衝突。所以，這種衝突，是基本性質的，是生理的。明乎這個道理，我們也就不難了悟：極權與極權之間的衝突，其價值與民主和極權之間的衝突，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柏勒斯說：「然而極權主義卻有它的意義，既切實又正確，用以描述國家的活動範圍增大，侵奪人民自由的力量加重。無論這種情形來自左方或右方，它們的意義是相同的。」他又說：「政治上的極權主義和經濟上的集權主義是併立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認識。「極權主義在政治上可以說是國家在經濟上加強管制工業的聯繫體制——經濟上傾向於集產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實足以代表極權國家的經濟政策。政府在經濟範圍內的活動有兩種相反的形態：國家資本主義旨在假借政府的管理以保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旨在屏除資本主義，利用政府機構樹立社會主義。然而在經濟方面，無論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其極權政治的功用總是相同的。」無論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都是極權統制之經濟的基礎。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鑄爲十二金人，以期杜絕人民變亂。但是，秦始皇還不知道藉控制人民底腸胃來控制人民之動靜。馬克斯輩提倡生產工具收歸公有。百餘年來，沒有任何工人農人受到實惠，而這一主張，卻提醒了藉社會主義之名而革命的野心家。他們受到這一主張底暗示，知道控制了人民底生活資源及生產工具便控制了人民底一切。自古至今，沒有那一種控制比這種控制還要根本而徹底。一個地方的政治在本質上是否爲極權統治，主要地以是否實行這種控制以爲斷，至於選舉一類之事，正如蘇俄一樣，不過用來自欺欺人而已。

極權統治之顯著的特徵，「先頭第一個象徵，便是少數人站在國家之上行使獨裁政權。這少數

人具有權勢，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而這種權力並不是人民委託給他們的。」這也是衡量政治是否民主的最佳標準。我們必須知道，真民主與假民主之分別，不一定在有無議會，不一定在有無立法機關，更不一定在有無選舉之事，而在是否有一個權力在民主之上。真正的民主，沒有一個權力凌駕其上。凡有一個更高的權力凌駕其上的民主，一定是形式的民主。沒有任何權力凌駕其上的民主才是貨真價實的民主。我們不能設想在美國民主政治之上，還有什麼別的更高權力來支配它。凡屬有一更高權力凌駕於其上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假冒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御用的民主政治，一定是極權統治者爲了迎合潮流時尚而搬弄的統治工具。凡屬藉民主作統治工具的空間，一定是極權空間。真民主之目的，乃爲自由；假民主之目的，乃爲民主之反面。真假之間的差異，乃本質的差異，固不可淆混也。

「獨裁政府的主要性質，就是不容許少數分子表示不滿意的意見。獨裁政府認爲這種意見必須加以禁止，否則對於獨裁者以及其黨的思想和政策，將成爲一種威脅。思想與行動必須同樣的加以管制。人民的思想與行動受到全部的管制，適足以說明極權的確切意義。爲保障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極權政府樹立一種極度祕密的警察制度，用以刺探人民，根絕批評和不滿意見。」這真是千真萬確之言。極權統治者爲什麼對手無寸鐵的人民如此放心不下呢？許多人不明瞭極權統治者底心理狀態。在現代各種各色極權統治者心目中，沒有什麼事比鞏固政權更爲重要。在從前，

有爲了美人而亡國的。這固然證明「美人關」之不易打破，同時也說明，在他們心目中，這個世界上也還有比權力更甜蜜的東西。這東西便是愛情。溫莎公爵也是「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多情種子。天下的英雄豪傑，如果都是這等多情種子，世界豈不太平？老百姓豈不延年益壽？古代英雄美人的故事，儘多值得嚮往憶念的。今日的極權統治者則不然。今日的極權統治者無一不是天生的權力狂。在這些人心目中，權力至上，權力即是他底上帝，上帝又即是他自己，所以他是權力底化身。爲了爭奪並鞏固其權力，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不惜殘民以逞，甚至不惜以千萬人底生命與幸福爲代價。焚書坑儒，鉗民口舌，消滅異己，那算什麼呢？希特勒，莫索里尼，是現代權力狂底典型人物。毛澤東及其一夥弟兄們，則是這些傑作底創造天才。可惜得很，這些人物發展其天才與忍狠之日，正是億兆百姓流淚之時！

作者在敘述了蘇俄，德國，及意大利底極權統治情形以後，他說：「惟有成功的民主可能驅除極權主義。」這真是金石之言。無論如何，槍尖上不能出現民主，大家底飯碗由一個人管時也出現不了民主。暴力只能換來暴力。中國民主之實現，將是在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途中完成的。由黑暗到光明的掙扎那有不艱難的哪！凡屬嚮往民主之實現的人，都應該具備這份信念，拿出進天國窄門的宏毅精神，一步一步地沉著向前。等到我們底子孫享受「無虞恐懼之自由」實現，我

們今日精神和肉體的磨難就不是白受的了。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五卷五期

附記：本書為柏勒斯著，李省吾譯，華國出版社編印。

文明是怎樣創造的？

這本書是擷取英國現代大史家陶英貝（Toynbee——原書譯作湯比）底名著《歷史研究》底節本並參照原著而寫成的。但是，這個節本之節本，有點名實不符。這從目錄就可看出。全書計分五部：第一部怎樣去研究歷史；第二部文明是怎樣發生的；第三部文明是怎樣成長的；第四部文明是怎樣破落的；第五部文明是怎樣解體的。既然如此，如果作者將書名叫做《文明之興衰》，那麼似乎比較能含蓋這部書底全部。

在論怎樣去研究歷史的時候，該書說：「近代史學家多好以民族或國家做單位來研究歷史，這實在是一個難以接受真理的作法。因為一個國家的歷史是很難孤立起來研究的。它往往與鄰近

的國家或很遠的殖民地同屬於一個文明單位。這一個單位便是我們所說的『可瞭解的歷史研究範圍』(intelligible field historical study)。這一單位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很具體的存在。不過，這一存在不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它必須從歷史的分析與比較中去察覺。在各個不同的小社群 (community) 中求其小異與大同。凡是在經濟，政治，文化三面皆同的，我們就可把它看做大同，歸範成一個『可瞭解的歷史研究範圍』。這種研究歷史的態度或方法，可謂使人「茅塞頓開」，識域廣大。張貴永先生說：「沒有一個民族的歷史能在這個世界上單獨發展，不受其他民族的影響。」(《大陸雜誌》第三卷第二期) 的確如此。這種研究歷史的態度或方法使人視野開濶，可以打破偏狹的民族觀念，而可能給人以比較完備的歷史瞭解。吾人由這種比較完備的瞭解，可以知道一個國家或民族在此四度因次 (four dimension) 的歷史中的地位，從而決定他的生存與發展之適當的道路。

論及文明是怎樣發生的，該書說：「文明與野蠻的真正分野是在摹做的方向。摹做前代和看不見而能感覺到的祖先，以增長人們的威望與信心，這是原始社會。這樣的社會只知摹做過去，遵循舊規模。這是一個靜的社會，沒有進步的社會。而在另一方面呢？即在文明社會中，摹做的方向是朝著創造個體 (creative minority) 的。他們皆是文明的拓殖者。於是，『習慣之餅』 (the cake of custom) (評者按：·custom 一字最好譯作「習俗」，習俗乃一個社群所共有的沿襲行為。

「習慣」則作habit底翻譯。在個體爲習慣；在社群則爲習俗。）被擊碎，社會乃循變動與成長的道路不斷前進。」

陶英貝底見解，真是富於啓發作用。一個民族或社群能否打開僵局或起死回生或發展其生命能量，主要的自力原因之一，看它究竟是戀念於過去或貪吃「習俗之餅」，還是將摹做的方向朝著創造的個體或創造的少數人。如果是前者，那麼這個民族或社群底前途一定很是渺茫；如果是後者，那麼這個民族或社群底前途可能有新的開展。

向前與向後，涇渭分明，極易從實際而又具體的行爲表現出來。凡屬向後的民族或社群，總好祭祀祖先，念念於昔日之光榮。一個人，如果一味的回憶他底過去，這個行動底本身就足以說明他沒有前途。賽金花獨處嗟歎過去榮華的時候，一定是她已經紅顏衰老，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時。一個人或一個女子是如此，一個民族或一個社群又何獨不然？一個民族或一個社群愛祭祀祖先或「效法先烈」，就表示他終於走不出新路徑來。當然，如果祭祀祖先或效法先烈失去了內容，只成爲外表形式之時，則又更等而下之了。

走不出新路徑來的民族或社群，一定貪吃「習俗之餅」。「菜是家鄉風味好」。家鄉風味，自小吃順了嘴，當然覺得好吃，而且不用再花腦筋發明，又覺得不會吃壞了腸胃。可是，這一「習俗之餅」卻拘束了你底靈魂，卻使你失去了創造能力。沒有創造能力的民族或社群，是拿不出真實

的辦法來應付大規模的新奇變局的，自然也就不足以適應新的世界動盪。

在這種時分，社會要發生內在的不穩定；終於社會表面的穩定也無法維持。這也正是文明交替之時。

「推動文明社會不斷演進的動力，乃是『內在無權階層』(internal proletariat) 反抗舊社會『當權少數』(dominant minority) 的分離運動。這些統治少數本是前一社會出生時的創造少數。如今他們已失去了早年的創造力，只知用強力壓迫大多數無權階層。他們已變成了統治階層，以致社會重行陷於靜態。針對這一靜態而來的，便是無權階層分離運動的反動。就在這一反動的『動態』過程中，新的文明隨之產生了，亦如文明社會在原始社會的動態中產生者然。」

陶英貝在此處的見解，說明了文明成長之動力。我們如果將這種見解加以引申，實在也可說明治亂現象。文明之興衰是治亂之必須條件。在歷史上，文明之興衰與政治上的治亂有著因果關聯的。

照陶英貝說來，「文明是『挑戰與反應』衝突的產物」。自然環境對於文明有刺激作用，人文環境亦然。

『衝擊的激勵』(Stimulus of Blows) 常在軍事上顯現。公元前第五世紀(四八〇—一七九)的波斯希臘戰爭，使希臘文明遭受了一個莫大衝擊。經過這次空前的大規模破壞與殺戮，阿提加

平原已被波斯人夷爲平地，但雅典人並未就此沉淪，反因此激勵而奮勉有加，卒能在其廢墟上重振聲威，稱霸海上，開創一光芒四射的伯里克里斯時代（461—429 B.C.）。迦太基人因第一次布尼克戰爭（264 B.C.）大敗的激勵，而征服了西班牙。第二次布尼克戰爭（218 B.C.）失敗之餘，猶能迅速恢復國力；最後一戰時，全國上下依然奮戰而死。在近代史上普魯士奮發圖強的基點，在於耶那之役的敗績（一八〇六年與拿破崙戰）。希特勒的崛起，顯然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屈辱的激勵。」

這些史例告訴我們，外在有形的機械力的失敗，並非決定性的失敗。真正的失敗是內在精神的崩解。如果一個民族或社群的內在精神趨於崩解，於國際風雲際會之時，即使能贏得對外戰爭，然而這表面的勝利帶來的正是裡面的失敗。癆病鬼肺部底擴張往往便利於肺癆菌的活動而加速病人底死亡。但是，如果一個民族或社群真正涵有內在的不朽精神和生命的意志，那麼即使它遭受挫敗，還是能夠轉弱爲強的。戰後日本之迅速恢復，現在又成爲東亞舉足輕重的勢力。短短幾年之間，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她倒下去又爬起來了，這證明日本是有內在生命力的民族。而這內在生命力的培養是不容易的。高尚的政治品德和大公無我的爲國精神，是培養這種民族生命力之必要條件。

「一個文明發生後，並不一定能發育成長，蔚爲大觀。就人類過去六千年已發生的文明論，

大致可分三類：(一)成長的文明(*developed civilization*)。(二)夭折的文明(*abortive civilization*)。(三)癱瘓的文明(*arrested civilization*)。」「所謂夭折的文明，是指某些文明在萌芽期中，即遭摧殘。」「癱瘓文明正像一個患了癱瘓症的幼童，雖有生命而不能成長亦無生命力。在反應一次挑戰後（發生的奮鬥），它已精疲力盡；當第二個挑戰到來時，它已無能爲力了。它始終很緊張的在覆滅的邊緣上掙扎。」

「癱瘓的文明社會有兩個共同特徵：一是階級制，一是分工制。分工制與階級制相輔而行，生活在這樣社會裡的『各個動物』(*individual living creatures*)常分成兩個或三個範疇，正像蜜蜂和螞蟻的社會體制。」

「平凡註：共產主義者理想的社會，以及實際上已形成的社會，正是這具有分工性、階級性兩大特質的社會。在一個社會裡，人人勞動，各有專司。實際上，在分工的過程中已建立了森嚴的階級；統治者（共產黨中央），輔治者（共產黨團員），被統治者（全體人民），劃分得清清楚楚。在不知不覺中全體人民都成了『無人格，有知覺，能服從的生產工具』(*Production-robot*)。史實證明，這是一個建築在獸性本能上的社會。大家只知吃飽肚皮，埋頭工作。這是一個動物的社會（蜜蜂的螞蟻的），而不是人的社會，更不是人類之所嚮往的一個社會。人的社會固然免不了矛盾，但解決矛盾的方法，不是讓大家回返原始，重行過著獸類的生活。基於我們人類先天的靈

性，後天的創造成果，我們是有良好的道路，解決今日社會矛盾的。只要我們能珍惜六千年來文明的成就，返而求諸內在的靈性，人類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飲鴆止渴的結果，是求生得死，是人間最愚蠢最淒涼的慘劇！」

這一段話真是金石之言。無論古今，一切大小極權統治者，爲了滿足其權力慾並且鞏固其統治，無不有意或無意以各種程度來將其統治之下的社會變成一個螞蟻式的動物社會。這種社會，秩序井然整齊壯觀，每個被治分子，在一個命令之下，各司其事，無頭無腦本能地生活下去。個體創導(individual initiative)沒有了。人生理想沒有了。生之樂趣沒有了。在這樣的社會，千萬人不得不犧牲各個底自由以成全極少數人底絕對自由；千萬人不得不犧牲各個底意見和思想以屈從極少數人底意見和思想；千萬人不得不奉獻各自人的尊嚴以襯托極少數人底尊嚴。這樣的社會還能說是人羣社會麼？這簡直是獸群底社會。不，獸底社會並非完全如此。鹿在深林中啃嚼嫩葉，沒有誰來干涉牠多麼悠遊自在。海鳥在天空自由飛翔，多麼令人羨慕！極權統制之下的人民，長年掛著一副抑鬱的臉，話說多了會被認爲是造謠，住居行動不能隨意選擇，言論底範圍限於唱讚美詩。共產極權主義者及其同路人所致力的，就是把人間造成這樣的活地獄。共產極權勢力一天存在，這種致命的威脅便一天不能消除。我們不能設想，愛好自由的常人，與共產極權主義者能共戴一天，共立一地。

而真正消除人類這一致命大患的，在一長久的行程之中，有而且唯有自由民主的願望與力量。許多人以為技術改良就是文明底進化。其實不然。該書說：「另一個可怕的錯誤，是拿技術的改良認作文明的進化。不少史學家竟以生產工具改進的里程來劃分文明的歷程。……坡來尼西亞人的航海術，愛斯基摩人的漁獵術，斯巴達人的作戰術，歐亞草原游牧人的馴畜術，鄂斯曼人的『馴人』術，皆是絕技。他們的技術儘管進步，而文明依然靜止不動。……從舊石器時代前期到舊石器時代後期，歐洲人祖先使用的工具與技能已有了進步，後期的人並曾用較進步的工具擊敗了前期的人。可是，前期已有的審美意識和藝術造境，在後期並無進展。」

陶英貝底這種看法，確乎比以生產工具底改進來劃分文明的歷程之史家高出一籌。至少從一方面觀察，技術改進並非蘊涵文明底進步，有時技術底改進反而可以加速文明底崩潰。許多人不明瞭這個道理，以為技術改進，或形式的整飾，就是「進步」，而欣然自得，沾沾自喜。這種現象，正是精神動力窮竭底結果。美國底強人藉科學技術從事盜劫。這是否「進步」？毛澤東學習了布黨底宣傳，組織技術，並且拿起洋槍洋炮造反。這是否算得中國之「進步」？太太小姐坐著一九五一年流線型汽車打牌看戲，在思想上是否算得「進步」？

美國底強人藉科學技術從事盜劫，比中國江湖奇俠傳中的強人更能有效地擾害社會。就倫理的意義言之，何進步之有？毛澤東所採用的造反技術不為不新，但滿腦袋裝的還是「打天下」的

帝王思想。凡拜讀過他底《沁園春》的人都知道的。何「新」之有？揭竿造反固然「徒苦吾民」，用布爾希維克方法造反更弄得天翻地覆，老百姓無洞可鑽。技術誠然進步了；但精神卻退步了。一九五一年流線型的汽車固然「新」，但坐在裡面去打牌看戲的人兒依然是舊的。新的工具一旦被舊人利用，新的技術一旦被舊的靈魂來操縱，結果不是加速腐潰，便是加速惡化。

所以，即使技術略有改進，也不足誇耀。因為，技術底改進，並非真正的進步。什麼才是真正的進步呢？精神，思想，或觀念底進步才是真正的進步。精神，思想，或觀念進步的人，掌握著改進了的技术，才是真正的進步。

「從一個低的存在或行動境界，進入一個較高的境界」，才是進步。「因此，我們可以說，文明成長的軌範是不能在對外征服——不管是對自然環境或人文環境——表現中發覺的，它是埋藏在行動場合的不斷升進之中。在升進場合中，凡足以引起淳化作用的挑戰並非來自外界，而是出諸自身；同時，此種反應亦非出諸外界的征服——技術改良或領土擴張，而是出於內在的自決或自明。毫無疑問的，一串成功的挑戰與反應的積累，便可以視之為文明的成長了。並且，這些挑戰與反應的場合，一定是逐步由外在宇宙轉入內在宇宙，由低級境界升入高級境界。這也就是說：一個在成長中的文明社會，其外在宇宙的挑戰與反應一定愈來愈少；內在的挑戰與反應一定愈來愈多。（平凡按：就整個的社會說，應注重社會內在矛盾的解除，不斷調整人與人間的關係，使全

體社會成員都能有逐步走向超人的機緣；就個人說，應不斷提高個人生活境界即多致力於精神生活的充實與擴張。）

在這一段話裡涵蘊著進步底真實含義。真實的進步是精神的新生成長；絕不是形式的整齊壯觀。

月有盈虛。文明成長以後，是可能破落的。文明是怎樣破落的呢？

「文明破落的特質有三：(一)創造少數創造力的喪失；(二)多數群眾的離心離德；(三)走向社會的解體。」「文明破落既非由於上帝的安排，也不是生物法則所能決定；更不是人們控制環境力的喪失；而是由於『自決』的挫敗。」

「就理想上說，一個新力量最好能通過一個新的制度以完成其任務。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新力量必須或多或少的通過前一社會存在的舊制度，達成其創造目標的。這一『新』(力量)『舊』(制度)關係的結合，可能發生下列三個結果：

(一)舊制度自動的逐步調整——模倣順利進行——以配合新力量的要求。這是事實上最理想最順利的結合。在這樣的結合下，文明得順利成長。社會進步不須付出太大的代價，人民不致遭受若何重大的災難。工業革命和社會政策在英國的成就，便是典型的例證。一切不流血的和平的社會革命運動，都屬於這一類的結合。

〔二〕舊制度適應延遲被新力量衝擊突然解體——模倣的延遲與激烈（評者按：這幾個字底意義不甚可解）。這種新舊結合的關係，我們通常稱它爲革命。這種結合亦能促成社會進步，但人民必須付出重大的代價，社會常常激起長期的動亂。這種結合有時反而引起社會本身的倒退。……

〔三〕舊制度延遲並拒絕適應新力量——模倣的延遲與拒絕——因而招來一種果報，造成社會混亂與文明衰落。歷史上有許多不成功的革命，實無異一種罪惡的暴行。暴行的結果，自然戕害了文明的成長。」

就文明的破落說是如此；就依存於文明之上的社會存在之革進說亦然。文明走下坡路底原因，照陶英貝說，是由於人們喪失自決的能力。

喪失自決能力的結果之一就是將過去的成就偶像化。這種倚恃過去創造的結局，常常產生三種「創造的果報」。

〔一〕自我的偶像化：某一民族或某一些人在應對第一次挑戰時是成功的，而對於下一次來的新挑戰，卻往往是無能爲力的。不特此也，有時他們還可能與新的創造者站在對立的地位，阻撓新力量的發展。這一現象並不是偶然的：猶太人陶醉於自己在宗教上的成就便自許爲『上帝選民』，而過於尊重自己的成就，過於相信自己的創造。日久竟將『上帝選民』一詞在意識中雕塑成了偶像，以致不知不覺中忽視應有的繼續進取。……『希臘教育』概念偶像化的結果，注定了雅

典人在公元前四世紀以後的失敗。……

〔二〕制度的偶像化：一個社會有一個社會的特殊制度。這種制度的產生，多係反應前一挑戰的結果。它的存在價值是要受時空限制的，並非可以永恆存在的。不幸，這一制度的暫時成功，多易被這一社會的成員過分重視，過分信賴，而達到偶像化的程度。因此，這一制度就不易改變，以適應新挑戰的要求。雅典人迷信他們的城邦政治，是希臘文明破落的基本因素之一。

〔三〕技術的偶像化：歐亞草原遊牧人和愛斯基摩人文明的癱瘓，主要的是因為他們過分集中精力在畜牧狩獵事業。此種『單軌生涯』，幾乎把他們回到動物時代。奧士曼人和斯巴達人曾把畜牧狩獵的精神，應用到他們的社會體制裡，結果當然是失敗。在他們的意識中，所有的人民只是一群動物。這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某種技術過度擅長，對於適應某種特別環境別具絕技，以致在面臨新挑戰時，不能輕易棄其原有專長，從事一個新的反應。他們能拿出來的還是那老一套，自然是要被淘汰了。』

走上破落道路者，如果不是陶醉於勝利，就是從事贖武主義的自殺，二者常居其一。

文明一走上破落的道路，便往往趨於解體。「文明解體的結果，可能是新社會的出現。黎明前的黑暗，終究要被晨曦驅散。在一個世紀的末日中，打算拯救大眾超脫苦海的並不乏人，能夠成功的可就寥寥無幾了。這些發大慈悲心的『救世者』能否成功，並不單靠他的動機善良，有決心

有毅力，更要緊的是看他能否走向新生的軌範。創造少數成功的基本條件在於「自決」，在於能棄絕舊的外在宇宙，退入內在宇宙，通過個人自明作用，再投入外在宇宙，發動整個社會的「自明」。——

通觀全書，提元勒要，改寫者確下了一番功夫，費了一番苦心，這種作品，在以口號當真理的目前，尚不多見，我們讀了它，不僅可以獲得一個廣濶的歷史概念，而且可以清醒自己的靈魂，擴大自己底襟度，我們有了這一點點歷史的涵養，便會在這赤流滾滾，瘴氣瀰漫的當前，有勇氣為未來而作長遠的努力。

書中有好幾處改寫者以中國儒家的說法作解釋。這種辦法，在改寫者也許是當做吃藥時所用的引子：用大家熟悉的觀念引人進入陶英貝的堂奧。儒家底那些話頭是否要得，評介者在此不論。可是，無論如何，那些話頭與陶英貝底道理是不大調和的。改寫者底這種辦法，多少妨害了陶英貝底思想之純粹性。依評者看來，這一點是本書美中之不足。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五卷七期

附記：本書為湯比原著，于平凡改寫。

科學與社會

羅素今年已是七十九歲的老人了。這本書是他得諾貝爾獎金以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印行的講演。他底講演是在哥倫比亞大學Franklin J. Matchette基金主辦的哲學講演中講出的。此老真是老而彌勤。有些人活著對於人類有害，史達林、毛澤東，及其同一類型的人物是也。有些人則活著對於人類有益，羅素是也。但願此老活到杜威那麼大的歲數，將他底人生閱歷和見解多告訴一點給世人，指引出人生正當的路途。在這本書裡所說的，可以說就是這一方面底東西。

本書計分三個論題：第一，科學與傳統；第二，科學技術底影響；第三，科學與價值。羅素早年致力數理與邏輯，與懷海德合著*Principia Mathematica*，其對於現代邏輯影響之大，弄現

代邏輯者類能道之。以他底思想訓練尤其是解析的思想訓練之精，由他來論析這些題目，見解自可高人一籌。

科學底影響有許多種類。在知識方面，科學廓清許多傳統的信仰，並且採取用科學方法所獲得的知識。科學對於工業技術和戰爭技術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除此以外，新的科學技術使得現代社會組織發生深刻的變化。社會組織之深刻的變化，逐漸引起相應的政治變化。最後，由於科學知識使人類得以控制或改變其環境，結果，產生了一種新哲學。這種新哲學包含著一種新觀念，使人知道人類在宇宙間的地位有了改變。

依此，羅素在這個演講中闡述科學對於社會的影響：第一，他詳釋科學在純知識上的結果。這些結果將無根據的傳統信仰予以清理。第二，分析科學技術，尤其是自工業革進（評介者按：歷來許多人將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詞譯作「工業革命」，「工業」乃技術方面的東西，毫無人為的「意圖」攙入其間，何「命」之有？所謂「工業革命」的本意應是「改進工業技術」，例如由手紡機進步成蒸氣紡織機。所以，評介者改譯成今名。而且，「革命」一詞，自布黨十月革命以至中國共黨之「頒佈懲治反革命條例」以來，所謂「革命」，與陰謀，暴力，恐怖，極權統治，幾結不解之緣。我人一聽到「革命」一詞，便聯想到這些血腥字眼，所以，並引不起樂觀與振奮之情。我人今日所需要者，唯理性，進步，自由，與利他諸要素。）以來的科學技術。第三，考察科學

技術對於政府，社會階層，對於個體自由，對於人種改變的影響。最後，討論由科學之勝利得到啓示所形成的哲學。羅素認爲，這種哲學，如聽其發展，會使人類蒙受災難。

科學與傳統

從十七世紀開始，科學使傳統的信仰逐漸衰落。羅素說，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科學觀中，有三件事最關重要：第一，對於事實的陳述必須以觀察爲根據，而不以無根據的權威爲根據。第二，無機的世界是一個自動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之中，一切變化都依照自然律。第三，地球並非宇宙之中心，而且人也許不是宇宙之目的（如果宇宙有目的的話）；復次，「目的」這個概念在科學上毫無用處。

這幾項觀念所形成的看法就是所謂的「機械觀」。這種看法，曾爲教會所非難。但是，也就由於這種看法，逐漸終止了教會的迫害，並養成了合於人情的態度。可是，到了今天，有許多人不像從前那樣地接受這種看法，於是迫害又已開始。這是現代值得注意的根本問題。在上述三點中，第一點對於今日的世界尤關重要，所以我們必須特予注意。

就現代人而言，我們對於事物下判斷時，這一判斷是否正確須藉觀察來確定，而不是靠古代

的權威來確定。但在十七世紀以前並非如此。亞里士多德雖然結婚兩次，可是他說女人底牙齒少於男人。他沒有觀察他太太底牙齒來證實此說。亞氏類此的說法頗多，許多學究居然信之不疑。

這種無條件地信賴權威而不憑自己獨立的觀察來下判斷的情形，在學術思想上已經夠有阻害了。如果在政治上是如此，那麼為禍之烈，真是不可勝言。納粹式和布爾希維克式的「訓練」，最高的目標之一，就是消滅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立理性的判斷和觀察事物的能力。他們要讓被訓者像羊群一樣，以牧人底是非為是非，以牧人的判斷為判斷；然後使盲目地跟著牧人亂跑。

要做到憑自己底理性獨立下判斷是很不容易的，必須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才辦得到這一點。爲了判斷免於權威之影響或限制，科學與宗教作過長期的抗爭。布魯諾(Bruno)和迦利略(Galileo)等人，是這一抗爭過程中的犧牲者。直到現在爲止，世界上得享這種「判斷自由」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在世界大部分地區裡的人，他們底判斷，唯或必須唯僧侶，酋長，國王，首領，或類似的東西是賴。因此，在這樣的一些地區裡，思想自由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科學重大地影響著人在宇宙間的地位之瞭解。這種影響有兩種：科學底認識，在一方面貶抑了人底地位；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提高了人底地位。從理解宇宙方面著想，科學使得人自認爲並非宇宙底中心；可是，從行動能力方面著想，科學卻增加了人類底地位。

在科學時代以前，權力即是上帝。在那個時代，照人看來，即使環境最爲有利，人所能作能

爲的非常有限；而且，如果人獲罪於天，有利的環境也會變成不利的環境。依據人間專制君主之類似情形來判斷，我們可以確知，神明所最不喜的，乃人類缺乏謙卑之感。你在神明面前，必須是很謙卑的。如果你想無災無害地過活，那麼你得表現的很是柔順：你必須意識到，你是處於沒有保護的情況之下，而且須常常準備認罪。

這話真是千真萬確的。這種神權在現代極權統治之下得到更充分的現形。在極權統治之下，權力者即是上帝。我們不能設想，我們在蘇俄及其同一統治型態的地區，獲罪於「天」時，還能好好安逸地過著日子。在這樣的地區，人民日夜暴露於警察密探底偵伺之下，沒有任何人來保護你。在民主國家，每個人是自己底上帝。在這樣的極權空間，所有的人只共一個上帝。你在這個上帝底武器威力圈以內，必須表現得非常謙卑和虔敬。謙卑和虔敬是你已被懾服底表現，並且是你屈從其權力底表現。聽話的羊，將得到水草。同樣，只要你表現得屈從其權力，那麼你將得到好處。所以，在蘇俄及其同型空間，幾乎目不識丁的脚色，可以對大學教授「訓話」（參看《今日美國》第四十四期〈我的故事〉一文）。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依此，你依靠了權力，無知變成有知，無理變成了有理，錯誤便是正確。這與金錢社會裡，有了金錢便有了一切，同樣地不足爲奇。

科學技術底影響

自從阿拉伯時代以來，科學具有二種作用：第一，促使吾人知道事物；第二，促使吾人做些什麼。在中世紀，有二種發明對於其後的世界具有深遠的影響：即是羅盤針與火藥。火藥底主要作用，是促使中央政權平服諸侯底叛變。自十五世紀以來，國家底權力，乃火藥發明底結果。從那時開始，國家底權力日益增長。

羅盤針底發明同樣重要。如果沒有羅盤針，那麼地理之發現似乎不可能。羅盤針發明以後，新大陸就成爲白入底殖民地；我們可以繞過好望角到達東方，征服印度，並且使歐洲與中國發生接觸。海權也得到激劇的發展。西方國家藉著海權而控制了世界。

至於蒸氣機之發明，對於工業革進以及世界的影響是如何重大，更不待言了。不過，在這一方面，羅素底看法與一般「科學萬能」論者頗不相同。他說：「工業革進使得英國和美國發生不可言狀的苦難。」崇奉科學若神明者，對於這位科學的哲學家之言，應當再三思量。科學是一把利刃。善人用來格魔鬼；惡人則用來毀滅世界。現代極權組織利用科學技術爲統治方式，人民只有永世作牛作馬，一輩子不能翻身。

誠然，科學技術可以增進生產能量。可是，生產能量增進底結果，使得經濟利益成爲爭奪之誘惑物。羅素說：「內戰(Civil War，評介者按係指一八六一年美國底南北戰爭)終於爆發。如果紡織工業仍然停留在手工業階段，內戰幾乎可以不致發生。」這話是很有見地的。近代有許多衝突，是起於大規模生產所形成的經濟利益之誘惑。不獨如此，這種大規模生產的技術，使現代戰爭遠較古代戰爭激緊(intensifying)和普通。因而人民所受之禍亂，也遠較古代戰爭爲烈。復次，由於提倡所謂「社會主義」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於是經濟權力成爲政權爭奪戰中之一有力的誘惑品。(古代有爲奪一美人而戰的，有爲「奪江山」而戰的。現代戰爭之勝利的一方，常可獲得對方底銀行，機器，鑛山，以及一切資源。至於江山美人，猶其餘事也。)

電氣在用作動力以前，已經用作通訊工具。這有兩種結果：第一，通訊比人行快得多；第二，在一個大的組織之中，中央機構能控制瑣細的事項。這在從前是辦不到的。通訊比人行較快，對於警察最爲有用。在電訊發明以前，一個強人乘著快馬逸去，治安人員不易擒獲。現在這種強人就難逃警方之手。羅素以幽默的口吻說：「不幸得很，警察所要捉的人常常是對於人類有益的。如果有電訊，Polycrates一定會捉拿Pythagoras，雅典政府一定會捕獲Anaxagoras，教皇一定會捉到William of Occam，Pitt一定會捉到Tom Paine。」這自然是指在暴政之下的人而言的。所以，羅素接著說：「在我們底時代，大多數最好的德國人和俄國人在希特勒和史達林底統

治之下受難；如果不是通訊太快，那麼逃出的一定更多。所以，警力之增加，就整個看來，並非一件好事。」我覺得如果有一組經過特殊訓練的傘兵隊把那個毛澤東捉來，對於國家倒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除了物理科學以外，生理學和心理學對於近代社會的影響也很大。「我想，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門，是群眾心理學。從科學觀點來說，群眾心理學並不是一門很進步的科學；而且直到現在，群眾心理學底教授不在大學之中：他們是廣告師，政客，尤其是獨裁者。群眾心理學的研究對於講實際的人是很有用的。無論他們是希望致富或者是希望獲得政權，都需要精通群眾心理。……現代宣傳方法之產生重大地增加了群眾心理學底重要性。」又說：「從前的錯誤是以爲，書上告訴我們，人是一種理性動物，並且依據這個假設之上找證明來說服人。我們現在知道弧光燈和銅樂隊，比任何漂亮的三段式更能誘服人。……」在科學的獨裁者之下的科學家可以把這種工作做到很好的地步。Anaxagoras會說雪是黑的。當時沒有人相信。但是，未來的社會心理學家將可對一群學生以各種方法使他們堅信雪是黑的這句話。」雖然群眾心理這門科學被人勤謹地研究著，可是這種研究只嚴格地限制於統治階層。他們不讓一般民衆知道他們自己底意見是被別人怎樣製造出來的。當著技術完備時，每個政府，只要控制人民底教育到下一代，那麼便能很安全地控制著它底人民，而無需軍隊與警察了。直到現在爲止，只有一個國家成功地造成這樣政客底樂

園。」

羅素此言，將現代「革命專家」們底愚民之術，可謂揭露無遺。現代的一些「革命專家」們，或高明的獨裁首領，其中列寧和希特勒可作代表人物，多屬實際的群眾心理學家。他們天才而直觀地（後來則進步到科學而分析地）知道活躍於群眾腦海裡的是什麼東西，他們確知群眾所急需的是什麼東西，他們洞悉群眾底好惡何在。以這些為基礎，他們設詞誘惑群眾，對群眾施行集體催眠術，讓群眾像觸電一般，激怒鼓舞，如水牛出陣，如大群醉漢，在一個組織指揮之下，「打資產階級」，打猶太人，在寒風冷凍之中拿身體抵擋水龍，拿血肉之軀抗拒機槍，仇恨異黨，……這就是現代的「革命藝術」。

趙高「指鹿為馬」，千古傳為奇談。其實這在現代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趙高底宣傳技術如果能科學化，如果他善於藉制約反射法（conditional reflex）來製造「直理」，那麼何止「指鹿為馬」！他何曾不可指貓為狗！共產黨在韓國明明打得大敗虧輸，他們卻把聯軍談判停戰代表底照片在電影上映，說是聯軍「乞降」。在竹幕中的人，有幾個能看得破這種把戲？一般人底知識之來源，無非是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極權組織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將大家底知識原料事先加工製造。大家居在知識的鐵幕之中，又何從知道外在世界？不知外在世界，又何從懷疑自己耳之所聞目之所見？於是，「政客底樂園」實現了！「天國」也就降臨人間！

「科學技術使組織底程度增高。組織底程度增高之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官吏權力之加大。這種結果底毛病，就是官吏不負責任的情事增多，而幕後的權力，像從前皇帝身邊的宦官和國王底王后一樣，操縱著一切。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控制官吏底權力，這是今日最重要的政治問題。自由主義者曾經向國王和貴族底權力抗議，並且得到成功；社會主義者抗議資本家底權力。但是，除非官吏底權力加以限制，則所謂社會主義與以另一主人代替原有主人幾無以異；以前資本家底一切權力都必為後來的新官吏所承襲。」這是很真切的。官僚制度得到科學技術之助，便如虎添翼。不獨標尚社會主義是如此，即使我們標尚民主政治，如果這種官僚制度不改變，則民主政治被官僚制度摧毀之有餘。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出了許許多多壞事，而還不知道責任誰屬。好像大家只感到有鬼為厲；但鬼究竟在什麼地方，誰也看不見，誰也捉不到。在這種制度之下談民主不過像黑夜看見稀微的星光；而人民所親身感受的是冷酷、無情、陰森、煩雜，困難重重，束縛無邊，動輒得咎的現實。

這種制度所產生的害處，不只這些有形的；而且，在一長遠的過程之中，還能使得社會僵化。至於一個本來被壓得缺乏生機的社會，若有這樣的制度置於其上，充其量只有造成外強中乾的結果而已。

由於組織底程度增加，個體自由底問題與十九世紀時穆勒(Mill)底想法完全不同，而必須重新

估計。一個人底行動是無關重要的。但是一群人底行動則比從前重要。以罷工爲例。如果一個人偷懶，不願工作，這是他自己底事。他所損失的，不過工資而已。可是，如果在一個重大的工業組織之中有罷工情事發生，那麼整個社會便受到不利的影響。我們並不是說，罷工之自由應予禁止，而只是說，如果集團罷工發生，必須因著特殊的理由，而不是基於個體自由這種一般的理由。集團罷工如果發生，則應藉協議或仲裁方式來解決。

羅素所言，無疑係以民主社會爲背景。在不民主的地方，最極端的例子如蘇俄，無論個體自由和集體自由，一起都得奉送給極權統治者，作爲他個人放縱肆態底原料。所以，在這樣的地區，個體自由認作是搗亂，不守紀律；集體自由，被更嚴重地認爲是叛亂。這二者都是必須絕對禁止的。所以，羅素之所言，在極權地區是沒有問題的。

科學與價值

許多人認爲科學底價值就是使吾人瞭解世界。時至今日，由於技術之勝利，許多人認爲科學底價值之所在，在於告訴吾人如何改變世界。這種新的看法，首先爲馬克斯所倡導。在費爾巴哈論中，馬克斯說：「客觀真理是否屬於人類底思維，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學理問題，而是一個實際

問題。真理是思想底實在和權力。這一問題必須在實踐中去證明。關於思想是否實在之問題純然是一學院裡的問題。……：哲學家只以各種方式來解釋世界，但是真正的任務是改變世界。」

這種說法與實用主義頗有相通之處。這種哲學，羅素名之曰「工程師底哲學」。工程哲學深合愛好權力者底胃口。因為，藉著這種哲學，他們可以從心所欲，當然也可以假戲真做。所以，在事實上，無論有無這些名詞，現代一切愛好權力者無不採取這種哲學。

假若你認為權力之獲得乃首要之事，那麼你就會採取馬克斯底觀點，即是，認為重要的事不是瞭解世界，而是改變世界。如果權力是你希望從科學那裡得到的一切東西，那麼實用主義正好給予你所需要的。科學甚至會給予你以意想不到的事。因為，「如果你控制了警察，那麼它會給予你以上帝一般的權力，使你能任意製造真理。你不能使太陽變冷。但是，如果有人否認『太陽是冷的』這句話，那麼便要遭到清算。你能保證做到這一點，你便可以提供一個實用主義的真理，說『太陽是冷的』。」

這種哲學，正是蘇俄及其同型地區底統治集團所採取的哲學。他們由「沒有人反對馬列主義」而「做到」所以「馬列主義是真理」。他們由「沒有人在史達林底部隊威力所及之處反對史達林」，而得到「所以史達林就是太陽」的結論。這種哲學，影響所及，不是亡國滅種，便是全人類毀滅。

可惜的很，人類頭上還有太陽照耀。史達林輩如何能摘下太陽呢？世界是這樣廣大，他們人

爲的一點黑影子能遮蓋多大的一塊地方呢？又能遮蓋多久呢？

「這種工程哲學不獨與最大多數的哲學思想相違背，而且也與一般人底常識不合。因爲，這種哲學之所謂『真理』，即是『力量』，而不是『事實』。普通所謂的『真理』總是要『合於事實』的。例如，假若你說，『南極是寒冷的』，你說的這句話之所以爲『真』，乃因是有這『事實』，即是，南極是寒冷的。南極寒冷之所以是一事實，並非因爲一般人相信那兒是寒冷那兒才寒冷，也不是因爲有人收買，叫人說南極寒冷，南極更寒冷起來。南極寒冷，是一事實。事實，當其無關於人類或其行爲時，便表示著人力底限制。我們發現自己在某種宇宙之中，我們之發現這種宇宙乃藉觀察，而不是藉著自我肯定的。的確，我們在地球表面或近處改變些什麼，但在別處則不能。……但是，即使在地球表面，我們底力量還是有限的。如果我們忘記我們是被事實所環繞，而且不承認這些事實之最大部分是獨立於我們底欲望，那麼這便是一種妄自尊大症。……」在事實上，許許多多極權統治者都患有嚴重的妄自尊大症。史達林要與遺傳律「抗爭」，下令賴申柯製造所謂「社會主義的遺傳學」。其如史達林底命令雖然下達，而後得性照樣不能遺傳何！

除了上述的影響以外，科學有著其他作用的。科學能夠減少壞事而增加好事。科學能夠免除貧窮並且減少工作時間。農業文化產生了奴隸制度，絕對君主專制，和大規模的戰爭。除了爲統治的少數人提高生活水準以外，農業並不提高大多數人底生活水準，而使人口增加。工業也未

嘗不可以走上同一的道路。可是，幸運得很，西方工業之興起是與民主政治俱來的。在西方，提高生活水準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民主政治；二，商業聯盟；三，節制生育。而這些都離不了科學一步。

「不過，西方近二百五十年來的進步，如果不普及到世界其他的地方，那麼這種進步是不會穩固的。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如果不實行民主並且節制生育，那麼人口便將激劇增加，而且由現代技術所產生的經濟利益，只有落到少數統治者手裡。這就是今日東西形勢緊張之源。這就是戰爭的情勢。除非東方征服世界，或者東方實行民主政治並且節制生育，否則這一戰爭情勢不能和緩。如果不此之圖，即使用戰爭的方法將東方擊敗了，世界也不會有永久的安寧。」這種看法，極其深遠。

科學底價值之一，在於消滅狂執的信仰。而一種狂執的信仰正像瘟疫一般地在東方流行。羅素說：「一切狂執的信仰都是有害的。當著這一種狂執的信仰不得不與另一種狂執的信仰相競爭時，害處便顯然易見。因為，在二者競爭的情形之下，便產生仇恨和爭鬪。在一個範圍以內，即使只有一種狂執的信仰存在，也是如此，因為，在一個範圍以內，即使只有一種狂執的信仰存在，也不許有研究之自由。因為如許自由研究，一窮究竟，狂執的信仰便會為之動搖。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對不喜狂執主義者施以迫害。狂執主義必須阻害知識的進步。」

共產主義就是現代狂執主義之一。共產主義底罪惡有六：第一，它堅持一種嚴峻的和不變的原則。這種原則，有一部分是可疑的；有一部分顯然是假的。第二，它以迫害的手段來推行其所謂正統的說法。第三，它認為只有相信它底道理人類才能得救；而且必要時應使用武力。第四，只有黨底最高機構才能解釋其「主義」。第五，黨員是貴族，他們靠剝削人民而生活。第六，這種固執態度乃戰爭之穩伏的因素。

毫無問題地以權威為根據來接受一種信仰，這種態度整個與科學精神相違。這種態度，如果大為擴張，便很難與科學之進步相容。科學底勝利是由於以觀察與推理代替權威。我們必須明瞭，在知識領域以內，企圖恢復權威的每一行動都是一個倒退的行動。

結論

羅素認為，現代人所充滿的絕望之情是不合理性的。人類目前是正在爬危險的懸岩。可是在懸岩爬過以後，我們就可以到達一個豐美的平原了。

羅素此言，當係鼓舞樂觀情緒。但是這種樂觀情緒之可以產生，並非茫無理由。今後人類之禍福，端賴是否善用科學。此一「善」字，實在大有講究。這似乎是科學——至少自然科學——以

外的事。

顯然得很，目前人類所正在爬的危險懸岩，就是蘇俄及其集團或其同型者底極權統治。人類如不能爬過這一懸岩，那麼便墜入深淵，淪爲工奴和農奴。如果人類能爬過這一懸岩，就可到達豐美的平原。在這平原之上，有自由與幸福的生活。

人類能否爬過這一危厄呢？他們正處於嚴重的試鍊關頭。

優美的西歐文明，在美國自由的天地得到新的營養，得到新的活力。這股巨大的力量，是全人類抗拒極權統治之所寄。如果吾人所居住的世界之歷史的發展是由偽，惡，醜向著真，善，美而趨進，那麼我們就相信這股新力量在這場巨大的抗鬥之中終於會戰勝極權暴力而使全人類走向自由之途程的。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五卷九期

附記：評 Bertrand Russell · *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 羅素講演，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自由人

美國出版的刊物，無慮千百計。我爲什麼要評介《自由人》呢？因爲《自由人》是主張反共制俄的刊物。美國出版的刊物之主張反共制俄的也逐漸多起來。我爲什麼單單評介《自由人》呢？因爲這個刊物不獨是主張反共制俄而已，而且它除了消極地批評共黨與俄國底罪惡以外，更能提出一組積極的思想。這可見之於該刊底主旨。

該刊說：「至少在近二十年來，美國亟需有一個刊物來宣揚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自由。《自由人》是爲滿足這一需要而編行的。」這個旗幟一打出來，便非常鮮明奪目。

也許有一部分赤心愛國和誠意反共制俄的人士看了這個旗幟，難免心頭火起：「現在從事反

共制俄，最要緊的是加強組織，鞏固紀律，你幹嗎還要評介這種刊物呢？你這不是要鬆懈組織，弛懈紀律嗎？」

評介者說：「你底心意很好，可惜性子太急。請閣下小坐一會兒，歇歇涼，咱們窮人吃不起冰淇淋，喝杯冷開水也好，靜靜心，聽咱慢慢道來：請閣下別見怪，您這種論調，不是中了法西斯底毒，就是中了共產黨底毒。」

「什麼？」他叫了起來，霍地起立，怒氣沖沖。

「請別惱火，坐下聽我說出個道理，我不是故意說你不對啊！死水魚兒在死水裡泡久了，牠就不知道牠所喝的那口死水，好人吃下去是要嘔吐的。中國古人說：『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習染既久，也就不知不覺，而視作當然了。閣下大概在這種空氣裡待久了，而且一天忙到晚，很少功夫靜下來想想問題，讓季候風一天到晚在耳邊吹，無意之間就把別人的意見作自己底意見了。我現在也不敢說自己底話百分之百地對。我不過幫助您想想思想而已。對不對還得你自己下判斷——慢慢地下判斷。」

「老實告訴您，法西斯之反對傳統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與共產黨之反對傳統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無殊。我們看到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之迫害自由，就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在老魔王史達林統治之下，人民連『不說話的自由』也被剝奪；別的更不用談了。那個啥子毛澤東（應寫作

「竊賊通」方算名實相符。孔夫子最注重正名的。）他在《整風文獻》裡不是大罵『自由主義』嗎？是的，這位流氓張獻忠底徒孫，反對自由是反對得最徹底了。大陸人民現在連走三十里路都得要路條。在親戚家借宿一晚還得層層打報告。您說反自由反得徹底嗎？固然，我們不能由『法西斯和共產黨反對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而推論到『反對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者就是法西斯和共產黨』，但是，我們由此總易於聯想到反對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即使和法西斯和共產黨不是『一路貨』，也是觀念上甚至於在作風上受他們沾染甚深的人物。因為，近三十年來，只有法西斯和共產黨拚命有計劃地宣傳反對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打擊這種優良的西方精神傳統。這股感應力真是太大了。所以，許許多人受其影響而猶未自覺。……您底見聞也廣。您看那有真正講民主的人打擊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挖掉傳統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所謂民主也者，不過虛有其表啊！閣下以為何如？」

「嗯！……」作疑難深思狀：「從理論上著想，您所說的有理。不過，實行起來，是否有困難？如果人人講自由，人人著重個人，如一盤散沙，紀律和組織從何談起？力量如何凝集？」

「先生是把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底真義誤解了。許多人攻擊自由主義，其實一點也沒有瞭解。有很多人則討厭這些東西，認為這些東西發展下去於己不利，於是先對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加以惡意的曲解，造成一般人對於二者底歪謬印象，然後再加以攻擊。在事實上，以東方人底心理

習慣和政治方式，是很難瞭解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這個，真是說來話長，我們此時無暇討論。您剛才所提出的『組織』與『紀律』問題，所著眼的當然是『效果』。一談到效果，問題就比較簡單了。」

「如果硬說只有犧牲自由才有紀律和組織可言，那麼，請閣下別生氣，至少在從前，我親眼看見必須用一根繩子把人串起來才行，否則，人便一溜杏花村。而您幾時聽說英美自由人民爲國赴敵時各散各的步去了呢？有些彌賽亞以爲『組織』與『紀律』是萬靈丹，其實越搞越秀麗可觀，人比黃花瘦，一個單元底力量都組合不起來。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艾森豪威爾元帥指揮那許多國底軍隊，指揮得那麼協調。這豈是強人以從己的形式所辦得到的事？這個明顯的對照，甚足發人深省。可見自由並非不講組織，更非不能發揮力量。」

「實在說來，只有自由與個人才是真正有效的組織和紀律之基礎。觀乎英美便可明瞭。組織與紀律，當其爲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副產品時，才不是強制與屈從之別名。只有當大家爲自由爲個人而奮鬥時，組織與紀律才有意義，有內容，有實際，更能發揮真正的力量。此外，在許多其他名義之下講組織與紀律，不是空洞無物，便是強制屈從。二者之間，雖然貌似，但本質之差別，則判若雲泥，固不可攪混淆亂也。」

「顯然得很，如果您有寶貴的自由，您家裡又有美妻，以及豐富的財產。外面來了一夥兒強

盜，要打進來劫奪您底財產，把您底美妻配給別人，又在佔領了您居住的土地以後剝奪您一切的自由。您還不會爲了保家保妻保產保自由而拚命與強盜戰鬥嗎？這時，您還會須要人強迫您編入自衛隊嗎？在事實上，河南西部底自衛隊之站隊，練槍，放哨，很少人強迫他們去做。爲什麼呢？因爲大家切身感到需要如此。」

「實在在在，把一切空論揭開看，組織和紀律如其有用有益，不過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底副產品而已。閣下以爲怎樣？」

「嗯……等……等我回去慢慢想想再答覆您。」

「對極了！您這種不輕於接受別人底話和不輕於否認別人底話之態度，正是作人之所必須，我沒有冤枉說一場。我現在可以繼續評介《自由人》了。」

該刊底宗旨接著說：「個人必須依其良心底指導而自由行動。這種自由行動以不侵犯別人底相等權利爲界限。」這幾句話，可謂道出自由底神髓。第一，自由不可不講「良心」。此處所謂「良心」，粗淺地說，就是「好心腸」。老太婆所有的心腸。所以，講自由，就得本乎好心腸。如果人本乎好心腸說話，作事，對人，那麼天國就降臨人間。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必須沒有恐怖空氣，必須人權真有保障，必須在法律以內的言行真不受干涉。可是，這些必須條件，在極權地區一概都不存在。你在極權空間，如果照著良心說話，保管大禍臨頭；如

果你照著良心作事，保管無權生存。爲了自存，你只有心理一套，嘴裡對人又是一套。所以在極權空間，大家同患一種病症，就是「人格分裂症」。極權統治對於人性底摧殘，豈可以數字計量！

第二，自由行動必須以不侵犯別人底相等權利爲界限，這就是說講自由不可不講個「群己權界」。民主國家底人民，在行動言論之間，最講人我底分界。這人我分界，任何人都不可侵犯。人民公僕更不可破壞。哥哥進弟弟底房要先敲門。在英國，人民公僕夜入民宅，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惟獨極權地區，如英國小說家奧維爾(G. Orwell)在所著《一九八四年》裡描寫的，統治的少數者之任意侵奪人權，破壞群己權界，根本是家常便飯。因爲，只有這樣，恐怖性的極權統治才建立得起來。

在民主國家，自由爲每一公民所分享，像分享上帝賞賜的陽光一樣。在恐怖性的極權國家，大家底自由全被剝奪。自由惟有統治的少數者可得專享。大多數人民囚居地窟。彼則高立陽臺，拔劍四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念天地之悠悠。

該刊說：「無論什麼地方，只要完全實行社會主義——無論什麼地方政府是唯一的顧主，那麼便不能有經濟自由。一旦經濟自由不存在，便不能有任何種自由。」寥寥數語，道盡了所謂社會主義的危險。

史達林說：「一個有職業而無自由的人遠比一個有自由而無職業的人爲佳。」當著大群人迫於飢餓的時候，很易聽信這話的。在快要餓死的時候，人自然選擇麵包而不選擇自由。所以，在貧困、混亂，而落後的東方，群眾極易聽信這種唯物主義的福音；而不易作更高的自由之追求。在人群餓極，群情憤激之時，自然容易被煽動從事鬭爭。這與一群狼餓極之逢人便噬何異？這與一群耗子爲飢餓所激而成群結隊攻擊倉庫何異？這還用得著講什麼「唯物哲學」？

馬克斯乃古往今來天字第一號底大撒旦！

麵包誠然重要，但僅嗜麵包絕不就是人之所以爲人的生活。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亦皆藉嗜麵包以爲生。飢不擇食所引起的結果，更屬危險。渴極之人，常「飲鴆止渴」。飲鴆以止渴，渴固可以小止於一時，但立遭亡身之禍。所謂「社會主義」，正是這一「鴆」毒。

世上最愚蠢之事，莫過於以飯碗交給別人管。飯碗獻出之日，即開始永作奴隸之時。集體地以「生產工具收歸國有」，便是集體地作奴隸之時。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鑄爲十二金人，以爲從此萬世一系，殊不知天下揭竿而起，強秦不旋踵而亡。但是，史達林則收盡全俄人民之飯碗，由彼一人掌管。全俄人民立即由人降爲牛群羊群等低級動物。腸胃受其配給控制，而莫能稍反矣！

在民主傳統深厚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自由已感受威脅。英國已走到這種危險的邊沿。若在毫無民主傳統的東方而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在已有的封建和專制之上更加一個現代化的工

具，而助長極權統治。這樣一來，初期的民主萌芽必被摧毀無遺；人民則在一種更嚴密的統制生活的方式之下過渡更普遍而深入的奴隸生涯。所以，在封建與專制尙未根除，民主傳統尙未確立的東方而談實行所謂社會主義，就是提倡新奴隸主義之別名。

經濟自由非經濟放任之謂。正猶之乎行動自由非行動放縱之謂。前者乃經公意協調之下的一種有節制的而不妨害他人的發展，後者乃無責任的任性衝動。無責任的任性衝動，乃獨裁與極權之特色。欲免於此禍，唯有提倡正常而健康的自由發展。自由經濟，如私有財產底保持，乃一個人作人（而不是作螞蟻，作蜜蜂，如史達林式或希特勒式底人物之所渴喜者）底必要條件。一個人有了經濟自由，並保持私有財產，乃能安身立命，保持人格，保持氣節。有了經濟自由和私有財產，你才能選擇你底職業，表現你底好惡。這樣，是非良心，才得以顯現。陶淵明因有將蕪之田園，才能「不爲五斗米折腰」，才能賦「歸去來兮」。如果在工業國或大農業國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一切收歸「國有」，「將蕪之田園」失去，所謂「政府」成爲唯一的顧主，那麼你爲了活命，還能不爲五斗米折腰嗎？今日之賦「歸去來兮」者，能有幾人？

該刊說：「照流行的口語說來，《自由人》既是激烈的，自由的，保守的，同時又是反動的。《自由人》是激烈的，因爲它要探究到問題底根本。《自由人》是自由的，因爲它要維護最高度的個人自由，容忍一切本乎誠心而出發的各種不同的意見，並且堅信藉著討論和理性來有效地解決

我們內部的問題，而不是藉有壓制和強力來解決。自由人是保守的，因為它相信要保持過去之偉大的建設性的成就。自由人是反動的，如果所謂反動的意義是反對在所謂「進步」底名義之下，以愚昧和魯莽的方法恰好來摧毀吾人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最有價值的遺產。」

這種「擇善而固執」的剛健的態度，是一切爲自由而奮鬥的言論者所應持的態度。《自由人》底編者是很固執，但他們是很有理由的固執，而不是虛偽的矯強。理由能給人以力量。當著人覺得自己「理直」時，便自然「氣壯」。氣一壯，便敢挺身而戰。在美國，當然有不少反對《自由人》的言論，但是，《自由人》面對那些「反對的言論，一點也不畏縮。《自由人》底編者並不懼怕別人說他們「激烈」，「保守」和「反動」。你說他是「激烈」「保守」和「反動」，他就是「激烈」、「保守」和「反動」；不過他「激烈」得有個道理，「保守」得有個道理，「反動」得有個道理。

《自由人》之所謂「激烈」，是要從根本上探討問題。這種「激烈」正是世界反共制俄之所必須，共黨常從根本上或所謂「哲學」上開始，「清算」舊社會，「批判」舊制度。這是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文明底反叛者對於人類文明最大的挑戰。在應付這一挑戰中，有的人則呼口號，伸拳頭。如果僅僅這樣，便是以小毒攻大毒。有的人則爲共黨唯物史觀等花樣所懾服，於是在「哲學」上接受了共黨底「歷史神學」，而在政治上則又高呼反對。這等於將頭伸給蛇咬而擊蛇之尾。這種人鮮有不中毒而死的。共黨從根本上或所謂「哲學」上開始「清算」舊社會，舊制度；《自由人》

雜誌則也從根本上探討問題，從根本上予以反對，看看我們文明的自由社會有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什麼是值得保持的。這就是從文化的根源上去找理由反共。這樣反共，才會在社會、歷史，和文化上生根。在社會、歷史，和文化上生了根的反共，才是本質的，而不是飄浮的。從這一根本上出發來反共，才能發揮巨大的力量。

雖然，史達林又把保羅，彼得，恐怖的伊凡，這些「民族英雄」底肖像高掛宮殿，可是，各國共產黨徒，在莫斯科嗾使之下，日以繼夜地宣傳，說各國自己底過去一概是罪惡，各國過去底文化一概都是要不得的資產階級的文化。要建立「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首先必須把這些東西破壞淨盡。毛澤東及其徒衆，是發揮這種破壞本能的「模範英雄」。過去在大陸上，如果有讀書人敢對之加以指責，那麼「反動」，「不前進」等等帽子馬上就來，許多人就被嚇住了，只好噤若寒蟬，於是共黨得以橫行無忌。當然，其時有心反共的人士所站的勢子不利，而且易於使人對之發生錯誤的聯想，把他們歸到某一類人去，加以某種人對之肆意摧殘，可是士氣消沉，士人自己振作不起來，作中流之砥柱，以阻遏洪水氾濫，也不能說不是神州陸沉原因之一。如果士人個個有《自由人》編者這股氣慨，那麼至少可以在思想上弄出一個青紅白啊！

中國近五十年來，特別是近三十年來，「革命」之風有若西伯利亞之寒流，吹遍中國原野。這種「革命」之風，養成許多人底一種輕於破壞的心理，所謂「革命」青年尤然。「革命」，「革命」，

許多人假汝之名以行不義。我真不懂，說是要把長期努力建造起來的經濟體系，交通體系，文化教育，倫理道德，一概破壞淨盡，讓大家都返回野蠻時代，受一個極權者驅策，然後才有幸福可言。這個道理，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我並非說過去的一切都好。過去的一切之有毛病，亦若將來的一切之可能有毛病。但是，說過去的文化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則簡直是胡說。社會是分工合作的。在一個社群中，有勞心的，也有勞力的。過去的文化，顯然是勞心與勞力者合作累積的結晶。如果說它好，大家都有分。如果說它不好，大家也都有分。（共產黨自己也有分，因為他們自己是文化產品之一，雖然這產品不見得怎樣令人喜悅。）然而，共黨說過去的一切都要不得。說道德是虛偽的，宗教是海洛英。非「唯物」的哲學是資產階級底「意識形態」。這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要探求這種原因，必須從政治的角度去求。從這一角度去求，便立即可以明其底理。如果從書堆或字面去追求，那就太書獃子氣了。事關指出反共者之迷津，所以評介者特地藉評介《自由人》之便指陳出來。

當年王陽明審小偷。他為證實「人有良知」，叫人替小偷當場表演脫褲子。那小偷頗感難為情，很不習慣，弄得拉拉扯扯。王陽明說這可以證實人是有良知的。良知是什麼，頗不易下定義。咱們很可不必選取「良知」這樣多義或者混合的字眼。我們無寧說，該小偷之所以怕當眾脫下尊褲，

是風俗，習慣，教育，文化，等等條件形成的。當然，這些條件之所以使得那位三手先生竟不敢當衆表演，可思議地有其「理性基礎」。然而，無論如何，這些條件及其背後所依據的理性基礎，就是人之所以爲人底條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仁義而已。」仁義是什麼，讓弄中國哲學的先生去界說，我且不管。我現在只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地方，是些「人文條件」。剝去了這些人文條件，咱們跟猿人泰山還不如囉！

而北大圖書館員毛澤東君則不然。毛澤東日思夜夢之所爲者，就是如何鼓勵男女人等當衆脫褲；越脫得快越好，越脫得精光越妙，越脫得徹底越有獎！

這條褲子，就是人文條件底象徵。上述人文條件之有無，乃人獸之分野。具備了那些人文條件的，才可算是人；否則人慾橫流，只好算是洪水猛獸。那些人文條件，叫人尊理性、重是非、美情操、明人倫、守禮節、知進退、發展個性，注重價值、嚴群己權界之分，因而不濫取濫予。這些條件，亦若欄柵，把人底獸性檻住了，而導人走向文明之途，創造真、善、美的世界。這些欄柵，亦非某一個人或某一階層之私產，乃人類數千年來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途中，許多大宗教育家，大哲學家，大科學家，苦心思觀出來，而且經千千萬萬人從生活的實際中體驗出來的。所以，這些欄柵和軌轍，實在是人類生活底生活原理。因此，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貧富，年無分老幼，都應該謹遵這些原理，信守而弗踰的。因此，這些原理若干年來對於人類底行爲的確多少發

生了拘束作用和規範作用。

可是，正因如此，對於共黨之破壞造反打殺與夫橫決大爲不利，於是乎彼輩首先要衝破這道人獸之分的欄柵讓獸性破柵而出，以造成橫決之勢。因而，共產黨徒，鼓其如簧之舌，大肆宣傳，說這些人文條件是富人底產物，是「資產階級底意識形態」，是用來保護其自己利益並束縛「無產階級」的。真是混帳已極！而許多人雖然反共，無意之間一任毒氣流入，多少也跟著共黨同樣作法，同樣說法。事之可異，人之可悲，執甚於此？

人底文化外衣剝除了，人剩下了什麼呢？什麼也不剩，只剩下一副人形。這些只具人形的衣冠禽獸，頭戴列寧帽，足登馬克斯鞋，身穿史達林裝，手持白朗林槍，成群結隊，搖旗吶喊，張牙舞爪，天不怕，地不管，見東西就搶，碰著不順眼的人就殺。這不是人間地獄嗎？

我說共產黨是「衣冠禽獸」，完全是爲了正名，一點也不含有罵牠們的意思。你想：一大群穿衣服的傢伙，以搶奪自豪，以鬪爭爲天性，以殺人爲職務，不講群己權界，無價值觀念，無羞惡之心，無惻隱之念，無是非之分，無優美情操，只曉得肚子餓了要吃，性慾來了要解決。你說這還算是人麼？這不是衣冠禽獸又是什麼？

所以，今日世界底反共問題，根本就是人獸之爭。我們大家要反共，必須首先好好作個人。我們要作個人，就必須遵守或具備上述的人文條件。世界如其忽視這些條件而談反共，勢必以獸

鬪獸。以獸鬪獸，力大者勝。而《自由人》雜誌主張探入問題之底裡，並主張保持優良的文化遺產，不獨見解高人一等，而且是對症下藥，至足發人深省。

Raymond Moley在*Newsweek*上評論道：「《自由人》底偉大任務是反對一個新的正教。這個正教主張一切的善都是由國家而來。」這是反共的重要論據之一。

共產黨之騙人，是要一直騙到死的。思格斯輩一方面說「國家將要萎謝」。可是列寧卻說，雖然如此，「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底武器」。他們所給予人的國家理想是無政府主義；而他們所給予人的國家現實則是絕對極權統制。真是妙不可言！史達林則企圖締造世界最偉大的共產帝國。在這個帝國之內，「國家」保有一切財富，「國家」支配每個人底衣食住行，「國家」控制每個人底前途。總而言之，一切統制都在「國家」名義之下行之。

而這樣的「國家」在事實上又等於「我」。「我即國家」。路易十四底「朕即國家」於此得到新的翻版。此「我」代表一切。在這種「國家」之內，只有此「我」底目的，沒有個人底目的。只有此「我」底是非；絕對不容許有個人底是非。只有此「我」及其擁護者底利益，沒有個人底利益；不擁護的，甚至被剝奪其生存權。在此「我」籠罩或「領導」之下，未看見個人，只看見「全體」。在此「全體」之中，個人底一切皆不足道，皆不值得注意。個人底生命，宛如水上泡沫，旋起旋滅；宛如海邊沙粒，一任風吹浪汰。更遑論企業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

可憐啊！我真不明白，在這種「國家」裡，人活著是爲什麼的？人生底意義何在？人生底價值何在？人生底目的又何在？爲了「國家」嗎？所謂「國家」也者，又渺不可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所謂「國家」也者，又往往是那一個「我」。其氣焰之高，自負之甚，較之路易十四有過之而無不及。彼所予細民之現實，凡可見可聞可嘗者，乃事事干涉，樣樣鉗制，件件過問。細民胼手胝足，辛勞終日，難得一飽。千萬人流血流汗之成果，不過供其權利之資。彼對細民生命之態度，一若花匠之於園卉。生長不當其標準者，輒肆意剪而除之，毫無痛惜之意與夫憐憫之情。蓋凡此類之「我」，從未承認「人生而平等」者。

凡極權地區，都有這種性質的危厄。所不同者，惟輕重程度之別而已。所以，自來若干民主政治學者，視此「國家」爲可怕之物，多方設法防制此「國家」權力之膨脹。共產國家乃國家權力膨脹之極致。所以，如要反共，必須從根本上反對此國家乃萬善之源之謬說。國家如爲一文化單位，如爲一保養之源，當然可親可愛。但國家不可妨害個人自由發展，更不可爲「我」所操持，而應爲「衆我」所經營。

今日反共問題底根本關鍵之一，乃在空氣方面必須與共黨迥然不同。即是，反共力量必須是與共產集團異質的力量。舉個例說，假如有一地方毫無恐怖氣氛，根本不發生「有吏夜捉人」之事。住民神經因而健康，寧靜。在這種情形之下，住民如見報端刊載共黨昏夜捉人之事，必定引

爲驚駭，引起不安，因而引起對共黨忿恨之情。此則無形增加反共力量至大。反之，若某地「有吏夜捉人」之事亦數見不鮮，久而久之，住民即見報端刊載共黨昏夜捉人之事，彼等必反應平平。蓋神經受同樣多次之刺激，漸趨麻木，不覺稀奇矣。其他事理，可以類推。總而言之，你要治梅毒，你必須離開梅毒之源愈遠愈好。你要反共，你愈表現得與共黨在本質上有異才愈有力量。《自由人》雜誌，在這一方面，提供了異於共黨的最基本的原則。所以，它很值得我們評介給誠意從事反共制俄的志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目前之赤禍，根由已深，不是喝白開水可醫，不是吃片阿斯匹靈可好，也不是三天五天可癒。世界歷史發展到此劫數地步，任何抄近路的辦法不足以起此沉疴。反共既是世界問題。對於世界問題，必須放開眼界在世界裡去求新見。在這一方面，《自由人》雜誌是一種很可取的刊物。該刊雙周一出，年價美金五元，海外連同郵費六元。訂閱處：240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16, N. Y., U.S.A.

——原載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五卷十一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寫真

△中央日報▽近來做了三件有味的事：第一，舉辦圍棋比賽。這可以和緩流行的歇斯底里症(Hysteria)，而使一部分人回復到人的生活之餘光裡。第二，刊載潘煥昆先生翻譯的△暴政終將毀滅▽一文。潘先生翻譯的文字常是可讀的。其所以如此，乃因潘先生之選譯文字，常從人的觀點出發。第三，翻譯並印行《柯里亞》雜誌原載之△第三次世界大戰寫真▽。如果竹幕以外真有利於反共制俄的事端，那麼△中央日報▽之此舉，是值得別人自動稱道的一端。

關於這本文集，許多讀者諒已看過，而且已有許多人爲文介紹。評介者現在之所要提及的，將是另外的幾點。

這一部文集，照評介者看來，與其說是著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預測和描寫，不如說是著重於為未來新世界底建設畫一個輪廓。這個輪廓就是，在蘇俄集團底極權暴政被撲滅之後，如何自文化，政治，和經濟諸方面來重新建設自由世界。這樣一個輪廓底描繪，會給在極權統治之下困苦掙扎的人衆以美麗的憧憬和光明的遠景。當著美麗的憧憬和光明的遠景在人衆腦海中長期起伏而不被消滅時，遲早是可能轉化而為實際行動的。到了那一天，如果有外在力量打進極權地區，那麼裡應外合，就是與極權統治算總賬的日子了。

照評介者看來，此乃這本文集編印底深遠用意之所在。有人說：這本文集之出版乃《柯里亞》雜誌爲了廣事推銷而採用商業廣告心理所作出的「噱頭」。這種臆想，頗足令人心冷。咱們中國大多數的人，弄到山窮水盡，人生理想盡失，現在一舉一動都是爲了實際的和最現實的物質利益。因而動輒以這種心理來度量一切。共黨仁兄是以這種心理來度量人類行爲底最高權威，集大成者，以及理論化者。如果我們再事事都從這樣的心理習慣出發，那麼不獨在精神上是共黨底俘虜，而且中國便完全完賬了。美國固然重商，同時她又重理想。她幾十億幾十億地出錢援助世界各國，有出無進。如果像英國那樣「唯利是圖」，那麼美國那肯這樣幹？當然，如果說辦雜誌不想打開銷路，不想賺點錢，那也是唱高調。但是，如果所辦的內容有益於人類前途，切合時代的需要，因而銷路增加，得點正當的利潤，我想這應是大家所不反對的吧！

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寫的一篇《自由——終於來了》。在這篇文章裡，他論到共產主義何以毀滅。他說：「它不是政治運動。因為無論在思想上或力量上共產黨在蘇聯都沒有敵手。共產黨不會以任何計劃或哲學教導群眾，因為它的路線不停地改變，使人如墜五里霧中。昨天的真理，今天會被認為邪說。因之每一個信仰的基礎都被摧毀了。」又說：「在原始的社會裡，人們可以用對政府的效忠來代替政治思想。但在蘇聯，對政府效忠的基礎亦不存在。因為今天對政府效忠的人，明天可能招供是賣國賊，間諜，破壞分子或人民的敵人。」

柯斯特勒的話是由痛苦經驗裡產生的。共產主義是以「政治運動」開始的。可是，等到共產黨人奪取到政權以後，政治運動便遭撲滅，代之而起的是較之從前厲害千百倍的極權統治。在這種統治鞏固以後，自然「無論在思想上或力量上」都沒有敵手」。這種局面之造成，並非由於「革命成功」，並非由於人心悅服，而是由於藉陰謀，暴力，收買，與清除異己諸手段。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間的大清黨便是明證。這些手段，就鞏固權力而言，來得非常直截了當，容易造成表面的帖服。因此，這套俄製貨色，三十年來，外銷很是暢旺。

因為蒙在共產主義外衣之中的最後動因為權力欲，於是，權力是最後的目的。相對於這一目的而言，一切都是手段。在有必要時，爲了奪取並保持權力，任何事物和思想都可利用。在有妨害於權力之奪取與保持時，任何事物與信仰都可摧毀。就這樣，共產黨人發展了包天蓋地的極權

思想。實質地說來，與其說共產黨底上層人物崇拜唯物史觀，不如說他們堅持「權力史觀」。在權力史觀之下，一切從屬於權力。一切言行是依繞權力而「辯證」的。既然如此，自然「每一種信仰的基礎都被摧毀了。」所以，我們儘管看到這類人物拿各色各樣不變的招牌主義來愚弄並束縛人衆，可是招牌所代表的內容則隨他們因應實際政治而更換。他們這些爲權力而存在的人物，是不受這些招牌之絲毫拘束的；可是，其操縱之下的人衆如果稍稍作違背這些招牌的言行，那麼輕則遭放逐拘禁，重則被處死刑。於是，「它僅僅教其人民學會說一個字：『是！』蘇聯百分之九九點八的人們是行動一致的：對伊凡同志陞官說『是』，對於納粹結盟也說『是』；對於萬能的史達林所作的一切決定無不稱『是』……」在這類底極權空間，你只有跟著權力者說「是」才能自全。這種「是」的天下，才是一切極權統治者所要建立的極樂園世界！

在這篇文章裡，柯斯特勒又報導他在科立瑪地方遇見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遇見柏津其人。「雖然他絕口不談政治，但他們都說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凡與我交談過的過去之罪犯，很少是對政治有興趣的。在這方面，柏津並不例外。雖然說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或『托爾斯泰與克魯泡特金的信徒』，但他們大多數都承認對這些東西摸不清楚。假使一定要他們作一番說明，他們會猶豫地說：『國家是一切罪惡之源，也是人類的主要敵人；如果廢除國家，則大家都將和平相處有如兄弟。假使你要和他們爭辯，他們便會莫名其妙，而俯首無言。』顯然得很，這種念頭，

照許多人看來，在弱肉強食的現在，是不健全的。不過，我們必須明瞭這個念頭發生的背景。我們考察無政府主義發生的近代背景，便會發現在暴君專政的大陸地帶，是容易發生這種念頭的。反之，在民主暢行的海洋地區，這種念頭則很難發生。俄國在十九世紀末葉，無政府主義盛行。這顯然是沙皇底「賢明」統治的產品。然而，在英美民主國家，這種主義是不會發生作用的。這是一個顯明的對照。何以會有這種對照呢？在大陸性的暴君統治之下，大家必須低著頭走路，每一個人都被籠罩在密探底陰影之下，人身毫無保障，事事要管，樣樣過問。在這種慘苦的情形之下，大家只嘗到「政府」底苦味，一點也想不出它底好處何在。國際間的弱肉強食固然要不得，國內的弱肉強食就要得嗎？所以，在這種統治之下，無政府主義之產生，實在是很自然的事，它是暴政底天然產物。而在英美，政府之存在，並非強加於人民之頭，亦非藉「革命」由武力征伐所產生，而是由人民在不受任何威脅之下共同意願所產生的。這樣產生的政府，人民隨時可以批評，必要的時候可以更換。這樣的政府，縱然要作惡，也惡不到底。人民可以自由在地過人底生活。所以，人民不易產生無政府思想。由此可見，醫治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妙藥是民主政治。

尼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底作品是「自由思想與自由言論」。在這篇作品裡他提到「俄羅斯精神的探求」。這一節中有如下的對話：

「你覺得未來的希望如何？」我問安托諾夫。

「我已經開始希望！」他說：「正如你所說的，我們必須恢復俄國以往最優良的因素。但是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一個中心目的，這便是實現俄國有史以來的幾項基本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所有教育上的改革以及科學與文學的發展俱將以此數項自由為基礎。你還記得希伯來先知耶利米(Jeremiah)說的話吧？他說：『這裡正發生一件奇異而可怕的事情。先知們的預言都是假的……而我們的人民卻喜歡它如此。』有了思想言論和寫作上的自由，我們就可以排斥那假的預言家了。」

自由是民主底必要條件。講民主而反對自由，正猶之乎要光明而不要太陽。有之，其唯共黨及其同路人乎？未有真正講民主而反對自由者。這類底人口頭未嘗不講民主，但手上卻剝奪大家底真實自由。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是很顯然易明的。魔鬼最忌陽光。麻面太太們最不喜歡製造鏡子的人。極權統治除了靠暴力以外，還要靠撒謊。撒謊常以抵賴或預言的行式出現。如果有言論自由，這些謊言豈不立被拆穿，所以，在極權世界，最受壓迫的是言論自由。結果，在這類地區，謊言流行，正聲微茫。

在「蘇維埃政權的教育」一節中，尼文斯藉著一位報紙主編人底口氣說：「共產主義的一切都是虛偽和撒謊。我們可以列舉幾樁事實。你應當記得保證人民各項自由的史達林憲法是在一九三六年制定的，但那一年也正是蘇聯進行殘酷清除運動的時候。你也應當記得那個假國會——最

高蘇維埃會議。史達林憲法把最高的權力賦予給它，但它實際上祇是一個傀儡。……蘇維埃的教育也是如此，表面民主，實際都是一套謊言，其作用祇在支持獨裁政體。……」這是必需的作法，否則極權統治不能存續。在極權者底權力意志之前，舉凡政府，黨派，和他底勢力所及之處的一切，無一不是延續其權力火焰的柴薪。多加一塊柴，便可多燒一秒鐘。多燒一秒鐘，便可多得一點尼羅王式的快慰。在極權統治者心目中，一切皆是權力底手段，工具，或傀儡。除了權力以外，沒有任何思想或事物對於他是真的，因而也就不是他所真正堅持的。這本不足為奇，足奇的是，古往今來，那些人怎麼跟著跑得那樣起勁？

尼文斯又接著說：「蘇維埃的教育也是如此，表面民主，實際都是一套謊言，其作用祇在支持獨裁政體。……列寧曾說過：『學說離開了生活與政治，就是欺騙和偽善。』然而以後列寧的政策卻使學校充滿了欺騙與偽善。史達林也曾經對威爾斯說過：『教育是一種武器：它的效用胥視它受何人所控制與它的對象是什麼人。』史達林摧毀學校的行動，比列寧還要進一步，尤其是一九四六年共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那些有關思想行動的歷史性決議案以後為然。」

「那時候甚至在幼稚園裡，教員們也利用遊戲與標語來訓練一些小天使，使他們羨慕紅軍，忠於共黨，而崇拜列寧——所謂『聖中之聖』——與史達林的畫像。從第一學年到第十學年（按蘇聯的小學與中學教育是十年制，與英美的十二年制有異）的少年學生，其所受的教育是生活必

須符合共產主義的形式。……」

既然極權統治者視一切為權力之工具，當然不會放過教育。因為，抓住了少年和青年，便是抓住了以後的幾代。這樣，他們便可造成「萬世一系」的局面。所以，凡屬極權統治橫行的地方，政治鬭爭，或黨化教育，一定滲入學校。純潔青年的純潔心地，不是被灌輸一些無聊無味的說素，便是被注入毒惡鬭爭的教條。爲了延續其極權統治，彼等不惜斷喪下一代底心靈，薰染少年底頭腦，戕賊人類純良的天性。禍延後代，了無已時。極權統治底毒惡，遠勝於洪水猛獸。

「極權統治所造成的這些心理惡毒，唯有自由世界拿自由教育來洗刷。在自由教育之下，每個人爲受教育而受教育，爲文學而文學，爲藝術而藝術，爲科學而科學，爲興趣而研究。我深知此說爲共黨及全體主義者所深惡痛絕。彼等百餘年來打擊此說不遺餘力。因爲他們要求一切爲政治權力而存在，他們要把一切納於政治權力之下，而從各方面以支持此政治權力。但是，唯有這樣的自由教育才能健全地發展人性。唯有人性得以健全發展，世界才能太平。」

△中央日報▽底譯印本，除了正文以外，又有一種很好的副產物。這就是關於本文集的序文或讀後其中有三篇是很優秀的文字。茲爲篇幅和本評介底性質所限，評介者只舉出戴杜衡先生底作品一談。

戴杜衡先生所寫的一篇是關於△一個新俄羅斯自瓦礫中誕生▽的讀後。在這篇文章裡，戴先

生特別提出原作者蔡思(Stuart Chase)關於「教條與智慧」的一節。蔡思說：

「我們列舉出克里姆林宮以前的主人們的所有的錯誤假設，以開始我們的預卜。這是一張很長的表，下面是它的一部分。他們認為：

整個經濟可以詳細加以計畫。計畫不會隨計畫者的消逝而消逝。

消滅私人利潤，乃可終止工人的剝削。

沒有工人參與的獨裁式工廠經理方法是最好的。(若干美國的大公司，在勞資關係上比國家托辣斯要進步得多。)

奴隸勞工比自由勞工較有效率。

領袖們和人民的溝通是可以無限期地操縱下去的。

『大謊言』永遠可以獲得報償。

不提及個人目的的宣傳，是有效的。

每一人類社會主要是以恐懼來維持團結的。

思想控制，對於二億一千二百萬人是一項行得通的辦法。

領袖們是可以信賴的，其權力可以不受牽制。

這九大條原則，值得東方世界底人民再讀千遍萬遍；值得寫在街頭巷尾，觸目驚心。目前的

世界，關於極權的煙幕頗多，令人眼花撩亂，頭緒不清。誰是共黨與極權者，很不容易劃分清楚。好了！蔡思在這幾條裡給予我們刻畫出一個簡明的輪廓。凡合乎上述九條的，便是共黨與極權者。否則不是。這九大條原則簡直是一個尺度。憑著這個尺度，我們不難將共黨與極權者和非共產極權者測度出來。」

關於這九大原則，戴先生有很精審和深刻的分析。這值得每個在下意識裡為個人利害或黨派利害而打算的人熟讀千百遍：

「我相信，有許多人讀到這些概括中的若干條，一定會感覺毛髮悚然。即令在十年以後，也仍然有很多人讀到了會感覺毛髮悚然。這位蔡思先生竟把經濟之全面計畫與私人利潤之消滅視為重大的錯誤觀念了。許多人都將在沉思一會之後或竟不假思索的發出這樣的批評：『這完完全是美國人的想法！』好像除了美國人之外，無論是中國人，英國人，或俄國人（未來的），都不應該如此想法似的。計劃也可以反對，利潤也值得擁護嗎？……」

「根本上，這是一個經濟集權與經濟民主的問題。前者相信少數人的智慧高於多數人；全面計畫必然是少數人決策而多數人奉行。後者，則相信人類進步依仗個人創發(Personal initiative)者多而依仗國家政令者少，所以不得不為此間的自由企業留下地步，初非特別有愛於資本階級及其所熱衷追求的利潤。我們難道不看見許多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都一面聽任私人作各種企業活

動，而另一方面卻以種種累進捐稅限制其過分利潤嗎？過去，所謂資本主義國家保障的是利潤；現在，它保障的已不是利潤，而是進步與自由。」

請讀者留意在此最後一句話「過去，所謂資本主義國家保障的是利潤；現在，它保障的已不是利潤，而是進步與自由。」這實在是真知灼見。許多人號稱反共，實則滿腦袋盡是共黨思想。尤其是關於經濟問題的想法，他們更是深受共黨宣傳以致接受共黨說法而不自知。所謂消滅私人利潤，便是其中之一。俗話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這話底解釋應該是：「如果誰說自己是不自私自利的，便是說假話。如果說假話，便應遭天誅地滅。」由此可見，從來的人都承認人是自利的。自利是人底本性。自利並不一定就是壞事。自利只在發展到妨害他人底利益時才是壞事。憑著政治力量將大家藉以謀生的資源和生產機構控制在手裡，使大家在經濟上不能自由發展，這是壞事之尤。私人利潤，是個人創導精神底一大動力。如果消滅私人利潤，那麼個人創導能力勢必盡失。在這樣的地區，個人如不加入統治階層便變成待哺之鴨。在這種情勢支配之下的國家或社會，勢必逐漸分化成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這樣的國家或社會一定變得死氣沉沉，毫無生機。死氣沉沉的國家或社會，一定會向後倒退。這樣不健康的國家和社會是沒有理由可以長久存續的。遑論他國。

許多人一談起「計畫」二字，便理直氣壯，彷彿說，我談「計畫」，是「為來世開太平」，「為

大眾謀出路」。理由這樣正大，動機如此純正，怎麼可以反對？反對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可是，我奉勸這樣的人冷靜一點。我在他思想中發現了共黨三十年來宣傳底成績。別的暫且不提，我且請教：您憑什麼資格替千千萬萬人底生活計畫，人生而是平等的。在太陽底下，沒有任何人高於任何人。上帝又沒有給你一張文憑，證明你在人群中的地位，像蟻王在蟻群中的地位，是應該管理人群，代人群「計劃」的。民主底實際，就是各人管各人底事。政府管得事越少越好，因此，大家沒有「拜託」你的事，你還是少「操心」的好。至於將來的事，更是渺不可測，無庸「深謀遠慮」。如果閣下嫌整天開會應酬尚不足以消磨永晝，那應奉勸閣下不妨多乘汽車兜風好了！

所謂「計畫」，無論披上多麼美麗的外衣，無論基於任何熱情的好心腸，好動機，而在實質上，它是統治方式底現代化。在實行「計畫」時，知識不夠，動機不良，經驗不足，這些毛病所形成的惡果可不必置論。即使沒有這些毛病，實行「計畫」底結果，久而久之，一定是通過全面的控制與事事的干涉，使計畫者與執行者對人衆居於極權地位。根據現代經營制度(Managerial System)看來，經濟的所有權幾成空洞名詞，而經濟的實權則操在非資本家的管理者手中。依此，可知一行全面計畫，勢必使計畫者與執行者底權力日益強大，而人衆則各別地降為工奴、農奴、商奴、文奴。這樣的社會，不復是人底社會；而是螞蟻社會，蜜蜂社會。結果，一個新的奴隸社會通過「計畫」而形成，民主自由也許只有在字典中去尋找了。

對抗共黨更需要這一套。在原則上，戴先生說得很明白：「其實，對抗共產主義的觀念並不困難。民主自由的觀念也是一連串的。雖沒有共產主義那樣的放縱性，而應用時也比較可以靈活變化。但祇要不過於割裂，就儘可以成爲對抗共產主義的有力武器。我所謂不要過於割裂，是這樣的意思：你不要在這件事上主張民主而在另一件事上主張集權。更明白一點說吧！你不要在政治上主張民主而在經濟上主張集權，就好。我（不是美國人）不相信經濟集權與政治民主可以配合得各不相犯。縱令勉強把二者牽合在一起，也祇能是暫時的，到最後，不是這個把那個打垮，便是那個把這個拖倒。英國的民主政治終於推翻了工黨政府，卽爲一實例。」

說民主對付不了共黨暴亂，並且常常擺出替民主國家擔憂的樣子，這不是由於未知民主爲何事，便是對於民主厭惡與懼怕之流露。如果這些念頭是不背理的，那麼英國應該是第一個被共黨搞垮的國家，美國應該是第二個了。在事實上是：「極端引起極端」。共黨成功的地區，無論是俄國或東方，都是有一種極端勢力存在的地區。民主政治，借用老的口氣來說，就是講「中和之道」的政治。這種政治，行起來不大能過癮，更不合於偏激的性格，但卻能消彌禍亂於無形。所以，馬克斯底共產主義雖是在倫敦搞出來的，但是英國人卻最有辦法對付它。不過，民主卻不可零折。雖然民主制度底彈性較大，可是它從政治哲學，經濟思想，以至於生活方式，是一整套的。如果你胡亂零折一氣，因而抵不了共黨時，那只怪你不瞭解民主，不能怪民主之無靈了。政治民主與

經濟自由底關聯就是整套而不可分的關聯。經濟自由是政治民主底必要條件。這就是說，如果經濟不自由，政治便不會民主。經濟自由是政治民主底物質基礎。如果經濟不自由，則所謂的政治民主，一定是空泛的，不能持久的。所以，凡是有誠意實現政治民主的人，必須鼓勵經濟自由。

然而，現在凡屬手裡抓著一點東西的人是絕不肯鬆手的。他們爲了維護手裡這點殘渣，當然要找許多理由。這些理由，千言萬語，不是以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教條爲依據，便是說「這是爲大家的好處」。這樣緊抓不放，是否「爲大家的好處」，此時不必深究。但是，當著什麼事物都「統籌，統辦，統購，統銷」，把「這樣或那樣收歸國有」的時候，從一時的表面看來，的確因透過經濟統治而增加了不少統治力量。所以，經濟統治問題，在某些地方，歸根究柢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利害之問題。這類底問題，證諸近半個世紀的經驗，似乎就不能僅靠語言與真理來了結。在「利害」決定一切的現今，那是非問題，公利問題，應然問題，道德問題，只好退而存諸殘冬嚴寒之野了。

這本文集，有莊嚴的文章，也有輕鬆的作品。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是莊嚴的文章裡的若干重要論點。輕鬆的文字，有〈費城恨〉和〈莫斯科奧林匹克〉等篇。小姐們也許喜讀〈費城恨〉，我卻還喜歡〈莫斯科奧林匹克〉。可是，無論是莊嚴的文章也好，輕鬆的文章也好；無論是〈費城恨〉也好，〈莫斯科奧林匹克〉也好，它們所要表現或描繪的都是一貫的情感和理念。評介者希望聰明

的讀者，能夠從那些理論的分析，尤其是好玩有趣的事物裡，體味出它們所要表現或描繪的情感和理念。如果這樣，你是更上一層樓，你將不是一個散漫的讀者。

這本文集所表現或描繪的，評介者已經在前面說過，是未來自由世界底一個輪廓。自由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你會從這本文集裡得到一些想像。

在一種不易名言的社會裡，你想苟活，便要時常辦那些毫無意義動輒得咎，麻煩死人的手續；人與人之間時常互存戒心，必須「話到口頭留半句」；必須說不好的東西好；背頌言不成理的陳腔爛調；大家相牽在一種幌子之下，奔競權勢；講氣節者被看作是傻子；談理想將被人笑話；只知道努力而不屑蟻附者一定歸於反汰淘；好人像冰箱裡的凍蝦，而蜉蝣蟻蝨則滿天飛；沒有群己權界之分；沒有個人尊嚴，沒有價值觀念；優美的情操被視作奢侈品。……這樣的社會，實在不易名狀；但是否可稱爲「人的社會」，就很值得懷疑。

而從這本文集裡，你可想像到在自由世界裡，你會得到充分的友愛，溫情，協助，和諒解。人與人之間，坦白相處，放心談天；寫起文章來，心裡怎麼想，手裡就怎麼寫，用不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居處行路，沒有誰想到會成問題；只要你肯努力，你真有才幹，你將會因之而出頭，大家也會承認你底成就——沒有誰壓得住你，也不靠誰依「政治觀點」來「提拔」你；你自己勞力勞心吃自己底飯，有多的存起來防老；在那個社會裡，大家不會因你官做得大而表面

恭維你，不會因你有權有勢而趨附你，你只有靠著真實的學問、人品，和為大家謀得福利，才會受到敬愛……。這樣的社會便是「人的社會」。

朋友！你在這陰霾的苦難裡，不希望這樣的社會實現嗎？如果希望的話，你不妨在空閒的時候，把這本文集細細品味一下，然後再沉思一陣。你將會像在沙漠中作長途旅行的孤客，看見遠遠天邊的一個綠洲！

——原載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六卷一期

附記：本書為〈中央日報〉譯印。

雅舍小品

古人說：「開卷有益」。這話大概已失時效了（古人之言，大抵如此）。如果黑字印在白紙上而且訂成本子者就是「書」，那麼筆者有時為買牙刷肥皂之類而上大街時，偶爾順便將書店那些花綠綠的貨色順手翻翻，便覺眼花撩亂，頭昏腦脹。人是可以接受經驗教訓的動物——雖然並非凡人皆係如此，上當次數太多，以後便不敢再去問津。不料前些時有一位朋友居然特地買一本書相贈，叫做《雅舍小品》。厚情難卻。翻開一看，脫口而出：「此乃書也」！書，在此時此地，是多麼不容易得的東西。筆者展讀這本小品，如遇故人，如吃冰淇淋，其樂陶陶，其味津津，靈魂舒怡之至。如果一個人獨食美味而不分享大家，大家一定咒罵此人太自私自利。同樣，如果獨閱好

書而不介紹給大家，在這心靈快要乾枯了的歲月，也未免太冷酷了。

打開書一看，裡面有〈雅舍〉、〈孩子〉、〈音樂〉、〈信〉、〈女人〉、〈男人〉、〈洋罪〉、〈謙讓〉、〈衣裳〉、〈結婚典禮〉、〈病〉、〈匿名信〉，……等等篇。我們且進一步把這些吉光片羽隨意揀點出來端詳一番。

在開頭的〈雅舍〉篇裡，如果你自己也有靈魂——這在時下是稀世的珍品，那麼，你將會知道，作者之所謂「雅舍」，從物質的觀點看，實在只是一個「陋室」；然而，在這間陋室裡，卻居著一個充滿了靈性和具有風格的人。這，正猶之乎在高樓大廈裡居的必常是靈性缺少的人一樣。作者說：「縱然不能蔽風雨，『雅舍』還是自有它的個性。有個性就可愛。」個性，在這年頭，於東方世界裡，正像金剛石一般地是昂貴的奢侈品。我們在必經之路上所看見的，往往是穿一模一式的衣服，走一模一式的方步，說一模一式的話的人物。這時，我們便發生「個性」踏破鐵靴無處覓之感。這年頭，有些好整齊劃一的人，有計劃地消滅人底個性，把人變成磚窯裡燒的磚一樣，塊塊整齊劃一，合乎尺寸標準，方才稱心如意。而作者偏說：「有個性就可愛」，真是空谷之音。

「個性」是靈魂底一表現。「人為萬物之靈」，就是靠了這一點靈氣。個性消失了，人人像磚石一樣標準化，「人」就不見了。

雅室底主人，我覺得充滿人味。讀其文，如入其室，人味盎然。他說：「我有一几一椅一榻，

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雅舍』所有，毫無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佈置俱不從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這個「我亦不復他求」的心境和精神是作人，尤其是作個讀書人，最須具備的條件。許多人就是「他求」的太多，以致墜入鬧市。一墜入鬧市，滿身便是塵埃，這時，「我」這個物件——身體——所有的東西似乎增多，但我這個「人」所有的東西卻減少了。

雅舍主人又有「收藏信件癖好」。但他收藏信件是有條件的，其中之一是「多年好友，誤入仕途，使用書記代筆者，不收。」「入仕途」，是否算得「誤」，我且不管。我感興趣的是，雅舍主人，連收藏信件，也表現個性。他要收藏的是「真」。那些「入仕途」的先生們，一天忙到晚，所要應付的人情又太多。他一個人底情感則又並非無限，如是寫信只有委諸職業寫信專家。水攪的太多了，酒味兒聞不到，留之何益？此事推而廣之，街上那些頒賜、旌令、扁額、獎狀，何曾不是「使用書記代筆」的貨色？何嘗有點酒香？而頒者自頒，受者自受。毫無真實內容，然而，真實的內容固屬無有，對於壯壯市容確有功用。當今之世，大概就是霓紅燈世紀。以其具有點工具價值 (Instrumental value) 也。

該作者不獨喜歡有條件地收藏信件，而且還留意信上稱呼。他說：「信裡面的稱呼是最足以見人情世態。有一位業教授的朋友告訴我，常接到許多信件，開端如果是『夫子大人函丈』或『×老師鈞鑒』，寫信者必定剛剛畢業或失業的學生，甚而至於並不是同時同院系的學生，其內容泰半

是請求提攜的意思。如果機緣湊巧，真個提攜了他，以後他來信時便改稱『××先生』了。若是機緣再湊巧，再加上銓敘合格，連米貼算在一起足夠有兩個教授的薪水，他寫起信來便乾乾脆脆的稱兄道弟了！我的朋友言下不勝歎歎。其實是他所見不廣。師生關係，原屬僱傭性質，焉能不受階級升黜的影響？」

作者之所言，如果推廣及於其他事例，的確「最足以見人情世態」。但他那位令友不獨「所見不廣」，而且無乃太迂。當今之世，「師」不成師，「弟子」不成弟子，大都是混來混去——這不用說。那位朋友還是沒有弄清楚內存價值(intrinsic value)與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之別。在從前，爲人師表者，固然也少不了拿束脩，但卻具有內存價值。如今既是霓紅燈世紀，爲人師表者只有工具價值，既然如此，你底工具價值如果天天貶值，而他底工具價值如果天天高漲，則二者之對應關係自應「調整」。明乎此理，也就可以了然：爲什麼銀行學徒底薪水比教師高，爲什麼香港國際攝影公司底招待月薪等於十四個文學系主任底之總和，爲什麼「十年寒窗不及兩月訓練，兩月訓練不及搖身一變」，……以其「工具價值」高也！

作者於〈女人〉和〈男人〉篇中，暢論女人和男人底種種特點，令人捧腹。他說：「男人多半自私。他的人生觀中有一基本認識，卽宇宙一切均是爲了他的舒適安排下來的。……他的家便是他的國度，他在家裡稱王。……他不高興時，他看著誰都不順眼，在外面受了悶氣回到家裡來

加倍的發作。他不知道女人的苦處。女人對於他的慇懃委曲，在他看來，就如同犬守夜雞司晨一樣的稀鬆平常，都是自然現象。他說他愛女人，其實他不是愛，他是享受女人。……」妙哉斯言！

常有西洋人說，東方容易出現專制或獨裁政治。筆者覺得這種說法，簡直不太明瞭別人底「國情」。東方之所以容易出現這些現象，是源遠流長的。東方的家庭，特別是舊式家庭，簡直是專制獨裁養成所。東方家庭裡的「宗法」有何好處，筆者不敢妄置一詞。筆者所可斷言的，就是東方古老家庭裡最發生作用的基本觀念是 *paternalism*。這一 *paternalism* 就是專制獨裁的靈魂。在東方的舊家庭裡丈夫是一家之「主」，唯「我」獨尊，一切對外大權，經濟利益，以及教導兒女之事悉操其握。彼在一家之中，大有「萬物皆備於我」之慨。妻子兒女對之唯有屈服於其權威之下，不敢稍有違抗。妻子如不合其尊意，可以「休」之。「七出」之條例加身，為妻者便倒霉矣。兒女如不合其尊意，輕則呵斥，重則捶擊，隨意為之。如此代代相傳，世世不絕，在這種優良傳統培養之下的人，一旦得機手握大權，那得不專制極權？照筆者看來，東方如欲實行民主，必須根本改革家庭和兒童教育開始。如欲做到這一步，必須一家之主「克己服禮」，放棄他那 *paternalism*。這恐怕要期望於半個世紀以後！

作者在〈洋罪〉一篇中，諷示東方人表面學習西俗而失其真義風趣，有時不獨「窒礙難行」而且易生弊端。論及東方人之模倣西人過「愚人節」，作者說：「四月一日為萬愚節，西人相給以

爲樂，其是否爲陋俗，我們管不著。其是否把終身大事也劃在相給的範圍之內，我們亦不得知，我只覺得這種風俗習慣，在我們這國度裡，似嫌不合國情。我覺得我們幾乎是天天在過萬愚節。舞文弄墨之輩，專做欺人之談，且按下不表，單說市井習見之事，即可見我們平日頗不缺乏相給之樂。有些店舖高高懸起「言無二價」，「童叟無欺」的招牌，這就是反映著一般的誑價欺騙的現象。凡是約期取件的商店，如成衣店、洗衣店、照像館之類，因爽約而使我們徒勞往返的事是很平常的。然對外國人則不然，與外國人約甚少爽約之事。我想這原因大概就是外國人只有在四月一日那一天才肯以相給爲樂，而在我們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隨便那一天都無妨定爲萬愚節。」誠哉斯言！東方人在市井之中，確是如此。地攤就常是謊言廣播處，你如稍不小心，聽信其宣傳而買了他底貨色，拿回家仔細一看往往大呼上當。街頭賣藝、走方郎中、看相算命，無一不是藉撒謊愚人以賺錢。其實這何足怪？在東方，「管理衆人之事」與撒謊愚人之事結不解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有明訓。搞政治組織，必做「宣傳」。「宣傳」者，公開說謊之謂也。戈培爾(Goebbels)並曾以善給人自豪，史達林老前輩更不用說。大量印刷花綠紙張以換取大家的金飾銀元，固一大謊也。今天說得如何如何肯定，明天則不是那回事。昨天說怎樣怎樣，今天看勢頭不對連忙否認。明明在劇場中失意，充不好一個丑角，卻說「養荷」。諸如此類，種種等等，不一而足。大家已司空見慣，不以爲奇了。「管理衆人之事」者「帶頭」撒謊，則普天之下，莫非謊言。

謊言成爲空氣，時時呼吸，不可須臾離。天下相率撒謊。久謊成眞，視爲固常。若有人突說眞話，自然反被目爲假話，語言本係一個社群藉以交通意念並活動的工具。語言底這種效用是其正面的效用。但是，在假言流行的社會，語言被濫用(abuse)到這種地步，其正面的效用盡失。到了這種時際，這樣的社會實在已經走到了它自己底盡頭。只有再出一個倉頡，才能幫著把它從耗竭的邊緣救活過來。

〈第六倫〉那篇是論「主僕關係」的。其中有至理存焉！且錄評介者最欣賞的那一段：「駕馭僕人之道，是有祕訣的，那就是，把他當做人，這樣一來，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我們也就不苛責於他。容易犯的毛病，我們也可以曲宥。陶淵明介紹一個僕人給他兒子，寫信囑咐他說：『彼亦人子也，可善視之』，這真是一大發明！J. M. Barrie爵士在『可敬愛的克來頓』那一齣戲裡所描寫的，也可使人恍然於主僕一倫的精義。主僕二人漂海遇險，在一荒島上過活，起初主人不能忘記他是主人，但是主人架子不能搭得太久，因爲僕人是唯一能砍柴打獵的人，他是生產者，他漸漸變成了主人，他發號施令，而主人漸漸成爲一助手，一個奴僕了。這變遷很自然，環境逼他們如此。後來遇救回返到『文明世界』，那僕人又侷促不安起來；又自甘情願的回到僕人的位置，那主人有所憑藉，又回到主人的位置了。這齣戲告訴我們，主僕的關係，不是天生成的。離開了『文明世界』，主僕的位置可能交換。我們固不必主張反抗文明，但是我們如果讓一些主人明白，

他不是天生成的主人，講到真實本領他也許比他的僕人矮一大截，這對於改善主僕一倫，也未始沒有助益哩！」

J. M. Bartie是蘇格蘭作家。我想，他大概未曾到過東方觀光。如果他到過的話，那麼他底這一齣戲裡的主僕之位，也許剛好要倒過頭來。在東方，幾千年來的主僕之位一向是顛倒的；僕人長佔主人之位；而主人則常住僕人之位，所謂在「倒懸」之中是也。這些僕人們於霸佔主位之時，又自稱是「天」底兒子。「天」底太是誰，又如何生兒子，筆者無法考證，且不去管。偏偏那位二先生則自告奮勇，為那些自稱為天底兒子者說個道理出來，於是那些「天底兒子」理直氣壯，一直高踞主位幾千年之久。二先生之功誠不可沒也！

在這一「倒懸」局面之下，主人之對待僕人，真是客氣已極，從來就不敢對僕人正視一眼，而且確是「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我們也就不苛責於他。凡是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們也可以加以曲宥」。可惜，僕人對於主人似乎太不客氣。他們對於主人，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事，往往苛責於主人；凡是人所容易犯的毛病，僕人一定不加曲宥。稍不順意，便空起屋子恭請主人光臨，或請其長期入山休息。久而久之，代代相傳，積非成是，以致養成一種本末倒置的觀念：僕人就是主人，主人就是僕人，凡有好事，皆此主人之所為，必歌而頌之；凡有不是，皆此「僕人」之所為，必膺而懲之。真主人必須以假主人之是非為是非；真主人必須以假主人之利害為利害。這就

是太陽從西邊出囉！

〈握手〉篇也滿有趣，第三段說「西裝革履我們都可以忍受，簡便易行而且惠而不費的握手我們當然無需反對。不過有幾種人，若和他握手，會感覺痛苦。第一是做大官或自以為做大官者，那隻手不好握。他常常挺著胸膛，伸出一隻巨掌，兩眼望青天，等你趁上去握的時候，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著，他並不握，他等你來握。你事前不知道他是如此愛惜氣力，所以不免要熱心的迎上去握。結果是孤掌難鳴，冷涇涇的討一場沒趣。而且你還要及早罷手，趕快撒手，因為這時候他的身體已轉向另一個人去，他預備把那巨靈之掌給另一個人去握——不是握，是摸。對付這樣的人只有一個辦法，你也伸出一隻巨靈之掌，你也別握，和他作『打花巴掌』狀，看誰先握誰！」

如果作者確曾因「事前不知道他是如此愛惜氣力」，而結果「冷涇涇的討一場沒趣」，那真是活該！只怪他不明世故，不洞悉當今那些人物底心理狀態，更未精明地意識到流行於那些人物之間的Zeitgeist。俗語說：「出門觀天色，進門看顏色」。世有許多書生，戴副近視眼鏡，既不善仰觀天色，又不曾俯察人情，結果「討一場沒趣」，真是咎由自取！

億兆善男信女，在大教皇脚下圍繞。能一吻教皇芳足，該是何等榮幸！如果信仰西藏的什麼教者，得緣給活佛一摸其頭，頓時身輕如燕。依此原理而論，那些「做大官或自以為做大官者」伸其巨靈之掌給你一摸，已經民主化多多矣！你何應多求？至若該作者所擬「對付這樣的人」的

「一個辦法」，「你也伸出一隻巨靈之掌，你也別握，和他作『打花巴掌』狀，看誰先握誰！」這種辦法，評者尤期期以爲不可。蓋如此一來，則有「分庭抗禮」之嫌頗不合乎「時代要求」也！

走筆至此，評者報告一個類似的情形。遠在二年以前，評者以看熱鬧的心情應某「要人」之約赴某會。席間另一大員瞥見評者，對評者作「垂詢」狀。我看他問的一些問題並不太不正經，於是本乎平日讀書與思考的習慣，對於其所提問題，則先推敲字句，繼則分析論點，然後試以謹嚴之語句爲之作答。豈料筆者正在如此認真對應之際，該「要人」之精神始而若存若亡，繼而對於所言若聽若離，終而彼則掉首他向，「王顧左右而言他」尋附近另一人作「寒暄」矣！筆者睹狀，心中大呼「上當」，又白白彈了一次琴。然而，細心一想，這也是咎由自取。其故在「不識時務」。當今之「時務」，凡人說話，只動口不動心，只用嘴舌不用腦筋。明乎此理，保險可以「百事大吉」！

〈臉譜〉一篇，我很愛讀。文中說：「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那意思承認人面不同是不成問題的。我們不能不嘆服人類創造者的技巧的神奇，差不多的五官七竅，但是部位配合，變化無窮，比七巧板複雜多了。對於什麼事都講究『統一』『標準化』的人，看見人的臉如此複雜離奇，恐怕也無法訓練改造，只好由它自然發展罷？假使每一個人的臉都像是一個模子裡翻出來的，一律的濃眉大眼，一律的虎額龍隼，在排起隊來檢閱的時候固然甚爲壯觀整齊，但不便之處必定太多，那是不可想像的。」

此處所謂「不便之處必定太多」，例如，如有一人犯法，負有特殊任務者不便認辨出來加以逮捕等等。但好處畢竟多於害處。如果人底臉譜完全一樣，戀愛之事一定自然取消，此點正合史達林與共黨輩底要求。共黨根本否認人應有優美情操。他們認為那不過是「資產階級底閒情逸緻」。在他們看來，男女之間的事，不過交配傳種而已。所謂「戀愛」，充其量只是「革命」工作底一部分：在「革命」尚未成功時，藉女色以勾引「男同志」。如果「革命」成功，像俄國內部底情形一樣，根本用不到這一套，反正男女關係既是止於交配傳種，於是相貌全同，正好便於隨時隨地隨人而解決之。省得各人各相，生出許多因「個別差異」而惹出的麻煩。豈不大妙？

依我看來，俄國底科學如果將來發達，那麼傳種之事，可以在工廠中辦理。果爾，則不獨男女「戀愛」可以取消，且交配之事亦可下令停止。由史達林老仁兄通令男女女人等一律割去性腺，則個個長得精壯如閩牛，「工作效率」豈不大增？

據說俄國那位「社會主義」的大生物學家，李森科兄，在生物學界有一空前的「革命」貢獻，就是使後得性可以遺傳。李仁兄既然有此巧奪天工之大神通，那麼這事不久諒可實現！

該作者又說：「不要以為一個人只有一張臉。女人不必說，常常『上帝給她一張臉，她自己另造一張臉』。不塗脂粉的男人的臉，也有『捲簾』一格，外面擺著一副面孔，在適當的時候呱呱一聲如簾子一般捲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誤入仕途的人往往養成這一套本領。對下司道貌岸

然，或是面部無表情像一張白紙似的，使你無從觀色，莫測高深，或是面皮繃得像一張皮鼓，臉拉得驢般長，使你在她面前覺得矮好幾尺！但是他一旦見到上司，驢臉得立刻縮短，再往癩裡一縮，馬上變成柿餅臉，堆下笑容，直線條全變成曲線條，如果見到更高的上司，連笑容都凝結得堆不下來，未開言嘴唇要抖上好大一陣，臉上作出十足的誠惶誠恐之狀。簾子臉是傲下媚上的主要工具，對於某種人是少不得的。」又說：「最令人不快的是一些本來吃得飽，睡得著，紅光滿面的臉，偏偏帶著一股肅殺之氣，冷森森地拒人千里之外，看你的時候眼皮都不抬，嘴撇得瓢兒似的，冷不防抬起眼皮給你一個白眼，黑眼珠不知翻到那裡去了，脖子發硬，腦殼朝天，眉頭皺出好幾道熨斗都熨不平的深溝——這樣的神情最容易在官辦的業務機關的櫃檯後面出現。遇見這樣的人，我就覺得惶惑：這個人是不是昨天賭了一夜以致睡眠不足，或是接連著腹瀉了三天，或是新近遭遇了什麼閔凶，否則何以乖戾至此，連一張臉的常態都不能維持了呢。」

梁先生對於東方某種「人上人」底「臉譜學」之研究，可謂升堂，想來必定「見習」不少時日。然而，書生梁先生究有未逮之處，容評者代為補充。需知這一干「人上人」底臉譜之所以如上云云，乃職業性的，乃「業務」之所必需。不觀夫唱京戲乎？唱京戲之丑脚，常需開大花臉。今「人上人」之有上述臉譜，其為職業上之必要正同。該等「人上人」之具備此種職業者，可以致富、可以立功、可以諂上、可以驕下，……妙用無窮焉！這等「人上人」雖「望之儼然」，但並

不「及之也溫」。此等人物，是否具有真才實學，不得而知；但爲人方面，多半總有些許毛病，常有不可告人之隱。彼等若以真面目出現，若與「下屬」相忘於無形，何以御衆？何以維持「尊嚴」？英國人說：「誠實是最好的政策」。流行於此等人物之間的「心照不宣」之「哲學」，乃「保持距離乃最佳之政策」。保持距離之道何由？曰：臉譜是也！這種人若與「下屬」接談，或者你有所求於他，他底那一幅臉譜便拉下了：面若冰霜，兩眼下垂，自視其鼻（據說莫索里尼有此貴相），口嘴緊閉，而鼻孔則不斷出氣：「嗯哼，嗯哼，嗯哼，……」

如果有人官場底訓練缺乏，人性尚未失盡，看不慣這一幅尊容，那麼我勸他此時此日，清貧自守，深居簡出；萬一坐在家裡氣悶，不妨逗逗三歲以內的小朋友，培養一點天真，保留一點人的元氣；或則在田野散步，看天際白雲舒捲，凝視遠山平巒。萬一你因生活上的必要而不能避免與這類仁兄照面，那麼我奉勸他心理上設一道衛生防線（sanitary cordon），以欣賞動物園中貓頭鷹的心情來欣賞其面部底各種變化。（貓頭鷹底面部頗富表情）你切勿動火，更切勿畏怯。如一動火，或示畏怯，則正墮其術中矣！切戒！切戒！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靜觀他將各種面部表情表演完畢之後，你再同他接談所要談的事情好了！

後面還有許多妙文，我不用再「續紹」了。我喜歡這本小品。從這本小品裡，你可以看到作者底風格，你可以看到一個人的靈魂在顫動、在閃耀，你可以聽到一個人的靈魂在輕輕呼喚。朋

友！你可知道，我們目前正在動物和人的邊沿上掙扎。我們只看到機械和動物在肆虐。人成了機械底奴隸，人成了動物底俘虜，人也快要成爲一張一張紙底下的犧牲品了。在這昏夜裡苦挨的你，聽到這輕微的心靈呼喚，難道不喚起你對於人之生活的回憶？難道不喚起你對於未來的人之生活的憧憬？當著昏夜有一枝燭光搖曳時，你會因不致跌到深淵裡而喜悅。當著你在憂役勞形中，即使只聽到一點人的清新聲音，你便會記起：哦！生命對於我並不是一種苦刑。你將會循著這清新的呼喚，發現一條生命之流，潺潺向遠方流去。也許，這條溪流在目前是細小的，但是，只要你對於生命不絕望，它終有一天會把你帶向大海。

聽吧！我告訴你，這裡有一陣輕微的心音！

——原載於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六卷四期

羅素論權力

這是一本許多人知道的書，但這是一本很少人能引用的書。這本書之所見不限於東方，但這本書之所見對於東方人不幸常新。

馬克斯輩以經濟自利為歷史發展底基本動力，而羅素，在本書中，以權力之取得為社會動態底基本動因。羅素認為，權力(power)之為社會動態底基本動因，亦若能力(energy)之為物理學底基本概念。「權力也和能力一樣，有許多種類，如財富，軍備，民政，支配思想的勢力。在這許多種類底權力之中，沒有一種可視為其他一種底附從物，也沒有一種是從其他諸種衍產出來的。」全書分十八章。計有權力底衝動，領袖與徒從，權力底類型，僧侶權力，君王權力，裸露權

力，革命權力，經濟權力，支配意見的權力，信仰——權力底泉源，組織底生物學觀，權力與政體，組織與個體，競爭，權力與道德，權力哲學，權力倫理，與權力底節制諸論題。

在〈領袖與徒從〉一章中，羅素說：「權力衝動底形態有二：明顯的，可見之於領袖；隱伏的，可見之於徒從。許多人之所以願意追隨一個領袖，他底意圖是希冀憑藉他（領袖）所領導的團體以取得權力，他們以為領袖底勝利即是自己底勝利。多數的人感覺到自己沒有能力足以領導他們底團體得到勝利。於是找出一個人，這個人似乎具有博得勝利所必須的勇氣和機智，大家奉他為領袖。」這說明了群眾服從一個領袖底心理根源。

群眾雖服從領袖，但群眾中之狡詰者，又常能通過一服從形式而分享領袖所有的權力。上層分給中層，中層分給下層。於是，彼等於服從上一級時所付出的代價，所失去了的人之尊嚴，俱可取償於下一級。層層如此，於是構成了一個統治形體。這樣的一個統治形體，一定是埃及金字塔形，上尖下寬。因而，在這種統治形體之下，社會階層不分化而自分化。各層之間的人所分享的政治權力，社會地位，經濟利益；種種等等，即使沒有十分刺目的顯明差異，也有可辨識的差異。而輪到一般人民，便墮入十八層地獄了。蘇俄不過是這種統治形體底標本而已。

凡自命為英雄或奇才異能者很少不愛好權力。但是，此等人之愛好權力，究竟只限於他有興趣的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而對於一切方面都有權力欲的人似乎很少。羅素說：「權力愛好，屬

於種種有限形式的，人類幾乎普遍都有；屬於無限形式的愛好權力的人很少。」一些太太們在家庭裡管教孩子威風十足，但對於她們外子所管的外務，則很少興趣。但是，世上也有自以為在一切方面爲領袖(Leader in every thing)，自以爲事事都能幹的人物。對於此層，生長於自由與專家社會的羅素，似未注意及之。嘗見有一政黨首領，彼在組織政黨方面或有所長，但彼至某印刷廠視察時，指導工人如何排印，指手劃腳，外行話滿口，爲技工所竊笑，彼固不之覺也。在現代極權型式底地區，若有人手握炸藥，則萬事能幹；在政治上爲領袖，在軍事上爲元帥，在經濟上爲計劃者，在文教上也爲大法師。此種類型底人物，事事愛管，對於任何問題他都有意見。史達林以一人之身，且兼爲科學天才，軍事天才，大哲學家，人民底導師，……(怨評者頭昏，數不清了。)總而言之，他無所不能，無所不通。這種「萬能權力」，如非發生於欲無限擴展權力於一切方面的權力狂，便是受全體主義的影響。但是，不論由何原因，這種狂妄是奇中之奇。但司空見慣者，則了不以爲怪。

領袖和徒從底分類，並非窮盡可能。在領袖與徒從之間，尚有第三種人，這種人即是「退避者」。羅素說：「有一種人，有不向人屈伏的勇氣，但也沒有高踞別人之上的傲氣。像這類底人，和社會組織不容易契合。於是，他們竭力尋求逃避的地方，藉以享受幾許孤寂的自由。具備這種性質的人在歷史上往往頗爲重要。早期的基督教徒與美洲底開拓者代表這類人物底兩個支派。退

避者有時是精神的退避，有時是形體的退避。有時所需為隱士之廬，寂寞而孤寄，有時為僧侶寺院，幽靜而合居。精神的逃避者，是隱晦教派中的人。這類人底興趣已經耗竭於過去愚昧的狂熱，至此地步則潛心於深邃寡要之學。形體的退避者，乃追求文化邊疆的人，為探險家。例如號稱亞馬遜河底博物學家貝茲(Bates)，居於亞馬遜河流域凡十五年。他所接觸的除印地安人以外，別無其他社會。在隱士所具有的幾許氣質中，有許多是美德的要素。因為，這些氣質，使人拒絕接受流行的誘惑，使人專心致志於重要的工作，而不顧及一般的漠視和敵意，然後得到與一般流行的錯誤意見相反的知識。」

此時此日，而談「隱士底心情及隱士底價值」，不獨不易為若干多血質者所瞭解與同情，且鮮有不觸怒於群眾者。實則，廢亂之世，以黑當白，以偽亂真，以非作是，以醜毀美，一切文化底遺產破壞盡淨，一切善惡標準不存，一切名器皆失其尊嚴與價值，眼前的動只是盲目與暴力的動，只是人慾橫流，只是利害與意氣之播弄，只是貪念幻想與勢利之結合。這種情境之中愈動愈亂，猶如抱薪就火，越搞越糟。在這種時分，必須有少數人沉靜下來，不把頭暴露於暴風雨中，保留一點殘存的元氣，保留一點倖免的生機，維護一點文化的餘燼。讓它不致全滅，待機在明春發長。在歷史上，每個天翻地覆的交替之世，總有少許這類底孤孽之子。所以，這種為超個人的利害而苦撐的人，是絕續之交之所寄，是不斷滅的靈魂。

然而，所可惜的是：如今的時代與昔日不同了。如今出現了一種新因素。這種因素就是包天蓋地的全體主義的極權統治。在這種統治之下，任何人都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在從前朝代變更，不從者只要「削髮爲僧，遁入空門」，便可饒過了。或者，只要你「不積極策動反抗，不去作官，溷跡江湖，也就算了。這樣，抱幾本殘書，發憤幽思，或可爲後世存點種子。今日則不然。今日的極權統治者對於讀書人，無一不視作眼中釘，要「清算」，要「改造」，要「學習」。炸藥底有效範圍，便是權力行使之場所。極權統治的魔掌深入每一角落：深入祠堂廟觀，深入學校，也深入每一個人底寢室裡。和尚尼姑要抓來配婚。避居窮鄉僻壤之士也要弄得他不好過。所以，今日要斷絕，便是連根斷絕。那裡還有「隱士」藏身之所！

羅素解釋組織進步底一種理由：「在怯懦的人中，組織之所以銳進，不僅由於服從領袖，而且更是由於藉著組織一個分子便感到氣壯。這種感覺，在一個群體中，人人都有。在狂熱的群眾集會中，同情主持者之旨趣的，往往甚覺得意，並且感到親切和安穩。這種情緒逐漸增高，直到最後，一切別的情感都被排除淨盡。所剩下的，只有一種欣然自得的權力意識。這種權力意識，係出於自我擴張。團體的鼓動，甘美醉人。浸沉於其中者，神智，仁愛，甚至於個體自存的觀念，都易於消失。浸沉在這種氣氛之中的人，逞兇殘的屠殺，與英勇的殉道，有同等的可能。」觀夫此理，可知「革命」與「群眾運動」爲何結不解之緣。群眾運動者，組織火牛陣之謂也。從此又

可知蘇俄共黨式的「革命」，「陰謀」，「暴動」，「煽惑」，「宣傳」，皆是相連之事物。此類事物，皆是提供苦難群眾以幻想，掀起並操縱群眾之情緒，激動其情緒，運用其暴力，以事推翻現狀，却奪政權。而政權到手以後，則領頭者必收拾此大批火牛，食其肉寢其皮，淪彼等爲工奴農奴，打入十八層地獄。蓋群情激昂與充滿改變現狀之群眾較之已被顛覆之舊軀殼可怕萬倍，不予以收拾則新權力必不能穩站。故近代人之忍狠，無有過於職業性地提倡「革命」者。近代事之慘苦，無有過於以「革命」爲專門職業者。觀夫列寧以降之事證，可知「革命」者，乃權力欲擴張之近代之新形態也。可不懼哉？

權力不限於政治權力。現代極權統治乃權力全面化之一統治形態。在此統治形態之下，權力擴張於天上以及地下，從精神到物質，從思想信仰到吃飽睡覺，無所不包；權力擴張及於古往今來——改寫過去的歷史，並發展現在的文教統治。而此諸權力匯聚於政治權力，充實政治權力，並支持此一政治權力；但回過頭來，此一政治權力又爲此一切諸權力之總樞紐。有形與無形的諸權力相互支持依托，遂成現代極權統治之奇觀。此一巨大權力機構，遂得毫無限制地吞噬人權與人身，儼如一大惡魔，日食人肉人血以爲生然。

羅素說：「支配人類的權力可以根據它影響到個人的情形予以分類，或者依照其相關的組織之種類來劃分。」

「個體所受的影響，有：一、加諸人身之直接的實質權力。例如，一個人之繫獄或被殺。二、藉賞罰爲誘掖或懲戒。例如，職位之任命與罷黜。三、以勢力支配思想。這就是最廣義而言的宣傳。……」

「這些類型底權力之表現於吾人處置動物的情況中，非常坦率而簡單。因爲，在處置動物時，不需要偽裝和假託之詞。如有一頭豬，用繩索縛其腰部而拉牠。豬在號叫的情形之下被拉至船中。在這種情形之下，豬之所身受者，乃直接加諸其身的實質權力。在另一方面，像俗諺所說，驢子逐胡蘿蔔而行。對於這樣的驢子，吾人可誘之使依吾人底願望而動作。吾人所取手段爲誘導驢子使牠相信牠是爲其自身利益而工作。介乎這二例之間的一個例子，爲演技動物之一例。在演技動物之中，習慣乃以賞罰造成。又有羊群被誘登船之一例。這個例子底方式有所不同。羊群首領一經強迫群羊前進，群羊便情願隨之前進。

「這些類型底權力在人類中都可找到實例。

「豬底例子說明軍事權力與警察權力。

「驢與胡蘿蔔一例是宣傳權力底表徵。

「演技動物表明『教育』底權力。

「群羊隨從違願而行的首領前進，乃顯示政黨政治的例子。像通常的情形一樣，大家所尊重

的一個領袖被一個黨派所拘束，或者被黨魁一流的人物所拘束。」

明乎羅素所言，則現代極權統治手法可以大白。

僧侶權力在中古曾大張其勢。這種權力，自其表面形式看來，似已不存在於今日世界大部文明地區。實則自其實質觀之，這種權力於極權統治中大見恢復。在極權統治下的地區，姑以蘇俄爲例，只有一個黨與一個主義被許可存在。在這種情形之下，此一主義取原有國教地位而代之。於是，保持，註釋，並宣揚此一主義的黨徒之權力，自取原有僧侶權力而代之了。但此種變形僧侶底知識程度，隨政權樹立之久暫而不同。在政權樹立日久的局勢之下，作爲新僧侶的黨徒，所受教養日深，知識水平漸可與國家知識水平接近。這時，所收信仰可以較大。如果政權初立，則情形異是。在政權初立或立之不久之時，作爲僧侶的黨徒，多屬宣傳員出身。彼輩實不識學問爲何物。徒爲從龍之衆，或趨附之流，以暴力與宣傳改變天下。彼等在此種暗示之下，不知天高地厚，擅自造作，自我作古，妄立奇說。政治權力又復從而保護之，人莫敢置評。習之既久，此輩則以自己胡亂之造作爲真理矣。那個艾思奇就是這等人物之首席代表。不過，他還沒有李森科出風頭。（若李森科之說果真，則中國婦女應無一人能跑百米者。）其餘步其後塵者，更無論矣。

裸露權力爲權力中較顯著的一種。「如果一種權力之所以被人民尊重，只因爲它乃一權力，而絕無其他原因，這樣的權力，就是裸露的權力。因此有一種權力向來屬於傳統性質的，而當著這

種信仰一經不被大家接受的時候，便立即變成裸露於外的權力。所以自由思想與活潑的批評時代，愈易發展裸露的權力。」裸露的權力之存在與延續，不爲什麼理由，只爲要存在而存在。這種權力之存在，完全是權力意志之表現，亦若盲目的生之意志使許多人爲求生而求生然。但是，愈是這種權力之本相裸露，則其爲裸露的程度愈益顯著，因而其存在愈益不固。這可以說明，在裸露權力之下，爲何不許言論自由。設想蘇俄及其同型者一旦開放言論自由，將成何種景象。監獄之窗，豈可以開？

革命權力，近若干年來，在世界混亂地區幾於流行成爲一種時尚。但標榜革命者於既取得權力以後，一切作爲厥惟如何保持此一權力。但保持此一權力之作爲若非創造性的而係佔有性的，則惟有導致此一權力與新起勢力之衝突與夫本身之趨於崩解。這二者皆需藉消耗社會之物質的潛能以及文教的積累以延續或擴大其鬪爭的火焰。故在此種情境之下，革命所帶來者，恆非幸福，而係更大的災害，更徹底的破壞，更普遍的貧困，道德淪喪，人心冷酷，險詐百出，馬基威尼主義盛行，暴力使用層出不窮。隨此諸犧牲而來者，常爲更大桎梏之建立。所以，羅素說：「照吾人觀察，傳統制度瓦解可能出於兩個不同的途徑。一是舊有制度所依據的信仰與精神習尚，受不住懷疑論底攻擊，因而只有退讓。在這種情形中，社會團結只能藉運用裸露的權力來保持。二、一種新信仰，與新精神習慣，日漸對群眾起支配力，終於成爲很強的勢力，足以建立協合新信念

的政府來代替被視為已成腐朽的政府。在這種情形中，新革命權力所具有的特徵，既異於傳統權力，又異於裸露的權力。這種革命若告成功，那麼它所建立的制度又確乎迅速成爲一種傳統制度。」蘇俄革命底經過，最足以例示此理。但是，「這種革命鬭爭若激烈而又延長，那麼常常變成搏取裸露權力的鬭爭。」此語頗足助人明瞭世變。

信仰，恆被認爲權力之一源泉。羅素說：「一個團體底權力不僅依靠這一團體底人數與經濟資源和技術能力，尤需有賴於信仰。」「現今有一流行的信念，以爲主義之一致乃國家力量底要素。這種見解之保持與遵行，在德國與俄國則出以極端嚴厲的態度。」這種想法無論是否正確，必爲權力者所喜好。因爲，至少從心理因素來觀察，信仰之一致可以易於收團結之效。團結又爲部勒底基礎。這類辦法，退步言之，即使爲非常時際之所需要，亦只可選擇地在一時施之於一部分的人；而不可盲目地在一切時間施之於一切的人。否則，總較下來，結果必定不佳。羅素說：「服從態度藉強制而得之於從屬的，必有礙於智慧之發展。如果在一個社會中，人衆至少必須表面接受顯然悖理的主義，那麼最優秀的人必定對之不感興趣，或者不滿意。結果，智慧水準將會降低，不久必致妨礙技術底進步。這種情形，當著正式的信仰很少有智識人士能以誠意接受時，尤其如此。」所以，在極權統治長久之下，大部分的人會失去思考力與創造力，一個個變得麻木不仁、呆頭呆腦，一個社會變成死板的軀殼。我們把俄國兵底照片與美兵照片比較一下便知。

權力有密度可量。權力密度與組織底強度爲同義語。羅素在組織之生物學觀一章中說：「權力密度，或是組織底強度，關聯的問題複雜而且重要。在各個文明國家中，國家底活動在今日遠甚於往日。在俄國，德國，和意大利，國家幾乎干涉人民底一切事務。」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人愛好權力，更因獲得權力的人士愛好權力常大於多數人，當政的人在一般情形之下，希望國家對內的活動之增加，正與希望國家底領土增加無殊。」這正可說明，爲什麼被支配的空間不增加甚至縮小時統治欲反而擴大。

許多人動輒言組織，殊不知組織底元氣遠較組織底形式重要。若組織底元氣早已斷喪殆盡時，以最大的氣力整飾組織底形式，固可壯觀於一時，但是否實用，殊難斷言。組織底元氣，靠新風氣，新觀念，新精神爲之培養。假若一個人底靈魂仍是一個舊靈魂，則雖穿一件較新之衣裝，亦屬無甚裨益於其前途。舊的靈魂不能丟掉，則技術的改進，譬猶坐一九五二年新型汽車打麻將，結果必定更壞。在西部武打片中，拿打槍的暴客，常比拿戈矛的印第安人更可怕。羅素說：「使得組織變成老舊的因素乃是基於過去的成功而形成的習性。可是，當新的情勢崛起的時候，當事者已經是舊的習性過堅，難以改變以資應付。在革命時代，那些有指揮習慣的人絕對不能即時充分察覺當前的情況不復能靠服從的習慣來應付。復次，高貴人物之所以需要別人對之尊敬，原意本在鞏固權勢。久而久之，遂發展而成牢不可破的禮節。這一套東西，妨礙彼等底活動，使彼等

無法獲得應付新局面所需的相關知識。君王常因過於神聖，不復能領導作戰；且逆耳之言即為真理亦不能告之，因告者將被處死刑。」羅素之言，可謂洞悉底裡。

愛好權力乃人之常情。在一合理範圍之內，適當地發展權力欲，可促進社會底進步。所以，權力並非在一切意義之下皆為壞事。但若發展為權力哲學，則為害鉅大。「哲學」，就某些習用或俗用的意義而言，非為精靈即為妖魔。前者是否可導入入聖不易確知，但後者則頗可有助於使人作惡。人有一意欲，自稱為「哲學家」者，往往基於此意欲而建造一大「哲學體系」，於是橫決者氣壯矣，狂行者理直矣。黑格爾，費希特，柏革森之流，皆是販賣此路貨色之「哲學大法師」。故彼等為現實世界之權力狂所竊喜。世有好作「哲學的英雄」(Philosophical Hero)者，於不得志於現實世界之餘，則「轉進」於觀念世界，欲挾其「支配意見之權力」以支配世界。助暴長亂，可勝言哉！羅素說得很明白：「愛好權力的心理是正常人性底一部分。但是，權力哲學在某一確切意義中則有狂妄之氣。外在的世界，即物質世界與人類底世界二者，其存在為一已知事件。這類事件，可屈抑一定種類之自傲感，但卻可遭一狂人底否認。人因愛好權力而使之對於世界抱持歪曲的見解者，在每一瘋人院中都可見到。在瘋人院中，一個人以為自己是英吉利銀行底總經理，另一個人以為自己是一國王，又一人竟以自己是天父上帝。可是，同樣的妄念，如果由學者藉深奧的言詞敘述出來，結果便可博取哲學教授位置。凡證實了的瘋人必遭禁閉，……而未經證實了

的瘋人則掌握大軍權，而能以死亡及災禍加於其勢力範圍以內的一切清醒人士。在文學中，在哲學中，在政治中，狂性底成功乃現代種種特色之一。」此語說來令人毛骨悚然。

以權力為基因所形成的害處，衆人可見：小之變生宮室，血流五步；大之則殺人盈野，國亡種滅。權力像原子能，用的不得當，可能引起危險的結果。權力必須有高於權力的東西來駕駛。權力必須予以節制。

羅素認為：「愛好權力的心理，必須與權力以外的一種目的相關聯，這種愛好方才是一種美德。我底意思並非說人不可為權力而權力。因為在實際事業底進行途中，這種動機必伴隨以生。我底意思是說，企圖實現其他一種目標的欲望必須甚為強烈，因而所得權力非有裨於實現這一目標便不心滿意足。」羅素提出節制權力之一法是：「……愛好權力的心理必須與一種目標相聯。這種目標，廣泛地說，乃與別人底欲望相和諧的目標。因而，這種目標，一旦實現，他人將蒙其利。……」這就是說，人不妨好權，但應為一正當目標而好權。

然而，僅以此標準來防範權力之肆虐是不夠的。古往今來，大奸雄，大獨裁者，如史達林之流，那一個不是標尚正當的目標呢？那一個不是說「爲了人民」呢？那一個敢明目張膽說我之所為都是爲了權力呢？可是，他們不知爲了權力而害死多少人。因而，爲了防範權力之肆虐，僅僅有正當目標是不夠的。不僅不夠，在現今權術政治之下，事實證示，好目標大都用作欺騙大家以

換取或鞏固權力的工具。所以，羅素接著又說：「而這一目標之實現，所用手段須無相隨而生的惡果。如有相隨而生的惡果，而此惡果又超過原有的目標，那麼這種手段便不可採取。」

這是非常重要的。現代政治之中，「必擇手段」比空講目標重要萬倍。老實說，僅就目標而論，希特勒，史達林，那一個不是說得天花亂墜？然而，一付諸實踐，糟糕的事就來了。民主政治是實行任何「爲人民」的主義之較佳的制度。離開民主而談任何「好主義」，都是騙人的。民主是個試金石。權力者是否真「爲大家好」，或者不過爲了自己，只有看他是否實行民主便知。你既然說你底「主義」是爲了大家好，爲何不讓大家作主？爲何要你一個人爲所欲爲？如果說大家底知識不夠，那麼少數人底知識就更夠嗎？

節制權力在制度方面的途徑，羅素認爲不能採取克倫威爾，列寧，與希特勒輩之方法，而民主政治雖非完善的解決方法，但實爲解決辦法底一主要部分。羅素說：「民主政治底功用乃屬消極性質。民主政治並不保證一定有良好政府，但能防止一定的弊端。」人間的實際事物沒有絕對完善的。如說有，不是欺人，便是自欺。一種政治制度，如能防止弊端，大家便可少受許多活罪了。

但是，實行民主政治，在心理上先須有所準備。不然，徒有民主形式，而無民主內容，結果必不見佳。民主政治底心理準備，乃是寬容。寬容底限度是，凡不妨害民主制度與內容的言行皆

需聽其自然。在這一限度以內，不可排斥過多，又應不具過分強烈之偏好。好惡不能過分主觀，尤不可以爲凡合於我者爲「好」，不合於我者爲「壞」。蓋人人如此，則解決之道惟有施放炸藥，天下鮮不大亂。羅素說得有趣：「這種態度不適用於成人。當兒童服從命令時我們就說『好』，否則說『壞』。這樣的兒童，當其成長而爲政治領袖之時，這種觀念如深入腦中，那麼便會將『好人』解釋爲服從我命令的人，而『壞人』則爲抗拒命令的人。因而，我輩中人都是『好人』，而反對黨都是『壞人』。所謂『好政府』即是我們所主持的政府，『壞政府』即是其他政黨所主持的政府。……如果嚴格抱持這種觀點，那麼社會生活幾於不可能。因爲，只有暴力才能決定那一團體是『好』的，那一團體才是『壞』的。」顯然，這種精神狀態存在一日，世界永無寧息之時。遑論其他，吾人欲謀完全收節制權力之實效，除政治條件以外，經濟條件，心理與教育條件，在在都需注意。但是，這些條件之收效，必須在一長遠的過程之中。「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家且拿出信心，忍耐地去作，澄清黃河，化積潦之區爲肥沃之地。

——原載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六卷七期

附記：評B. Russell: *Power, Allen and Unwin*。

世界之新希望

羅素今年五月八十歲了，此老老而彌勤，還在寫作演講，構思不休。這本書是他最近的作品之一。

羅素少年與壯年時代做過充分的解析功夫（攻I. eibnitz·著*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與Whitehead合著*Principia Mathematica*）；走的地方多；見的事物又廣。閱歷如此之深，所以他底思想，至少就他自己而言，已經純熟。本書雖短短二一八頁，然評者已覺妙論橫生，清光鑑人，足可作動亂世界之一盞明燈。可惜，他所提出的對付蘇俄與共黨的某些實際辦法，評者則頗不敢苟同。羅素如果生在憂患的東方，親嘗共黨底好滋味，正視共黨底真性質，我想他不會提

出那些客氣辦法的。當然，我說羅素提出對付共黨的某些客氣辦法之爲不當，此言並不意謂反共者必須以牙還牙，學習共黨底那一套。在一非常時期，應付危難的必要措施自爲無可避免者。但此「必要」之分寸必須守得很穩，過此便成「不必要」。即使在主觀上反共，在客觀上，精神的實質是否逐漸與之同化，這是一個應該時時留心的問題。如果不幸反共者在方法上步步學習共黨底那一套，「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在一實踐的實際歷程之中，七搞八搞，東一個主意，西一個限制，欄柵多日，束縛重重，故障層層，桎梏壘壘，久而久之，由漸入深，不知不覺，整齊固好看矣，但自由全失，理性盡喪，價值消亡，人只餘形，利欲暴力，與獨格碼(Dogma)三者統治一切。假如不幸到了那種地步，就是天下一色混了。

但願真正熱心的人士距離精神的共黨遠一點。距離無形的共黨愈遠，則愈增加對共黨的精神抗力。這是對反共真正有利的。

這本書是根據羅素底廣播講演「原子時代之生活」而成。時至今日，有三種衝突使人類苦惱。這三種衝突即：人與自然之衝突，人與他人之衝突，及人與自己之衝突。本書討論這三種衝突，並及其救治的方法。與這三種衝突相應，解決第一種衝突的乃科學之事；解決第二種衝突的乃政治之事，解決第三種衝突的乃宗教與心理學之事。

現代技術已使貧困成爲並非必不可免之事。現代技術已可使人類過度較從前遠爲優越的生

活。人類之所以不識現代科學技術有這種可能性，是由於信仰，原則，情緒上之固執，以及只有適於過去時代的思想習慣。但是，這些東西，現在都必需放棄。到了今天，新的技術使人類的合作比之競爭遠較過去為重要。悲愴的恐懼之情籠罩著這個時代，緊壓在每個人底心頭。照羅素看來，這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普遍認識現代知識與技巧能使人類快樂，那麼便能在極短期間移除恐懼與失望之主要的根源。

本書著重希望之理由。羅素認為，如果大家普遍瞭解這些理由，那麼藉著自我興趣和自我保持，便會把這個世界導向明智的途徑，並且使個人能過度一較和諧的內在生活中。

現今的時代，是一個充滿了糾結的時代。在本書底開始，羅素就指陳時代的糾結。他說：「現今的時代是一個糾結充塞乎每個人心中的時代。而這些糾結，照許多人看來，是使現今的時代虛萎無力的因素。我們很少人希冀戰爭。但是，我們卻驅向戰爭。我們都明白，這一戰爭會給人類中之最大多數帶來災害。然而，像兔子被蛇迷糊住了一樣，我們瞪眼望著危險，而不知如何避免戰爭。」

「吾人須知，現今世界所面臨的純知識問題是極端困難的。吾人不僅須解答這個重大的問題，即是：不經由實際的戰爭，吾人能否保衛西方世界？而且，在亞洲，非洲，和南美，同樣有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不能在傳統的政治觀念之架構上求得解決。的確，有許多人確信他們能以古代

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以看看麥克阿瑟及其共和黨的支持者。麥克阿瑟底知識和想像力都是很貧乏的。因而他從來沒有作片刻的躊躇。照他看來，我們所應作的一切，就是回返到鴉片戰爭時代。在我們屠殺了幾百萬中國人以後，剩下的人會認識我們在道德上的優越之處，並且對麥克阿瑟歡呼，把他當作救世主。可是，我們不要只想到一方面。照我看來，史達林也是同樣頭腦簡單，同樣也是過時的人物。他也相信，如果他底軍隊能夠佔領大不列顛，並且把所有英國人底經濟水準降到蘇俄農民生底經濟水準，把所有英國人底政治水準降到政治犯底水準，那麼我們會向他歡呼，把他當作一個偉大的解放者，而且爲我們從民主的枷鎖解放出來而慶祝。在我們底時代有一件最令人頭痛的事，就是，凡那覺得世事確然無可置疑的人，都是愚昧無知的；可是，那些具有想像力和理解力的人，則充滿了猶豫和疑慮。不過，照我看來，這種令人頭痛的情形，並不是必不可免的。我想，對於人和他底命運，以及他現在的煩惱，有一種看法。這種看法能將確定之感和希望之心與吾人對於各人在心情，失望，和過分的疑慮之最完備的瞭解合起來。這些因素是困擾現代人的。我希望指陳這一展望。我希望我底看法能說服大家，並且使大家得到廣泛的鼓勵。近年以來，許許多多的人以爲只有殘酷的偏執一義者才會產出生活力以勇赴一事。我希望我能鼓勵具有善意的人同樣能夠產出生活力以勇赴一事。藉此，我們可以祛除別人對於我們西方人的一種譴責，說我們不能提出像克里姆林宮底徒從們所激起的堅定不移的信念。我預料我們是

能夠的。」

羅素對於麥克阿瑟個人的批評，似乎夾雜了西歐人士共同的偏見。就個人而論，無疑麥克阿瑟是一個偉大的軍人；而且，似乎是頗富「哲學意味」的軍人。在世界反共的實際鬭爭中，麥克阿瑟在遠東曾經是克里姆林宮和毛澤東震懼的人物。他之呼籲強化遠東反共的陣線，獲得東亞反共人民底普遍支持。他之指責美國日益苛煩的內政措施之日益妨害人民自由，足見他具有深厚的民主素養。至於羅素說麥克阿瑟想「回返到鴉片戰爭時代」，這簡直是閉著眼睛想的。如果羅素稍稍留心麥克阿瑟平時對於日本的態度，措施，和言論以及他在國會的演講，評者相信羅素一定不會認為麥克阿瑟是個帝國殖民主義者。恰恰相反，他曾帶給東亞反共人民以無限的溫情。羅素說麥克阿瑟「從來沒有作片刻的躊躇」，這不像是經過慎重思辨的言論。麥克阿瑟身經百戰，負一方面的重任，那能如此？至於麥克阿瑟對於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之決定，更不是遠在西方的羅素所知的。總而言之，羅素底這類言論，多係出於地域偏見。地域偏見，雖大思想家亦不能免。

羅素對於遠東的情況不甚了了，對於麥克阿瑟本人有所誤解，並且多少夾雜著地域偏見，所以有上述的論斷。可是，如果我們把這些人與地的特殊因素撇開，我們將不難看出他底話中之義蘊充滿了睿智與開明。他將極左與極右的人物等量齊觀，實有至理。在原則上，他為世界反共運動指出一個新的方向，就是我們不能藉舊有事物來反共。目前的世局雖然在現象上甚為緊張。但

骨子裡則根本是一個文化的鬪爭。從歷史眼光看來，文化的鬪爭沒有在很短時期之內就可結束的，更不是單憑軍事力量所可了結的。依此，我們應該勇敢地接受這場大變動，我們應該不怕承認反共運動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鬪爭。有了這個認識在心裡，我們對於一切就得重新估量。共黨雖壞，但我們應該勇敢地承認他是一個有創造力的亂黨。對付有創造力的亂黨，必須新的創造能力才行，當然，從認識到實踐，往往不得不千迴萬轉，走一浪費的旅程，才會轉入正途。歷史及現實與觀念認識尚未一致時，它當然會阻礙人折磨人的。在東方尤其如此。

在一個時代被形成以後，風雲人物就有了他們英雄的光輝的過去。但過去的光輝不是未來光輝底保證。在歷史上，一個時代常常創造了一些人物，而這些人物也往往結束這個時代。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創造幾個時代並結束幾個時代的。一個民族或社群底生命可以常新，然而一個人底生命則易於衰老。一個人底思想更易衰老。普通的人，能活六十歲，但思想至多到四十歲就已經定型了。特別是，曾經藉著某種方法獲得成功的人，容易回味那種方法，容易認為那種方法乃天下唯一之大法，因而易於固持不移。殊不知實際世界早已先於他底觀念世界而變易了。麥克阿瑟當然不是羅素所認為的那樣頭腦簡單。但是，麥克阿瑟個人是否如此，可以不問而傳統的觀念以及舊式的方法之不足以應付共黨問題，則是今日凡與共黨交過手者所應有的醒覺。觀夫巨濟島共俘之暴動，滿腦袋裝著西方舊有習慣與傳統觀念的盟國官員之束手無策，窮於應付，便可測驗

此理。評者作此言，許多人切勿直觀地反應，以為此係由於盟國未作嚴峻的措施，與夫硬幹所致。如果盟國這樣做，則正中克里姆林宮之下懷，史毛之輩必心竊喜焉。共黨在世界利用人命製造事件與在一國以內利用人命製造事件在原則上正無以殊。盟國之應付共俘固然棘手，但盟國官員究受相當科學與民主教育，頭腦比較富於變化 (suppleness)，看事比較客觀，所以在一度「試行錯誤」以後，會逐漸試出一套對付共黨的方法。我相信整個民主世界都會如此。在這一方面，民主國家比東方進步得大的多。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及結束以後的幾年，民主國國家吃蘇俄底虧很多，後來漸能與之相持，現在則能逐漸採取政治的攻勢了。

羅素說易持定見的人常頭腦簡單，而具有思想力的人則多猶豫不定。這真可說是現代底一大悲劇。許多自以為滿有把握的人，其實所言所思，大多粗糙惡劣，建立在成見與舊習之上，經不起分析。其所優為者，充其量不過激發更下一層人衆之無根的激情。而在另一方面，許多號稱自由主義者，則意志薄弱，了無定見，缺乏獨立不移的精神，沒有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他們總是站不起來的樣子，往往要依附一個東西才安心。於是，這種游移的自由人，常常為知識低下而自負特甚的人所挾制或利用。所以，總搞不出什麼好事。如何克服這種毛病，使有思想者有定見，而且意志堅定，這是關係乎今後命運的一大問題。

「迄今我所說的是公共的糾結。但是困擾西方人心的還不止這些糾結。傳統的獨斷系統以及

傳統的行為法典不復再能維繫人心。我們懷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甚至以為所謂對錯不過是古代的迷信。當著我們試行為自己解答這些問題時，發覺這些問題是太難了。我們不能發現我們應當追求的明白目標，或是我們應該遵行的明白原則。靜止的社會也許有這些原則。可是，這些原則，在局外人看來，似乎是荒唐的。……西方人底現代生活，全不像有節律的舞步。它像自由韻文，只有詩人才能把它從散文分辨出來。當著現代人精神疲敝的時候，有兩種偉大的獨斷制度在等待著他們：一是羅馬制度，一是莫斯科制度。在這二種制度之中，雖則一種曾是西方人底光榮而另一為西方人底威脅，可是，任何一種都不能給予自由人以新希望。……自由人曾經充分成長，必須充滿快樂，活力，與心理健康；可是，同時他們卻在痛苦煎熬之中。

「不僅是群體，而且也是個人，都需要思想底道路，和情緒底安頓。這思想底道路和情緒底安頓，必須合於我們底知識，合於我們所能相信的什麼，也合於我們所不能相信的什麼。有許多傳統的情緒安頓方法。這些方法，在過去有其尊嚴和權威，但不適於今日的世界。在今日的世界中，新的技術須要新的德目(virtues)，而舊的德目不復適用。」

可見不獨東方發生傳統動搖的問題，西方亦然。當傳統道德崩解的時候，人們不知由何道路而生活，情感如何安頓。這時，共產主義的邪教以狂熱的姿態乘虛而入，於是千萬人鼓舞嚮往；共產黨這個狠毒的東西乘機造亂，於是赤禍滔天，民不聊生。由此可知，今日反共問題之根本處，

厥惟如何爲大家確立一適合的生活原則，以及如何安頓大家庭情感。爲了解答當前這重大問題，許多有心人在那兒想在那兒說，甚至於在那兒做。當然，見仁見智，各人底想法不盡相同，因而說法也不盡相同。有人認爲必須恢復過去的傳統。但過去的傳統既已失去支配人心與鼓舞人之情之實效，如今只剩一空虛形式，當有其客觀原因。這客觀原因，吾人必須放開眼界，不從一個窗戶而從許多窗戶去虛心尋求。一棵大樹，已失去發榮滋長開花結實之能力，如今只空餘一點老樹根，此何以故（當然評者並不主張並此根而拔之）。有些文化，就其理想成分而言，都是差不多的，無非仁，義，愛，等等，但文化爲一總體之類名(Class name)，因此吾人不應只提空高之理想，且應包含全部之體現(actualization)。一談到體現，便不能不涉及政治，法律，教育，經濟，等等。一談到這些，東方古國，毛病百出，以致全民之生存發生問題，以致有今日之大禍臨頭。評者以爲太「唯心地」完全致力於空談理想。不如實徵地(Positively)多用力從體現方面著手，由體現中設法培育理想，來得切實。一談到體現，毫無問題，西方比東方高明多多。如果這樣一想，可知所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在某些層次上，根本是不必要的。二者並無必然的衝突。

許多觀念的進步不若技術進步之快。舊有觀念遭遇新技術所造成的形勢，便構成生活上之不調適。因而，有些傳統觀念必須放棄。但適合的倫理學亟須建立。

羅素說：「人類自其祖先發明語文以來即被傳統所支配。這種情形曾爲進步之主因，同時也

是進步之障礙。……我們可以反對吾人祖先底狹窄心胸，但是我們只能站在他們底肩而上而超過他們。」

「雖然，就某種程度而言，尊重傳統和服從習慣是必要的，可是許許多多社會在這條道路上走得太遠，而且就由於過分守舊，有些社會因此毀滅（請注意此語——評者）。人類之改變其生活方式，較之野獸快得多；而文明人又比野蠻人較快；而現代文明人較之過去的文明人也快（請特別思索此意——評者）。近一百五十年來，文明社會已經大大地改變了其物理的環境，大大地改變了謀營生活之方法，大大地改變了求取安適的工具。這些改變的基本原因，乃知識與技巧之廣泛的增加。」

「現代物質領域裡的新技術，如其是為人類帶來充分的便利，那麼需要新的心理習慣與之適應。可是，就在這一點上，現代世界的人最差。在此機器時代和科學生產時代，我們底情感和許多信仰依然滯留在適應生產貧困和原始農業的狀態之中。我們底政治觀念幾乎恰好在十八世紀的形態之中。假定沒有共產黨人以爲他底信條是從這個時代衍發出來的。其實，彼輩之政治觀念特別陳舊，恰好與十六世紀菲力二世者相似，恰好與十七世紀路易十四者相似。」

羅素說：「普遍的恐懼知識，乃吾人所處時代的一大危機。如果主持教育的人更知悉現代世界所需者爲何種人才，那麼他們不難在一代的教育之中培養出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足以改變

這個世界。但是，他們關於個人品格教育的觀念乃一舊式觀念。他們最欣賞的品性，乃在海盜群中足以作領袖的品性。如果我們說商業較之作海盜不同，那麼他們以為你柔弱無能，以為你錯誤。他們之所以有這種念頭，是由於固持自古以來相沿至今的舊式好戰觀念。這些觀念，在物質貧乏的時代是適用的，但不適用於今日。時至今日，如仍有物資匱乏的情形，那就不怨別的，只怨人類自己底愚蠢。雖然如此，可是最大多數人寧取感情而不取知識。最大多數人喜觀我們底情感被激起；我們喜好歡呼或作嫌惡之聲，我們喜好讚賞或恨憎，我們喜好極端。」

「這個世界臨著一個可見及的災難。我們迷亂地問我們自己，我們既然誰也不願這個悲劇的命運來臨，但為何似乎無法避免。基本的原因是，我們沒有調整我們底心性，使之適合現代技術。我們依然將我們底思想方式和情感滯留在一種只適合於技術簡單時代的狀態之中（請就這點虛心思考——評者）。現代技術可能比從前帶給我們較高的快樂。如果我們要在現代技術世界裡快樂地活著。我們必須放棄某些觀念，而代之以別的觀念。我們應該放棄支配別人的觀念，而代之以平等觀念。我們應該放棄競爭的觀念，而代之以公平觀念。我們應該放棄崇拜暴力的觀念，而代之以愛智。我們應該放棄競爭的觀念，而代之以合作的觀念。我們必須學著把全人類看成一家。我們必須藉著聰明地利用自然的資源來增加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共同趨進以增進繁榮，而不是互相剋制，以趨向死亡與毀滅。自然，作這些轉變時所需的心理改變是很困難的，而且不是一蹴而

就的（的確如此——評者）。可是，如果教育家認識了這種需要，並且如果將下一代教育成世界底公民，而不是過去世界好戰之徒統治之下的工具。那麼在一代以後便會得到這種改變。」

羅素在此指出觀念與現代技術之配合乃人類致樂的一重要條件。共黨反對並打擊「技術觀點」在「技術」之中，彼等最反對者為思想技術。至於實用科學技術，則保持於少數效忠於政權的所謂「專家」之手。彼等欲迫使廣大大眾，勒其返於東歐蒙古草原式的農奴生活。赤魔之所謂反對「技術觀點」，其意思之本質，乃在反現代化，而便於迷信之增進。少數有心人士，也對現代技術持不甚歡迎的態度。不過他們所用方法比共黨文雅而間接一點。他們不正面反對技術觀點，而說「技術觀點不夠」。這些說法底意謂不易確定：至少，在Cognitive Level是不能說的。其實，東方人要學習西方技術，再學一百年未必夠數。只有像Whitehead這樣的人才資格從反面批評科學與技術。他說科學乃一Obscurantism。東方人普遍地還得好好學習科學與技術，尤其是思想技術，以救數千年混沌之病。今此等熱心人士橫截一下，如真發生效果，會使中國在現代化途中倒退。此點說來話長，容有機會再詳細討論。

吾人現處之世界幾於全為恐懼所籠罩。有的地方處於大恐懼之中；有的地方則為大恐懼旁邊之小恐懼。恐懼固有大小之分，但其為恐懼則一。在恐懼之中，人常易產生不正常的心理。羅素說的很有趣：「最大多數的人所感到的不安全，較之實際上為大。他們認為獲得安全之唯一的道

路就是跑到別人肩頭上去。」又說：「這種恐懼在最大多數社會是很深的。恐懼阻礙人底原本創造力，並且增加人對人的迫害；恐懼防害生機和個性，並且使人失去一切精巧的適應能力。恐懼使社會逐漸趨於困乏，僵固，與殘酷。」不獨此也。「恐懼底結果之一乃大家屈服於首領。任何社會，如果尖銳地感到恐懼，便會本能地尋覓一位首領。大家相信這位首領是可以信賴的。有的時候，此一首領是好的；但有時則不見佳。無論首領佳與不佳，大眾總是本能地予以信賴。一九四〇年英人之擁護邱吉爾與大不景氣時德人之擁護希特勒，其出於此種恐懼本能之衝動，正無以殊。在危難之秋，屈服於首領常為必要。顯然，當船失事之際，乘客服從船長，乃一良佳之事。然而，屈服於首領常有不可免之弊病。當恐懼使人屈服首領而此屈服又無必要時，則使人悔恨，認為不該屈服。屈服於首領使人失去個人負責之感以及獨立思想之習慣。假令所選之首領之心靈並非特殊高尚，彼遲早將誘陷其徒從為其自身之利益而努力。希臘之暴君固常如此也。且其權力既源於普遍之恐懼，彼所努力以消除此恐懼者將非常之少；恰恰相反，彼將擴大誇張敵人之危害，藉以恫嚇群衆。結果所至，必內而疊詞流行，外而兵連禍結。整個悲劇乃由恐懼所生。」史達林乃這種建立於恐懼上之首領底典型人物之一。

羅素所希望的世界，乃一有無虞恐懼的自由之世界。而此一世界之實現，固不能由妥協得之，亦不能藉暴戾得之，端賴剛毅精神之建立。「勇氣，希望，和不可動搖的信念，在一黑暗時代，及

防止精神災害之不可或缺的因素。……基督教會乃西歐新文明之核心。許多非基督教徒底思想很崇高，其抱負也可敬，但卻缺乏動力。」

羅素謂Platinus乃其時代最顯著的非基督教徒。彼之成就雖不可忽視，但卻無補於世亂。「我想Platinus之極力從事思構外在事物乃正確的；但他以為這樣便足以構成一好的人生，這就錯了。思構，如其是完整的和有價值的，必須與實際結合起來。思想必須激發行動，並且提高實際政治家之目的。如果一個人只退隱在寺院中沉思默想，這只是一種逃避而已。」羅素之言，應提起許多在故紙堆裡打轉的人士反省。但是，這並不是說，學人不應有其「個人興趣」。

羅素引申的話裡很清楚地表現這點：「在目前的世界，有二種極不相同的概念在爭取支配權。在西方，我們在人底個體生活看出人底偉大。照我們看來，一個偉大的社會是包含個體的社會。如果人力辦得到的話，這些個人是快樂的，自由的，和富於創造性的。我們絕不以爲各個個人必須都是同樣的。我們將社會看作一個合唱隊。在這合唱隊中，不同的演奏者擔任不同的節目，用著不同的樂器。在這合唱隊中，合作之事，係出於大家自覺的共同目標（請特別留神此語——評介者註）。我們相信每一個人應有其相當的人的尊嚴。他應有其個人的良心和個人的目的。除非他底目的妨害他人，否則就應自由發展。我們認爲減少貧窮的困苦乃重要之事，增加知識，產生美和藝術乃重要之事。……」

然而，蘇俄底想法則恰恰與此相反。「蘇俄政府對於人生目的則有不同的概念。照蘇俄政府看來，個人毫無重要之處；個人可隨政府之意予以消耗。所重要者惟有國家（其實只是史達林而已——評介者註）。他們幾乎將國家視為神聖。國家之自身有其福祉，而此福祉非公民之福祉所構成者。這種看法，乃馬克斯取自黑格爾者。此與基督教倫理根本相反。這種倫理。在西方為自由思想家所接受，亦如基督教徒然。在蘇俄世界人底尊嚴一文不值（史達林底尊嚴當然例外——評介者註）。在蘇俄人必須作匍匐的奴隸，俯伏於代表國家之偉大的那個半神聖的人脚前。照他們看來，這是正確的，而且是適當的。」國家如其是文化單位發展底結果，自與每個公民有不可分的精神血緣。其可親可愛，自不待言。但到了現代極權統治者手裡，國家竟作了這種用途，寧不令人慨歎！

羅素認為人生在世，應過快樂的生涯。鬱鬱終老，殊屬苦蹇，自然給予人的限制為食物，原料，與壽命。但此可藉科學與智慧改善至某種程度。科學生產技術可以使食物之產量大增。同時，吾人須提倡節制生育，以免人口過剩。天然資源應力予保護，以免過度耗竭。人壽可藉醫學與衛生設備等予以延長。快樂的個人，有賴乎人性之正常的發展。此則端賴乎不阻抑天真的兒童教育及非地域性的成人教育。行非地域性的教育，各國底人方可善意相處。才能特殊的，應予特殊發展的機會。希特勒式的人物方不致掀起巨患。世界欲求長治久安，必須民主地創立一世界政府。

此政府成立之後，大家同意唯有此一政府才得保持一支配有重武裝的強大武力。各國在此政府之下實行自治，各安生業。各國政府只有警察力量，以防宵小而已。

羅素所言，自爲人人所嚮往的境界。但欲達到這一境界，有一大前題，即如何解決共黨問題。共黨未嘗也不想建立一「世界政府」。但彼等實現此一雄圖之方法爲心理麻醉與武力攘奪，並強人以蘇俄爲世界政府底首腦，別國則降爲奴國。此所以世界擾攘不安也。自由世界同共黨根本無法「打交道」。這可由所謂韓戰和談見之。羅素所建議的藉減少戰爭氣氛來慢慢疏導的辦法，在原則上雖無毛病，且爲大部分西歐人士底共同心理，但在實際上甚難收效。當然，評者並非贊成亂打亂殺。解決共黨問題，依評者之見，爲了應急，當然必須建立一支具有壓倒優勢的武力，如美國現在之所致力者，但是，在一長遠的過程中，此一武力背後若無一新精神爲之支持，必歸瓦解。建立一新精神，美國似不勝任，至少目前尚未勝任，雖則美國有識人士如杜勒斯與艾森豪威爾等已有覺悟。這就有待乎自由世界底思想家底共同努力。

——原載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七卷二期

附記·評B. Russell: *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9s, 6d.

經濟政策與經濟學理

這本小書，照評者看來，應該是值得介紹的。這本小書之所以值得介紹，是因為其中除討論經濟以外，更涵蘊著極有價值的思想。如果此地還能用顯微鏡找到比較健康的思想，這本書所表現的應是寥寥可數者之一。雖然，因為其中所涉太廣，作者未能將某些觀念釐清，以致某些觀念不夠明確。評者不懂經濟學。茲主要地從思想方面著眼予以評介。

本書一開頭就說得頗合分寸：「經二百年之演進，經濟學已發展成爲嚴格的科學，旨在研究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一切科學均是手段之學）。至於此種目的之價值如何，則牽涉哲學倫理乃至宗教等若干超科學的問題，科學家似不窮究。科學家只把目的當作先定事實來處理。廣泛目的的

奠定，如仁義與貨利孰先，節義與生命孰重，是政治家或哲學家之事。……經濟學家絕不走哲學家之路，杜撰一理想國後再窮究此一抽象國是否應該或如何行使經濟機能。經濟學界始終找不出柏拉圖。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主義者乃至馬克斯，雖杜撰若干種烏托邦及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幻想，但他們的訓練及方法仍是哲學的及玄學的，絕不是科學的。馬克斯雖自稱創造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但黑格爾乃至前人的玄學實控制他的腦筋。他淵源所自的黑格爾乃一極帶玄學意味的哲學家，著作中充滿神祕的幻想及公式，絕不能用邏輯及科學方法來證驗……」

這些話說得頗為扼要而透徹。作者在這方面所表現的思想與現代傑出的政治思想家漢克森(Hans Kelsen)在這方面的思想不謀而合。漢克森嚴格地區分科學與哲學。這一區分至少可救混沌雜亂與夫層次不明之弊。自馬克斯式的經濟思想被介紹到東方來，宣傳者說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是科學又是哲學；既是對於「現實」的「批判」，又是對於人類社會未來的理想遠境之描繪；既是一種「正確的」認識方法，又是一種「鬭爭武器」……妙矣哉！天下有這等「既是這又是那」的「無所不是」的「大體系」。有了這件法寶，豈不是等於有了一切？真是方便之至！難怪許多考大學考不上的天才們，人手馬列一冊，一齊創造新宇宙去了。

知識的特色之一，就在分殊。這一趨勢，只有在西洋學術裡表現得最顯著。自亞里士多德以降，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等等逐漸分殊之形跡，可以證示這趨勢之展進。不獨科學為然，

現代哲學也有這一趨勢。作者將哲學與玄學並列，似乎不太妥當。所謂「思辨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目前正在遭受嚴格的考驗之中；而「專門哲學」(Technical philosophy)正在突飛猛進。二十世紀已無「哲學之英雄」；欲以一人之腦而構造一包羅萬象的體系(An all embracing system)，殊不可能。無他，今日的知識太紛繁故也。涉指太多，勢必漏洞百出。時至今日，能作一切知識之基樞的先驗知識，又不能經公認而成立。奈何！就評者所知，在西洋思想中，最博學者有三大物：一為Democritus，一為亞里士多德，一為Leibniz。評者不能想像，今後會出第四個此種人物。時勢不同了。

作者說：「政治家的目的可能根據一己之幻想，而無學理的根據。政治家須儘可能的接受學人的建議，尤其在抉擇達成目的的手段方面，需完全採納學人的意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政治家絕不可過於專斷及自矜。學人亦應珍視自己的學問，不在權勢之前發抖或屈膝。學術權威的價值，絕不在政治權威之下。」作者所謂之「政治家」，評者不知怎樣界說。就常識而論，忘記私人一時的利害與毀譽而為大家謀求久遠幸福的，算是政治家。評者已經活了一萬多天了，這樣的政治家底影子還未看到，不是瞎眼，便是福薄。如果中國近若干年來真有政治家，一定會如作者所說「在抉擇達成目的的手段方面」，「完全採納學人的意見」。因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必是超自我的，因而一定從善如流。但是，作者應知今日的風氣是認為知識不值一文。教師底薪水不及銀

行學徒。今日不獨非文人不重視知識，即使是知識分子本身也不珍惜知識。知識，在今日似有權勢的人看來，不過是一點裝潢或玩弄的工具而已。至於「學人亦應珍視自己的學問，不在權勢之前發抖或屈膝。學術權威的價值，絕不在政治權威之下」之說，評者聽到了，好像置身伊甸園。但伊甸園祇有夢遊得之。這多少年來的風氣，只重子彈，金錢，與撒謊三者。許多人以為祇要子彈多，金錢多，再加上一點謊言來潤飾一下，一切便「安逸」了。所謂「學術」，是多麼腐朽無用的東西。至於共產黨極權類型者，認為「政治權威」是至高無上的宇宙之父。一切必須俯伏於此一天父腳前。學術不過此天父藉以麻醉迷昏人衆的工具而已，那裡還敢與政治權力一比高下。在這種空間，學術不是以外的客觀世界之實況為對象研究，而係因應實際政治需要而隨時編造的謊言系統。俄產新孟德爾李森科君底遺傳學說便是這種「學說」底代表傑作。他底遺傳學說之真實的要素是：無產階級已被共產黨三十餘年來注射入了許多「美德」。這些美德需要一勞永逸地永久保持下去——必需遺傳下去，所以會遺傳下去的。鄙人現在自覺身材短小，看戲不便，打架尤其吃虧，需要再高三寸。因此，我說，我明天會突長三寸的。今晚睡個好覺等著吧！

只有在民主國家學術才有真正的尊嚴。因為，在民主國家，學術既不需作宮庭的飾品，又不受到權力底歪曲。因此，只有在民主國家，學人才有尊嚴。

在論及治理機構底措施與大量現象(Mass Phenomena)之關聯時，作者說：「因人性及各種

科學的基本大法的限制，故經濟政策或國家干涉亦有其限度。若干基本勢力任何政治權力絕無法凌駕，超過此限，實爲不智，或肇大禍。」這個問題真是根本而又重要。治理機構是否承認並尊重個體有其各自的目的與夫社群有其自身獨立的存在與發展規律，乃民主與極權之最實質的分野。

民主國家絕對尊重個人底尊嚴及其各自的人生目的；承認社群有其獨力的存在與發展。在民主國家，個人和社群是主，治理機構是從。主，有其自身之生命與價值，乃永久常存的。治理機構，幾年一換，根本算不了什麼。因此，治理機構在與個人以及社會接觸時所抱持的心理狀態，絕對不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心理狀態，絕對不是臨之以威，鎮之以力，而是出於服務觀念，如僕從之對待主人，小心翼翼，唯恐有失，否則輿論譁然，時時有請你下臺的危險。這樣的治理機構，既對個人與社群居於從屬地位，於是，彼等在製定經濟政策或國家干涉時，必非常顧及個人及社群現存的狀態。萬一對之採取干涉或限制措施時，必選擇抗力最小的溫和途徑。可能得很，人性是自私的而且是有惰性的，治理機構底措施也許具有遠見因而對於大家有利，但一般人不及見之，或即明知之而不願有所改變。在這種情形之下，治理機構是否可本乎此「真知灼見」而強制執行呢？不可！如可，就不是民主的治理機構了。爲什麼呢？因爲「利益」是一價值判斷。在民主國家，作價值判斷者有而且唯有人民主體。人民主體意願地說它有利就有利，說它無利就無

利。禍福利害，唯主體自擇之。除了創造萬物的上帝以外，誰有資格管這些閒事？治理機構，既不過是大家湊夥委託出來的從屬物，它沒有資格代理大家作價值判斷。至多它只能貢獻專門知識與技術罷了。

極權國家如蘇俄共產類型者則大大不然。極權國家在根本上就不承認個體底尊嚴。不承認個體有其各自底人生目的；不承認社群之獨立存在與其自身之自然的發展。在極權統治者心目之中，他們而且唯有他們自己是主，其他個體與社群是從。統治者與人衆之間的關係，像澳大利亞牧羊人與羊群之間的關係相若。既是如此，治理機構與個人以及社群接觸時所抱持的心理狀態，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心理狀態。因而，價值判斷之權，完全操諸統治者手裡。他說好就好；他說壞就壞。於是，事事臨之以威，鎮之以力，騙之以謊。嚴刻，冷酷，苛板，峻厲，煩瑣，毛細，無情，樣樣俱全。彼等不承認個人底價值與目的以及社群之獨立的自然發展。彼等堅持一套主觀幻構之所謂「建國理想」（所謂「建設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乃理想之一）。他們把「國家干涉」神聖化而爲一種「哲學」。於是乎扭緊龍頭，強使千萬人衆與整個社群「跟著我來」。如有不跟我來者，則「反動分子」，「反革命」，「落伍頑固」，等等帽子上頭，立罹奇禍。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他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天下莫可誰何。他還顧及什麼人性以及社群中的什麼阻力呢？人性，他可以改變；幾十萬幾百萬人，可以消滅，可以遷移。除了有力量的叛亂以外，他們什麼都不顧忌。

彼等之基本觀念是「老子壓得住你一天就壓你一天」。破壞家庭，總是人家痛惡的事，民主政府絕對辦不到的，而毛澤東卻辦到了。多少兒子打老子，多少夫妻被拆散了。不過，我覺得毛澤東「革命不徹底」。如果他真是個「人民」的「革命領袖」，他應該首先與藍女士宣布離婚，「起帶頭作用」也！

作者對於個體底功能，價值，及其與全體之正常關係，闡釋得頗為切合實際。他說：「若人則有意志，有價值判斷，有慾望，有理想，人人有個性的差異。任何大量現象(Mass Phenomenon)均此等不同之個體反應排拒合作之結果。馬歇爾以次的經濟學家，輸入若干自然科學的觀念，如平衡靜態動態，於解釋大量現象至有貢獻，於提供政治家處理實際問題的方法，至有貢獻，但窮究大量現象成立之源泉，仍不能不訴之於個性及心性。且彼等所確立之總量，不能推之無窮大無窮遠無窮久而皆準確。風尚及心理一變，任何經驗的數字，均可改變。誠如康德所云，經驗知識只能說明事象之已然，而不能解釋事象之必然。唯其如此，故個體論(或個別論)的方法，在行為科學上，比在自然科學上更為重要。個人生息於社會之中，但惟個人有感受有慾有主動力，惟個人工作或指揮工作，惟個人生產商品，交換之，分配之，並消費之。群的現象的研究，舍個別論的方法無從著手。一切全體及集體論的方法，均是術語的賣弄，空無所有。社會國家全體只是抽象名詞。社會國家之不能感，不能欲，不能行，正如其不能衣不能食。社會國家及一切全體，只

能藉個人之中介方能發生行爲。且人們只能經由個人行爲之辨識，方能辨識社會國家及一切全體的行爲。經濟學乃至一切人的行爲的科學之採此實際唯一有效的方法，其正確性絕不容否認及懷疑。作者據此斷然反對一切任何形相的集體論及全體之空無所有的方法。」

又說：「個人生而入於有組織的社會環境，只有在此一意義上我們方能接受社會先於個人的說法。在其他的意義上此一說法均空無所有。個人在社會中生活並在社會中行動，但社會亦僅爲個人合作的結合。社會只存於個人的行爲中。於個人的行爲外，求社會生活，實爲幻想。如謂社會有機動的獨立的生存，社會有自己的生命靈魂及行爲，僅屬一種比喻，容易引起嚴重的錯誤。究竟社會抑個人應視爲終極的目的。社會的利益是否應從屬於個人的利益，抑個人的利益應從屬於社會的利益——此等爭論毫無意義毫無結果。行爲永爲個人的行爲。社會的因素只從個人的行爲中方能辨識。目的範疇只能於行爲中方能覺察。神學或歷史玄學討論社會的目的及神意，但科學不能脫離理性，科學不適宜處理此等問題，任何關於此等問題的推測，均無根據。」

又說：「在社會合作的間架內，社會的分子間可能發生同情友誼或利害與共之感。此等情感乃人類最快樂最崇高的經驗之來源，亦爲生活中最寶貴最修整之因素，提高原爲動物的人達到真正人的生活。但視此等因素爲促使社會關係的原始動力，則屬大錯。彼等乃社會合作的結果，只能滋長於社會生活之中，決非先於社會關係存在。」

作者對於個人底功能及其與社會關聯之闡釋，毫無神祕論的色彩，而是實徵的，切實的，經驗的。實在，個人爲人文的活動之最後不可解析的有元(entity)。如果撇開甚至犧牲這一實在的最後有元而談全體利益，如非愚妄，即包藏天大的私慾。全體利益之實際只有在每個個體底利益及其總和中來實現。這也就是民主政治之指歸。我們必須注意，一切極權政治，無論以什麼形式出現，都是強調全體主義，極權政治與全體主義是不可須臾離的。極權政治與全體主義之不可分，亦若其與「哲學」上的一元論尤其實際表現之不可分然。極權政治對於多元論及其實際深惡痛絕，因而排斥不遺餘力。而民主政治背後的「哲學基礎」正是多元論，因而在其實際的表現上也是多元的。例如，多個政黨之平等而獨立的存在，多種不同的思想信仰之同時流行的等等。在全體主義所造成的思想空氣之下，提倡個人論及由之衍生出來的個人自由，被視爲一樁可惡的事體。恰相反，民主政治之出發點正是相對的個人論。因此，個人自由爲民主政治底珍貴財產。由此，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界劃出民主和極權底真正分野了。

關於自由主義，在東方攻擊之的人遠多於瞭解之的人。作者對之有很適當的解說：「經濟學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亦極混淆。流行許多謬誤之見，亟待澄清。」

他說：「行爲學及經濟學奠定之理則，可作極廣泛的運用，不固執具體的內容。縱在使用極淺近流行之術語，如幸福如慾望如功效，均無例外。幸福慾望原不爲物質所限，原不爲具體事件

所限。自由主義則賦此等辭句以具體內容，它假定生優於死，健康優於疾病，營養優於饑餓，富優於貧，並教人如何據此價值標準，採取行動。」

「批評者稱此等事件為物質的，從而攻擊自由主義為唯物主義，忽視人之高尚尊貴的企圖。彼等謂人不僅依麵包而生活，君子憂道不憂貧，學人重真理，美術家重藝術，宗教家重信仰，英雄重節義。彼等極力闡發功效哲學(Utitarian Philosophy)之卑賤平凡。此等感情激越之論，完全曲解了自由主義的學說。」

「第一，自由主義並未肯定人類僅『應該』追求上述之目的，不過謂大多數人的看法，生優於死，健康優於疾病，生活豐富優於貧困。此一說明之正確性，無可置疑。任何反對自由主義的主張，不論為宗教的國家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黨派，對於此等問題均持同一態度。彼等絕不敢向群眾宣傳實行其計畫後，將貶損大眾之物質生活。反之儘力攻擊其反對黨之計畫實現後，將招致大眾之貧困，彼等自己之計畫，則招致富裕。即基督教各派，亦無殊社會主義各黨派，均預許生活水準之提高。現在的教會宣傳提高工資，提高農民所得，較宣傳教義尤力。」

「第二，自由主義者絕不輕視人之智識及精神的追求。彼等確以高尚的熱情，追求知識及道德的完備，追求智慧及美術的成就。彼等關於此等高尚事物或性格的意見，遠非其反對者可比。彼等唯不抱持一般反對者之淺見，即認為社會組織能直接鼓勵哲學及科學的思想，直接產生文學

及美術之傑作，直接能開迪大眾之智慧。彼等認識一切優美崇高之事物，或開創於個人。社會之所能為者，乃提供一種好的環境，使天才之創造能力不遭受不可逾越之障礙，進一步使普通人不為營營求生所苦，而能注意優美崇高之目的。彼等認為提高人之地位之最有效的社會手段，莫如消除貧窮。智慧、科學、美術，容易發達於豐裕之社會，而不發展於貧窮之中。

「指摘自由主義為唯物主義，乃惡意的曲解。十九世紀不但有空前的生產技術的改進，及大眾物質生活的改善，且延長了人的平均壽命，科學及藝術的成就，亦不可磨滅。不朽的音樂家，著作家，詩人，畫家，雕刻家，亦產生於此一時代。哲學，經濟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均在此一時代，成就飛躍的進展。且偉大的著作，偉大的思想，自有歷史時代以來，只從此一時代開始，方普及於平民。」

作者之言，可謂多少道出自由主義底要素。

關於自由經濟與政府干涉二者如何調適，作者也提供了恰當的原則。他說：「……自由主義者洛克(J. Locke)謂自由並非人們可不顧法律任意行動。自由乃指個人只受經過立法程序之法律支配。換言之，即個人生活於一定之永恆條件下，此等條件平等的同樣適用於社會內一切分子，個人不受其他個人之任意的額外的權威(之支配——這三個字是評者加上去的)。法律之目的，非限制或廢止自由，乃根據無法律即無自由之原則保障自由，並擴大自由。」

「國家經由法律決定自由之意義及內容，經濟自由不能超出法律範圍之外。經濟學者之意見：國家之主要任務，在創造法律間架，提供國民以最有利條件以從事各項活動，市場必需自由，此乃首要之點。經濟學家及自由主義者堅持市場之保持。彼等相信此乃最有效之方法，納一切經濟活動於福利全體之途。……」

「反對自由論者，謂如任個人據其自己利益為所欲為，則社會將無發展之可能。自由主義者則謂個別主義必導致社會組織之自動的發展。經濟自由流行之社會，個人即機動的自發的成為社會化。分工所創造的社會組織，極為堅強而合理。分工要求人際間的嚴密合作及時際間的嚴密合作。從此一複雜關係，遂產生相互依存，利益與共之情感及事實。個人在行動中瞬即認識顧及別人的利益即為促進自己利益之最有效途徑。……」

「……任何經濟秩序，均不與無限制的自由融洽。但人能選擇，能判斷，能感，能欲，此均優美崇高之創造力，廣泛的自由。保障此特殊創造力的自由，必需存在。」

最後作者又說：「早如一八四八年，屠克維爾(Aliside Tocqueville)曾批評各式社會主義，謂它們限制自由，以人為工具，於壓迫奴役中追求平等。試看今日國際共產黨的實例，此一預言已經言中。作者堅決相信，人類所享受之自由，只許擴大，不許縮小。一切干涉，應朝著保障自由的方向發展。過去我們已從酋長祭師封建王侯專制帝王的權力以及各式各樣的傳統束縛中解放

出來。每解放一層壓制，人類的精神及物質的成就即前進一步。……」

在這裡，作者原則上指出「政府干涉」如何與自由發展相調適之一大方向。從純理論來說，政府干涉只能視作一不得已而行之的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既然干涉是一種不得已而行之的必要之惡，於是愈少愈妙。砒霜為滋味不佳之物，恐無人視之為珍饈。但為治某病，人需服若干之砒霜。這是出於不得已而然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服砒霜只止於最少必要的限度。絕無人應視砒霜為補品而日日服之。同樣，干涉只可行之於最必要的情形之下。這裡所謂「最必要的情形」，意即「用來制止妨害自由作健康的發展的那些事物」。在這一意義之下，政府干涉，並非一先天的有害事物。這個道理與服適當的砒霜以治病正同。可是，何種干涉是必要的，何種干涉是不必要的，在現代化的複雜社會之中，甚難劃一條判然分明的幾何界線。必要干涉與不必要干涉底劃分，在現代化的社會裡，無疑不能粗略地訂立一些原則，再殿之以政治強制力以執行之。這樣的硬幹辦法，在人民真正有權又有能的真正民主國家是行不通的，我們不難想出，劃分何種干涉為必要或何種干涉為不必要，是一種最細緻的工作。從事於這種工作，不能籠籠統統，而必須就一件一件特殊的實例來制定。可想像地，做這樣的工作，不獨麻煩，而且需要各種專門知識。不僅需要各種專門知識，而且需要有機會讓專家就原則上看看各部門之所行有無衝突之處，並且推論有無可能抵觸的結果。而最根本重要的是，從事這類干涉工作的政府之心理準備是必須將統

治意識打掃得乾乾淨淨。有了這種心理準備，技術上的困難也就可以減少了。可是，這不是非民主的政府所辦得到的。非民主政府底統治意識，是打雷都打不掉的。假若非民主的政府兼營利潤事業，它底利益與民間營業衝突，那麼要它在一開始心意初動之時顧全大家的利益而減損自己底利益，其難有甚於從虎口裡掏肉。休想！

所以，這個問題還是歸結到施行干涉的政府是否被人民大家所控制的政府。如果施行干涉的政府人民大家能夠控制自如，像牧童牽著牛鼻子，要牠往東就乖乖地往東，要牠往西就乖乖地往西，那麼一切都好辦：即使干涉得過火了一點，也很容易改正過來；即使有予大家不便之處，也很容易通過言論自由集合衆意予以糾正。可是，如果施行干涉的政府不是人民大家所能控制的政府，那麼光景就大不相同了。如果施行干涉的政府像一座金剛菩薩，它儼然高高在上，冷冰冰，嚴酷酷，死板板，人民大家對之只有燒香叩頭，只有頂禮膜拜，只有讚揚歌頌，那麼施行干涉政策則如爲虎添翼。其結果如何，是不難親身嘗其滋味的了。

因此，施行干涉政策，除了施行時的技術問題必須注意以外，尤其必須考慮到在什麼人文環境和什麼政治基礎上施行。砒霜吃多了是要毒死人的。假若世界上真有因過份放任而致互相剋制的自由經濟情況，那麼適當的政府干涉誠爲必要。可是，如果政府干涉以致自發的生機瀕於奄奄之境，那麼，爲了一個有春天生意盎然的遠景，與其接受干涉以作岩下之草，不如選擇放任以作

柳頭之枝。

從這本書底行文，造句，和用字這一方面來觀察，作者似乎並不太隨便。有些名詞譯得非常精彩。例如作者將Category譯作元範，就頗不違原意。但是，有幾個名詞之用法評者頗不以爲然。作者有好幾處用到「邏輯」一詞，至少，現代西方純正的邏輯家沒有作者底那些用法。依現代邏輯家，邏輯只是一組語法規律(a set of syntactical rules)。又作者在好幾個地方用到「批判」一詞。就評者之所知，這隻好名詞兒，是由日本左派介紹進來的；純正學術書上未見過它底芳踪。而最嚴重的是，作者提到「政府干涉」時，作者都說是「國家干涉」。顯然得很，政府不就是國家。這二者絕對不可混爲一談；雖然有些人希望有計劃地造成許多人「政府即是國家」的印象，甚至於造成「政黨即是國家」的印象。這種心眼兒，正是洪水滔天之一源，存這種心眼兒，國家一輩子搞不好。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爲公」，當然，以作者學識之淵博，絕不會這點常識也沒有。諒係一時之疏忽。評者因覺這些名詞底分別，與思想觀念之正確與否相干，所以特地指明出來。

——原載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七卷四期

附記：本書爲周德偉著，中國經濟月刊社發行。

羅斯福夫人回憶錄

我讀完這本書所發生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羅斯福夫人是一個偉大的女性」。評者知道此語一出，一定有許多東方人異口同聲地說：「那還不是靠了她底丈夫！」這是不正常的社會裡極其自然的反應。在這個不正常的社會裡，人們底聰明才智都沒有機會作獨立自由而正常的發展。大家要活命，或者要滿足一部分支配欲，必須倚靠一個Leviathan，一個私利組體。如果善能迎合並適應這個Leviathan或私利組體那些俗套，心性、私意、習慣，並甘受其役使，那麼即使是學問人品最不堪聞問的人，也可以爬到大家肩頭上來，揚揚乎大街之中；如其不然，即使你個人本身底學問人品再好，你底最佳命運，只合窮病潦倒以死。此之謂「反淘汰」。在這種「反淘汰」作風的

風行之下，久而久之，人們不信有由個人底努力得來的名譽和地位。有之，就是「因人成事」。因此，評者一說羅斯福夫人是個偉大的女性，許多人會很自然地認為那是「妻以夫貴」。評者要追問一下：即使大家不信一個人會因他底努力而有成就，必須依附權勢才行，然而，他所依附的第一個權勢又是那裡來的呢？是不是人創造的呢？如果是人創造的，人當然可以再創造。世界是這樣廣闊，坐井觀天是可悲的。我們最好別「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方法來瞭解這個世界。否則，我們一輩子將陷在這個殘存的污泥沼裡，一點新的希望也沒有。別人底環境與我們多少不同。我們不要太習慣地以瞭解我們所處環境的想法來瞭解別人。我們不要忘記，羅斯福夫人所處的是一個民主的環境。在民主的環境裡，那非民主環境裡一個而且僅僅一個人可以創造的名譽和地位，人人都可以有自由創造的機會。

許多人以為民主與極權底分別在於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這種顯然易明的說法固屬不錯，可是，如果我們以為民主與極權之不同僅僅在於政治制度，那麼我們所觀察到的，將屬表面之表面。民主與極權之不同，不一定在乎形式。一個極權國家，可以在形式上裝得與民主國家相像甚至於可能比真實的民主國家裝得更加「民主」。如選舉哪！許可在圈圈裡頭有自由言論哪！因一時政策上的需要而給予的宗教自由哪！種種等等，不一而足。據說蘇俄選民投票之百分比為全世界之冠。所以，現代極權國家無不嘵嘵而辯，說自己是「最新的民主」。在另一方面，老牌子的

民主國家在形式上反倒不像是十分民主的。英國直到現在還有國王。其實，認真說來，民主的形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倒是民主之實質。同一樣式的糕餅，可以是麵粉製的，也可以是雞蛋製的。二者底外形雖然如此相同，但二者底營養價值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民主的實質之所以與極權的實質不同，根本在於它發衍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人文環境，歷史條件，生活習慣，以及思想方式。單就哲學思想來說，近世以洛克爲首而衍出的海洋型類底思想，重解析，重經驗，重試行，重運算，重假設，較枝節，富於懷疑精神，較承認多元的存在。這一類型底思想，與上述其他條件伴合，天然地在政治上容易產生民主的。而這一路底思想與大陸類型全體主義的思想，則根本大異其趣。黑格爾底玄學，到了右派手裡就成了軍國主義之基石而轉成獨裁政治；到了左派手裡翻一個根成了所謂「辯證唯物論」而護飾了極權政治。這都不是完全偶然的事。願以民主救東方之亂的好學深思之士對於個中的脈絡深加思究。凡在思想上找不到正當可行的道路的人群體，在行動上鮮有不迷失大方向的。

在這本回憶錄裡，羅斯福夫人報導她底丈夫和她底一些瑣細之事。由這些瑣細之事裡，我們缺乏民主生活經驗的東方人可以多少領略到民主生活經驗是怎樣的經驗類型。

在寫這個回憶錄的時候，羅斯福夫人一開始就說：「對於他（指其夫羅斯福總統——評者），我並不以爲我的態度能夠完全客觀。」請讀者切勿忽略這話。這話就可充分表示有民主的思想

和說話習慣者與有極權的思想和說話習慣者是怎樣地大異其趣。從一種意義言之，民主的思想者是一些相對論者；而極權主義者則無一不是絕對論者。茲以具共黨性格的這一路人們爲例。這一路的人們在政治上是絕對主義者，在思想上亦然。他們自稱世界上一切「真理」都握在他們底手裡。他們認爲他們之所言無一不是「絕對的真理」。他們從來沒有反省思考的習慣。因而，他們從來不稍懷疑自己底信仰。彼等既自以所持爲絕對真理，並且自以爲負有實行此真理之「時代使命」，於是進而強迫別人接受其「主義」。假若有人對其「主義」稍示懷疑與批評，便被認爲「思想動搖」。思想動搖者，殺之無赦。富於民主思想者沒有這樣絕對的狂妄。他們知道真理是多元的。人底知識能力極其有限。如果你認知了這一角度的真理，也許別人認知了另一角度的真理。因此，他們自幼就在教育中養成了寬容異己之見的心胸，和對自己懷疑反省的心理習慣。因而，富於民主思想習慣者很少肯定說一己之所見是絕對的真理。羅斯福夫人之所言，就是有懷疑精神與自反修養之示範。一個妻子，由於感情之蒙蔽，很自然地容易帶著感情的眼鏡來看她底丈夫，何況是一個大有作爲的丈夫？羅斯福夫人自反到這一點，而且很坦白地說出來，說她對於她丈夫的態度恐怕不能夠「完全客觀」。憑這一點，羅斯福夫人就足夠是一個偉大的女性了。

我們切勿以此爲不經意之言而視之爲小事而忽之。這一類本乎懷疑精神與自反習慣來思考和說話，是到民主之路之最基本的心理起點。

羅斯福夫人表現這一類底心性之事例還多著哩！「路易還堅持著我該學習演說；當我演說的時候，他甚至坐在最後一排去聽我講，聽畢再給我談我的錯誤。有一次他問過我：在我的演說裡爲什麼在某處笑起來？」啊！我都不知道我笑了，我說：「沒有什麼理由要笑啊！」我知道沒有，路易說：「那麼你爲什麼要吃吃傻笑呢？」

羅斯福夫人在這裡所說的路易，不過是祕書一流的人物而已。祇有在民主國家，祕書才可以這樣批評上司，才可以把她當作學生來教。因爲，在民主國家流行不了「超人」觀念。他們覺得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因而，在民主國家，人與人之間不易因政治地位不同而發生種種奇奇怪怪的地位差異。既然如此，於是人與人就好接近，因而也就容易吸收別人底長處。

她記述她底白宮生活，是滿有意義的：「那次進白宮去的情形，我記得極清楚。我忽忽忙忙地穿過拉法葉方場，因爲我怕遲到。我筆直走進白宮廊裡去，心裡還存著無限的畏怯。我想到當我的丈夫是海軍部次長的那些時日，我慣常開車經過白宮，想到住在那裡面該會感到何等奇奧。現在我正將卜居於此，雖然百感交集，卻絕無任何奇奧之感。」

「無意中我做了許多使那些管事們吃驚的事。我第一個行動是堅持自己開電梯，而不去等候司閘來代我開。這正是總統夫人從未做過的事。」

「我要在我的起坐間裡裝一具電話機，過了兩天還沒有動靜。我去詢問，才發現裝電話機的

工人不能到我房間裡去。因為我離開那間房的時間不夠他們去裝好電話機——當時大家認為總統夫人在房間裡的時候，工人同時在裡面做工是不合適的。我即刻作了補救，堅持著工人在我旁邊工作對於我是司空見慣的。」

「我的丈夫總為我計劃生日歡宴。他知道我不喜歡無謂的鋪張，常常祇邀請我特別關心的朋友們來晚餐。但是，我祇要不成為人家注意的中心，我便常常快樂。」

羅素說過，奴隸與奴隸之間也是平等的。顯然，這樣的平等是含著眼淚的平等，是悲劇性的平等。因為，在這個「平等」之上，有一個絕對性的不可反抗的主宰。真正有的人生價值的平等是在一個真正自由的環境裡培育出來的平等。而民主的環境才是真正自由的環境。於此，在這種環境裡成長的人，即使身居「顯要」的地位，也沒有阻塞她底平等觀念之自然的流露。羅斯福夫人在白宮生活上的這些瑣事，是真平等之絕好佐證。

我們再看她對於她自己所屬的民主黨的態度。她說：「一九三六年，當我們到華盛頓去的時候，富蘭克林（評者按：富蘭克林即其夫）接受盛大的歡呼。他第二任的開始是非常吉利的。他在國會裡有極大多數的民主黨支持。黨員們篤篤定定，他們開始相信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他們要做的一切。這是一種不良的態度。任何團體的人員都不該採取的，尤其是當他們正在負責順利地治理一個大不景氣之後剛剛穩定下來的國家。」

這是何等的風度！這是何等的識大體！羅斯福夫人對於當時自己所屬的一黨這種「有恃而無恐」的心理之指責，完全係從國事艱危的大處著眼，叫他們不要因一黨勝利而欣然自得，而忘記困難，而忽略大者遠者。這種指責，可謂「責以大義」。責以大義者，自係以大義領導人衆。以大義領導人衆者，自係不以黨派私利爲前題，而係以國家公利爲前題。這樣的國家，未有不臻於正常豐隆發展之途的。與此相反的一種攝納方式，就是藉現實利益與欲念激發以熏製出人衆只知道獨特之Leviathan，以及與其特殊的聯繫。在這種「熏製」之中成熟的人，幾乎個個形成一種心理狀態，即在獨特個體蔭影籠罩之下，人人自以爲「篤篤定定」，「有恃而無恐」，肆行無忌；即使在實際上不過飄浮乎一片浮萍之上。由此熏製出來回分子表面似甚噴張，實則人格尊嚴早被剝奪，獨立意志連根拔掉。彼等無復一人憂在天下，無復一人真心以億萬事爲念。彼等之所孜孜者，厥惟發展私的關聯，並擴大私的利益。這種習性之根深蒂固，儼成第二天性。這種第二天性，從地老天荒，雖新的冰河來臨，亦不能稍有改變。即使溝隔一條，洪水滔滔，猛獸橫行，哀鴻遍野，天崩地裂，亦不能稍轉移其注意力，亦不能稍稍改變其附庸，蒙騙，與傾軋之基本興趣。真正的用心重點放在這一層面，怎樣能在世界新冰河期裡發生大的作爲，實爲不可想像之事。

我們再讀本書這一段：「我的丈夫常常對我談到他和胡佛先生從白宮坐車駛往國會去的一段故事。他談起當時他在這位極沉默的伴侶面前如何設法保持著愉快的談話。群眾正在歡呼的時候，

我的丈夫便不自覺的回答他們，直到他忽然發覺坐在他旁邊的胡佛先生一無動靜。當然在我丈夫的內心和思維中，有的是希望。但是他明白坐在他身旁的人，其心情卻和他並不相同。」這樣處人，是何等的細緻！

這一段所說的是一九三三年胡佛在不景氣中去位，而羅斯福總統就職的情境。當著我們東方人讀到這一段的時候，幾如閱讀天方夜譚。西方政治領袖之相處，是有著何等的風度！這不是偶然的。這是長時期民主環境裡培育出來的襟懷。歷史使我們知道，在東方古老的空間裡，歷次之改朝換代，幾乎無一不是弄得天翻地覆，殺人盈野，血流漂杵。除了一二次例外的「禪讓」以外，似乎沒有一次是客客氣氣上臺，客客氣氣下臺的。幾乎每一次總是弄到最後膿疱破皮，不堪收拾，砍殺一陣，死些無辜的人，才算漸告段落。至於政敵相見，不是「援弓而射之」，便是「彼可取而代之」。那取代的人，對於被取代的人，照例是要他底老命，斬草除根。幾千年來，這樣的悲劇，循環不已。政敵，就是生死存亡之敵。彼此不承認對方的生存權利，遑論顧到失敗者心情上的不安？當然，形成這一連串悲劇的因素並不簡單，但古老的文化是否因素之一？「唯我獨尊」的絕對主義之培育是否應負其責？無條件地衛護東方古老文化的人應須冷靜想一想。人間沒有完全美好的事物。我們應須不從一個窗孔不從一種史觀來看過去。將過去看清楚，才可能端正未來應走的方向。否則只有延長並助長禍亂而已。

羅斯福夫人又提到她處理函件的事：「先和文書局局長賴爾夫，馬基先生商討過，我們才發現在那些前任期間，大部分的信是用印好了的和規定格式的覆信回答的。馬基先生甚至還有克利夫蘭總統任內覆信格式的副本。不論寫信的人是為教堂主持的賣物會請捐一塊手帕或一頭白象，他們會得到這類的答覆：『某某夫人曾接獲此類之請求太多，因此目下無法允予所請……』」她又說：「我堅信當時情形既太嚴重，請求又迫切。這些信件不宜於用那種方法去回覆；因此我的信沒有一封是用某號某號格式的信回覆的。」

我們不要以為這只是一件寫信的小事。這件小事所表徵的，是羅斯福夫人對人事的想法。她底這種想法，是道道地地的民主的想法。在非民主的地區，治理機構之對一般人民寫信，是「例行公事」。一成例行公事，你所接到的便是冷冰冰，硬僵僵，死板板一些印刷格式，不是苛細的令你頭昏眼花，便是帶些強制性的命令口氣；甚至於要你出錢的事也不例外。你在這些格式上面，感覺不到一絲半毫人情的溫暖。這些格式底構成，也不是偶然的：它們也表徵著行使格式者對於一般人民的根本觀念。這種根本觀念就是：你必須時時準備聽我的。可是，從羅斯福夫人處理信件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民主思想者與一般人民之間，是溫暖的，是有人情味的，是有血肉關係的，是充滿了同情心的。由此可知，羅斯福夫人輔佐她底丈夫，實行新政，渡過大不景氣，對軸心作戰，以至於勝利，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還有一件事可以看出羅斯福夫人底心胸：「一天早晨，富蘭克林剛剛離開華盛頓，我到火車站去接一次車。因為這一班車遲到，我便在總統候車室裡稍留片刻。這間房那時已改作軍人問訊處。我在那兒親筆簽了無數次的簽名，並且儘可能和許多人談話。我聽那班車會到得很遲，於是就起身在很壞的天氣裡走回去。一個年輕的一等兵問我他能否陪我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本薛凡尼大道走著。我問他的一班車在什麼時候開。後來知道了他直到傍晚都沒有什麼事，我便請他到白宮吃午飯。我根本沒有想到請一個穿制服的人吃一頓午飯有什麼大不了。但是，當我把他帶進來，告訴他們說，他要留在這裡吃午飯的時候，那些警衛人員以及其他的侍從人員都是滿臉不以為然的神氣。他們曉得我不知道他的底細，並且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動。我卻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危險。富蘭克林不在這裡。我又不會給他什麼有價值的消息；而且我也絕不致是一種反叛行動的目標。」

這是何等坦率的心胸！只有在民主的環境裡的人才能培育出這樣可愛的心胸。一個小兵可以隨便進總統府而與總統夫人並餐。誰說民主國家沒有平等？恰恰相反，極權國家則上上下下充滿了猜疑的空氣。史達林所走從住宅到克里姆林宮的一條路。是世界警衛最森嚴的一條路。這一條路絕對禁止百姓行走。至於小兵之流，除非作個樣子「召見」一下，那裡還能進克里姆林宮一步？

民主和極權是何等的一種對照！

極權和獨裁一樣，總是儘量將少數權力者形容渲染爲神祕的超人。蘇俄共黨之流底報章，雜誌，甚至於書籍，多用來做這種好勾當。人一成超人，他底一舉一動便顯得與衆不同，而且在任何情況之下永無失誤。這是神權政治之近代化而已。民主國家斷乎沒有這一套愚民作風。民主國家底公僕則總是以人底本來面目與大家相見。他與我們大家一樣，是平平凡凡正正常常的人。他有人底長處，也有人底短處。凡人都有錯誤，他自然也有錯誤。所以，祇有民主政治才可能是最合人性和人情的政治。這樣的政治，我們在羅斯福夫人的這本回憶錄裡所記述的細小事件上，可以很親切的體味到。這本書所給我們的，不是宣傳，而是這方面底一個具體的真實的榜樣。

——原載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七卷九期

附記：本書爲王維達譯，今日世界社出版。

莫斯科的寒夜

「莫斯科的寒夜」這個名字似乎是很詩意的。然而，這個詩意所隱含的，卻是人間無限的悲情。莫斯科的寒夜尚有春來轉暖的時候。然而，莫斯科人民心頭的嚴寒，正不知何年何月轉暖！

人類在洪荒時代的敵對是自然界。那時，毒蛇，猛獸，洪水，旱荒，疾疫，在在都威脅著人類底基本生存。然而，近三百餘年來，特別自近一百五十餘年來，由於科學昌明和技術發達，使自然界對於人類的這些威脅大為減少。在世界的文明地區，毒蛇猛獸遠避林澤了，醫藥之進步減少疾疫之害並且延長了人類底平均壽命。文明人類並且知道怎樣「征服自然」，利用天然的資源了。這樣說來，人類應該過著和平、安樂，和進步的日子。然而，今日人類中的大部分正陷入恐怖，

苦悶，和徬徨不安之中。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因爲人害人！

今日世界不安之總的原因，是，代替自然之危害人的，乃人之危害人。而人害人之根本組織機構，乃極權空間的極權政府。在極權空間，如果一個人不發「配給」，成千成萬的人就會餓死。世界那還有比這更大的人爲災害？舉凡行路，居住，說話，無一不照少數人任意的「規定」行事。天下那還有比這更可惡的事？時至今日，事實很明顯地擺在大家面前，極權空間的極權政府，正是今日世界萬惡之源！此萬惡之源一日不去，世界即一日不安，人類即一日籠罩在恐怖氛圍之中，和慢性集體死亡之厄運裡。

什麼叫做極權政府呢？簡略地說，事事要管，人人要過問的最大政府 (the greatest government) 就是極權政府。蘇俄共產型類底政府乃極權政府底典型。其他小極權政府則是這一政府之完備的或不完備的摹擬。極權空間的極權政府之最大的特徵，是利用群眾之渴望或飢餓或恐懼或無知，外表披上一層理想主義的或擬似理想主義的外衣，骨子裡高度集中並且運用一切可能集中和可能運用的壞惡勢力，構成層層節制和格格分離的流治機構，統治少數利用此統治機構高踞廣大人衆之上，專斷而無限制地發揮其權力狂慾。在極權統治者眼中，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學，甚至於哲學、文學、歷史、藝術，無一不是權力底手段，只有權力本身才是目的。權力即

一切；因而一切即權力。在極權統治之下，男女老少僧人娼妓都在編組之列。天上的雲和地上的草，過去的死人和娘肚中的胎兒，飛機舟車之運行以至個人底思維活動，無一不說成與「政治有關」，因而無一不要套入那政治的「體系」之中。這樣，亙古未有的包天蓋地的極權統治於焉形成。於是，無一人可自外於政治，無一人不受控制，無一人不被縛於蜘蛛網中。於是，慘禍作矣！生民苦矣！世界危矣！在《莫斯科的寒夜》這本小說裡，我們可以約略窺見極權統治的真面目。而且，這本書反襯出一種理由。這種理由，就是我們爲什麼必須反對共產極權類型的統治之真實而且正當的理由。

讀一本書而且如果此書有序言，有些人先看序言，有些人後看，有些人也許根本不看。評者之讀這本書，是先讀了譯者序言的。照評者看來，這篇譯者序言是全書底精華；至少，它的價值不下於全書中的任何一章。這篇序言不獨勾勒出全書底結構和重點之所在，並且將本書所描寫的俄國人民的基本心理情狀刻劃出來。由譯者底刻劃，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意象：俄國人民正在寫著一首慘厲而悲壯的大史詩。

譯者說：「……他們的心裡希望和失望交疊著起伏；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期待著一點點的安慰；時時刻刻在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抗拒的——命運威脅底下苟延殘生，雖然他們是多麼的愛生命呀！」真的，在極權統治之下的人民，「雖然他們是多麼的愛生命」，可是誰個又不是「時

時刻刻在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抗拒的——命運威脅底下苟延殘生」呢？這是一切極權統治下的人民所共同的命運。

序中又說：「……他是個相信定命論的（俄國人民族性裡恐怕就有相信定命論的傾向，所以馬克斯的那套歷史定命論容易在俄國傳佈。），定命論者當青春的朝氣已經喪失的時候，便會變得悲觀而接受現實，聽任命運的宰割。……」這幾句話是多麼深刻的確，當著一群人沒有遠大的眼光而且又沒有深厚的理性基礎作行為的指針時，在他們憑一時血氣之勇衝殺一陣之後，或造成一陣時尚之後，如果血氣之勇衰退了，他們便只有變得更疲憊。更疲憊的人一定會變得比一般人更悲觀而且更接受現實的擺佈。當著人們更悲觀而且更接受現實的擺佈時，他們只好受比他們品質更低下但卻積極行動的人之宰制。依照事實看來，不僅俄國人是宿命觀的，衰老的東方大陸民族多具有這種性格和心情。因而，馬克斯得以代替東方正教；馬克斯也代替了那失靈的一尊之神！於是形成這個時代的悲劇！

譯者序裡又說：「本書另一個最大的成功的地方，就是強烈地描繪了這一個對立：集權國家的力量對著個人靈魂的獨立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本是算不完的賬，但是假如集權國家的力量不是如此殘忍可怕，怎麼能顯出人性的如此的偉大和可愛呢？看了這本小說，我相信讀者應該對於人類的前途感覺到希望的。」

在這段話裡，譯者似乎不經意地將「政府」與「國家」混爲一談。俄式極權政府正在有計劃地製造「政府即國家」的意理。既然「政府即國家」，於是反對政府即是叛國。叛國者人人得而誅之。這是「理論魔術」之一。這種理論魔術之目的，乃在掩護極權政治，讓群魔們的統治之魔鈎與吸盤永遠釘牢於社會之政治、經濟、教育，……任一層面，和每個角落，使統治者得以永遠規持著社會的機體，而造成二者牢不可分之局勢。這種狠辣，真是亙古未有！所以，爲要擊破極權統治，吾人必須首先在觀念上分清「政府」不是「國家」，國家也並不是政府。美國自弗基谷開國以來，三百年於茲，政府已經換了三十四次，然而美國還只是一個美國。未聞有三十四個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情形亦莫不類此。怎麼可以說「政府即國家」呢？

譯者所提極權政府之極權的集體化之力量與個人靈魂之獨立性，二者是對立的。這是今日自由人所面臨的一個性命交關的根本問題。今日共黨型式的極權政治與反共黨型式極權統治二者之衝突歸根到最後，就是集體統治與個體自由之問題。民主政治下的政府管理與組織根本係來自人民，所以它們不與個體自由相剋；不僅不相剋，並且是成全或保障或擴大個體自由。在民主政治之下，管理與組織同個體自由得到適當的調和，或可能得到適當的調和。從輿論看來，很少英美人士對政府管制感到大不舒服，或感到政府之存在乃一千斤重擔的。在極權政治之下則不然。現代極權政治無一不是由少數野心份子藉口革命騷亂而施用陰謀權詐欺騙群眾所形成的。彼等於利

用這些方法奪得政權以後，爲了鞏固奪得的政權，勢必採取較諸昔日更爲苛嚴猛厲的手段。這些手段一行，個體自由當然隨之化爲烏有。極權統治之形成與鞏固，乃建立於個體自由的消滅之上。有極權統治便無個體自由，有個體自由極權統治便無法維持。所以極權統治簡直先天地是個體自由之死敵。於是，在極權政治之下，「集體」（指被規制的「國家」，「階級」等等）永遠與個體自由相衝突：不是集體被利用來消滅個體，便是個體起而驅逐規制全體的人。這是現代人爲的人與人衝突的基本形式之一。在這一衝突中，譯者提示了樂觀的希望。在如願的想法中，評者願意接受這一提示；可是，如果我們肯正視現代科學技術所加於統治技術的威力已經達到什麼程度，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出歷史上的解放運動都不足爲憑以推斷將來了。何況即使在歷史上，人類還經過了長期的中古時期呢？如果我們愈肯細心觀察與分析，那麼便愈驚異於大多數人底思考力之薄弱與觀察力之遲鈍。現代極權統治不獨控制了個體的身體行爲，並且嚴密地控制著個體底觀念活動。一個人底觀念活動大部分是以感覺基料 (sense-data) 或由感覺基料衍出的材料爲基礎。而這一基礎自幼就由極權政府來規定，包辦，供應，又復藉控制電訊交通而與外界隔絕使你自幼耳濡目染無非是那一套，再也沒有別的現象和思想以作比較。這麼一來，除了極少數特出的人以外，誰能跳出觀念的牢籠？觀念上跳不出牢籠個體，又如何而與「集體」抗爭？這是現代極權統治藉現代科學技術造成的一個史無前例的局勢。這個局勢大大地增加了極權統治內部個體鬥爭的困難。這

是當前反共黨型式的極權統治者的一大難題。談到這裡，評者以為，我們今日與其在雲裡霧裡高談「歷史精神文化」和「唯物唯心」那些毫不相干(irrelevant)的空論，不如把聰明才智用來解決這類相干問題。(所謂「相干」，這裡有一個嚴格的定義，但茲從略。)

譯序又說：「當福開森在開羅一聲叫喚的時候，『哦，維姐莉亞，這個世紀是多麼的長呀！』他道出了二十世紀人類的苦悶。凡是遭遇到不幸的人都有『生不逢辰』之感，可是我們在這個短短的半個世紀中，已經經歷了兩次大戰，個人自由和個人幸福差不多處處碰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這個世紀不是一個特別不幸的世紀呢？下一個世紀是不是要快樂一點呢？」的確，現在每個有識見和靈性的人都有這種感歎。然而，形成這種感歎的正是集人為災禍之大成的極權統治。這感歎是因極權統治之形成而發生的，所以還得要從極權統治之潰滅而消失。看情形，至少這一代的人，必須走一段艱險的旅程，長期堅持地硬挺下去，促使極權統治在大地上潰滅，像泡沫在水上幻滅一樣，然後才有好日子過。

在譯者所述的這種規模之下，這本書用各種描寫方法從許多角度來展開它底內容。評者現在將最有興趣的地方提出來品味品味。

在第六章敘述「一個女革命家的幻滅」中有幾句話說：「於是列寧死了：這是一個大打擊，好像他們自己的一部份死去了，變成木乃伊了；但是他們想起了正有人把列寧的屍體用香料煉

製，覺得非常討厭，認為是件荒唐之事，把好好的一個人變做偶像，只有東方的宗教才會這樣做，列寧知道了一定也要反對的。」藉著「革命」而起家的集團，豈但把死人「變做偶像」，而且更把活人也捧成偶像哩！史達林明明是個混世魔王，他卻深住宮禁，被人頌為「太陽」。毛澤東明明是個滔天狂寇，共黨卻把他奉若神明，把他底那副貴相塑成柏拉圖的樣子。真是混賬已極！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搞呢？原因很簡單：非此不足以愚衆。其實，這一類的傢伙不過偶然攘竊著權力而已。有了權力，便神乎其神。拆穿了底子看，這些傢伙盡是些險狠刻毒之徒。他們比街上隨便那一個小販都不如囉！

但是，人而有「聖人」之說，卻是這套魔術之思想的先導或老底子。民主國家根本沒有這個高貴的傳統，沒有人相信人而有異乎常人的「聖人」。所以即令有人要把國家行政首領捧成「太陽」，總也捧不起來。四年過後，如果大家不選舉他，那麼他和大家是一樣的平民。杜魯門底女兒也要叫他一聲「米斯特杜魯門」！父女相顧大笑，天下太平！

第十二章談「權位的爭奪」中，有幾句話頗具代表性：「好吧，」蘭吉說：「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小群老布爾什維克黨知道他們快要死了。他們知道，假如他們據理力爭，假如他們吵鬧公堂，那麼關於他們的事，就不會被公佈。他們將要就此失蹤，什麼記錄都沒有。……」這是布爾希維克迫害異己的典型手法。鬼只敢在黑夜走路。天下一切壞事都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出。極權統

治底惡行必須藉黑暗來掩護。這說明了在極權空間爲什麼「祕密」如此之多。極權統治者之所作所爲都是經不起推敲分析的。所以，他們如果不能製造歪曲的「理論」來辯護自己的惡行，便索興不許公開進行辯論。又說：「他們知道老頭兒的脾氣，他就頂愛人家坦白。」什麼是「坦白」呢？一言之以蔽之，就是讓你自己做你自己底特務。特務對你實行調查，不獨費事，而且總有遺漏之處。一般而言，一個人對於自己底特殊行爲之所知，總比別人清楚，於是乎自己「坦白」一番好了。結果，你底私事，他們毫不費力地通通知道了。「坦白」，大家公認是一種美德。如不「坦白」那還要得？豈不受「群眾」制裁？共產類型者玩弄名詞之用意，大抵類此。可不懼哉？

第十七章描寫「莫斯科的寒夜」裡有一段話頗值得注意：「外國人都喜歡莫斯科就是爲的這個：因爲大使館一個頂窮的書記，比起任何俄國人來吃得好，穿得好，房子又暖，住得也好，權利也多，生活也安全。外國人的安全，他自己是知道得不大清楚的，因此他總覺得斯拉夫民族精神很神祕；他看不清在俄國所特有的恐懼的徵象，他看不清俄國人的自尊心已經因長時間生活在恐懼裡而變成麻木了；俄國的官僚政治造成了恐懼，可是外國人就在官僚政治的邊上生活。因爲他的地位特殊，並不覺得恐怖，他反而把這點事實看不清了。……」這段敘述，可謂相當深刻。但不知自由國家駐外使節或觀光的人幾個能有這樣銳敏的觀察力。在極權空間，人民如有自由，不是上帝賦予的，而是地上的統治機構「給與」的，像配給口糧一樣，給與多少你就享受多少。

如果沒有給你某項自由而你享受，立招莫測之禍。俄式極權政府對於外國使節，因著外交上的利害關係，常給予他們以較多的便利。但是，如果他們沒有本書著者同等的觀察力，因而以為水中的魚兒和他們這些水上飛掠的燕子同樣自由快樂，那麼他們就是睜起眼睛受騙了。

這一章裡又說：「在這個『死靈魂』的城市裡，精神屈服在農奴制度之下，不論多少人，只是紙上的一個統計數字，在交易的桌子上可以買來賣去，現在當然是在戰爭中可以隨便犧牲掉了：『靈魂』成了農奴的別名。當然那種沒有靈魂的，沒有感情的，純憑體力見長的人是會起來了。他們根本沒有感情可言，沒有倫理上的顧忌，也不顧一切落伍的道德觀念。他們只是維持自己的肉身。可是肉身外面所包的一層皮是如此的厚。他們的主人的鞭子落下來，他們是不覺得痛的。」這一段話所描寫的真是深刻極了；讀起來也真是驚心動魄極了！這就是布爾希維克式的「革命」之果實，也是提倡「辯證唯物論」的果實。由這一段話裡，我們可以知道，極權統治根本不能與民主政治並列。因為，民主政治固然不免有毛病，但畢竟是人的政治。而極權統治從頭到尾不是人的政治：極權統治不過是管理「人畜」(human cattle)的一種方式而已。這種統治只要行之稍久，保險所有被治的人之尊嚴，美感，智慧，被剝奪殆盡，都變成畜牲。吾人須知，與商業社會比較起來，農業地區距離極權統治更近。農業地區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形態，祇差幾步，就可以上極權統治。因此，農業地區之老底子，最易沾染極權統治，至少蘇俄之一例，可作佐證。

據此，吾人可知，鼓起勁來扯住農業地區底思想形態並且誇而大之，如果真能發生實際影響，則結果如何，不問可知。打強心針的郎中們，別再自我陶醉吧！君不見！史達林滿喜歡俄國舊日的事物，大概尤其欣賞伊凡第四底玉照。希特勒更誇耀日爾曼過去的光榮和血統。用柏拉圖底術語來說，祇有藉這類底方法，才能「抑止」(arrest)社會底進步。社會底進步被抑止住了，「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才能穩坐陽臺之上。君不見！史達林老仁兄還兼任「哲學大師」哩！

第二十一章有很精彩的對話：

「啊，現在這一批一九四一——四二的青年團，在幾年之內也可以決定大局的，結果是對我有利或是不利，那時再看吧。」

「替厭倦乾一杯，」我說，把杯舉起。

「當然這個你也知道。這些小東西在十三歲左右，正是腦筋發育的時候，他們就把他們帶走，把馬克斯——恩格斯——列寧——黨——無產階級那一套話灌輸進去，把他們變成狂熱的信徒。可是你知道，我總以為狂熱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少了。你瞧，他們聽那一套東西聽得厭倦了，厭倦得厲害。很短期之內，他們會到各處去找尋新花樣的。」

「爲什麼幾年之前，他們不厭倦，今天他們就厭倦了呢？」

「他們的師傅對於那一套東西，也覺得厭倦了。有其師，必有其徒。今天的情形就是這樣。」

馬列那一套東西，全是枯燥得要命，而且沒有人再信它了。它變得像教會裡的教義問答一樣，你得把它背熟，可是同現實生活毫不相干。」

「你的結論呢？」

「下一代的人要變得有人性了。」

這一段對話將極權統治之下馬、列，等等「主義」底作用以及若干人民底反應說得頗為透徹。如果我們說極權統治之下有所謂「計劃教育」，這簡直太客氣了。實在說來，「教育」與「訓練」究竟是兩回事。「教育」是對人的，只有人才需要教育。馬戲班裡的動物只需要訓練而不需要教育。極權統治者史、毛之流根本不把人當人看待，只把人看做牛群馬群，還談什麼「教育」呢？有一位外國學者說，在極權統治之下的教育，就是激烈的繼續不斷的動員。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言。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極權統治者從小就藉著「教育」（其實是訓練，像訓練海豹一樣）手段要你接受「主義」，接受了「主義」就會發狂。發狂就爲主義「鬪爭」。爲主義鬪爭就爲主義而死。假如你對於主義厭倦而不感興趣呢？你還得表面贊成。你不能批評。因爲，如果不贊成那些主義而提出批評，就是動搖其權威和不接受其統治底表示。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所以，爲了防患於未然極權統治者在根本上不許有言論自由；更進而扼殺個體自由。扼殺個體自由乃維持極權統治的根本手段。

這本書精彩的地方還多著哩！除了評者在以上所引的以外，值得細心體味的地方真是不少。從對於這些地方的體味，我們可以體味到俄式極權統治是什麼滋味兒。而且，除此以外，如譯者在序言中所說的：「作者不單描寫了一九四二年冬天的莫斯科，而且把半世紀以來的俄國歷史也都包括在內了。」誠然，讀這本書之所得，不只於是讀了一本小說而已。

關於譯文，一望而知是出於對英文有相當修養者之手筆。譯者在翻譯的態度方面是謹嚴而認真的。但是，評者可以看出，譯者於對翻譯所採取的原則與評者底頗不相同。當然，在這一方面，正如在許許多多別的方面一樣，各人有其選擇的自由。可是，無論翻譯選擇那種原則；總不能說在任何一點上都是 *alternative* 的，即，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的。如果多少還有標準可求，那麼評者不獨可以據之贊同譯者底譯文，並且可以據之反對譯者底譯文。如其不然，贊同或反對，都無從說起。準此，除了對譯者贊同的地方以外，評者也有若干不甚贊同的地方。茲隨意舉個例子吧！譯本一四三頁有一行是：「『胡說，』我說『昨夜裡我明明看見一個警察踢一個紅軍士兵。他喝醉了，你們的一個憲兵就把他肚皮上胸口有系統的踢個周遍。』」有系統的」一詞，在原文是 *systematically* (原書一五六頁)。一望而知，這種譯法在中文是很不習慣的。

——原載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八卷五期

附記：本書為齊文瑜譯，中一出版社出版。

美國去來

「鮑魚之肆，竟聞芝蘭之香！」

評者在朋友處偶然看到這本書，展開之下，不禁脫口而出。

現在，街上有成堆成碼的出版物應市。這固然大有助於印刷業之振興，但也大有助於知識之荒蕪與情感之枯燥（黃色貨品例外）。在旱海中行脚的寂寞旅人，意外地看到一片綠意，使人聯想到大地或有回春之時，寧不驚喜！

這本書共計十二節。節節都是可讀之作。內容輕鬆而不失莊嚴，雋永而意味深厚，富於幽默感但卻不失於憤世疾俗。在一筆一畫之間都深藏著耐人體味和夠人追求的道理，卻毫無說教氣氛。

作者遊美不及百日，而能將所見所聞，如此輕巧而又深刻地勾畫出來，使我們依稀想到美國立國真實心理要素之所在。由此足見作者觀察力銳利，感應力靜敏。不知作者是否爲一記者。如爲記者就記者應該具備的素質言，當爲世界第一流記者。

我們且從第二節開始，看裡面說些什麼？「有一天，我有意去聯邦調查局參觀，依我的臆測，這地方總得由官方介紹了。於是我就去請教國務院一位辦理聯絡事宜的人。他說用不著介紹的，走進去就是。他們每隔半小時，就有一位嚮導人員帶路到各部門去參觀。這次我是同十多個互不相識的人，週遊了聯邦調查局的大廈。我這位姓名身份不詳的人，還不甘緘默，隨時隨地提出問題，提一些杞人憂天的問題。例如『聯邦調查局日益強大，會不會於不自覺中，傷害了民主政治中最寶貴的個人自由？』我說杞人憂天，並非毫無理由。因爲我已逐漸體味到在美國，凡有損於民主精神，有悖於民主原則的事，不會聽其成長的。我當時的用意，祇不過是給他一個題目做做。此人甚擅詞令，妙語橫生，我不免想難他一下。他的答覆，現在回憶起來，已甚模糊，似乎是聯邦調查局，祇是法律的耳目，聽命於法律，受司法機構指揮的。……」

聯邦調查局是負有特殊任務的機構。這種機構而可任人參觀，寧非不可想像之事？世人好稱某些國家爲「鐵幕國家」。實則這個名詞還不夠表達真相。「鐵幕」係就其對外而言。其實在鐵幕以內，極權統治者又把整個國家分隔成許許多多小格子。這一個格子裡的人民與那一個格子裡的

人民都不能自由交通。至於「政府機關」，那怕小如芝麻，都是不能自由進去的。至於負有特殊任務的機構，那就更不用說了。在以蘇俄爲範型的國家，到處都是「祕密」。祕密，乃構成權力之一大要素。在這類國家，負有特殊任務的機構，才是國家最後的統治權力。司法，不過是掩飾此一權力的面紗而已。這與美國之以聯邦調查局爲司法的工具，成何等尖銳的對照！

作者在記述他華府與白宮之遊裡說：「我在華盛頓時間不久，見聞不廣，但似乎未曾見到『閒人免進』的字樣。大約華府的公私建築物，都無拒絕入內的意思。：：白宮每星期有幾個上午是開放的。我走進去同我走回我寄宿的旅舍一樣的毫無困難。值勤的警員，同我互道一聲『您早』，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又說：「這一天逛白宮的人頗不少。大家極其悠然自得。有的在草坪上逗松鼠，有的在綠廳，藍廳，紅廳中看擺設，鑑賞歷任總統的畫像；有的與值勤警員聊天。（他可能在批評總統的不對之處，警員也祇有微笑不置答而已，絕無加罪之意。）」

這是何等令人嚮往之的境界啊！然而，在另一方面，史達林走的路老百姓都不許走哩！其他的空間，類似的人物（毛澤東爲其中之一）所到之處，莫不戒備森嚴，令人望而卻步。同在一個地球之上爲什麼二者相去若是之遠呢？無他，一個民主，一個極權而已。民主國家的人之心性，是公開的心性（open minded）因而民主的社會是公開的社會（open society）。恰恰相反，非民主空間專愛管人的人之心性是封閉的心性（close minded）（封閉的心性者，見不得人的心性之謂也。）

因而他們只有藉暴力，組織，和宣傳的力量將他們控制之下的社會造成一個祕密社會（secret society）。祕密社會一旦建成，人人便處於恐怖戒懼之中。所以，在民主的公開社會裡，人人天真活潑，坦白真誠。而在極權勢力籠照之下的社會，則處處是陰鬱，沉默，猜忌，冷酷，處處是在做作，處處在勉強之下行事。俄共算是把這一點做到堪供「示範」的地步。

第五節論政治。這種論法，很值得望雲霓而色喜的人注意：「我對兩黨的政治競賽，有一粗淺而極基本的印象，覺得那簡直像兩個買賣人爭顧主，兩個孩子在父母前爭寵愛。」

「主顧何人？父母何人？老百姓也。」

聊聊數語，道盡了民主政治底基本要素。

極權政治與民主政治幾乎是事事相反的。在極權統治之下，主顧何人？父母何人？曰，統治階層而已矣！在極權空間，人民想苟活殘生，除了把頭削尖一點往上爬以外，不甘者只有乖乖順規規矩矩，照嚴格規定的路子舉止動靜。至於「競選」，確有那麼回事，但不過做做樣子，「競舉」而已。

作者說得很真實：「我幼時讀書，讀到稱地方官為父母官，後來又在公民教科書上讀到官吏是人民的公僕，心中甚為茫然，因為他們兩者都不像。名士如袁枚作縣知事時，猶說『此地蒼生尚感恩』，儼然民之父母。以官為生者，當尤甚焉。看美國的政治活動，覺得『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爲輕』的原則，簡直是不折不扣。玩政治的手段，有可訾議之處。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是本錢，談得天花亂墜沒有用。必得老百姓相信而後可，因爲那張票在他手裡。艾森豪威爾將軍，可能不懂政治，但他有一點本領能贏得人心，那就是誠懇。在七月四日美國國慶那一天，他的火車經過我逗留的愛和華州栖得賴城，在車站發表十五分鐘的演說。大家的印象是此人誠摯，直率，可靠。這一類形容詞加諸叱咤風雲的人物如艾帥身上，未免平淡無奇，分量太輕。但是今年初冬，他若是能成爲白宮主人，依我看來，就得力於這幾個似甚平淡的因素。：：」

搞「政治」而要「誠懇」，在咱們東方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咱們東方人搞政治的定律與美國人底可剛好相反。在咱們東方，歷來搞政治愈是詐欺愈能成功。詐欺發展至極，就把至多跟你我相像的人烘托成天神天帝。而東方的倫理形式主義和超人的聖人觀所產生的心理效應，則又大有助於這種烘托之成功。在東方而搞政治，就怕的是欺騙不倒。老子騙倒你，老子就跳到你肩膀上。你聽信了謊言而上了當，你活該。如果艾森豪的「誠懇」搬到東方，保險他一敗塗地，還要落得「大傻瓜」的美名！

東西「文化」不同故也！

又說：「儘管大家十分熱心於政治，大家並不十分羨慕總統這份差事。某一次一位朋友要我猜在美國最挨罵的是誰。我怎麼也沒有猜中是總統。經他一點破，我才恍然。總統日理萬機，忙

中的舉措有時不免有小錯。忙中的情緒，也不免開罪於人。這些當然都招來不滿，挨罵了事。未被開罪的人，也還是要罵的。大約凡有不滿，最理想的去處，是往總統頭上一堆。罵得理直氣壯，或者不無理由的固然有。更多的是潑婦罵街。據說某次報上竟發現相等於我們罵人『狗養的』字眼，加諸杜魯門身上，結果居然彼此泰然相安無事。……這種情形，在我們東方人聽來，簡直像在講天方夜譚的故事。

第六節談的是「民爲貴」。咱們東方許多人，除了顛沛流離，憂勞勞形之外，又加上恐怖迫害，這樣限制那樣限制，弄得早已忘記了真正的「人」是個什麼樣子的東西了。要想作個人，或者體味體味人的生活是怎麼回事，不可不細讀這一節。爲了引起讀者底興趣，評者茲將其中最精彩的地方徵引出來：

『民爲貴』這種精神，同時也直接幫助了民主政治中最關緊要的個人尊嚴這一大原則的建立。我在美國旅行了兩個多月之後，漸漸體悟到一件似乎不可捉摸，而又似乎鑄在每一個美國人臉上的一個記號，那記號若必須用文字來概括其涵義，大約應該是『我和你一樣的好』。在財富上我可以不如你；在學識的廣博上，我可以不如你；在才能上我可以不如你；但作爲一個人，我絲毫不比你差什麼。擦皮鞋的也好，報販的也好，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覺得自己的工作，同樣是爲公共服務的一部門，與貴爲卿相的人，在職責上有差別，是性質上的，其中並無高貴微賤等不通的

意思。他們面對著高官巨商，談笑風生，毫無自卑感。本來什麼叫做高尚職業，低能的人自卑感作祟，想以頭銜身份來彌補的一種辦法而已。我看到擦皮鞋的與顧客互相說些俏皮話，彼此大笑不已；聽到飯館裡鄰座向侍者要一樣什麼東西，先說對不起，再則連聲道謝的情景，總覺得那是我們東方人彬彬有禮的傳統，何以在東方反要漸漸失傳了。」這才是人的生活！

禮貌在東方漸漸失傳，即使殘餘一點，也只空有形式，毫無真情實意。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東方人不懂科學；不講民主（「民本」並非民主。請弄歷史和談玄學的人別胡扯！澳洲的牧人有羊群作為財富之本，是謂「羊本」。但不能說是「羊主」啊！以紫亂朱，是最可惡的行徑。一國底文化，即使真是「世界最優美的」，也不見得無所不包囉！）不講民主生活，禮貌不是屈服的象徵，便流於虛套。不懂科學，便不知怎樣「利用厚生」。不知怎樣「利用厚生」，久而久之，社會底生活基礎和內容枯竭甚至傾倒下去（有事實為證）。於是，禮貌等等，根本維持不了。「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人窮志短」是也（此處並非唯物之論）。這種道理本極淺近，可惜在半天雲裡高談「歷史精神文化」和「唯心論」及「理想主義」的人立腳點太高，高到忘記了。不食人間煙火，不知人是什麼者，雖力竭聲嘶，何補於時艱哉？

作者在前一節底末尾就談：「『民為貴』這種氣氛，特別使一個鄉下人如我者歡欣。我初到紐約時，一位新聞記者來訪我，問我對美國的印象如何。我說，如果有誰要我為百餘年前那位法國

政治家塔哥所說的，『美國是人類最後的希望』作註解，我第一就得說，民爲貴這種精神，在美國發揚光大到如此地步，可以給嚮往民主自由而獨在徐徐學步階段的其他民族一種提示。一切事在人爲。在另一方面，又可給正在地獄邊沿上與極權掙扎的人們一種鼓舞。人不必一定要壓迫其他的人，才能顯示其優越與高貴；也無需欺負別人，才能生活愉快。舉世之人，何以視納粹，法西斯以及共產主義等極權集團如洪水猛獸，主要是他們不把人當人。芸芸衆生，不懂什麼主義；但是一旦有誰要把芸芸衆生當成機器上的零件，小螺絲，而不把他當做人，結果是『予與汝偕亡』。歷史上的例子有的是。凡不把人當人的，最後必如夏天的蛾子，撲向燈火，倒下了事。」

納粹，法西斯，以及共黨類型者，莫不以壓迫欺侮大家爲優越。此所以劫數連天也！他們底政權取之不以其道——連騙帶搶搞到手的，並且建立於不義之上。人心當然不服。人心不服，而彼輩爲欲鞏固其政權，於是必須壓迫大家，欺侮大家，行之既久，就形成了第二天性：壓迫大家，他們才生活愉快。這正像張獻忠底令堂大人一樣，不聞人血腥味，夜不安寢！

評者還是繼續徵引第六節裡精彩之處吧！作者說：「不以頭銜、身份、財富，自絕於人，自然朋友也就多了。有人批評美國人交朋友，一見如故，親熱非凡，但沒有深度，不見得很能持久。這一觀察不無理由。但他們那種交朋友的習慣，頗叫人喜歡，見面不久，距離就沒有了，就不再某某先生某某太太之類的拘束稱呼。不論年齡上差異多大，或地位如何懸殊，大家都直呼其名，

甚至互喚小名，稱兄道弟，偶爾聽到一聲某先生就覺得刺耳。拿我訪問栖得賴城爲例。我到的那天，去拜訪市長，所謂禮貌上的拜訪是也。我當然稱他市長先生。寒暄一番之後，相安無事。當晚商會會長請我吃飯，市長是陪客，在我的鄰座。我仍舊照例稱他「市長先生」，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但他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見了。『老兄，夠了夠了。你若再不直截了當叫我的名字，還這樣市長先生市長先生下去，就不是朋友了。』他又接下去加以解釋：『每當有人直呼我的名字時，我就得起一點戒心，我想他一定是對市政不滿，來提出抗議的；再不然，就是代表什麼團體向我募捐的吧。凡直呼我的名字的，我就可以坦然了。』

這是何等新鮮可愛的風氣！喊「市長先生」，反而覺得也許是市政辦得不好，或不夠朋友，直呼其名才夠朋友，這也許又是與咱們底「歷史精神文化」不同之處吧！在咱們東方，一個「白丁」如果不稱呼一個做「部長」的人作「部長先生」，或直呼某市長爲「老兄」，那才是自觸霉頭，你底事辦得通才怪哩！評者有幸，寄寓的地方可巧左鄰右舍不是「長」就是「官」。矮矮的牆頭之外，常有人問路：「某某主任是那一家？」起初，我很大驚小怪；爲什麼沒有名字，只有「官銜」？我就直截了當問他：「那個人姓甚名誰」？該問路的人等竟不置答，從來沒有一個例外。這好像一做了「官」，姓名是不可說，說了便犯諱似的。我底本意，是提醒這些過路君子；人底名字比官銜更香，更大方，更永久。但是，人是可根據歸納法而理解經驗的動物。經過的這種例子既多，我發

現了一個通則；原來這樣稱呼，是經過現在的生活環境和訓練所形成的一個新風氣。這種新風氣，才真正象徵著實質上的進步。自有此重大發現以來，我就放棄了提醒別人之無益的努力。

妙的還在這裡：「另一晚，我們到荷姆士泰鎮一處俱樂部去晚餐。我發現廚司對市長也是直呼其名，稱兄道弟的。（東方的『歷史精神文化』則是『君子遠庖廚』——評者）他給我介紹那位名廚時，說他不僅做得一手好菜，而且有政治頭腦，有行政的才幹。『下次我競選時，要請他出馬當總幹事的』。大家相與大笑。此種毫無階級觀念作祟，才見出人的真價值」。這才表徵出貨真價實的民主。民主不是一塊招牌，而是人所應享的生活方式。

又說：「個人尊嚴，不是單行道交通，大人在上，臣罪當誅。這祇是在做戲，席終人散，誰的尊嚴都不存在了。」這幾句話說得輕鬆極了，但也莊嚴極了。這幾句話，道盡了古往今來一切奸雄，獨裁者，和極權者底後果。你看那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之流，生前何等神氣，何等威風。他們底玉照要到處高掛。他們底話要人奉若金科玉律。他們要被劫持的人民跟著他們一樣想，一聲令下，誰敢不從？誰敢不恭維他們？表面看來，他們底戲做得真是夠熱鬧了。然而，曾幾何時，「席終人散」，他們底尊嚴那裡去了？他們底玉照那裡去了？誰再記得他們？一根草也沒有了！只落得史家諷刺幾筆罷了。惟有耶穌、釋迦牟尼、蘇格拉底這些人，生前受盡冷落或迫害，但死後卻給人類留下無窮的惠愛，受到萬世的景仰。說到這裡，我聯想起今日的史達林和毛澤東這一

路的貨色。他們深住宮禁，「一言天下令」，指頭一撥，舉世騷然，桌子一拍，千萬人身首異處。得意是得意極了，「尊嚴」也尊嚴極了。但是，可惜有一點美中不足；就是他們底得意和尊嚴要靠子彈來維持。子彈達不到之處，就是他們底尊嚴掃地之處，嗚呼哀哉！

第七節論「美國人」。作者說：「美國人天性愛動，愛群體生活。可是有一點特別易使人注意的，是他們在群眾中不丢掉他的個性。他們好群，但不受群眾的情緒左右。第一次大戰期間，主持英國海外宣傳事務的一位布祥君，在描述美國人民的性格時，有兩句名言。他說在美國，某種熱浪，可能一下子就波及全國，轟動一時，但不久就敵不過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而趨於平靜。他的結論是，美國人可以受領導，但是供驅使就辦不到。『民可使由之』，祇是歷史上的陳跡。這說法，在現代世界上，祇有在極權國家找立足之地了。」

「可以受領導」但「不能供驅使」這話底分寸拿得多麼穩。「受領導」與「供驅使」底分界在那裡呢？二者之分別，猶黑與白之不同，絲毫不能蒙混。受領導者，乃各個個別的人基於自由意志之所向及對某一情勢之理性的瞭解，為要實現某項目標，自動並自願推舉大家公認為對某項目標之實現最富能力的一個人或一團體底人，在其指引之下，向此目標趨進。羅斯福之於新政乃是領導而不是驅使。五十年前若干人之對於參加辛亥革命是領導而不是驅使。華盛頓之對待為脫離英國之羈絆而作戰的美國人民，是領導而不是驅使。反之，一大團亂糟糟的人，失去自由意志，

對於某某情勢又無理性的瞭解，更茫茫然不知此身將欲何之，亦更不確知誰最有能力救大家出於苦海，少數或一團奸雄乘機而起，先之以煽動，繼之以組織與部勒，強使大家走向自己所規定之「路線」，或滿足自己之狂想，甚或滿足其個人情感之好惡，這便是驅使。秦始皇叫人築萬里長城，是驅使而不是領導。埃及金字塔是驅使數十百萬人的遺跡。修阿房宮的人是被驅使的。毛澤東之聚集數十百萬人「治淮」是驅使而不是領導。……領導與驅使之不同，若涇渭之分明，絲毫不能混淆。民主國家即使發生集體行動，都是受領導而行的。極權地區底集體行動是被驅使而行的。「驅使」，乃現代最大的人為罪惡。

「美國人對自己的批評，十分苛刻。而且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東方人好批評。小自市區內某一條下水道失修，大至國家的外交政策，他們都要鉅細無遺地痛加抨擊。美國人通常不喜歡官辦的事業；討厭政府用一批冗員。我到華盛頓不久，碰到一位商人，他聽說我是國務院的客人，就問我可知知道國務院用了多少人，在華府有幾座大樓。我說不很清楚。他說，他也不清楚究竟用了多少人；但是他知道一共二十六座大樓，裝得滿滿的。『老兄！不是我吹毛求疵，我是一個納稅人，我得打我的算盤。他們用那麼多人，是必要的嗎？』他們對官辦的事業，也從不讚美。這大約有兩種原因：第一官辦事業，多少妨害了個人發展的機會。在美國謀個人的發展高於一切。第二，官辦事業，聲勢浩大，很容易把私人企業的功績，淹沒乾淨。……他們說國務院總是愛給遠道來的

人看看TVA的偉大處，嘆為觀止。事實上，若以美國比做壁上的那座掛鐘，使這鐘擺的嗒作聲的，不是一個TVA。』而且，你若是懂得技術上的盈虧』，他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TVA是年年虧本的。』

這裡告訴我們，民主國家經濟的內容是什麼。在真正的民主國家，個人經濟之自由發展是高於一切的。官辦的企業，是不受人歡迎的東西。如果官辦的企業，在美國尚且年年虧本，何況在其他地方？美國許多人喜歡華府那一座座裝滿大批「冗員」的大樓。這種感覺，正是民主的感覺。假若一個地方，凡屬高樓大廈，幾乎都是官家機關佔用。交通工具，幾乎全部為官方控制。滿街直衝橫撞的幾乎都是公家車輛。工廠與資源又莫不是公營。這就像一匹牛，頭長得特別大，角長得異常長，而身子卻瘦小得可憐。你想，這頭牛還能真正健全發展嗎？

第十一節「筭記」字少，但輕靈可喜。其中幽默的話頗多，例如：「有人說華盛頓的進口貨物以紙為大宗。華盛頓運出去大約以廢紙為大宗。——那一面有字了。」華盛頓尚且製造廢紙，非華盛頓之處更不用問了。的確，有些人天一亮就往外面跑，忙著把大堆大堆的白紙變黑。這固然有益於造紙工業，但何有益於「國計民生」？芝麻大點小事，表格填不完，似乎嚴重得很，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豈不浪費生命？我建議多設立幾個圖書館。

這本書，只有短短六十頁。但評者覺得它比許許多多六百頁的書所包含的還多。它裡面所包

含的，不獨有美國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則，而且有很健康的教育意義。我們之所以反共，最基本而且顛撲不破的理由，分析到最後，就是要作個像人的人。共產黨不許我們作人，他們要驅策我們作政治權力底工具，所以我們反共。這點最起碼的低調，至少應該能適用到教育上。如果從事教育者尚把年輕的一代看作是人而不是政治工具，並且希望他們發展成一個正常的人，那麼就應該讓他們讀些有益於心身的書。像吳魯芹先生這本著作，就是其中之一。評者認為這本書最適合於作中大學生底課外讀物。

這本書底字句錯落不少，標點符號尤未注意。這是美中不足之處，希望作者能於再版時著意修正一番。

——原載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八卷五期

附記：本書為吳魯芹著。

羅素畫傳

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歷史上的燦爛時代。促使維多利亞式的思想和制度崩潰的，在本世紀有三大人物。一個是威爾斯(H. G. Wells)，一個是蕭伯納(G. B. Shaw)，還有一個是羅素(G. Russell)。而羅素對於世界底現代思想之啓發力與影響之大，則非彼二人所可同日而語。羅素對於東方人民的同情和瞭解，在西方思想家中，是少有的人物之一。羅素早在三十餘年前即在思想上反對布爾希維克主義。這在今日看來，尤覺令人欽仰。羅素今年八十一歲了。藉著這本畫傳，如果我們能夠知悉這樣一位思想家底生平和思想之吉光片羽，應該是一樁有趣的事。

羅素生於熱芬斯奇夫(Ravenscroft)地方。此地靠近替利克(Trelleck)，離第頓(Tintern)約

三哩，風物優美宜人。羅素生時爲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其父爲安貝勒子爵 (Viscount Amberley)，母爲克提·史丹來 (Kate Stanley)，羅素是他們底幼子。祖父羅素艾勒第一 (First Earl Russell) 乃英國歷史上聞名的約翰羅素爵士 (Lord John Russell)。約翰羅素爵士曾提出改革法案 (Reform Bill)。這個法案於一八三二年成爲英國的法律。羅素自幼從他父母那兒承受自由黨的政治傳統，尤其從他祖父那兒承受到這種傳統。這種傳統奠定了他日後在政治上的自由思想之基礎。

從孩童時代開始，羅素一直浸沉於思想之中，但是，他並不是一個遁世者。如所週知，羅素與一般數學家不同的地方，就是，除了浸沉於抽象的名數世界以外，羅素對於社會人生問題、教育問題，以及戰爭與和平問題，有著高度的興趣和熱心。他寫過關於這些問題的許許多多著作，創辦過學校，遊歷過許多地方，並且曾經下獄。

在早年的時候，羅素就因著他的機智與言詞鋒利而得名。與羅素合著《數理原本》 (*Principia Mathematica*) 的懷海德 (N. Whitehead) 是他底老師。懷海德說：「像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樣，我也欣賞著他自己底才華。他起先是我底學生，後來是我底同事和朋友。」梅理遜夫人 (Lady Constance Malleson) 寫道：「如果我們和他很熟識了，那麼便會發現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他自己充滿一大堆的矛盾。但是，如果我們和他在一起時，便知道他平易近人——爲人自然，也充

滿了特出的機智。」凡讀羅素底著作，或聽其廣播的人，不獨可以認知他是一個思路最清晰的思想家，而且是極富於幽默感的人。

羅素具有驚人的文學天賦。據說，懷海德常把簡單的東西弄得困難；而羅素則把困難的東西簡易地表達出來。羅素底著作不獨曉暢易讀，而且氣味清新可喜，並且在字裡行間流露著輕快之感和愉悅之情，絕無一般德國哲學著作底笨重氣息。因此，即便是羅素所寫專門性質的書，也使人覺得高興去唸。除此之外，還有一項特殊的本領，為一般哲學家所不及：羅素寫作舉例取譬，常能恰到好處，趣味橫生，將抽象的推理弄得有血有肉、有聲有色。因此，羅素之文，也極為普俗刊物所歡迎。

羅素身材中等，相貌並不美觀，但面目清爽，銀髮飄飄，一望而知其人富於智慧，格調不凡；但衣履則不甚講究，羅素身材固然並不算魁梧，但體格之健實亦如其腦。一九四八年羅素已七十歲，是年十月，羅素乘挪威飛艇前往霍姆維嘉(Hommelvik)，預定該晚對當地專科大學學生講演「如何防止戰爭」。當飛船著陸之際，忽起狂風，飛船失事，乘客十九人墜海溺斃。可是，羅素則游水得救。羅素墜海之際，身上還穿得很厚的大衣，在冷澈肌骨的冰水中游泳達十分鐘之久，後來才為人救起。當晚的演講固然延期，可是並非出於羅素本人底請求。

我們再來談談羅素為學之發展的經過。十一歲時羅素從其兄習歐基理德幾何學。但是，習之

未久，他對歐基理德幾何學底第一條公理就發生懷疑，以致學習之事幾乎中輟。羅素之兄法蘭克(Frank)記其事曰：「在那個時候，羅素極其迫切地想要瞭解關於人生和宇宙的確切真理。有人告訴他，歐基理德已經證明了他所說的這些真理。但，在羅素面前所呈現的是，歐基理德堅持他所認為真的東西必須視為自明之理，可是在羅素看來，這些東西並非自明之理。」法蘭克面對著這個非凡的弟弟所造成的這種局面，感到頗為尷尬，窮於應付。他對羅素說，要麼你接受歐基理德底公理，要麼不唸下去。終於，羅素之強烈的求知欲克服了他底懷疑。此後，他浸沉於數學中多年。

十八歲那年，羅素進劍橋大學。這對於羅素而言，乃是開闢了「一個無窮歡悅的世界」。在劍橋，他碰見許多有學識和思想的人，其中有麥塔格(J. R. Me Taggart)和穆爾(G. E. Moore)。麥塔格是黑格爾派的哲學家。起初，羅素信奉黑格爾哲學。後來，羅素受穆爾的影響，於是洗掉了黑格爾的思想成素。穆爾是劍橋解析學派底開山大師，新實在論領袖之一。他對於現代哲學解析的創導作用建有不可沒之功。一八九八年，羅素讀黑格爾底《大邏輯》。他認為黑格爾對於數學所說的一切，皆屬模糊籠統和攪混不清之論。同時，他又跟穆爾一樣，放棄了波萊德雷(Bradley)底學說，波萊德雷底學說在當時是頗有影響的。也就在這一年，羅素代替麥塔格底位置，講授萊布尼茲(Leibniz)哲學，並著手著作關於萊布尼茲哲學的書。

自十一歲習歐基理德幾何學以來，羅素即為數學基礎問題所煩惱。一九〇〇年，羅素參加巴黎國際哲學大會。其時，意大利數學家柏阿諾(Peano)及其門人與會，討論時設詞精審絕倫，論證方式謹嚴非常。羅素深受感動。這一次的影響，引致羅素著作《數學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1903)後又與懷海德合著《數理原本》(*Principia Mathematica*, 1910)。

但是，羅素與一般數學家或抽象思想家之不同的，如前所述，就是他畢生對於社會人生問題發生興趣。羅素是費邊社底社員，與韋布夫婦(the Webbs)頗相友善，過從頗密。後來，因自由貿易問題，羅素退出費邊社，加入自由黨。羅素雖然熱心社會問題，但因長期的數學與邏輯訓練，所以不是從情感出發，而是從理性出發。(這裡說「理性」，不必是「理性論」。「理性的」(rational)不必是「理性論的」(rationalistic)；「理性論的」不必是「理性的」。一個論說如為「理性論」，則可以是「理性的」，但不必然是「理性的」。「經驗論」亦然，但「理性的」則不能不是「理性的」。「理性論」是一種觀念的創造，而「理性」則是一種知識功能。準此，「理性的」與「理性論的」二者切不可混為一談，否則混亂叢生。)因此，羅素雖熱心社會人生問題，但不脫其本乎理性的色彩。一九四〇年，他在《我底信仰》中寫道：「我底知識上的一致，使我完全不能接受任何好戰國家底戰爭神話。的確，接受那些神話的知識分子是放棄了他們底職守，而以與群眾同調為榮。……如果知識分子對於社會還有些功用的話，那麼便是在一切情感的煽動之前保持冷靜的和 unbiased

不倚的判斷。我發現，最大多數知識分子，除了在平時以外，不相信知識有何用處。」

這是千真萬確的話。照評者看來，就中國而論，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在太平年間，漂漂亮亮，似乎滿有道理。但一遇亂世，便惶惶無主，不知何所適從，結果只有一任狂風東吹西捲。近三十餘年來，如果中國底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的知識分子，當初勇於面對這樣的大混亂，堅信知識的功能不限於亂紙堆中，面對著各種各樣的「主義」、「宣傳」與「組織」，而處以冷靜的頭腦和不偏不倚的判斷，並且以之教導青年，作中流之砥柱，那麼中國的局勢也許不致於這樣糟透，也許可能出現一個不同的新形勢；萬一不成，讀書人至少已經盡到他們自己應盡的職責。奈何大家六神無主，東倒西倒，以致不可收拾！

羅素由於熱心社會人生問題，於是注意到俄國革命後布爾希維克興起所形成的新形勢。一九二〇年，羅素訪問蘇俄，並且遇見列寧、托洛斯基和高爾基。但是，他在新俄國之親見眼聞，使他對於俄國所存的希望幻滅。自此，羅素成爲英國知識分子中指摘蘇俄共黨政權最早和最力的人中之一。羅素早就指出，蘇俄將如此巨大的權集中於如此少數人之手將來可能的危險爲何。自古至今，權力絕對集於少數人之手，未有不造成慘厲淒絕之人禍者。遊俄以後，羅素有《布爾希維克之理論與實際》一書，這本書是對布爾希維克的觀察與瞭解的最佳著作之一。

羅素描寫他抵達俄國之所見道：「我未到俄國去之前，準備忍受身體上的痛苦、不舒適、饑

渴。我認爲爲了人類前途光明的遠景，是值得忍受這些痛苦的。孰知剛一跨過邊境，我們就吃了兩餐飯和一餐豐盛的早點，幾隻最好的雪茄煙。晚上，我們睡在一個宮殿底豪華寢室裡……在我們所經過的車站，月臺站滿了成隊的士兵，而貧民則被小心地趕往視線以外。……每一件事都是依計畫而行的；在俄國，組織和分配倒是公平的。所有的人都受一樣的教育，所有的人讀同樣的書，所有的人都信奉同一的主義——的確，是很公平的，而且彼此不致發生嫉妒……」什麼都成一樣，什麼都是「一個」「一個」的，正是共黨型類底人物所嚮往的天國。只可惜這樣的天國降臨之日，人類最佳的命運就是變成螞蟻。但是，極權獨裁者捨人王不做而做蟻王，又有什麼滋味呢？

羅素對於教育問題，一向是很注意的。羅素之所以注意教育問題，主要的原因是教育自己的子女。爲了實現或試驗自己底教育理想，羅素決定辦理一所新奇的學校。一九二七年羅素在培根山(Beacon Hill)開辦了一所學校，自己當校長，太太幫忙，收容了四歲到十二歲的兒童約二十名。這是第一所「自由」學校。這所學校底學生教以遊戲。學生所提出的問題，老師都予以自由和坦率的答覆。不成問題，體罰是廢棄了。學生要頑皮就讓他們頑皮，高興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喜歡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男女小孩在一起洗澡，在太陽底下曬日光浴，好不快活！

一九二六年，羅素把他底教育理想寫成一書《論教育》(On Education)，這本書問世以後，很受歡迎，立刻再版了幾次。羅素認爲一個人之完好的品性必須是由這四種特徵結合起來的：生

氣蓬勃、勇敢、敏銳和智慧。勇敢即是免於恐懼，也是自尊與非個人的人生展望之結合。照羅素看來，勇敢可以藉教育養成。

「我所提示的是，沒有人應該習於服從，也沒有人應該想到要命令別人。自然，我這話底意思並不是說，在合夥的事業之中不應該有領導人物。但是，我認爲，領導人物底權威應須像足球隊裡的隊長之權威一樣。大家自動自願地服從這個隊長底權威，以便達到共同的目標。我們底目標必須是我們自己底目標，而不是外在權威所加於我們的。而且我們不應該把我們自己底目標強迫加諸別人頭上。」評者以爲，羅素此言，如從教育推廣到人生其他事物上，更見其重要。極權主義者，認爲自己所信仰的主張是「盡善盡美」的，便藉宣傳、組織和暴力強人接受。於是，造成今日的滔天人禍。無論任何人所抱持的主張怎樣「盡善盡美」，任何人都沒有天賦的權利強加諸人。任何主張再好，也要別人本乎自由意志來接受。何況人間根本就沒有「盡善盡美」的主張呢？更何況那些必須藉宣傳、組織和暴力來推銷的主張更是經不起一指的嗎？許多人所持主張果真是「盡善盡美」的，則人衆趨就之唯恐不及，何需藉宣傳來掩飾，何需藉組織來維持，何需藉暴力來保護呢？於是，吾人可思過半矣！

我們再來談談四十年代以來羅素講學的情形。一九三八年，羅素在牛津講演「語言與事實」。兩年以後羅素把這個題目擴充三組講演，先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加利弗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講

出。羅素說這些講演是「富有結果的共同討論之模範」。尤其在芝加哥大學，開納普教授(Prof. R. Carnap)常常到臨聽講。開納普是現代邏輯語法研究的主要創導人之一。羅素所作的這些講演，就成爲所著《意義與真理探究》一書之基礎。

一九四四年，羅素受聘紐約市立學院底哲學教授。但是，該城一個牙科醫師之妻控告羅素，要求該校解除羅素聘約。理由是：羅素不該「主張自由戀愛」！(編者按：羅素是主張結婚後夫婦可以各自與他人自由戀愛，即中國之所謂通姦。通姦而至懷孕，即可離婚。羅素即此一主張實行者。美國並不反對普通意義的自由戀愛。)這位牙醫底太座底這一動作是曼林主教(Bishop Manning)所支持的。曼林主教是紐約福音派領袖之一。當時，紐約市立學院底代理院長是梅德博士(Dr. Mead)。梅德力言羅素底工作只限於教邏輯與數學，但卒無效。紐約最高法院法官麥克基罕(Judge John McGehean)判決取消聘約。理由是說羅素「企圖建立猥褻之學」。

後來，羅素接受巴勒斯(Barnes)聘請，在賓塞維尼亞州(Pennsylvania)爲巴勒斯基金講演哲學史。巴勒斯其人，是一個富有的土包子。他奇思滿腹，自以爲是文化之保護者，爲人怪癖，在地方上小有聲名。他與羅素訂約五年，不意兩年以後改變了意思，辭退羅素。羅素控告巴勒斯。巴勒斯賠款二萬元了事。羅素在賓州的演講後來成了名著《西洋哲學史》。

一九四八年十月，羅素底哲學著作《人類底知識：其範圍與限制》出版。這本書將羅素關於

知識論的一切學說都提綱挈要地敘述出來。一九四八年末到一九四九年初，羅素為熱弗講演 (Reith Lectures) 廣播「權威與個體」。播講六次，講詞已印成書。在第一次播講中，羅素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個體創導能力為進步之所必須，社會團結則為生存之所必須。但此二者往往不能調和。吾人如何將進步所必須的某種程度的個體創導能力與維持生存所必須的某種程度的社會團結調和起來呢？」

照羅素看來，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就是由於不能解答這個問題。而且，時至今日，這個問題威脅著人類底快樂生活，因此也就威脅著人類底安定和生存。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尤其是政客、大工業家和高等官僚，他們的展望往往太抽象。他們往往忘記實實在在的人是什麼樣子，他們往往要把人來適合制度，而不將制度用來適合人。現代社會遭受著「由遠距離的權威對廣大地區施行過分的統治」之苦。

照羅素看來，社會組織屬於手段底範圍。而時至今日，此手段所欲達之目的反而往往丟在一邊。這樣一來，就引起一種謬誤。這種謬誤叫做「行政者底謬誤」。行政者底謬誤就是慣於將社會看作是一個制度之下的整體。如果社會是屬於一種型模的秩序和組織，那麼行政者便感到愉悅。但是，一個好的社會乃個體底良好生活之手段，並不是目的。因這個社會是這些個體所組成的。

羅素之言，真是「巨眼觀透」。吾人須知，個體創導與社會團結之衝突問題，有而且只有在民

主國度裡才得到比較適切的解決。在民主國度裡，個體創導能力得有機會盡量合理地發揮，沒有誰來作無謂的限制。個體創導能力之發揮，不獨不危害社會團結，反而因充實了社會底生命內容而使社會團結產生了真實的意義。因為，有而且只有這樣的社會才值得團結以圖生存與發展。復次，在民主國度裡，社會團結不獨不害個體創導，而且是成全個體創導的；社會團結為個體創導準備一些必須條件，為個體創導而盡其保護功能。所以，個體創導和社會團結問題在民主國家得到比較妥善的調協。因而，在民主國家，二者不僅不相尅制，反而猶人之兩條腿，雖一左一右，但能把人帶向共同意志所向之境地。

在極權地區，這個問題則從來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極權統治者解決這個問題之方法，如史達林及毛澤東之流之所為者，則是根本藉否認個體自由而取消個體創導，納所有個體於「一個首領（史、毛等）」，「一個主義（馬列主義）」，和「一個政黨（共產黨）」之下。彼等於藉此手段剝奪千萬億人之個體創導機會以後，便將創導機會獨攬於彼等極少數人之手。彼等「一朝權在手」，則依其主觀之妄想，為所欲為，將千萬億人納於彼等認為「當然合理」之同一模型之中而塑造之，若磚瓦廠之製造磚瓦然。這樣的上好辦法一行，上焉者將一部份人造成酒醉瘋狂之徒，狂馳疾走，如野獸出柙，如火牛出陣；下焉者則把人一個個地壓成柿餅，扁扁平平，了無生氣，慊慊欲絕。人間世之悲劇，孰過於此！

話談到這個地步，我們不妨再來對於羅素底哲學思想稍稍勾勒幾筆。羅素底哲學思想，可以叫做「解析的經驗論」(Analytical Empiricism)。顧名思義，羅素對於哲學傳統(Philosophical Tradition)多持批評的反對態度。在《吾人對於外在世界之知識》(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一書中羅素表示，哲學傳統之原本衝動，是由希臘哲學家以推理為萬能之信念而來。「於是，希臘哲學家以為僅僅藉著思想，我們就可以得到關於整個宇宙之最令人驚奇和重要的真理。而且這些真理是確定的，沒有相反的觀察可以動搖它們。」

結果，時至今日，許多哲學家太過重視思想家心中怎樣變化，許多哲學家斷定，因為他們之所能知者乃哲學家心中怎樣變化，思想或觀念乃知識僅有的泉源，結果也就是唯一的實在；物質只有當著人觀察時才存在。

羅素則對一切玄學的思辨都不信任。至於神祕的慧見，他認為不在哲學範圍以內。「關於神祕世界之實在或不實在，我一無所知……我所要表示的是，慧見，是沒有經過檢證的和沒有證據來支持的，因而也就不足以作真理之保證。縱然許多最重要的真理首先是由慧見提出的，還是不足以作真理之保證。」

「理性，與其說是一種創造力，不如說是一種調和力。即使在最純粹的邏輯領域裡，我們常首先藉著慧見而有新的發現。」

我們知道，經驗事物如此林林總總。人類對於經驗事物的瞭解，常由一個方面一個方面著手，而這個方面底知識往往不免與另一個方面底知識發生衝突。調和不同方面底知識之衝突，端賴理性作用。調和知識底衝突必須在一個假定的「系統」以內行之，但不必然在一個「體系」以內行之。如在一「體系」以內行之，所捨必多。「系統」乃一純邏輯構造。這一構造底可能性或可展演性不必假定任何一元，在這一構造以內，除邏輯符號以外，可有敘述符號。敘述符號(Descriptive Symbols)可以隨意代以不同的一組之值。至少，自語法的(Syntactical)意義言之，邏輯無「體」，故邏輯非一「體系」。但邏輯系統以內的敘述符號既可隨意代以不同的一組之敘述的值，於是經過特殊化(Specification)之程序以後，邏輯系統可以塑造成許許多多「體系」。這裡所說的「體系」，如果有認知的意義(Cognitive Sense)，即是，如果是可印證的(Confirmable)，那麼便是像「物理學底體系」，或「地質學底體系」，或「森林學底體系」的體系的等等體系。當然，像這樣的體系，不僅僅是極端名目論者(Radical nominalists)所謂的一組語句(a set of sentences)，而且是與此一組語句相應的一組命辭(a set of propositions)。通常，一組命辭形成一種學說。這一學說與那一學說怎樣調和，是學說底學說之研究題材。此種研究，一方面是語意學的問題，另一方面是邏輯問題。無論是那一問題，主要地是羅素所言知識之調和問題。而一般傳統上所謂的「體系」，即所謂「體系哲學」(Systematical Philosophies)所例示者，則大異其趣。一般傳統上所

謂的「體系」，主要乃一心靈創造。理性論者以爲理性可以創造知識。（此處理性論一詞，從其廣義的用法：包括唯心論）既然如此，人類心靈底其他創造亦如知識一般的可靠。這種說法，問題殊多，因而也就是現代哲學解析家所礙難接受的論旨之一。關於這一類底問題，在在需要專門而細密的討論。這只好在另一機會裡去進行。

照羅素底意思，他只承認兩種知識：經驗知識與邏輯知識。經驗知識包括常識和經驗科學底知識。這一類底知識以觀察和試驗爲根據；這一類底知識包含事實陳述和假設。邏輯知識是演繹的真理。這種知識所涉及的乃語句與語句之間，或類簇與類簇之間，或關係與關係之間之形式的可能聯繫。這種知識之爲真，是以吾人之規約爲出發點。但「規約」並不必要蘊涵「隨意」。

羅素抱怨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們將「邏輯」一詞應用底範圍擴大，以致將「邏輯」一詞之所指在實際上等於一「形上學」。「黑格爾相信，藉著先驗的推理，我們可以證明世界必有各種不同的和重要的特徵。因爲，任何世界，如果沒有這些特徵，便成爲不可能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於是，我們所謂的「邏輯」乃關於宇宙本性的一種研究。宇宙底本性全可從『宇宙必須在邏輯上自相一致』這一原理推論出來。我自己不相信，從這個原理可以推論出關於這個存在的世界之任何重要的東西。」當然，一個純然假設的世界，是可以從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原理推論出來的。羅素又說，雖然黑格爾批評邏輯傳統（即古典邏輯），可是他卻無條件地和不自覺地應用邏輯傳統中

的原則或技術。

本書共分七章。每章從一個或幾個角度來描寫羅素。第一章，哲學家 and 先知；第二章，數學、太平論和婚姻；第三章，兒童、教育與離婚；第四章，第三度結婚和世界大事；第五章，解析的經驗論；第六章，哲學、宗教與道德；第七章，羅素底主要著作。

當然，如果從嚴格的傳記體裁著眼，這本畫傳是差得太遠了。它既不夠概括羅素思想之梗概，又對其生平事蹟記得太少。羅素不僅得到諾貝爾獎金，而且得到英國功績狀；不僅得到功績狀，而且是現代哲學解析之開山大師，與政治上的自由思想之重鎮。這本畫傳與羅素本人底分量相較，顯得太不相稱了。

不過，本書是以趣味為主的。在短短七十八頁之中，它能夠觸及上述那些角度，也算是有益於讀者的工作。書中圖片凡二十八幅，使我們依稀可以想見羅素底生活之一般。第七章所記羅素底主要著作，對於想接近羅素之學者而言，多少是一個幫助。

——原載於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民主評論》四卷九期

附記：評 *A Pictorial 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O. M.* By H. W. Leggett,
Philosophical Library, New York.

新蘇維埃帝國

凡從知識上反共制俄的人，都應該知道大衛·達林其人。達林擁有相當豐富的對俄知識。一談到知識，特別是這一類底知識，今日有許多人便以為所指似乎就是一堆一堆底素樸材料。這樣的材料誠然必不可無，但還不能算是知識。如僅有一堆一堆底素樸材料，對於我們有什麼充足的作用呢？建築一座宮殿，誠然不可沒有磚瓦木石，但僅有磚瓦木石，而其他條件不備，根本不能成爲宮殿。要能成爲宮殿，必須有安排磚瓦木石底辦法。安排磚瓦木石底辦法，我們叫做工程設計。顯然，工程設計，較之製造磚瓦木石是高一層次的事。做一個良好工程師必須有相當長時期的訓練。同樣，在學問上，無論如何，尋找材料是初級工作，而安排材料則是高級工作。安排材

料，我們在思想中必須有一個章法。這個章法，雖然必須扣緊所得材料來說明材料，但不自材料所生，而是靠構思、觀見、解析，或綜合、諸運作而來。一談到這些運作，許多過分謹慎的學人便如操小舟者之初入大海，見驚濤駭浪，不辨東西，莫知所措，便害怕起來，以為在材料之上而談安排之章法，就毫無「準頭」可言。因而，智力不願延伸到這一層次。所以若干年來，在尋找材料上或有成績，但未嘗有太多的觀見出現。而若干號稱有「見」者流，又多屬未做必須的基層找「料」工作。彼等立論，多屬天馬行空，放言無忌，浮泛無根。於是，近若干年來，在中國知識界之一部份，形成了一種特殊現象：找「料」與創「見」脫節。找「料」者自找「料」；創「見」者自創「見」。於是，創「見」者成無源之水，愈流愈乾，愈懸愈空，愈創愈浮。而找「料」者因乏靈感之刺激，與觀見之誘導，於是愈找益愈沉埋。於是而聲臭息焉，於是而不能形成學術思想之大流焉，於是而陰謀作亂者之妄說乘虛而入焉。

嚴格說來，一個合格的找「料」者，如果是有目標與有範圍地找「料」，而不是亂抓一堆，他必須在找「料」之先對「料」有一選擇或取捨。既有一選擇或取捨，便是有一預定(prescription)。特時人多將此預定取用於未經意之間(take for granted)，而極少自覺地提出來加以形造，多憑一自然的心理狀態於未自覺之中運而用之。一旦「料」既到手，便是學問終了之時。這是在半途停住。亦若製磚瓦者將磚瓦運出，撒手而去者然。直接就對學術思想貢獻言，間接就對社會人生

負責言，必須再基於所找之「料」以創真「見」，學問底目標才算達到。

從上面的解析看來，學問之道，實始於「見」亦終於「見」。但此「見」不能以自然的心理運行為之，必須經過長期的理論訓練，增進觀見與思想能力，使這類能力從自然階段更精進一層，到達思想階段。這樣，對「料」之安排會有準頭。於是，「料」與「見」才能密切配合形成知識，產生輝煌的成果，影響社會人生。像達林之研究蘇俄問題，似乎多少合於這個要求。所以，他關於蘇俄問題的著作，較之一般要高出一格。這本小冊便是其中之一。

第一章論蘇維埃帝國的成長。達林說，蘇俄新帝國底擴張主義比帝俄更深入，更具野心：「新的擴張主義，與帝俄的觀點和方法都不同：第一、新的擴張主義，比帝俄時的範圍更廣，野心更大。當年帝俄只覬覦波蘭，土耳其及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吧了。現在新的目標是吞併全球。相形之下，帝俄實在比較蘇俄容易滿足，比較容易和平相處得多。」這是開門見山，一針見血之論。

又說：「第二、傳統的帝國是憑藉武力，駐軍於被征服及被吞併的區域來建立的，而蘇維埃帝國則建立於群眾運動之上。所謂『第五縱隊』，在理論上，就成爲武裝佔領的代用品了。」

「第三、與帝俄大不相同的，蘇維埃政府至今迄未將衛星國家的領土收歸爲蘇俄版圖所有。它仍舊保持衛星國名存實亡的主權，並且絕口否認有剝削衛星國以自肥的企圖。」

列寧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自十九世紀以來「攫取和瓜分」世界殖民地。這些國家離開殖民地就無以為生。但是，殖民地之「瓜分」已至盡頭。所以，爲了維持各自底生存，勢非訴諸戰爭不可。這種戰爭，就叫做「帝國主義戰爭」。若干年來，共產黨人據此「理論」廣事宣傳。吾人需知，人不能在任何時候對任何言論設防警戒。這種宣傳一多，甚至許多非共人士也中其毒，信以爲真。其實，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一形勢根本反過來了。時至今日，所謂「資本主義國家」逐漸放棄殖民地，而代之以起劫掠殖民地的，則是蘇俄。不過蘇俄劫掠殖民地之方式較新而已。蘇俄之劫掠殖民地，是藉組織各國內部「革命」而進行的。這樣一來，被劫掠的國家，在名義上無不獨立存在，但在政治、經濟、軍事，甚至於思想和文化上，卻被蘇俄掏空了。這像吃西瓜一樣，整個西瓜皮還是好好的，而瓜瓢則全空。其狠其毒，千古未有！達林說：「過去十年來事實的演變，證明這種帝國主義論點是錯誤的。這個被『瓜分』的世界——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不停地戰爭以從事爭奪殖民地及屬國的世界——已經產生過不少擺脫了隸屬關係的新國家；『被領屬的』世界已經愈縮愈小了。大不列顛放棄印度、緬甸、錫蘭和巴勒斯坦；荷蘭失去了印尼；法國失去了敘利亞和黎巴嫩；日本吐出朝鮮、臺灣和東北；意大利至少喪失了里比亞及阿比西尼亞；美國放棄了在菲律賓的權利。不列顛帝國的自治領——舊日的殖民地——也不再是皇室的『財產』或被剝削的國家了。」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以來的事實擺

在大家眼前，蘇俄積極企圖奪取這些被「帝國主義國家」放棄了的「殖民地」。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不安最基本的因素。

蘇俄是信仰「唯物史觀的國家。」她開拓殖民地之方法少不了經濟侵略手段。而它底經濟侵略手段，遠較舊式「帝國主義國家」廣泛，深入，而且徹底。照達林底解析，蘇俄對殖民地實行經濟侵略的方式一共有八種之多。而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八種：「第八種經濟上的剝削，要算是歷史上最別開生面的了——蘇俄竟要求衛星國家償付三十年來共產國際墊付給他們活動的「津貼」。莫斯科向保加利亞索償一千萬美元，以結清蘇俄以往給予保加利亞共產黨的財政援助及其領袖居留蘇俄時所耗的生活費用；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既然已經達到了控制國家的目的，當然必須清償以往的債務。假如其他的歐洲衛星國——包括德國在內——也在同樣情形和原則之下償付，這筆欠共產國際的老債，總額可能相當可觀。此外遠東的新衛星國家也將同樣地被索償。蘇俄又有新的生財之道了。」

這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聞！蘇俄幫助叛亂者覆人之國。覆人之國的目標既達，還要叛亂者償清費用，納手術費。此真所謂「鐵算盤打穿了底」也。但不悉叛亂者底利益何在。這個奇聞，在其結構上，等於這樣的故事：一個人有家財一百萬。鄰人覬之，慫恿此人之子曰：「若能殺父，可盡得其財，供汝享受。」其子信以為真。但是，其子說：「我沒有刀啊！」鄰人說：「那很簡單，

我有，你拿去用吧！」這個兒子果真拿這柄刀回家去把他父親砍了。鄰人看見他父親已死，就對他兒子說：「好！你把你父親殺了，你得還刀錢來。我這柄刀價值一百萬元。」結果，除了一雙血手以外，這個孝子賢孫一無所有！

共產黨頭兒盡是這樣的孝子賢孫。毛澤東則爲其尤者。我替這些共產黨頭兒設想，辛苦一世，真是太不值得了。就拿毛澤東來說吧！他打了三十年血仗，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之中被撞得雞飛狗跳，好不容易搶到地盤。搶到地盤以後，在一方面天天殺人，恨不得把非共產黨人都滅光；在另一方面把千千萬萬人民胼手胝足辛勞得來的物資不捨晝夜地送往蘇俄，償還造反之債，而聽任中國人餓死。這個樣子的「革命」，不知是爲了什麼？不管什麼「主義」不「主義」的，仔細想來，這些人一概都是瘋子。

我們只有一項假設可以解釋這等人底行徑，就是：這樣做，可以洩忿，又可以滿足權力欲。我們覺得抽鴉片煙很無聊。但有等人不抽鴉片煙便不能過癮。抽鴉片煙者，其勢非抽到精血枯乾，皮包骨頭，到死不止。醫治這等人物，百藥罔效，只有讓他看看《紅樓夢》裡的「太虛幻境」，或者，讓我佛如來點化點化。

第二章論權力和威信。從第一章裡，我們可以看出達林對於蘇俄的瞭解，是如何之深入。他說：「莫斯科的事實一再表現，說明了在某種情形之下，在有限的時間之內，政治上的權力仍然

是歷史上的主要因素，而經濟現象反而是政治的產物和支流。這個表現，是違反莫斯科的官方理論的；馬克斯的著名公式已經倒轉：政治是「基礎」，經濟反而成了「上層建築」。又說：「政治權力是蘇維埃國家的基礎……」又說：「史達林認為只要在這些『人民民主國家』中保持他的政治機器（例如祕密警察顧問等），這些衛星國的政權是不會發生危險的……他認為只有政治力量才是社會制度的創造者。」凡此等等論據，俱足以表示在俄國的「實踐」與共產黨人所宣傳的「經濟決定一切」的「理論」是怎樣相反。由此，我們知所以破除「唯物史觀」的迷信。

達林更進一層分析權力和威信道：「政治上的權力在心理方面很是重要。變成了心理現象之後，政治權力可以產生更多的權力；而且由於權力本身性質使然，在某種限度之內，權力是會伸展其影響的——它有一種永遠動的性能。不管標榜什麼性質，什麼哲學，什麼目標，一個已經達到相當高度的政府，在相當時期內，可以因權力增加而繼續更高度的發展。」

「在俄國，蘇維埃制度之所以能夠維持，主要歸功於心理狀態的推波助瀾。蘇維埃法律與秩序的基礎，建築在一種『尊敬』之上——尊敬無可抗拒的國家權力。只有極少數人才談得上真心信仰共產主義。一般人心理上也不是天生就憤世的。在大多數人心中，共產主義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已成鋼鐵般的事實：『他們』已經非常強大；抵抗『他們』已經成為無意義之舉。爲了要熬過這段日子，大家情願逼不得已地在思想上適應環境。當然，總難免有少數人要坐牢；有些人也

難免在殺一儆百的情形上被懲誡，至於其餘的人都還可以逆來順受地捱過剝奪了自由的歲月。」這段話真是道出了極權統治下一般人民生活狀態和心理的底裡。他們是這樣懼伏著。他們是這樣直接或間接地被逼著調整自己思想底角度，甚至抽換自己思想底內容，以求適應藉政治強力所織成的人為思想周遭。在純種的極權制度之下是如此，在變種的極權制度之下亦復如是。極權制度者，生人之死敵也！

又說：「史達林就是利用這種群眾的情緒，取得了崇高的地位。他受人尊敬，就是因為他有『無比的權力』。這種尊敬，不是出自對一個可愛的人格關懷的那種感情。甚至黨員們，親信們對史達林的感情，也遠不如他們對列寧或布哈林的感情。史達林很少在公共場合露臉……人民不瞭解他，他也沒有真正的朋友。……」這段話說得再真切也沒有了。

又說：「對統治者敬畏，是從統治權力產生的必然結果。龐大的權力使被統治者產生深切的尊敬。那麼許多年來，蘇俄一直在老百姓心中培植這種畏懼，不如說是敬畏的心理。……」的確，蘇俄型式底訓練目標之一，就是培養被訓者對施訓者的敬畏之心理。其實，這種訓練底基本原則，動物園裡的訓練師是最清楚不過的，並不深高，也不必高談什麼「形上學的基礎」啊！

從第六章「蘇維埃的名流和第二代」裡，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在實際上，是一個階級距離更大和貧富更為懸殊的國家。在蘇俄，家庭是要分等級的。而「每個家庭的

等級劃分都要根據部長會議的命令。」同時，「更具代表性的還有『名流』中的效忠者與不忠者之間的強烈對比：效忠分子得到高度享受，而且被鼓勵去享受；不忠者呢，階級地位，銜頭名號，藍色快車的車票、別墅、著名的私家醫生，甚至個人本身的自由立刻都被剝奪得精光。」極目大地，一切極權統治者之對待「效忠分子」，無不如此，只有顯明與不顯明之分而已。也許有人覺得，極權統治者對待「效忠者」是要好一點。如果他以為如此，那麼我們請他到動物園去上一課。在動物園裡，猴子如果表演得不中意，訓練師就打牠幾棒，或餓牠一頓。獅子表演得妙時，訓練師馬上餵牠一隻死兔。極權統治者對待「效忠者」之「好」就是這樣「好」法的。他並沒有把他們當人看待，只是豢養豢養而已。他用得著他們時，就把他們養得肥肥胖胖的；他用不著他們時，就把他們扔在一邊——不殺掉他們，已算「宅心仁厚」了。他們表演得好，他就鼓掌嘉獎；他們表演得不好，他便痛打幾棍。這與猴把戲有何分別？極權統治根本就是獸畜統治。所以，不說別的，就是單單爲了作個人，我們要反對共產極權主義及其一切方法。

第七章論戰後的共產黨。達林說史達林所用的人，沒有一個不屬史達林派。否則，不會任用。「他們的高陞都是由於史達林的選拔，他們的政治前途也全繫於史達林一人的恩寵。」因而：「蘇俄的領袖們，有意和無意中，總是在舉止上，言語上，甚至衣著上模仿史達林。而且他們之間的相似也不僅在於外形。和這個獨裁者一樣，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是有傑出的學識或個性的。政治局

簡直沒有一個有創造性的思想家，出色的理論家或有才能的作家；政治局的最末一個出色人物是日丹諾夫，但他在一九四八年死了。史達林不能容忍任何一個幕僚在才智上超過他，或者能引起別人的注意，或博得大眾的景仰。在一個知識平庸的人之下，全體都只好是知識平庸的人。史達林的主要幹部只是些行動者，苦幹者，優良的組織者，行政人才，和無情的工頭。自由世界曾經有機會仔細地觀察過他們中的一員——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的許多特點——沒有頭腦，政治手法上的固執，冷酷無情，但孜孜不息苦幹——這些特點同時也就刻劃出來蘇俄當代領袖的典型。」

達林之所言，可謂鞭辟入裡。時至今日，種無分純雜，只要是共產類型底極權統治，情形無不如此。如果「他們的高陞都是由於史達林的選拔，他們的政治前途也全繫於史達林一人的恩寵」，那麼求升官發財的唯一道路，自然是設法使極權者寵信了。當今之世，極權者底品種固然繁多，但有共同的特徵，即是，他們無不自以為是高於一切的「全智全能的父上帝」。既然如此，彼等無不認為言足為無窮則，行足為天下法。既然如此，於是衍產出一種「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到了激化的程度，就要通過手握之權力，具體化而成一種「領導方式」。

常常聽到人說，「某某人不講氣節」，或「某某人不伸大義於天下」，這一類底話。當然，至少從某種意義來說，「氣節」和「大義」都是應須提倡的。不過，如果我們要拿這些話來責人，那麼在當今之世，就得特別審慎。人「應不應該」把「氣節」和「大義」放在第一是一回事；人「能

不能」把「氣節」和「大義」放在第一是另一回事。如果「應該」等於「能」，那麼不僅「氣節」和「大義」不必提倡，這一類底「規範法則」(norms)與「自然法則」之間的界線也就沒有了。人是多方面的存在之一複合。人除了倫理的存在，理想的存在，或精神的存在以外，尚有政治的存在，經濟的存在，生理的存在，以至於物理的存在等等。在這些存在之中，究竟那一種存在最具有決定作用或支配力量，這要視主客二者所構成的情境複雜而定。在平常的情形之下，這些方面的存在各以適當的比例發生作用，而構成我們正常的生活。當然，在特殊的情境中，這些存在中之一種可能特別突出，對我們特別發生支配力量。例如，「大義不屈」，「見危受命」，「餓死於首陽之山」，等等。在這些情形之下，倫理或理想或精神的存在居於主導的決定地位，而生理或經濟等方面的存在居於從屬地位。但此乃非常態的事跡，不能責諸一般的人。

在過去的時代，沒有有效的統治技術，統治者底權力欲不能盡量發揮。因而，個人表現其自由意志之可能較大。時至今日，統治者即掌握現代統治技術之總工程師。彼掌握了億兆人衆底衣食、住、行，各方面。掌握了這些方面，就是掌握了大家底生命線。掌握了大家底生命線，他就不難按照他底意志甚或個人好惡來選擇和懲獎你了。極權者所看重的有而且祇有權力，史達林等口中所說的「國家」，「光榮」，「主義」等等，皆不過掩飾權力的表面幌子而已。既然如此，他所選擇的人，當然是無條件對他個人絕對忠誠的人。只要滿足了這個條件，能力是次要的，知識學

問可有可無，人品操行更不在考慮之列。

這種「領導方式」行之稍久，便無可避免地發生下列結果：有理想，有抱負，有知識，有氣節者，都不接受這種領導方式。不接受這種領導方式，則生活底資糧日益減少，且發展底可能範圍愈益縮小。這種現象，便是在受淘汰之中。這一類底人受淘汰，意即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受淘汰。而接受這一套「領導方式」的，多屬無理想，無抱負，少知識，無骨氣的人。於是，這一類底人成了「上帝底選民」。這一類底人一成了選民，於是生活底資糧日益增加，發展底範圍日益擴大，因而愈來愈浮現於眾人肩頭之上。這一類底人被選擇，意即社會上的遜色分子被選擇優秀分子被淘汰，而遜色分子被選擇，是之謂「反淘汰」。

如果一個社會發展的基本原理是「反淘汰」作用，那麼這個社會底生機絕不能正常發展，充其量只能呈現一時表面的穩定現象。沒有理想，沒有抱負，知識缺乏，和無骨氣的人，固然不能有所作為，但替其顧主在各部門把持樞紐藉以阻塞社會新生機之活動與成長則綽綽有餘。這樣一來，阻塞力量與新生機，二者不是相激相盪，便是互相對消。如果是二者相激相盪，便形成社會大動亂，或走向大崩潰之途。如果是互相對消，那麼便是在統治者方面把全力用來制壓社會自己底發展；在社會方面則曲折折竭盡全力來應付此一制壓力量，或想盡種種方法與之周旋以求自存。這樣，二種力量便是在相互抵消之中。二種力量每天在抵消之中，社會未有不漸趨於萎縮的。

這就像患肺病的人，拖乾了爲止。就在這一斷喪而尚未完全耗竭的時分，社會上可能出現表面穩定的現象。

所以，無可避免地，共黨型類底極權統治，在看起來極其堅硬的外殼以內潛含著自我毀滅的因素。

第九章論真和假。在這一章底開頭，達林說：「三十多年來，蘇俄的發展似乎有著一個不變的趨勢：國家權力範圍不斷逐漸擴張；而在社會與私人生活的各方面，個人卻不斷縮小。我們所看見的其實就是一個極權國家的長成。個人的權限一點一點地失去，被併吞到國家的統轄底下去。這個過程首先在政治上發生，然後擴展到經濟，最後又波及到教育和思想上去。組織和統制日益徹底和嚴密，蘇維埃警察國家於是崛起。」的確，一切純種或變種的極權統治底建立，在基本上，莫不循達林所說的章法著手。極權統治是一種「不全則無」的統治。這種統治絕不能「網開一面」。如網開一面，則面面俱漏。所以，在蘇式極權統治底下，除了政治和軍事不成問題地必須嚴予控制以外，經濟必須「統制」，教育必須「計劃」，文化必須「改造」。面面俱到。

在第十章論及蘇俄的強點與弱點裡，達林下結論說：「這些很明顯地就是今天蘇俄的情形，也就是大家所能看到的情形。不過，假如只從表面的價值來估量它，那也會犯錯誤的。」

「僅僅在表面之一吋，共產國家從中心腐爛起的情形就已經開始。在表面之下還有平民，

他們是三十年專制政治下首當其衝的犧牲者。他們疲憊，沮喪而且緘默。他們的疑惑已經硬化成爲一種生活方式了；外表上，他們好像聽天由命，他們口頭上順從著領袖們的滿口自稱爲人類救星的理論，因爲他們必須這樣做。他們是很聰明的，誰也騙不了他們。……經過幾十年的動亂和壓迫，人民別無他求，主要的是安息。人類的尊嚴的敏銳感覺一直天天被侵犯著，以致整個民族都在渴求著正義與人權。常態的生活——普通人（不是國家英雄或超人）的正常生活——已經變成俄國人可貴的目標。」這些話，刻畫出蘇式極權統治之下人民生活底一般現況，並且傳達出他們共同的心聲。這種生活現況和心聲，無疑是一切蘇式極權統治之下的人民無可避免的共同生活現況和同有的心聲。假若有一天這種心聲能轉化而爲具體的力量，那麼便是苦難的人們真正得到解救的一天。

現在大家的時間這樣寶貴，要讀書就要讀好書。所謂好書之好，至少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內容正確或豐富；二、只爲真理而寫作的。當然，這樣的寫作，其所發生的結果，可以有益於人生。像達林這本書，是滿足了這兩個條件的。全書只有短短二十頁，共分十章。但是，我們讀過之後，一點也不覺得它薄弱。恰恰相反，我們只覺得章章內容充實，取材扼要，而且處處現出他對於蘇俄有比較成熟的知識，和比較透徹的觀察。我們從這本書可以知道一個現代極權統治國家底全般型模。我們更應該由此知道，即使是英美這樣的國家，如果採取蘇俄底方法，遲早也一定

會變成極權國家的。到那時，英美如標榜「反共」，便失去真實的內容了。

本書封裡刊有新蘇維埃帝國版圖在一九三九年以前的狀況和一九三九年以來的擴充之比較圖。書末有「建造『新蘇維埃帝國』的『英雄』們」圖片三幅。看蘇俄統治者對待一般人民之殘酷與兇暴光景，真是令人驚心動魄。

——原載於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八卷十期

附記：本書為大衛·達林著，趙盾譯，今日世界叢書之三，今日世界社出版。